

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绪 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自 1927 年 8 月 1 日诞生起，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伟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全国解放战争大规模作战行动刚刚结束之际，人民解放军又以一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人民一道，经过近三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打败了美国侵略者，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祖国安全。

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并独立地领导人民革命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人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上的一些成就世人瞩目，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有口皆碑，对世界文化、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晚清统治阶级的腐朽，严重禁锢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以外敌的入侵和掠夺，使中国经济逐渐落后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19 世纪 30 年代，当中国还沉睡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急剧上升的阶段。为了开拓新的商品市场，扩大势力范围，攫取资财，资本主义列强把魔爪伸向东方。英国侵略者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麻醉人民的鸦片，以此来达到既毒害中国人民，又获取巨额利润的双重目的。这种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和抵制。1840 年，英国侵略者经过海盗式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俯首就范。从 1840 年至 1910 年，英、美、法、德、俄、日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强制中国割地、赔款，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取得了关税、领事裁判、沿海和内河航行等等特权，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从 1840 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经过 1851 至 1864 年反抗清政府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1857 至 1860 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33 至 1880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等，打击了侵略者，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由于这些斗争没有和还不可能以先进的阶级为领导，因此不可避免地都遭到了失败。

由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聚集了大批爱国仁人志士，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终于在 1911 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的觉醒。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成果很快被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卖国求荣，以出卖中国的主权未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多方政治势力的一致反对，群起讨袁，原来支持袁世凯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感到大势已去，于是抛弃袁世凯，寻找新的代理人。日本支持占据东北三省和安徽、陕西、

浙江、山东、福建等省的奉系和皖系军阀，英、美支持盘踞长江流域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的直系军阀，因而使中国陷入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旧没有改变，中国人民遭受屈辱和灾难的境况一如从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和倡导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接连兴起的工人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无产阶级逐步掌握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7月诞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长期从事民主革命又屡遭挫折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推动下，开始了他的伟大转变。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大会，李大钊还参加了主席团，并担任章程、宣言、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共产党人在大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包含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解释，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正式改组国民党。从此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此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了帮助孙中山创建革命军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一对比共产党人被派去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官，苏联派遣了军事顾问，先后有多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黄埔军校组建的军队，参照苏联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和政治部。

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从1921年下半年到1925年底，共产党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平息广州商团叛乱，先后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等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以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担任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建的叶挺独立团，成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部队。

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使混迹于革命阵营中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感到恐惧，他们加紧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强迫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接着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排斥加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实际上逐步被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所控制。

为了消除军阀割据，统一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参加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由广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强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配合和支援下，长驱直入，迅速消灭和击溃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3月，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北伐军刚刚占领的南京，向国民党右派发出共同反共的信号，窃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要职的蒋介石，加

紧同帝国主义、地主和买办阶级相勾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制造反革命流血事件之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缺乏警惕，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置之不理，致使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时失去有效的反抗而遭受重大损失。在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排除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领导，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领导核心。7月15日，一贯伪装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镇压共产党，同蒋介石遥相呼应。至此，以国共合作形式出现的革命统一战线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历史教训唤醒了全党和革命群众，使我党认识到军队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道路。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由共产党独立组织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说 明

为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学习的指示精神，适应我军干部、战士和全国广大青年学习、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本书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等科研成果，记述了从1927年8月至1953年7月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一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光辉战斗历程。本书对历史事件的记述采取综合、概括的方法，同时适当突出重点，力求简明、准确。在内容上，既反映我军在各个战争时期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和重要作战行动，又反映我军的政治、军事、后勤建设，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突出的英模集体和个人事迹，以及根据地建设和人民支援等。

本书由王道平主持编写。由魏德松、郑功仁、雷光鸿、李昌华、岳思平、林治波、华国富、姜铁军、张晶、齐德学、肖石忠、唐义路等撰写初稿，由傅吉庆负责，魏德松、毕建忠、齐德学参加，对全书进行加工修改。莫阳、沈宗洪、林登泉、姚杰、孟照辉、吴晨、支绍曾对本书的提纲和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年7月

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章 武装起义，红军和苏区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靠手中的军队，实行“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政策，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疯狂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2年6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被杀的在100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李大钊、杨闇公、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郭亮、向警予、陈乔年、罗亦农、彭湃、杨殷、恽代英、夏明翰等，就在这种反革命屠杀中英勇牺牲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人民坚决用武力反抗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并且更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和商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中国，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绝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加之战祸、灾荒频繁，工农运动被镇压，农民土地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大多数中国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表明，中国需要根本变革，人民需要彻底革命，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承担这一重任。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国民党当局宣布“分共”之后，立即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独立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在秋收季节起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以军事行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组织党领导的和在党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起义，打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新的北伐；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党在新时期领导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克服张国青的阻挠之后，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北伐军第11军第24师和第20军等部，于8月1日凌晨2时向南昌城内外的敌军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前委的周密布置，不到5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守敌3000个人全部被歼，起义军缴枪5000余支，大炮数门。当天下午，位于九江马回岭的第25师，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领导下起义，随后开到了南昌。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敌委员会依据中央关于以“左派国民党”旗帜号召革命的精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军个指挥机关参谋团参谋长；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方面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廖乾吾任军党代表；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聂荣臻任军党代表；朱德任第9军（无作战部队）副军长，朱克靖任军党代表。全军共2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但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究竟

走什么道路尚无经验，因此，前敌委员会于起义胜利后，立即按照中央原来的意图率部南下。起义军击退了敌军在瑞金、会昌等地的阻拦，于9月下旬进至广东潮汕地区。但是，很快遭到广东优势敌军的进攻，起义军损失严重。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参加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经闽西转移到赣南，摆脱了敌人的追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南昌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8月1日就成了我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以农民协会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8月9日，“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和军阀结成了联盟，成为同工农阶级势不两立的反革命营垒。党的任务是在那些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省分组织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任务之一”。这样，中央就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规定了总的方向。

湘赣边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部署，各地党组织加紧了秋收起义的准备。从9月上旬开始，秋收起义相继爆发，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参加了临时政清局第一次会后，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回到湖南，同湖南省委一起讨论了起义的各项问题，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集中力量领导浏阳、平江、岳阳、宁乡、岳阳、平江、浏阳、醴陵、安源七县、镇的农民起义，在长沙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省城，同时，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广州。以表明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决心。毛泽东特别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这时，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军，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平江、浏阳西县工农义勇队和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也在修水、铜鼓地区；湘东、赣西儿县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则集结在安源待命。这几支武装都同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湖南省委决定，以这几支武装作为秋收起义的骨干。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些武装。8月底至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安源和铜鼓，向当地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领导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湘东、赣西、鄂南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卢

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辖 3 个团，共约 5000 人。另有一支邱国轩的军阀残余部队愿意和工农革命军一起行动，称为第 4 团。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各团依照省委“会攻长沙”的命令，由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分三路向平江、浏阳、醴陵发动进攻。由于第 4 团中途叛变和个别指挥员指挥失当，致使三路进攻都未能取得胜利，部队反而受到重大损失；同时，由于敌人对我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破坏，各县农民也未能按计划举行大规模起义。根据当时形势，毛泽东毅然放弃会攻长沙的计划，令各团向浏阳县文家市集中。

19 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危险区的正确主张。次日，部队由文家市出发，沿湘赣两省边界东侧南进。24 日，部队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年仅 22 岁。卢德铭，四川自贡人，参加过北伐，历任叶挺独立团营长，第 25 师第 73 团参谋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他作战英勇，指挥果断，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芦溪战斗中，部队又受到一些损失。此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人数已不足千人，组织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所以，当部队沿湘赣边南进至永新县的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部队缩编成 1 个团，加强了党的领导，连、营、团三级均建立党组织，设立党代表，支部建在连上，同时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有重要地位。

此后，毛泽东会见了井冈山地区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率领部队一边行动，一边调查，发现井冈山地区有一定的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地方反动势力较弱，是湘赣两省军阀统治的薄弱地区；而且地势险峻，只有通过“五大哨口”才能上山，这里进可以向湘赣两省发展，退可以上山休养生息。经过考察，毛泽东决定以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于 10 月下旬率部进驻井冈山的茨坪。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黄麻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党领导的另一次较大规模起义，是黄麻起义。

9 月下旬，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曾掀起一次群众斗争高潮，由于没有武装力量作支柱，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10 月，中共鄂东黄麻特别区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党组织深入动员群众，整顿农民自卫军，很快组织起拥有 3 万多人、300 余支枪的群众武装。11 月 14 日，千余名义勇队队员在大批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黄安城，歼敌 40 余名，缴枪 30 余支、子弹 90 余箱。接着，黄安农民政府成立，曹学楷任主席；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成，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不久，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黄安，鄂东军固守县城，遭严重损失，潘忠汝不幸牺牲。随后，起义武装 72 人转移到黄陂以北的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 年 1 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黄麻起义点燃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烈火，为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此外，党组织还在湖北、粤东、苏南、豫内、陕北、冀北一些地区领导农民秋收起义或革命军队起义。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广州起义 1927 年 11 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成果，讨论党的新的工作

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不承认中国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它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这就使“八七”会议中出现的某些“左”倾苗头得到发展，并形成了全局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还不适当地把以军队为骨干组织起义的行动批评为“军事投机”，以致后来一些地方解散了已经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虽然中央很快发现了上述错误，并坚决予以纠正，但已经使实际工作受到了损失。

早在1927年9月，中央就计划夺取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当时认为，武装起义“是从下至上，从乡村到城市。乡村不肃清，单以占据城市是占不住的”，因此要求广东省委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东江、西江和海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尔后在城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广州。11月中旬，粤桂两派军阀争夺广州的矛盾激化，张发奎、李福林两军主力分别集中在西江、东江、韶关、江门地区，广州兵力相对空虚。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7日通过决议，要求广东省委乘机迅速组织工农起义，夺取广东政权。

根据中央决议，广东省委于11月26日决定，立即组织由我党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工农武装在广州起义，夺取并巩固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省委在广州工人中组织赤卫队，在教导团和警卫团官兵中进行秘密动员；成立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兼委员长；建立起义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起义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消灭了敌炮兵团等部，攻占公安局，控制了城北制高点观音山，除少数据点外，广州珠江以北市区的大部被起义军占领。当天，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工人的杰出领袖苏兆征当选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叶挺任革命军总司令。苏维埃政府庄严宣告：“广州政权已被我们无产阶级夺过来了”！

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能容许有一个人民的广州。从12日起，由外地回援的敌人向起义军民发动了疯狂进攻，同时对群众开始血腥屠杀，几天中就杀了5700余人。停泊在珠江上的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积极配合和支援反动派的行动。起义军民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战斗，终出敌我兵力悬殊，被迫于13日退出广州，张太雷不幸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曾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湖北、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无产阶级建立城市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州起义部队的主力1000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参加了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韶关，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

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军一部转移到赣南时，人数已不足800人，主要领导干部只有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10月下旬，部队在信丰附近进行了整顿。朱德在军人大会上分析了革命必定能发展的条件，并且宣布：今后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陈毅

告诉大家：在部队，有枪可以杀敌人；离开部队，只能被敌人杀掉。并且指出：“只有经过困难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王尔琢号召：坚决拥护朱德、陈毅的领导。这样，就使部队稳定下来。随后，转移到韶关，使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12月下旬，参加过广州起义的200余人来到韶关，编入了这支部队。

1928年1月，朱德、陈毅与毛泽东派来的工农革命军代表取得了联系，立即率部由韶关北上，智取宜章城，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接着挥师北进，配合湘南特委发动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10多个县的农民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2个独立团，部队扩大到近8000人；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和宜章、郴县、耒阳等县苏维埃政府。

从3月下旬起，湘粤两省敌军7个师向起义军民反扑。由于敌军强大，加之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义军无法在湘南立足，朱德、陈毅遂于4月上旬率部向井冈山转移。

在广州起义、湘南起义的同时和以后，各地党组织还领导了赣西、赣南、赣东北、湘东、湘西北、闽西、浙南、皖北、苏北等地的一些起义，广西、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党组织也领导了一些起义。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12个省，140多个县共领导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起义。尽管中央的决策有过失误。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也不尽如人意，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党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探索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这些起义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影响，而且在起义中建立和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取得了初步经验。

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肯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浪潮尚未到来。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聚集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大会要求：在已经起义的地区，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要求。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任务是：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发展正式的红军，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培养、训练党员和干部，造成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党的“六大”关于形势分析和革命的性质以及某些任务、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某些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大”决议没有能够解决的中国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领导人坚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正确解决。

井冈山红4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进驻井冈山后，先后攻克茶陵和遂川，建立两县的中共组织、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毛泽东和前委还帮助宁冈、永新、莲花、酃县恢复或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对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改造工作，把它编成第1师第2团。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第1师粉碎敌军的第一次“进剿”，初步建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4月中旬，朱德、陈毅等率领湘南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到达井冈山，同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不久又缩编为2个师。5月下旬，师的番号撤销，军直辖4个团，即第28、第29、第31、第32团。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先后成立，毛泽东任特委书记，袁文才任政府主席。

5月2日，毛泽东就红4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方针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提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军队，以促进湘赣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军委采取了对内加强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一方针对红4军取得反“进剿”和反“会剿”的胜利，巩固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大意义。

从4月底开始，红4军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剿”，特别是6月下旬粉碎敌人第四次“进剿”中，在龙源口、七溪岭全歼敌军1个团、击溃2个团，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井冈山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总面积7000余平方公里，人口65万。敌人在“进剿”中，少则3、4个团，多则7、8个团，红4军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坚决和敌人作斗争，使割据区域、革命政权、红军和党组织一天天壮大，土进革命一天天深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湘赣边界党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关于红4军的行动问题，中共湖南省委在6月的几个星期年三变主张，时而要红4军去湘南，时而要

求去湘东，使红4军无所适从。7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17个团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边界特委以红4军主力攻克酃县，调回了湘军；以1个团配合永新地方武装，将赣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就在反“会剿”临近胜利的时刻，湖南省委代表却鼓动红4军主力冒进湘南，致使反“会剿”功亏一篑，造成井冈山和湘南两处失败，第29团也损失殆尽。在第28团返回井冈山途中，又发生了营长袁崇全率两个连投放叛变的事件，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团长王尔琢在追赶这两个连队时，不幸被叛徒开枪杀害。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既善长军事指挥，又会做政治工作，鼎力协助朱德、毛泽东巩固部队和指挥作战，和官兵同计苦、共患难，深得士兵爱戴，牺牲时年仅25岁。王尔琢虽然牺牲了，但被叛徒欺骗的两个连全部回到了井冈山。连战斗中失散的一个担架兵，也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部队。正像陈毅在一个报告中所说：“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可能有的。”

在红4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前，敌军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会剿”。红4军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1个营的兵力，依托黄洋界天险，打退敌军4个团的轮番进攻，保住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热情赞扬这次战斗的胜利：“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红4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后，南进遂川，北出永新，忽南忽北，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不停止对井冈山的进攻。井冈山根据地基本恢复。

10月至11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共红4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任书记；根据中央指示，边界党的最高机关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毛泽东以《井冈山的斗争》为题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一年来，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土地分配、政权、党组织和根据地建设诸方面的经验。这是一个全面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光辉历史文献。

在井冈山红4军艰苦奋斗的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湘鄂边地区红4军成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年春，由贺龙、周逸群领导桑植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刚建立，没有经过整顿和改造，就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仅经3次战斗就被打散，周逸群同部队失去联系，转往洪湖地区。由于贺龙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和号召力，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失败后，很快又集合1500人，于7月初编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又称红军第4军），并建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后改称湘鄂西前委），贺龙被任命为军长和前委书记。但是，新组成的部队仍不巩固，在石门活动时又被打散，仅余200余人，退回桑植、鹤峰边界的堰垭。两次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湘西前委深深认识到，要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必须建立一支有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拖不垮、打不烂的红军。于是，前委坚决整顿了部队，遣散投机分子，建立基层中共组织，发展士兵党员，加强基层领导骨干。整顿后，部队虽然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但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接着，部队到鄂西南地区游击一个多月，吸收一批劳动群众入伍，于1929年1月攻占鹤峰县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部队重新发展到1000余人。

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年1月，中共湘西北特委将鄂中、鄂西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5军和监利、石首等游击队集中起来，在长江两

岸开展游击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2月，湘西北特委把部队交给鄂西特委后转往湘鄂边。不久，鄂西特委被敌破坏，部队也在敌人的“清剿”中受到严重损失。周逸群由湘鄂边回到洪湖后，重建鄂西特委，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游击队改编为特务队，扎根于农民群众中，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利用河湖港汊的有利地形和优越的群众条件，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补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党和游击队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建立了小块秘密割据区域。有一首广为传诵的民谣：“老子本姓天，住在洪湖边，有人来捉我，除非是神仙。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有你便无我，你死我见天”，就是洪湖地区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

鄂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红11军第31师成立 1928年春，由鄂东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7军，在黄安城突破敌人围攻后，辗转在黄冈、罗田、麻城、黄安、黄陂、孝感地区流动游击，取得一些胜利，但在敌军的“清剿”下，处境十分困难。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和地方中共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立足点，进行有根据地的斗争。这次会议成为鄂东北革命斗争的转折点。会后，部队开到柴山保（今河南新县陈店乡）地区，会同地方中共组织发动群众，争取团结当地的红枪会势力，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建立具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采取减租减息，而不是分配土地的斗争策略，受到各阶层群众的欢迎。同时，又打退敌人几次小规模进攻，到7月，拥有20万人口的柴山保根据地初步建成，部队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共120余人。同年冬，鄂东北党组织总结斗争经验，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在东起英山、西到武胜关之间，依托大别山进行武装割据的战略计划。依据这个计划，红11军第31师返回黄麻老区恢复工作，鄂东北党组织同豫南、皖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以推进战略割据计划的实施。

平江起义，红5军成立，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年3月湘东起义后，敌人在平江疯狂“清乡”，残杀大批群众，群众忍无可忍，纷纷参加游击队或配合游击队作战，游击队发展到360余人。同年6月，湖南当局派独立第5师第1团到平江“清乡”。该团团长彭德怀出身贫苦，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在部队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并于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德怀率部进驻平江后，同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取得联系，于7月22日率部举行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彭德怀被士兵选举为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全军共2000余人。此后，红5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通山之间，虽然给了三省“会剿”之敌一定打击，但因不习惯于游击战争，部队锐减到700余人。10月，红5军将平江、修水等游击队编入部队，组成第1、第2、第3纵队。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由黄公略率第2纵队坚持湘鄂赣边区的斗争，彭德怀、滕代远率主力约800人到达井冈山，12月10日同红4军会师。

赣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弋阳、横峰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第1连转移到磨盘山区后，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1928年5月间先后建立了大阳、横峰两县苏维埃政府，控制了10多个村庄、纵横各30公里的地区。不久，敌人纠集1个团和各县反动武装前来围攻，省委代表提出掩埋枪支、解散部队的错误主张，遭到方志

敏的坚决反对。在敌人围攻的紧要时刻，方志敏主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否定了埋枪散伙的意见，率领军民打退敌人的围攻；随后，又于10月和12月打退了敌人第二、第三次围攻，并争取敌军2个连起义，初步巩固了根据地。同年10月，在赣东北革命斗争的推动下，闽北中共组织领导崇安、浦城农民起义。

赣西、赣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3年春，赣西起义组成的江西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编成后，分别战斗在吉安东南部的东固和北部的延福地区，到同年4月，初步形成了以东固为中心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5县边界的秘密割据区域(推毁了反动政权，但无公开的革命政权)。6月，第7纵队粉碎敌人5县“会剿”，割据区域扩大到纵横各40公里的范围。接着，第7、第9纵队联合作战，在吉安和吉水、新余、分宜、安福等县边界，同1个旅的放军作战多次，均获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同年9月，中共赣西特委将第7、第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学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随后，第2团连续取得攻占乐安、兴国和粉碎“五市联防”进攻的胜利，部队发展到800个人，各种枪430余支。在此期间，中共赣南特委着手在于都县桥头建立秘密割据区，1928年6月组成赣南红军第15纵队，随后又组成第16纵队。1929年初两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任政治委员，全团共400余人，300余支枪。

同上述几个地区坚持斗争、不断胜利相反，有的地区虽然基础较好，革命军队也不少，但由于当地党组织不善于运用来之不易的革命武装，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采取埋枪散伙或执行“进攻路线”的错误方针，使武装斗争遭到失败。惨痛的教训说明，对敌斗争既要有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又要有正确的斗争方针，二者缺一不可。

总之，1928年是红军极端困难的一年。其根本原因是：红军刚刚诞生，力量很弱小；而敌人拥有全国政权，力量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不屈不挠地领导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广大红军指战员更是含辛茹苦、浴血奋战，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三、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29年至1930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张发奎反蒋战争、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战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等。战祸波及华中、华南和华北广大地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正如毛泽东在一首词中写的那样：“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同时，全国发生大面积水、旱、蝗灾，灾民达7000万。在战争、灾荒和国民党暴政的多重肆虐下，广大农民几乎完全丧失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从而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高潮。

新军阀之间的内讧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高涨，大大减轻了各地红军和游击队所受的压力，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和苏维埃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中国共产党内，“六大”的精神先后传达到各地，给全党以巨大鼓舞和力量。中共中央对各地游击战争的具体指导既积极、又慎重，例如提出争取农民中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秘密团体，实行党员军事化，告诫红军“切勿轻易到接近海口的地方”，指出目前红军的任务“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红军“应向群众力量及党的工作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地形便利及给养不缺乏的地方发展”等等。当然，中央在具体指导中也有失误，如曾先后给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将红军分成若干小的游击队，实行“分散游击”的方针。但当中央看到各地领导人不同意离开部队和分散游击，也就放弃这个意见了。所以，中央的这个失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1929年6月下旬，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规定了党在当前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区与红军、加紧党员军事化和群众的武装训练等15项任务，确定了“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新的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正式把党领导的武装划分为赤卫队、游击队和主力红军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正确的，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1929年至1930年春的多次“会剿”和“清剿”，使红军和苏区有了更大发展。

赣南、闽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在蒋桂战争开始以前，湘赣西省敌军纠集7个旅的兵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以边界特委和红5军军委率红5军主力和红4军第32团在内线作战，前委率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14日，红4军主力由井冈山出发，经崇义到大庾（今大余），遭到强敌跟追，遂绕道南雄、信丰、安远、寻乌、武平等县向瑞金转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和敌人围追堵截等重重困难，以每天行走45公里以上速度同敌人周旋，并且在大柏地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歼敌1个多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扭转了被动局面。几年以后，毛泽东还写了“当年度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著名词句，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

大柏地战斗后，红4军于2月19日到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在这里，红4军前委得知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已经失陷，并且从东固的秘密割据中得到启示，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3月14日，红4军攻占长汀，消灭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

2000 余人，击毙其旅长郭风鸣，打开了通往闽西的门户，给了闽西党和人民以巨大鼓舞。

在长汀，红 4 军部队改编为 3 个纵队，全军换上了新衣，并且接受著名医生傅连璋的建议，为全体指战员接种了牛痘。前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 20 余县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公开苏维埃割据，作为前进的基础。

奉命留守井冈山的红 5 军等部，以 1000 余人的兵力同万余敌人进行了 4 天的英勇战斗，终因兵力过小，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于 1 月 30 日失守。红 4 军第 32 团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斗争，红 5 军主力突出重围，到赣南寻找红 4 军，途中在赤卫队配合下，先后攻占于都、安远、瑞金等地，缴枪数百支，4 月 1 日，同由闽西到赣南的红 4 军在瑞金会合。

红 4、红 5 军在瑞金收到中央 2 月 7 日关于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部队分散游击的来信。红 4 军前委和彭德怀随即复信中央，认为目前敌人最嚣张、红军最困难的时期都已过去，而且有了一套发动群众的办法和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江西、福建有发展革命战争的良好基础和前景。前委还向中央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作为前进的目标。不久，前委又在于都召开了有地方中共组织、红 5 军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了这个战略计划。根据会议决定，红 5 军返回湘赣边区，红 4 军在赣南、闽西活动，地方党组织加紧工作，以推动这个战略割据计划的实现。

红 4 军在赣南期间，同江西红军第 2、第 4 团一起，分兵在瑞金、于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地区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且攻占兴国、宁都县城，建立了兴国、宁都、于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前委还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使赣西、赣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红 4 军攻占长汀后，闽西中共组织领导连城、长汀等县农民起义。5 月 19 日，红 4 军乘闽军到广东参加军阀战争之机第二次入闽，先后三次攻克龙岩，占领永定，共歼敌 2000 余人。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永定、龙岩、长汀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地方武装、赤卫队升编为红 4 军第 4 纵队，闽西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进入高潮。正是：“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 年 8 月，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地区红 4 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 4 军以 2 个纵队出击闽中；2 个纵队留在苏区内，配合赤卫队切断敌人交通，断绝敌人粮源，打得敌人寝食难安，使敌人陷入困境。不久，转移到外线的红 4 军 2 个纵队返回苏区，歼敌一部，迫使敌人仓皇退出苏区；接着，乘胜攻占号称“固若金汤”的“铜”上杭，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10 月，红 4 军根据中央指示进军东江，一度攻克梅县城，随后返回闽西。在此之前，红 4 军于 6 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由于领导者之间对建军原则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 4 军主要领导岗位。8 月在上杭召开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继续讨论上述问题，但仍无结果。10 月，红 4 军前委收到党中央肯定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的“九月指示信”。红 4 军返回闽西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于 12 月下旬在龙岩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 4 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古田会议通过《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等13个文件，精辟地总结了红军诞生两年多的丰富建军经验，规定红军必须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标志着红军建军原则的基本形成。

1930年1月，敌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红4军全部转往江西，闽西地方武装坚持当地斗争。敌人“会剿”破产后，闽西武装合编为红军第9军（不久改称红12军），随后又建立红军第20、第21军，以巩固、扩大苏区；并建立闽西红军学校，以培养基层军政干部。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此时，闽西苏区发展到纵横各150公里，人口近100万，建立了8个县委，6个县苏维埃政府；苏区内有党员1万余人，赤卫队员3万余人，少先队员5万余人；建立了工农银行和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得到全面发展。

在赣南地区，江西红军第2、第4团粉碎敌军“会剿”后，各地秘密割据逐渐变成公开的苏区，游击队发展到10多个纵队，党组织又领导吉安靖卫团起义，编成江西红军独立第3、第5团。1930年1月，4个红军团和一部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2000余人。

2月上旬，中共红4军前委和红5、红6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代表在吉安县陂头召开联席会议（“二七”会议），确定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夺取江西全省的工作方针，并决定将红4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4、红5、红6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前委，选举毛泽东为书记。随后，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并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2月下旬，敌军对赣西南地区发动新的“会剿”。红4军和红6军1个纵队以“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的办法，在水南、值夏地区将敌孤军冒进的1个旅大部歼灭，俘敌1600余人，缴枪3000余支。此后，红4军在赣江以东的赣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经过3个月的努力，赣南苏区发展到10多个县的地区，并且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了土地，不久，赣南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22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红22军调走后，又组成红35军，邓毅刚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湘鄂赣边、湘赣边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红5军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第2纵队，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和“打圈”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红军和游击队都得到了发展。1929年4月，第2纵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红军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支队辖3个纵队，共600余人，枪600余支。6月至7月，敌人正规军5个团和7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发动三省“会剿”，边区群众“牺牲者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域房无完舍，十室九空”。但是，边区军民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又在鄂东南地区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并且迅速发展到数百人。9月，红5军主力返回平江，同湘鄂赣红军支队会合，随后，以1个纵队坚持湘东北、赣西北地区的斗争，3个纵队发展湘赣苏区，1个纵队到鄂东南开辟新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作战数十次，攻克万载、修水、平江、沔阳、通山、阳新、大冶等县城，歼敌数千人，缴枪2000余支，基本建成湘鄂赣苏区。部队也有迅猛发展，仅

第5纵队就发展到6000余人，并且组成湘鄂赣独立师，各县赤卫队也有了巨大发展。

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失守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抽调部分赤卫队，同红4军第32团和红5军1个大队合编为独立团，继续坚持边区斗争。1929年5月，红5军返回宁冈，同独立团会合，基本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随后，部队游击于湘粤赣边区广大地区，取得多次战斗胜利，筹集了相当多的军用物资，为坚持长期斗争准备了条件。8月，红5军主力离开湘赣边区，边界特委率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于10月间攻占永新，从此，边界的政治中心由井冈山转到永新。1929年冬至1930年春，红5军3个纵队和红6军主力先后取得攻克安福、分宜、宜春、路口等战斗的胜利，歼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到1930年7月，包括湘赣边界和赣西的湘赣苏区，已有16个县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编成红军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兼政治委员。红20军调走后，又组成了湘东独立师，继续坚持边区斗争。

湘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湘鄂边红4军攻占鹤峰后，收到中央发来的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红4军的建军经验，全军遂集中在堰坪、红土坪地区学习中央文件，总结一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思想和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政治机关，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1929年3月18日，红4军集中兵力击退桑植、鹤峰、五峰三县团防3000余人的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随即东出到石门北部，因未找到战机，遂转兵桑植北部，一边从事群众工作，一边向南发展，于6月间攻占桑植县城，基本建成了湘鄂边苏区。7月，湘鄂边苏区军民粉碎湘西军阀的两次进攻，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部队发展到近4000人。同年9月，敌正规军对桑植发动进攻，红4军避敌锋芒，转到鄂西，将根据地扩大到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地区，并且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1930年2月，中共湘鄂西前委留一部兵力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斗争，率红4军主力沿湘鄂西省边界向东发展，于6月间攻占公安县城（今南平镇）。

1929年3月，在洪湖地区的鄂西游击队乘蒋桂战争爆发的机会，集中力量发动进攻，17天中连打21次胜仗，初步打开了斗争局面。随后，游击队根据特委“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方针，分赴监利、石首游击，都得到了发展。6月下旬，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周逸群兼总队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大队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维护纪律的纠察队；总队成立教导队，用以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游击总队还在作战中形成了战斗讲评制度，每次战斗结束后，评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战斗员的战斗动作，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8月，敌军对洪湖地区发动“清剿”，鄂西游击总队利用敌军在水网地区运动不便，而自己熟悉地形和水性的特点，及时转移兵力，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经过3个月的奋战，于11月取得反“清剿”的彻底胜利。接着，又展开攻势作战，扩大苏区，到1930年春，使原来被敌人分割的几块苏区连成一片，部队扩编为红军第6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随后，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宣布成立，周逸群兼主席。苏区内建立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华容6个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发展到近20万人，苏区外的游击区域发展到17个县境。同年夏，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建立红军第26师，巴东、兴山、秭归地区建立红军第

49 师，有力地配合了红 4、红 6 军的斗争。

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1929 年春，鄂东北党组织利用军阀战争，领导红 11 军第 31 师积极活动，消灭民团数股，缴获各种枪 170 余支，根据地发展到纵横 30 至 40 公里的范围，部队发展到 400 余人，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宣传队。5 月初，红 11 军军长兼第 31 师师长吴光浩，率部分干部到商城指导工作，不幸在罗田遭敌袭击牺牲。吴光浩，湖北黄陂人，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营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鄂南农民起义和黄麻农民起义，是鄂东北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光浩牺牲后，部分干部到达商城南部，参加了商南农民起义，建立了红军第 32 师和豫东南苏区。

6 月至 10 月，敌军对红军第 31、第 32 师发动了三次“会剿”。两支红军都及时跳到外线，以赤卫队配合广大群众在内线袭扰、打击敌军。苏区内的抢声、锣声、群众的“叱喝”声此起彼伏，敌军一夕数惊，疲惫不堪，不得不狼狈地退走。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苏区内被“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宿营无房，采买莫由，问路无人”，寸步难行。

在反“会剿”胜利的基础上，鄂东北、豫东南两苏区统一为鄂豫边苏区。皖西地区的中共组织在第 32 师的支援下，发动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建立红军第 33 师和皖西苏区。1930 年 4 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第 31、第 32、第 33 师合编为红军第 1 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6 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甘元景任主席。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赣东北、闽北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赣东北红军第 2 军第 2 师第 14 团于 1929 年 4 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 1 团，随后粉碎了敌军第四次围攻，以弋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初步建成。从 7 月起，江西红军第 1 团先后取得贵溪、横峰、周坊、团林、弋阳、秧坡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苏区也随之扩大。10 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此后，第 1 团又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攻占鸣山煤矿和景德镇两战，缴枪数百支，部队迅速扩大，遂于 1930 年 7 月改编为红军第 10 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治委员；苏区发展到约 1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苏区内普遍分配了土地，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闽北崇安、浦城起义后组成的红军游击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同赣东北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夹信江相呼应。1930 年 1 月，闽北游击队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团，3 月，该团发展到 1200 余人。同年 7 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

广西右江苏区的建立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9 年夏，中共中央应国民党进步将领李明瑞等的要求，派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干部到达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 12 月，李明瑞等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 4 大队在百色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 7 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1930 年 2 月，在邓小平指导下，李明瑞、俞作豫率警备第 5 大队在龙州起义，部队编成红军第 8 军，李明瑞任红 7、红 8 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 8 军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不久，红 8 军在敌军进攻下大部失败，一部转移到右江，加入红 7 军。红 7 军经过多次战斗，基本巩固了以东兰、凤山为中心区域的右江苏区。

此外，中共组织还在广东创建红军第 11 军和东江小块苏区，在浙江创建

红军第 13 军和浙南游击区，在江苏创建红军第 14 军和(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苏区，在四川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和川东游击区，在海南岛创建琼崖独立师和琼崖苏区。虽然这些红军和游击队有的失败了，有的遭到严重挫折，但都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 1929 年至 1930 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有了迅猛发展，主力部队由 7000 人发展到 10 多个军、7 万多人，苏维埃区域也同时扩大，基本上形成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和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右江等苏区。这个时期，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除了敌军主力被吸引于军阀混战战场这一原因之外，主要地还在于中央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已经积累了建设军队、指导作战、发动群众和建设苏区的一整套经验，对于敌人的进攻有了措置裕如的办法。这样，红军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尔后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准备了条件。

四、红军主力兵团的建立，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行动

继 1930 年春的军阀战争之后，5 月又爆发蒋介石集团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之间的军阀大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广大群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中湘鄂赣三省流离人口达 25% 至 48%）、饥寒交迫，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更加脆弱。

军阀大混战给红军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依据这一客观形势，1930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但是，这时党内的“左”倾思想也随着发展起来。6 月 11 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党有可能在这个高潮中争取全国胜利，因此要求各地组织总暴动，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以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这样，从 1929 年下半年逐渐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就形成了新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在中央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各地红军被迫开始了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作战行动。

红 1 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 年 6 月中旬，中共红 4 军前委在长汀开会，决定红 4、红 3、红 12 军组成红军第 1 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全军团共 2 万余人。随后，红 1 军团根据中央夺取南昌、九江的指令由长汀北上。25 日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 16 人为委员。7 月 24 日，红 1 军团攻占樟树（今清江县城），歼敌第 18 师一部。毛泽东和朱德审时度势，不赞成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在攻占樟树后，引军西渡赣江，攻占生米街、万寿宫地区。8 月 1 日，在以部分兵力攻占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 3 周年之后，全军转往安义、奉新地区休整，避免了进攻南昌的不必要损失。接着，部队继续西进，20 日在浏阳文家市地区歼敌 3 个多团，俘敌 1000 余人，缴枪 1500 余支。

红 3 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战斗在湘鄂赣、湘赣苏区的红 5 军，于 1930 年 6 月上旬集中在大冶刘仁八地区，将第 5 纵队编为红军第 8 军，军长李灿未到职，改由何长工为军长，邓乾元为政治委员。红 5、红 8 军组成红军第 3 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同时，鄂东、赣北游击队编为红 8 军第 4、第 5 纵队，不久这两个纵队北渡长江，开辟了蕲（春）黄（梅）广（济）游击区，并于 10 月改编为红军第 15 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红 3 军团成立后，根据中央“切断武长路”的指令向西进击，连克通山、崇阳、岳阳等城，歼敌一部，缴获火炮 16 门，从此，红军有了炮兵。随后，红 3 军团回师平江，击退敌军 7 个团的进攻，于 7 月 28 日乘胜攻占长沙，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3000 余支。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攻占省城。红 3 军团占领长沙期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成立，李立三当选为主席；并以红 5 军第 1 纵队和湘鄂赣独立师合编为红军第 16 军，胡一鸣任军长，李楚平任政治委员。8 月上旬，敌军集中兵力向长沙反扑，红 3 军团退回平江。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 年 8 月 23 日，红 1、红 3 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两军团前委当即举行联席会议，宣布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和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全方面军共3万余人。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红1方面军成立后，以红16军在湘鄂赣边区担任掩护，主力5个军向长沙进逼，根据总前委将敌诱出工事加以歼灭，然后乘胜攻占长沙的部署，在城郊待机。从8月底至9月11日，放军除以1个师出击，被方面军歼灭2个多团外，其主力始终没有离开工事，方面军两次组织强攻，也未奏效。总前委鉴于敌军不肯就范，红军再战不利，遂主动将部队撤至株洲、萍乡地区休整，然后以红1军团攻占吉安，再将全军置于分宜至清江段的袁水两岸，以战备姿态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红20、红22军归入红1军团建制，方面军总兵力达到4万人。

至10月，赣西南苏区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连同赣西、赣西北、赣东北在内，江西省有了60余县的苏维埃政府。在此形势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曾山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也从这时起，把赣西南、闽西地区称为“中央苏维埃”区域，这就是后来“中央苏区”称呼的由来。

红2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年7月初，湘鄂边红4军（不久改称红2军）和洪湖地区红6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全军团共1万余人。红2军团成立后，根据前委首先拔除洪湖苏区内的白点，尔后向汉水以北和鄂西北发展的方针，先后攻克岳口、潜江和沙洋等城镇，把苏区扩大到了汉水以北。9月，红2军团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令，强攻沙市未克，部队伤亡1000余人；随后移军东进，攻占监利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28日，鄂西联县政府改组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10月中旬，红2军团渡江南征，先后攻占南县、华容等城，歼敌1000余人；后来远离苏区，转战于津市、澧县、石门之间，虽然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部队也受到很大消耗，被迫于12月上旬退回松滋杨林市、街河市地区休整。

红1军的作战行动 红1军成立后，军部率第2、第3师在皖西发动攻势，连克霍山、英山等城镇，歼敌近3000人；第1师向平汉线发动进攻，连续取得杨家寨、杨平口、花园、云梦等战斗的胜利，歼敌2000余人，缴枪约1800支。1930年8月，全军在四姑墩会合，并取得小河溪战斗的胜利，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9月，红1军根据长江局的指令沿平汉线北上，进攻广水、信阳均未得手，部队受到不少损失，遂主动撤离交通线，攻占光山、罗山县城，歼敌1个多团，随后集中在潘新店地区休整。

红7军的作战行动 1930年10月，红7军接到中央早先发出的关于向广东西江、北江发展的指示，遂以一部兵力留守右江苏区，主力约7000人沿湘桂、湘粤边界东进，先后占领绥宁、全州、江华等城，于1931年1月到达粤北。2月3日，红7军在乐昌梅花村遭敌重兵袭击，被迫沿湘赣边界向北转移，3月到达湘赣苏区。

红10军的作战行动 红10军成立后，根据中央夺取九江的指令，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先后攻占波阳、都昌等城镇，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歼敌1个缉私营和4县保安团共3000余人，缴枪500余支。随后于1930年11月返回苏区。

总之，1930年夏秋时期，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战略指导，使革命力量受到不小的损失，并且丧失了了在有利形势下争取更大发展的时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主要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

命令弱小的红军去进攻敌人的中心城市，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毫无胜利把握的决战，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挫折。红一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领导者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五、红军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认识和建军原则、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

红军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红军初创时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以北伐军编成的南昌起义军，企图长驱直进，先攻占广东东江地区、后取广州，再行北伐，结果起义军只保存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大部失败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部队，最初也准备进攻中心城市或县城，只是在部队受到挫折后，才转移到农村，使部队得到生息和发展。广州起义时，以北伐军和工人编成红军，准备占领和坚守广州，以促进全省起义，夺取革命胜利；但起义军民只在城里呆了不到3天，就被敌人赶了出来。革命的最初实践说明，中国革命不能按照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道路，而应主要依靠农民，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几省边界山区生根和发展。

最先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特点的是毛泽东。他在经过一年的实践之后，于1928年10月和1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初步论述了红军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同时，鄂西、鄂东北、赣东北等地的中共组织，也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扎根于农民群众中，领导红军和游击队深入开展农民群众工作，以农民为主体建立和发展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一样，实际上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是，当时党中央某些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有人甚至认为，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农民力量会超过工人力量，党的思想会被农民意识所左右，因而不重视红军在农村斗争。直到1930年1月，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后，才使这种思想在红4军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澄清。毛泽东指出：必须认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认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进行有根据地的斗争，有计划地建设革命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在其它斗争形式的配合下，逐渐向全国发展。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偏僻的农村和山区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家族统治严密，地方主义严重，封建迷信盛行，要把这些地区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把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红军战士，确非易事。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湘鄂边、洪湖、鄂东北、赣东北的党组织都遇到类似问题，特别是湘鄂边党组织在将旧的农民武装改造成红军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教训更为深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红军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不断以先进思想教育农民，通过不断扩大游击战争，克服农民的散漫保守思想和地方主义，使党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的任务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某些人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承认“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但不承认“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虽然实际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又不断批判“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中共中央一些人始终盯住城市不放，以致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屡遭挫折。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红军建军原则的形成 红军和其它旧军队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红军的根本宗旨和任务是什么？在红军初创的三年中，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时中央就指出：党建立的武装必须是“工农的革命军”，并且规定，在部队建立广泛的政治工作，建立党的组织，设立党代表，作为维护革命军队本质的保证。此后，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反复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红军任务等建军的根本问题，保证了红军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六大”决议中，又规定建立红军政治部，担任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和对地方政权的指导。

192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规定红军必须执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帮助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在群众支援下战胜敌人和在政治上瓦解敌军的任务；并且号召红军指战员，“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明确的。

各地红军，特别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的建军实践，把中央的建军原则更具体、更系统、更理论化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三湾改编时建立了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设立各级党代表，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协助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显示了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建军原则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规定：红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规定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使红军摆脱了旧军队只管打仗的模式。毛泽东又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它以简单易记的形式，融合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于一体，充分体现了红军的人民性。

经过两年多的建军实践，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时，关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规定就更加明确了。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基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一切形式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军阀主义、雇佣观念等思想和作风，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建军路线。当时中央将红4军建军经验转发各地，因此，不但在红4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在其他地区的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实行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党的领导制度。在三湾改编时，就建立了团委、营委、连队支部，部队各级设立了党代表。随着部队的发展，又建立了帅委(纵委)、军委。红军建立主力兵团以后，军团、军建立了前委，方面军建立了总前委。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制度也得到了加强。部队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首长负责行政管理、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政治首长负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讨论决定，首长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由于部队各级都有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成为红军团结内部、共同对敌的核心，成为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战场鼓动、指导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种很好的上下关系。在红军建立初期，生活极为艰苦，但红军指战员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干稻草来轻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红军的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内的民主生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批评官长的权力，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能从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中节余一点作零用，称为“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可分到六七十个铜钱，闲暇时，可以拿它组织“合作社”，到饭馆“开个荤”，士兵非常满意。尤其俘虏兵，他们感觉白军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生活不如白军，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人，昨天在白军怕死，今天在红军却很勇敢。红军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有一个很好的外部关系。红军和人民、红军和政府，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正因为有了这一切，红军才在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的包围中，成长壮大起来。

红军的组织建设 红军的组织形式服从于红军的战争形式和所处地理环境，各地红军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阶段。赣南、闽西红军先后采取过军、师、团、营、连和军、纵队、支队、大队的编制，1930年秋正式改为方面军、军团、军、师、团、连的编制序列。湘鄂边红4军采取过军、师、大队和军、路、团、营、连的编制，洪湖红军采取过总队、大队、中队和军、纵队、大队的编制，1930年夏红4、红6两军会师后，形成军团、军、师、团、营、连的编制序列。鄂豫皖红军分别采取过师、大队、队和师、同、队的编制，1930夏形成军、师、团、营、连的编制序列。总的来说，红军1929年前组织形式适合于游击战争，1930年后的组织形式适合于运动战。由此可见，红军的组织形式是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红军建立的初期，领导机关中只有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分工，没有军事部门、政治部门的设立，有的虽有政治部的名义，但无工作人员，形同虚设。1929年后，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和战争形式的转变，领导机关建设得到加强，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后称供给部)、军医处(后称卫生部)先后成立。司令部设作战、侦察、交通(即通信)等部门；政治部设组织、宣传、政务(后称群工)、白军(又称破坏)等部门；经理、卫生处也设有相应的部门。领导机关中另设有肃反委员会(后称政治保卫局)，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红军的供给问题，建军初期主要依靠自己打土豪和筹款解决，1930年后，一部分供给由苏维埃政府征税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开始就是由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红军就是主要由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和在群众配合下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组成的。随着革命战争的进展，各地除了主力红军之外，又有了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如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到1930

年，各地正式组成了地方红军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等形式的武装，赤卫队变成群众性的武装，这样，各苏区就正式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有了这样的武装体制，主力红军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执行跨地区的作战任务，地方红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群众武装执行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肃清敌军侦探、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有了这样的体制，地方红军在必要时可升级为主力红军，群众武装可以组成新的地方红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地发展。

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 在红军诞生初期，在运用其它作战形式失败之后，就开始采取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种游击战不同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支队进行的游击战，不同于无目的到处游荡的流寇式的游击战，也不是在城市中打几枪就跑的暗杀式的游击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中央的统一战略指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依托根据地进行的游击战争。

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的游击战争，也就产生了新型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红军诞生初期，由于兵力过小，战斗力低，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能够体现红军根本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各地于1929年先后总结的战术中，以中共红4军前委总结的最有代表性。毛泽东以红4军前委名义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为了实现中共的斗争目标，红军不但需要一套正确的战术，而且需要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一个能在近期实现的目的。所以，在红军经过一段斗争之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提出“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在到达赣南后不久，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割据计划。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战略设想。鄂东北红军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割据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各地红军依据自己制定的方针，展开顽强斗争，到1930年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红军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兵力有了很大发展，部队得到集中，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建设日益完善，根据地日益巩固，战略战术日渐成熟，作战形式也逐渐脱离游击战争的阶段，具备了运动战的性质。这样，红军就开始脱离它的幼年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为执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任务准备了条件。

第二章 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一、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1930年秋后的形势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推行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带来严重的损失，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的不满和忧虑。也有少数地区的干部和红军，在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抵制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而改取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中小城镇和乡村，使红军和革命力量仍然得到发展和壮大。1930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30年冬，中央苏区(赣西南、闽西)和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土地革命逐渐深入，根据地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地方武装、游击队、赤卫队蓬勃发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余人。在三年多艰苦频繁的战争实践中，红军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经过集中整编，歼敌能力不断增强，一个地区的红军，一次已能歼灭整团、整旅的敌人。这样，就为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0年10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获得胜利后，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铲共剿匪”为今后最主要的任务。接着，又在南昌召开策划湘鄂赣三省“剿共”的军事会议，准备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放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他们认为“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蒋介石则疯狂叫嚣，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除去心腹大患。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在湘鄂赣闽等省陆续调集10万大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自11月上旬起即开始向红军进攻，在袁水流域扑空以后，又从吉安、泰和和赣江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一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在赣南苏区。

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左右，由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从10月下旬起，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战胜敌人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毛泽东则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十分巩固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于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应先实行退却，引诱敌人进入苏区，红军依托苏区熟悉的地形，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等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新喻县境的罗坊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11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命令分布在袁水流域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红军立即收拢，东渡赣江，向赣南苏区北部边境转移，使敌人

在袁水流域与我主力决战的计划破灭。此后，红军又向苏区中部转移，先后集结在黄歧、小布、洛口、平田、砍柴冈、麻田等地，隐蔽待机，抓紧临战训练，准备反攻。总前委在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

12月中旬，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下旬，张辉瓒的第18师进到东固；谭道源的第50师进到源头。这两个师都是齐装满员，是这次“围剿”军的主力。如果红军能消灭它，就把敌军“八百里连营”从中间拦腰截去一段，敌军失去中坚指挥，必阵脚大乱，自顾逃命，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可能被打破。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准备首先歼灭张辉瓒师或谭道源师。24日，红军得知源头谭师四出拉夫，准备向小布前进，总前委当即命令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的谭道源师。25日和27日，红军主力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歼敌于运动中，但因走漏消息，源头谭师刚一出来就缩了回去，红军未能达到歼敌目的。28日，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一个旅留驻东固）向龙冈前进，该部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红军决定首先歼灭深入龙冈的张辉瓒部。

12月30日晨，龙冈地区群峰雾消，枫叶霜红，旭日东升，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出发向东前进，不久，即遭到早在此等候的红3军的迎头痛击，拉开了龙冈战斗的序幕。敌人依仗其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展开部队，疯狂向红军反扑。红3军顽强抗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下午3时，红军大部队及时赶到，隔绝了敌师部与东固之敌的联系，切断了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敌第18师主力已成瓮中之鳖。这时，天气骤变，顷刻间浓雾漫天，咫尺之间，人物难辨。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利用熟悉的地形，勇猛穿插，敌人则如入迷津，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四处乱窜，战斗在黄昏前结束。

龙冈战斗，红军共歼灭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武器9000余件，活捉敌第18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写的：“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龙冈战斗的真实写照。

龙冈战斗后，深入苏区的其他敌人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再歼敌谭道源师一个多旅，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被打破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经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数十万群众，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筹措了作战经费和给养，准备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场。

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惨败以后，仍不死心，于2月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与红军决一死战，并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流通，企图困死、饿死苏区军民。至3月下旬，敌兵力集结完毕。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苏区军民欢欣鼓舞，大家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政治动员令，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部队召开司政后各种会议，总结战时政治、军事、给养工作经验，研讨作战指挥、临战训练、政治鼓动、后勤保障存在的问题；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广泛进行动员，讨论支援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实行坚壁清野，加强群众参战的组织工作；地方武装交流了封锁消息、袭扰敌人的经验，决心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消灭侵入苏区的敌人。整个中央苏区万众一心，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的胜利而紧张地工作着。

在此期间，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担任中央同代理书记（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曾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4月，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处理因错误地进行反“AB团”斗争而引发的“富田事变”，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是“反革命行动”，致使红20军许多干部被冤杀。同时，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接任。由于中央代表团的干预，使苏区中央局工作遇到困难，特别是在确定第二次反“围剿”方针问题上，遇到很大阻力，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当时，经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已不足4万人，而对蒋介石20万大军的进攻，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能否取得胜利，有人犹豫、动摇，表示信心不足；有人主张红军分散到苏区境外去打游击，以便把敌人引出根据地；也有人主张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建立新苏区，并以共产国际一位领导人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他分析敌我情况和现状后指出：敌兵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它们各属其主，想保存实力，而且指挥不统一；许多部队由北方初到江西，地形生疏；苏区军民实行坚壁清野，敌给养难以解决。至于我们，虽然兵力较少，装备落后，但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群众好，得到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经过反复讨论，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年线消灭敌人。

1931年4月1日，敌军分四路发动进攻。第19路军由兴国向宁都；第5路军由泰和、吉安向东固、沙溪；第26路军由乐安、宜黄向洛口；第6路军由南丰向广昌。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他们每日前进三里五里，十里八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进行“驻剿”。至4月下旬，已进至江肖洞、富田、水南、严坊、招携、横石、广昌一线。

敌人采取的“双稳”战术，给红军从哪里开始反攻带来了新的困惑，有的主张先打南面强敌第19路军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先打东面朱绍良的第6路军。毛泽东主张先打西面王金钰的第5路军，因王部刚从北方开来，地形不熟，战斗力不强，有把握取胜：打了王金钰，可就势向东横扫，便于打下一个战斗，有利于整个战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初战必胜、照顾全战役、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三原则，符合战争发展的需要，大家心悦诚服，一

致赞同。

红一方面军主力根据预定方针，立即秘密退却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等待王金钰部脱离富田巩固阵地，便于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山区，红军迫敌而居 20 余日，敌始终不出，时间一长，一些人主张另选目标，要求快打；一些人议论纷纷，认为这种打法是“钻牛角”。毛泽东、朱德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5 月 16 日，敌王金钰所部第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向东固方向攻击前进。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其他敌军，以主力分三路向该敌出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 28 师大部和第 47 师一部，缴枪 5000 余支，火炮 30 余门。5 月 19 日，红军主力追击向水南方向逃跑之敌，在白沙歼敌第 47、第 43 师各一部。22 日，攻击前来增援的第 26 路军，在中村歼其近 1 个旅。中村战斗后，在战场上红军已占据主动地位。为迅速追歼敌人，组成以毛泽东力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27 日，红军攻克广昌，歼敌第 6 路军第 5 师一部。31 日，突袭建宁，歼敌第 56 师 3 个团。从 5 月 16 日至 31 日半个月时间，红一方面军横扫 700 余里，连打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 3 万多人，缴枪 2 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写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的雄伟气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筹粮，并组建了第 4、第 5 独立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十分恼怒，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对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

1931 年 6 月，蒋介石新败不到一个月，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 30 万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抽调其嫡系部队 10 万人担任“围剿”军主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务求一举将中央革命根据地荡平，“永绝后患”。7 月 1 日，敌各路进击军、各军团开始行动。

当时，红军仍是 3 万余人，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等地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根据敌情，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于是以少数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红军主力由工作地域出发，冒着盛夏酷暑，忍饥挨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准备待机反攻；命令从广西右江苏区来的红 7 军东渡赣江，参加反“围剿”作战。

在此期间，担任迟滞敌军前进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队，不断阻击与袭扰敌人，苏区人民则实行坚壁清野，使进入苏区的敌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集中。

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 20 余日，一直找不到红军主力。7 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在兴国地区，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南进击，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赣江边。在大军压境之时，红一方面军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红军主力由兴国突破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打出去，使深入赣南苏区敌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8 月初，各路敌军纷纷向红军集结地围了上来，红军只有一个圩场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

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机立断，利用敌人认为红军将西渡赣江的错误判断，以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敌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4军团向万安方向的赣江边上牵引；将敌第1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地区；集中主力实行中间突破，求歼向莲塘急进的敌军中较弱的第3路进击军。8月5日，红军主力乘夜暗从崇贤、兴国两地敌重兵之间20公里间隙中秘密东进，于8月7日首战莲塘，歼敌第3路进击军两个旅；接着在良村又歼其一个师大部；8月11日，在黄陂歼敌第3军团4个团。其中有1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鞍，但没来得及逃脱，就全部当了俘虏。红军三战三捷。

莲塘、良村战斗后，蒋介石、何应钦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转兵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是红军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稍有疏忽，就有被敌围歼的可能。朱德、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最怕红军北出临川（抚州）、进击南昌的恐惧心理，命令红12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临川、南昌方向牵引，红军大胆地采用敌我对进的战术，主力2万余人从敌重兵之间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待机。蒋介石又被红12军的佯动所迷惑，立即命令第10师回防临川；第1、第2路进击军追击红12军。红12军在罗炳辉率领下，将计就计，伪装成方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北行进，利用自己轻装灵便和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专挑难行的路走，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拖住敌人。蒋介石以为抓住了红军主力，紧跟不放，就这样将敌人拖了半个月，用敌人自己的话未说：国军进入苏区，像个瞎子、聋子，找不到饭吃和水喝，整日东奔西颠，困苦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当敌人发现自己上当时，已是疲困已极，士气低落，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正在此时，两广军阀乘机进兵衡阳，威胁蒋介石的统治，蒋只好下令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第19路军打成对峙外，9月7日，在老营盘歼敌第4军团1个旅。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1、第4军团1个多师，第52师师长韩德勤也当了俘虏，后化装成伙夫得以逃脱。在方石岭战斗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被敌机击中光荣牺牲。黄公略，湖南湘乡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红5军主力开赴井冈山，他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1930年担任红3军军长，参加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作战，牺牲时年仅33岁。

此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以3万余人同大于自己10倍的敌人作战，歼敌3万，实属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转入进攻，占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南和闽西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毛泽东对这块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根据地充满着无限深情，写下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著名词句。

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由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赵博生任参谋长，下辖3个军：第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第14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15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

量。

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红军反“围剿” 蒋介石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同时，派兵“围剿”邻近的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等部自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在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在严塘、酃县、将军山、廖塘桥、永阳等地，共歼灭敌人2个团。1931年11月，敌人集中10个师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并进占永新、莲花、永阳等地，向苏区腹地推进。湘赣红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围困驻守永新、莲花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苏区失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为2个独立师，并扩编为红8军，代军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

湘鄂赣苏区红16军于1930年12月，利用敌人合击空隙西移，在通城歼守敌1个团。1931年3月至5月，红16军趁国民党军调防之际，先后歼敌2个连，击溃其1个团，接着，与独立第3师协同作战，在鄂东南歼灭敌人2个团。此后，红16军和独立第3师密切配合，打击入侵之敌，坚持了湘鄂赣苏区，红军也得到了发展。

赣东北苏区红10军于1930年12月先后在珠山桥、上饶、河口等地歼敌2个团，击溃1个团。1931年3月至5月，红10军在贵溪、余江边境歼敌一部后进入闽北作战，接着回师苏区，收复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葛源，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7月，红军执行王明错误的军事战略，虽艰苦奋斗，仍未能打破敌人“围剿”，被迫退至葛源地区进行整顿。

二、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总指挥，先后调集8个师3个旅近10万人购兵力，由刚刚投靠蒋介石的冯系军阀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并以他的部队充当“围剿”军主力，计划第一步先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圆箍式”包围；第二步以主力突入苏区，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

当时，鄂豫皖苏区主力红1军正奉命在外线作战，先后进行了姚家集、黄安、谢店、新州战斗，特别是新州一仗，歼敌1个旅部2个团，打乱了敌人部署，震动武汉。敌立即调整兵力，重新部署，以鄂豫边为中心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2月上旬，敌分四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边苏区进攻。

11月，由中央委任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到达鄂豫边苏区。在敌人准备“围剿”、红1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的紧急情况下，曾中生召集会议，决定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并以地方武装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阻击敌人，迅速调回红军主力攻击敌人弱点，以改变不利态势。会后，随即以鄂豫边的地方武装以及半脱产的红色补充军7个师2万余人为基础组成三路，建立了第1、2、3路指挥部，并和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共同组成指挥委员会，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敌人进入苏区以后，苏区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进犯之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敌提心吊胆，进展异常迟缓。正在这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红15军由商南到达黄麻地区。临时特委决定以红15军为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打击入侵之敌。12月16日，红15军一举突入河口，歼敌一部，使苏区南线之敌不敢冒进。下旬，北线之敌凭借优势兵力，大举向七里坪进犯，并侵占鄂豫边黄麻中心区。红15军转移外线作战，鄂豫边苏区游击队、补充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内线，对进入苏区“清剿”之敌展开英勇的斗争。他们利用高山密林，时隐时现，割电线，摸岗哨，打击小股敌人和反动民团，前后缴枪500余支，俘敌数百，使窜入鄂豫边苏区之敌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只能困守几个县城和集镇。

在鄂豫边军民反“围剿”的同时，红1军在皖西袭击金家寨、苏家埠、韩摆渡之敌，一度包围六安，诱敌来援。敌为救援六安，于12月底向红1军发动进攻。红1军在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毙俘敌3000余人，缴枪1700支，迫击炮数门。1931年1月3日，红1军主力回师鄂豫边途中，又在商城四顾墩歼敌1个团，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告失败。

1月中旬，红1军与红15军于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000余人，归特委直接领导。临时特委举行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总医院。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把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作为党的第一任务。同时成立红军军政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校长，刘杞任政委，

加强干部的培训，以满足红军日益发展的需要。

红4军组成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特委、军委的决定，立即转入攻势作战，向信阳、广水段京汉路出击，连续袭击李家寨、柳林等车站，歼敌一部，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威胁豫南重镇信阳。敌为确保信阳，分由广水、孝感等地出援。3月8日，敌第34师到达广水以南的双桥镇。红4军集中主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奔袭双桥镇。9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激烈，阵地几度易手，最后红军将担任预备队的两个团及时投入战斗，一举突入镇内，捣毁敌指挥中心，并将敌军分割围歼，经7小时战斗，歼敌第34师大部，师长岳维峻想乘隙逃走，但他的乘马被马弁骑跑了，自己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此役，红军俘敌5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炮10余门。前后50天的攻势作战，歼敌1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3月中旬，敌人先后调集10多个师10余万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鉴于第一次“围剿”中部队行动不一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敌军改取“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以3个建制师(缺2个旅)组成“追剿”队，专寻红军主力作战；其余部队分布于苏区周围，配合“追剿”部队堵击和“清剿”。第一步计划合击新集、七里坪，歼灭鄂豫边红军；第二步转向皖西作战。4月上旬，敌各线堵击部队开始在苏区边沿区展开“清剿”，皖西之敌乘红军主力未在，首先侵入麻埠，进往独山，伺机进攻金家寨。红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克独山镇，全歼守敌1个多团，首战告捷。入侵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

敌“追剿”部队乘红军主力在皖西作战之际，相继侵占新集、七里坪。敌进入鄂豫边苏区以后，因地势险恶，道群众反对，时时处于我人民游击战争袭扰包围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不敢久留。5月上旬，敌准备实施第二步计划，转向皖西寻我红军主力作战时，红4军迅速西进，在符湾歼敌第53师近千人，5月底围攻黄安、宋埠间敌供应线上之桃花店据点，先后歼敌近4个营。敌“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梦想5月底肃清鄂豫皖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告破产。

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原有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由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沈泽民任省委书记。不久，还成立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任书记。红4军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政委曾中生。7月，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7月中旬，红4军军长徐向前(旷继勋已调任第13师师长)、政委曾中生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率军部和个多团兵力，冒着酷暑，由豫南地区南下作战。他们从实际出发，转战英山、薪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地，连克四城。歼敌7个多团，生俘5000个人，牵制了敌准备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扩大了地方武装，筹集一批经费，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新苏区。但张国焘借口红4军没有按他的主张，攻占英山后出潜山、太湖，相机攻占安庆，威胁南京，而“错误”地擅自南下蕲黄广作战，严令红4军火速返回。红4军北返后，即宣布

撤销曾中生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政治委员。接着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斗争，并在红军和地方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柄杀了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造成党内盲目服从的气氛，使张国焘逐步建立起军阀主义的家长式的个人统治。

红四方面军成立，敌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 1931年8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

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也估计到敌人新的“围剿”不可避免，即抓紧时机，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首先开展反第三次“围剿”的政治动员，号召苏区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整顿和扩编地方武装，将不脱产的18岁至35岁的赤卫队、守备队改编为赤卫军；17岁以下的组成少年先锋队。到10月间，全区赤卫军已组成15个师，脱产的地方武装，仅县独立团就有20多个。有7000余人参加正规红军。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4、第25军。红4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红25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方回军的总兵力已近3万人。方面军的成立，使作战行动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对红军完成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敌人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已陆续增至15个师。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抗日反蒋浪潮和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红四方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

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入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据点，位置孤立、突出，由国民党军第69师驻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目的是歼灭该师，夺取黄安，打乱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战役从11月10日开始，红军首先以扫清黄安敌外围据点，切断守敌与外地联系为目标。经10天战斗，黄安县城完全处于孤立被围状态。第二步，红军紧缩包围圈，威胁城内敌人，迫其向外求救，以便打敌增援。敌第69师被围后，有损无补，难乎为继，曾两度突围，未能得手，只得固守待援。敌第33师和第31师1个旅奉命从宋埠、歧亭出动，分两路向黄安增援，来势凶猛，直逼近方面军总部，战斗极为惨烈。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敌在红军三面进攻下，溃不成军，弃尸千余具，狼狈四窜。打退援敌以后，红军即对黄安守敌发起进攻。12月22日，红军“列宁号”飞机在黄安上空投掷迫击炮弹和宣传品，更使敌人惊慌失措。入夜，红军发起总攻，黄安城破，师长赵冠英化装潜逃被赤卫军活捉。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万余人，生俘近万，缴枪7000余支。黄安战役得到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男子运粮弹，抬担架，妇女烧水煮饭，救护伤员，群众送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当地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群众充分动员，使黄安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黄安战役胜利后，

1930年初，四川军阀刘湘的一架德国式教练机，从南京飞回四川途中，驾驶员迷航后迫降在苏区，飞机运到新集后，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城内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宣布将黄安改为红安，以示纪念。

黄安战役结束后，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商城，拔掉楔入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中间的钉子，鄂豫皖军委会决定组织商演战役，国民党军集中 4 个师 1 个旅在商城、演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腰斩”进驻在商演公路一线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第 2 师，控制商演公路，然后相机夺取商城。1932 年 1 月 19 日，红军发起进攻，敌第 2 师等部逃往演川，红军完全控制了商演公路，也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驻守商城的敌第 58 师已陷于孤立。2 月 7 日，集结在演川地区之敌 3 个多师分两路出援商城。红军集中力量，乘敌运动之机，实施勇猛突击，将敌击溃。9 日，红军乘胜追击，直追演川近郊。此次战斗，蒋介石嫡系第 2 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固守商城的第 58 师见援兵溃败，惊恐万状，乘红军主力追击援敌之际逃往麻城，红军不战而克商城。

商演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在固始地区稍事整顿后，即按鄂豫皖军委决定，东进打击皖西敌人。皖西地区有敌第 46、第 55 师等部共 12 个团的兵力，从六安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担负对红军进攻和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经方面军总部研究，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3 月 21 日，方面军主力秘密渡过淠河后实施战役展开，至 23 日，完成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准备打敌增援。3 月底，国民党军第 46 师驻六安、霍山两城部队倾巢出援。因红军早有准备，敌由六安南进的 4 个团，1 个团被歼，1 个团窜入韩摆渡，其余狼狈逃回六安；由霍山北援之敌一个旅，亦被红军击溃。青山店之敌乘机突围，大部被歼，小部窜入苏家埠。4 月，敌无增援活动。苏家埠、韩摆渡守敌被围经月，粮食用尽，多靠野菜、树皮充饥，敌机虽不时以空投接济，但大部落入红军阵地，守敌更加恐慌动摇。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并欢迎白军士兵前来觅食，凡来者即予热情招待。4 月底，蒋介石任命第 7 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 15 个团 2 万人，从合肥大举增援。红军决心围歼援敌，在六安以西的樊通桥、戚家桥一线布阵，以逸待劳。

5 月 1 日，红军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边打边撤，诱敌失头旅渡过陡拔河。敌渡河后，向我既设阵地猛攻，遭红军重大杀伤，接着红军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往后逃窜。时值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陡拔河两岸敌军人马前拥后挤，自相践踏，乱成一团，红军乘势冲杀，敌大部被歼。敌后续部从见先头失利，慌忙抢占高地顽抗。红军主力从两侧迂回包围后发起总攻，一举突入纵深，摧毁敌指挥机关，活捉总指挥厉式鼎。其余敌军在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进攻下，悉数被歼。在战斗时，苏家埠、韩摆渡之敌曾数次突围，均被红军堵回。援敌被歼后，苏、韩两地敌军处于绝望之中，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指战员编成顺口溜对被围敌军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那桩？”“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长，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苏、韩两地敌军于 5 月 8 日全部缴械投降。苏家埠战役，历时 48 天，共歼敌 3 万余人，俘敌总指挥以下官兵 1.8 万余人，缴枪 1.5 万余支(挺)，炮 40 余门，电台 5 部。这是红军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胜仗，也是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完满成功的范

例。

苏家埠战役后，以六安、霍山等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红 74、75 师，属红 25 军建制，留在皖西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则挥师豫南，发起潢光战役，打击侵入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之敌。战役从 6 月 12 日开始，红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光山南部的敌第 12 师，一部兵力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打援，主力攻击进占双柳树、仁和集之敌。战役进行 5 天，歼敌近万人，缴枪 7000 余支。

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战役，歼敌约 6 万人，给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这一辉煌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胎死腹中。由于军事的胜利，扩大了苏区，壮大了武装力量。主力红军发展到 4.5 万余人，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 20 万人。鄂豫皖苏区扩大到东临舒城，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面积达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350 万，建立了 26 个县的革命政权。四次战役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步入鼎盛时期。

三、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洪湖苏区军民第一次反“围剿” 湘鄂西苏区由洪湖、湘鄂边、巴(东)兴(山)(秭)归、襄(阳)枣(阳)宜(城)等几块根据地组成，其中以洪湖苏区为最大，是湘鄂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至1930年秋，洪湖苏区已发展到拥有长江南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7座县城，纵横数百里。因此，洪湖苏区已成为湘鄂西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湖北省主席兼第10军军长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4个师7个旅的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战法，准备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洪湖苏区。

当时，湘鄂西苏区主力红2军团正奉命离开根据地南征，获悉敌人准备“围剿”洪湖苏区消息后，总指挥贺龙、红6军政委段德昌等坚决主张回师洪湖进行反“围剿”作战，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去信督促红2军团回洪湖苏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但红2军团前委书记认为洪湖苏区是水网地带，大部队不易活动，决定只派段德昌率少数武装运送伤员和物资返回洪湖苏区。红2军团主力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被敌人乘机突袭，损失严重，被迫退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为反对敌人的进攻，在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下，将各地的滁击队及由段德昌带回的少量红军分编为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苏区群众组织分别编成赤色教导军、赤色守备队、少先队等，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

1931年1月中旬，敌人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入侵之敌，使敌人十分恐慌，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江左军主力和独立团转到外线去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红军虽损失了一些老苏区，但开辟了大片新苏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江北吃紧，敌就集中兵力防御江北，江南告急，又转兵南渡，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最后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洪湖苏区军民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3月初，国民党军为摧毁湘鄂西苏区党政首脑机关，以江南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相继攻占藕池、石首县城，并继续向根据地推进，形势极为严重。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两路，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周逸群率部分干部和武装南下洞庭湖区开展游击战争；段德昌率红军独立团北渡长江，到被敌占领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活动，在江左军配合下，先后两次攻克峰口，四次攻克朱河，击溃敌人1个团，歼敌1个营。独立团扩编为红9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另外还组织了湘鄂西警卫团、教导团、沔汉独立团等部。4月下旬，红9师及地方武装对入侵江北地区之敌发起进攻，在老新口先后歼敌两个营，击溃敌两个团，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接着又向江陵地区之敌发动进攻，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汪家桥等地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江北苏区大部恢复。与此同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开展攻势，东山地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夏曦来湘鄂西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

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夏曦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崔玫(后为杨光华)任临时省委书记。5月间，周逸群在洞庭湖区岳阳县城遭敌伏击，不幸牺牲。周逸群在大革命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和第20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时任师长，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洪湖苏区军民第三次反“围剿”和抗灾斗争 1931年9月初，敌人调集两个师1个旅的兵力，以江南华容东山地区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红9师正在江北活动，东山地区仅有300余人的游击队，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寡不敌众，东山地区陷入敌手，1万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屠杀。这个地区的革命群众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震慑，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重新组织起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极端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1年夏，湖北省遇到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流密布。入夏以后，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国民党军又利用洪水，丧心病狂地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使江北苏区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江南苏区亦部分被淹。严重的水灾，对红军反“围剿”斗争带来了严重困难，粮食、医药更是缺乏。为了战胜水灾，在反“围剿”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抢险修堤，保护未受灾地方的秋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给受灾群众；实行继续生产和极端节约措施及发动群众募捐互救等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又将广大灾民组织起来，向白区和新苏区就食。沔阳、汉川两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数千人，深入白区，击溃国民党军一部，夺取运载物资船数十艘，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分给灾民度荒。洪湖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渡过了苏区最严重的难关。

红3军出击襄北，扩大新苏区 在洪湖苏区反“围剿”期间，主力红2军团转到湘鄂边，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苏区和红军却没有获得发展，部队供应日益困难。1931年3月，红2军团按照中央命令改编为红3军，军长贺龙，政委唐赤英，下辖第7、第8两个师。为配合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3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后在武当山区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同年9月，接到中共湘鄂西分局要红3军返回洪湖的指示信，红3军即留一个团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25师，坚持鄂西北苏区斗争；贺龙率部向东南出击，在红9师迎接下到达襄北(汉水以北)。红3军和红9师的会合，增强了主力红军的突击力量，为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全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沟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10月上旬，返回洪湖苏区。夏曦借口红3军和红9师在襄北活动打击敌人是改变军事计划，脱离苏区，不要群众，撤去万涛(会师后刚接任)红3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夏咸兼任，同时撤销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为5个团，直属军委指挥，实际上架空了红3军军部。经贺龙等领导人力争和中央的批评，才恢复第7、第9两师番号，另辖1个独立团。

11月，红3军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调动进攻洪湖苏区的敌人，主动在襄北发起进攻，连克皂市、陈家何等地，歼敌一部，进逼应

城。12月下旬，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派遣第4师第12旅等部增援应城，并相继进占龙王集、陈家河、皂市等地。1932年1月，贺龙命段德昌率红9师及汉川独立团赴汉(川)宜(昌)公路歼灭该敌。红9师首先袭占皂市，并将大部队埋伏于公路两侧，派出骑兵连与敌接触，佯作溃退，引诱敌人深入红军伏击圈。敌进入以后，分别被包围在龙王集、陈家河地区。红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经几次战斗，在龙王集地区歼敌1个多旅，俘敌旅长以下官兵3000多人，缴枪3000余支(挺)，迫击炮20余门。

1932年3月，敌调集10多个团对洪湖苏区发动进攻，第48师第144旅由皂市出动，进至文家墩、李家场等地。红3军在贺龙、新任政委关向应指挥下，集中兵力，将运动中的敌人包围歼灭于文家墩，俘敌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随着作战的胜利，洪湖苏区和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新建了9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超过原有苏区一倍以上。洪湖苏区扩展到襄北广大地区；红3军发展到3个师1.5万余人，地方武装有枪2800余支。龙王集、文家墩战斗的胜利，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进入了全盛时期。

红军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反“围剿”作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同时，由于红军的迅速壮大和实行了集中统一的指挥，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作战成果显著提高。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完成了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且形成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在战略上，红军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红军也乘敌“围剿”部署尚未完成、对红军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以主动进攻、外线歼敌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在战役战斗上，红军已经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迂回包围，围点打援，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红军反“围剿”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1931年秋后的形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形成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正为继续贯彻反对“左”倾错误而斗争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一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中央。他们无视党的纪律，结合一部分人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公然鼓吹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使党内生活出现了严重危机。

1931年1月，在王明一伙的压力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依仗米夫的支持，强行篡夺中央的领导，并且以王明所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党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在政治上主要批评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错误”和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从而形成了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则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其“左”倾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提拔了一批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使新的“左”倾路线贯彻到各个苏区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中去；对不同意见他们那一套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则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党员遭到打击诬陷，使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数人不了解军事，因此在上台初期，还来不及也提不出新的军事战略，同时为标榜反对李立三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甚至还主张攻打中心城市。随着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不断胜利，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他们便错误地估计形势和红军的力量，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已经能够与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相匹敌。因此，不再满足于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夺取中心城市，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以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相抗衡。为此，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全党全军的军事战略。

1931年9月，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为代总书记的王明，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王明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不顾事实地严厉指责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所谓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发动群众的工作，对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深入的了解，至今还未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以致红军在作战中疲于奔命，使红军长期围于内线作战而不易向外发展等。在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新成立的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2年1月9日，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形势。决议要求全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此后，实行进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为全党和红军的总任务。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

战略正式形成的标志。决议全盘否定过去的正确主张，把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放在实行进攻战略、攻打中心城市的基点上。自从这个决议发布之后，王明及其支持者就在各地进一步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以进攻战略代替积极防御，以所谓“正规原则”代替了真正的正确原则，使革命战争遭受严重的挫折。

1931年11月，根据党中央9月指示信，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批评毛泽东为代表的所谓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会议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的决定，实际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改选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代理书记，项英、任弼时、毛泽东、朱德、顾作霖、王稼祥、邓发等7人为委员。12月下旬，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沿途见闻，发现中央苏区的“肃反”存在严重问题，于是立即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根据他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批判肃反中心论。会后又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制止。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夫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但由于各根据地被敌分割，相互隔离，中革军委实际只能指挥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的红军。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其所属部队统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指挥。

五、鄂豫皖、川陕苏区红军反“围剿”、反围攻斗争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春，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备阶级政治态度变化而造成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危机，因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得以克服。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日本签订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向美国借款1200万美元充作军费，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不久，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武汉，下辖左、中、右三路军，防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中、右两路军总兵力24个师6个旅30余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另有4个航空队支援地面作战。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其计划是，第一步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并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长江边上歼灭之。

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进攻战役，士气高昂，械弹充足。由于根据地的扩大，红军作战有了更为众多的群众支援和广阔的回旋区域。因此，敌人这次“围剿”虽然来势凶猛，但如果我战略方针正确，指挥得当，红军是有可能打破敌人“围剿”的。但是，张国焘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在黄安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张国焘竟认为红军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来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商潢战役胜利后，鄂豫皖省委在决议中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和帝国主义者直接作战。1932年6月，敌人准备大规模“围剿”的密锣紧鼓已喧嚣入云，但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却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对于临时中央提出的采取积极进攻战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军事计划，不仅全盘接受，而且颇有发挥。张国焘竟认为目前已不是冲破“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要红军向京汉路出击，并于7月初开始围攻屏障武汉的麻城，以实现其打下武汉过中秋的冒险计划。

正当红军主力围攻麻城之际，敌各路纵队开始向苏区进犯。

7月底，敌已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形势十分严峻，但张国焘仍置之不理，命令方面军主力再次围攻麻城。蒋介石见各军进展顺利，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8月7日下令总攻，要各路纵队以疾速秘密的手段深入我根据地中心，攻占红安、七里坪，寻歼红军主力。在此严重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撤围麻城，但又轻率地作出迎击敌军主力，一举粉碎“田剿”的决定，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8月中旬，方面军主力在冯寿二、冯秀驿和七里坪地区两次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红军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重创蒋介石嫡系部队2个师，杀伤敌官兵5000命名。但这两次战斗都未能使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相反，红军打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使自己遭到重大伤亡，处境更加被动。敌战后调整部署，张国焘又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主力业已溃退，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命令方面军迎

击敌军主力，保卫新集。敌军乘红军在浒湾地区与陈继承纵队苦战之际，张钫纵队和卫立煌纵队从南北两面迂回红军侧后，与陈纵队构成三面合围之势。张国焘见形势险恶，即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及中央分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地区向皖西苏区转移。新集、商城随即陷落。敌见红军主力向东转移，立即派大军前堵后追。张国焘惊慌失措，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红军东进受阻，遂重返红安地区。国民党军随之迅速围了上来。红军在红安以西的河口、东西冯秀驿地区与敌激战，击溃敌人一部，毙伤敌 3000 个人，缴获武器甚多。战斗中，红 25 军军长蔡申熙，红 11 师政委甘济时牺牲。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28 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 15 军、红 25 军军长等职。牺牲时年仅 26 岁。

10 月 10 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认为红军主力再在苏区战斗是无望的，只有离开苏区才是出路。会议决定，留少数兵力坚持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根据地。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 2 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方面军主力又在湖北枣阳西南的新集和土桥铺进行两次有关全军安危的重大战斗，意在争取主动，但由于部队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仓卒反击，虽然给数倍于红军的尾追和堵击之敌以重创，但未能改变被动局面，不得不向西北鄂豫陕边转移。

红 25 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继续以 10 多个师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清剿”，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妄图把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力量彻底消灭。中共鄂豫皖省委为扭转危局，将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重新组成红 25 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3 年 1 月，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 28 军，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兼）。不久，红 28 军合并于红 25 军。两军合编后，连续在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等战斗中取得胜利。战斗中，红 25 军政委王平章不幸牺牲。

王平章，湖北省汉川人，领导过农民运动和鄂中区秋收起义，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央分局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红 25 军和红 28 军政治委员等职，牺牲时年 32 岁。5 月，红 25 军执行临时中央夺取敌占城镇的指令，围攻敌重兵防守的七里坪，连攻月余未克，减员逾半，被迫撤出战斗。

1933 年 7 月中旬，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 25 军在省委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并提出要保卫苏区中心区，与土地共存亡等口号，激战月余，未能打退敌人，被迫向皖西北地区转移。敌人向皖西北苏区中心区合击，红 25 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向鄂东北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主力到达鄂东北地区，一部返回皖西北。这两部分红军接受前一阶段作战失利的教训，改变战略，以时聚时分，外线游击等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不少胜利，使部队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皖西北地区又组成红 28 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红 28 军组成后，连续取得石门口、葛藤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1 个多团，俘敌旅长以下 1000 余人。

1934 年 2 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张学良所部 9 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准备发起新的进攻。

为集中兵力进行反“围剿”斗争，红 25 军和红 28 军重新合编为红 25 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7 月，敌人开始进攻，企图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红 25 军转入外线作战，在英山、大湖边境建立游击根据地。11 月上旬，红 25 军在光山县斛山寨击溃尾追之敌 10 个团，毙伤俘敌 4000 余人。11 月中旬，红 25 军主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丧失从外线打回鄂豫皖苏区的条件后，被迫寻求新的立足点。部队且战且走，经鄂西北、豫西南，翻越秦岭，北入关中。在此期间，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1 月底，红军再次翻越秦岭，此时已届严冬，部队仍着单衣、穿草鞋，白天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夜晚宿营于悬崖老林之下，饥寒交困，十分艰苦。12 月上旬，红军抵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无目的地向西北转移日益不满，以曾中生为代表的高级干部直接向张国焘提出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张国焘为缓和矛盾，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第 73 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张国焘对此事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1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抵汉水以南地区，摆脱敌人追击堵截，正在这时，前委得悉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兵力极为空虚，遂决定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回旋余地广阔。全省分别被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割据，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呈半独立状态，内部则勾心斗角，连年混战。川北为田颂尧第 29 军的防区，自 1932 年 10 月起，田部主力协助刘湘在成都地区与刘文辉部作战，川北几成不设防的地区。红军进军川北，主要障碍是横在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之间，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红军为迅速进抵川北，选择了一条路隘山险、人迹罕至的捷径。部队于 12 月 19 日开始翻越大巴山，指战员们冒着严寒风雪，互相鼓励、帮助和爱护。优秀的红军战士陈松庭，宁可自己挨饿忍饥，把干粮让给年幼的战士，晚上睡在草棚门口，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遮风御寒，当战士们醒来时，发现他已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全军越过大巴山以后，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着手创建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地区长期受着极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奇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田颂尧为了维护称霸川北的地位，对人民敲骨吸髓，仅用赋一项，当时已经预征到 55 年后的 1987 年了。红军一到川北，立刻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33 年 2 月 7 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城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接着，又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红军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和川陕边根据地的创建，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连电四川军阀，要他们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并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促其乘红军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攻。田颂尧调集近 6 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其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按照蒋介石“着重左翼”，防止红军西进的方针进行围攻部署。盘据在营山、渠县地区杨森的第 20 军和在达县、万源地区刘存厚的川陕

边防军准备相机出动，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首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人必经的山险要隘，构筑阵地，节节抗击，大量消耗敌人兵力，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根据地内有利红军作战时，红军即适时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粉碎围攻。

1933年2月中旬，田颂尧3个纵队向巴河左岸发起全线攻击，红军凭险固守，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后，逐步抗击，逐渐后撤收紧阵地。至3月18日，敌虽取得巴中、南江二城，但付出了8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士气顿挫，攻势锐减，不得不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

4月下旬，敌又发动猛烈进攻，红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通江城。田颂尧却认为红军已溃不成军，胜利指日可待，于是再次开展全线进攻。这时，红军虽已退守到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全部集中，反攻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方面军总部下令从5月15日晚开始反攻，取得竹峪关、空山坝等战斗的胜利，敌全线崩溃，红军乘胜发起追击，穷追猛打，相继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残敌望风而逃。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红军以毙伤俘敌2.4万人，缴枪8000余支(挺)，迫击炮50余门，恢复全部根据地的胜利而告终。

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第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各军直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特务营和迫击炮连。

部队经过调整扩编，新战士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被提升为干部，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有针对性地掀起了练兵热潮。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素质，印发了方面军领导干部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教材供大家学习研究，尤以《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更为重要。它总结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反“围剿”应采取的短线作战，各个击破，抄袭迂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点打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击敌要点等10种战法。它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军事文献。《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是曾中生身陷囹圄中吉笔疾书写成的。曾中生是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高级将领，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在鸡鸣河和小河口会议上两次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因而饱经迫害和扫击，三次反围攻后，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关押了曾中生。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3年8月中旬起，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集中主力，连续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仪南战役打的是田颂尧残部，历时半月，歼敌3000人，解放仪陇县全境，夺取了南部县境的盐井。营渠战役打的是军阀杨森部。战役自9月22日开始至10月6日结束，红军共毙俘敌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解放了营山县城。宣达战役的目标是老牌军阀刘存厚，这位吴佩孚的“崇威

上将军”，贪婪昏庸，老朽顽固。他趁红军反三路围攻的困难时刻，派兵配合田颂尧抢占竹峪关，欲置红军于死地。当红军向刘存厚老巢达县发起进攻时，刘还在府中饮酒扶乱，求神保佑，听到枪声才大梦初醒，仓皇出逃。是役，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城，刘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设备均被我缴获。宣达战役后，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 33 军，原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面积达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 5 个军共 8 万人，形成了川陕根据地空前昌盛的时期。

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 1933 年 9 月，刘湘打败刘文辉，结束了四川军阀的混战，开始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10 月，刘湘在成都正式就任蒋介石授予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以其所属第 21 军为主力，收集大小军阀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军，第 21 军编为第 5 路。敌人采取分进合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集中 100 多个团、20 万兵力。预定以 3 个月时间，分三期，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敌围攻兵力强大，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在兵力部署上，把主力放在东面，对付敌主攻方向的第 5、第 6 路，由徐向前亲自指挥。西线配置 10 余个团，分别钳制第 1、2、3、4 路敌人，由王树声统一指挥。

12 月上旬，敌在东西线同时发起进攻。红军的防御战线，东西长达千里，作战十分艰难，但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气概和猛烈突然的近距离火力，歼灭进攻之敌；又针对敌人害怕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深夜出击，捣毁敌旅、团指挥机关，使敌日夜处于惊恐状态。在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之后，利用川北山地的有利地形，节节收缩阵地，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战。敌人连续发动三期总攻，至 1934 年 4 月底，付出 3.5 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红军主动撤出的根据地大部分城镇。

敌三期总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围攻旷日持久，军阀之间矛盾又起。刘湘为缓和其内部矛盾并部署新的总攻，一面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对小军阀进行安抚，一面准备第四期总攻。鉴于前三期总攻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这次刘湘求助于神灵，请出一位江湖术士，号称刘“神仙”的人，授以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代刘湘统领各路军阀，实行以神治军。刘神仙还举行了登台拜印仪式，刘湘率各路总指挥顶礼膜拜，祈求神灵保佑刘神仙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决定从西线开始反击。6 月，红军为创造战机，迷惑敌人，主动撤出通江城，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城口。敌误认为红军将由城口向万县方向出击，忙将第 5 路主力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附近，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此时，敌已发起以东线为重点的第四期总攻，刘神仙到达前方指挥，适遇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于是大肆吹嘘其“占卜有灵”，扬言 36 天内必将“赤匪”消灭。

7 月中旬，敌以万源为主要目标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

陕交通，一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通江以东地区。刘湘在阵前发布奖惩条例：夺取万源及附近主阵地者赏3万银元；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旅长在所属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在重赏之下，第5路总指挥唐式遵亲临前线，连日以人海战术，组织波浪式的密集冲锋。土匪部队王三春部，手持短枪，光着膀子，大喊大叫，真有一股要钱不要命的劲头。在疯狂的敌人面前，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指战员，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坚守阵地，运用近战、夜袭、阵前反击等传统打法，大量歼灭敌人。从7月下旬至8月上旬，敌人在万源地区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死伤万余人，不仅未夺取万源，而已因部队损失惨重，士气沮丧，病员急增，逃亡不断，刘湘的重点进攻，成为强弩之末。

万源的决战防御，为红军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方面军决定乘机开始总反攻。8月10日，红军首先在东线突破中段敌阵地，接着向纵深发展，造成对敌分割的有利态势，但由于张国焘指挥失当，失掉了在东线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8月下旬，红军主力转向西线，在通江城南渡过通江河，突破敌第3、第4两路结合部的坚固防御阵地，为西线反攻打开了通路。敌防御体系被打乱，纷纷夺路溃逃。总指挥徐向前亲率一个军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两个多旅。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其他各部亦乘胜追歼逃敌，被敌侵占的根据地相继收复。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军付出2万余人的伤亡，取得辉煌的战绩，先后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枪3万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蒋介石对这次失败深感震惊和恼怒，严电指责刘湘指挥无能。刘湘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成都去重庆途中，还演出了一幕假投江的闹剧。

1935年1月，蒋介石又积极准备发动川陕“会剿”，中央军直接开进四川，并令胡宗南第1师接防广元、昭化，扼止红军向陕南发展。红四方面军先发制人，发起广昭战役，歼敌一部；2月初北出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在10多天内，先后攻占宁羌、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多团。敌为确保汉中，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六、湘鄂西和陕甘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

湘鄂西苏区党内斗争和王明“左”倾错误方针的贯彻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引起了湘鄂西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1932年1月，临时中央派关向应到达洪湖苏区，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红3军政治委员。在夏曦主持下，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包含着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这个决议案，不仅全盘接受临时中央提出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战略，而且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大会以后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夏曦特别强调向武汉外围的应城、京山、云梦、孝感等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并要红军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争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红3军执行积极进攻战略，打下京山城，扩大新苏区。红军以一部兵力强攻京山未克，自己遭受很大伤亡。3月底，国民党军以4个旅进占襄河以北地区的瓦庙集一带村镇，红3军对该敌发起攻击，在七昼夜的阵地战中，敌人先后投入2万余兵力，红军虽前赴后继，顽强冲击，作战十分英勇，但因未形成优势兵力，战斗打成对峙，红军被迫撤出战斗。5月下旬，红3军奉命进攻国民党军第44师，将该师3个团包围在张家场地区，经连日激战，未能歼灭敌人。瓦庙集、张家场战斗，红军伤亡4000余人，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6月初，川军第21军向洪湖苏区进犯，红3军主力立即从襄北回师，以红7师进至下蚌湖地区打击左路敌军侧背，由段德昌率红9师进入东荆柯以南苏区中心区域，求歼中路敌军。6月中旬，敌1个师被红军小分队诱至新沟咀地区，红军以正面部队阻击，命骑兵部队秘密迂回至敌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遭受两面夹击，溃不成军，红军紧紧追赶，在熊口一带将其全歼，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挺）。新沟咀战斗的胜利，是红军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而取得的。

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党代会以后红军作战失利，特别是瓦庙集战斗未打好，复曦归罪于红3军中存在的所谓“游击主义”。

1932年4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改造红3军的训令》，全盘接受临时中央要求各苏区加紧进行“肃反”斗争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认为各种反革命派别都想打入红军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左”的观点出发，夏曦把党内的两次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从5月开始即进行第一次“肃反”，万涛、潘家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红3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转战湘鄂川黔地区 正当湘鄂西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10余万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第10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方针，计划第一步进占襄北，将红3军压迫到长江和襄河之间，第二步全力“围剿”洪湖苏区，妄图歼灭红3军主力。

1932年7月中旬，敌人向襄北发起进攻，当时红3军主力正遵照中央分

局的指示，在襄北的京山、应城、皂市地区寻求作战，在强敌进攻下红 3 军被迫撤出襄北。3 月上旬，敌人实施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标的第二步计划。夏曦决定分兵两路，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要红 7 师等部构筑碉堡，分兵把口，以阵地战阻击敌人，固守洪湖苏区；命令贺龙、关向应率红 3 军主力重返襄北去牵制敌人。红 7 师等部在洪湖苏区中心区实行固守决战，使苏区越战越小。9 月上旬，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并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和包围，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 7 师突围后，于 10 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 3 军主力会合。留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 3 军到达大洪山后，中央分局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的指责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只得在山区无目的地往返游击。10 月下旬，得悉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西进的情况后，才决定红 3 军转移至洲鄂边。11 月初，红 3 军 1.5 万人由大洪山向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鄂川边境南下到达湘鄂边，行程 7000 里，一路上克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侵袭以及第二次“肃反”造成的严重困难，广大指战员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坚强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艰难的转移任务。1933 年 1 月，红 3 军先后攻占鹤峰和桑植城，准备恢复湘鄂边苏区。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以让出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都表示同意，认为这对红军也是一个体整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很好机会。但夏曦以反对“革命不彻底”为理由，坚决不同意，并强令红 3 军立刻向陈部进攻，结果反被敌人击败。红军被迫退出桑植，返抵鹤峰休整，取消红 8 师编制，将撤出洪湖时失去联系后转战远安地区的卢冬生的独立师编入红 3 军。

红 3 军刚刚来到湘鄂边，夏曦又借口一些指战员要求“打回洪湖去”的意见是“改组派”破坏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立即进行第三次“肃反”，先后捕杀了军委主席团成员、红 9 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等大批干部，使红军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参加南县、华容和石首等地的农民起义，领导游击队在江陵、天门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建立正规红军以后，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过多次坚决的斗争，在洪湖苏区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害时年仅 28 岁。

这时的夏曦，觉得什么组织、什么人都靠不住了，共产党、青年团和苏维埃政府已被反革命所把持，其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在他把持的中央分局会议上，不顾其他领导同志的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并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敌人利用苏区和红军忙于“肃反”之际，调集兵力围攻红 3 军，红军又被迫离开湘鄂边，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历尽艰辛，部队由洪湖出发时的 1.5 万人减至 3000 人左右，处境十分困难。1934 年 6 月，红 3 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决定在红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并在黔东创建新苏区。9 月，包括沿河、西阳、德江、印江、松桃 5 县，纵横约 100 公里，人口 10 余万的新苏区已建立起来。黔东苏区的创建，为红 3

军建立了立足点，同时为与红 6 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陕甘苏区、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作战 从 1930 年开始，由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后来进入陕北的晋西游击队(入陕后称陕北支队)分别在甘肃和陕北开展斗争，以后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反对敌人“进剿”的斗争中节节胜利，游击队发展到 1000 余人。1932 年 12 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成立时只有 1 个团的番号) 逐步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 年底，陕甘边成立红 26 军第 42 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与此同时，陕北游击战争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并建立了陕北苏区。

1934 年 2 月，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 26 军第 42 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 30 余次战斗，歼敌 3000 余人，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3 月，敌第 86 师会同当地民团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北党组织将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成立统一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袭占安定县城。随后，陕甘苏区红 42 师一部北上，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经井务塌、张家圪台等战斗，至 8 月底，歼敌 3000 余人，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陕甘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习仲勋、马明方分任主席，并在陕北苏区组建了红 27 军第 84 师。

1934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 4 省军阀部队 4 万余人，准备以陕北苏区为重点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1935 年 4 月下旬，敌人开始进攻。红 42 师与红 84 师在安定县境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红军在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下，与游击队、赤卫军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经两个多月作战，先后占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歼敌 3000 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七、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中央红军六次进攻战役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夺取赣州、吉安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就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苏区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赣州守敌不多，较易得手，因此决定首先围攻赣州。1932年2月3日，红军向赣州发起进攻，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进行强攻，仍未能攻克，后敌援兵秘密入城，红军又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以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分兵两路，由彭德怀率红3军团(称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毛泽东率红1、5军团(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中旬，红1军团和红5军团攻占龙岩和漳州，歼敌第49师大部，缴获飞机2架，筹款百万银元。

粤军陈济棠部乘红军主力出征之机侵入赣南苏区。为解决入赣粤敌，红军东西两路军会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发起水口战役，经池江、梅岭关、大庚、水口等战斗，击溃粤军15个团，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

8月8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军事最高会议，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留在瑞金，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8月16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攻克乐安、宜黄等县城，歼守敌第27师大部，俘敌5000余人，抚州、南昌之敌受到震动。

乐宜战役以后，红一方面军分布在南丰、乐安等地做群众工作，为反“围剿”准备战场。这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积极进攻战略大相径庭，从而促成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召开。在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对以“消极怠工”的态度来对待“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毛泽东开展了激烈的批评与斗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接任。

自1932年10月中旬至1933年1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歼敌2个旅，击溃敌人3个师，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金溪、资溪广大地区，扩大了根据地，建立了闽赣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在金资战役中，红5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与董振堂一起率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5军团，赵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先后参加赣州、漳州、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在金资战役中，赵博生亲临前线，肉搏冲锋，被弹片击中右额而牺牲。

红一方面军的六次进攻战役，是在蒋介石准备和忙于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情况下进行的。除赣州战役未达目的，红军遭受较大损失外，其余几次战役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目的，配合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在战略指导上，临时中央一心想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因而使红军丧失了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12月，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

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 12 个师担任“主剿”任务，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 19 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 4 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两个航空队支援陆军作战。1933 年 1 月，敌中路军组成 3 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 3 个师为第 1 纵队，吴奇伟指挥的 4 个师为第 2 纵队，赵观涛指挥的 4 个师为第 3 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 1 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又进行六次进攻战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红一方面军辖 3 个军团、4 个军，总兵力约 7 万人，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并不乐观。1932 年，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失去了“三足鼎立”、互相支援的战略格局，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于 1933 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加紧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红军连续作战，反“围剿”准备不足；具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毛泽东已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这些因素，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

在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决定采取进攻战略来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要求红一方面军首先攻取南城和南丰。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对这一决策力持异议，并且向中央力陈红军在大战前攻击坚城的弊端，请求改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强我弱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拒绝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周恩来在自己正确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同朱德一起，对围攻南丰作了灵活机动的部署：按命令准备强攻南丰，攻坚不利时则撤围打援；打援不成时转至宜黄、乐安地区，在山地运动战中消灭敌人。2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南丰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未能突破敌防御主阵地。

蒋介石获悉红军围攻南丰以后，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天赐良机，立即命令南丰守军第 8 师固守待援，命令驻南城第 24 师派兵驰援，同时命令中路军各纵队加速向南丰、黎川、宜黄地区推进，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识破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出红 11 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 1 纵队接到向南丰地区推进的命令以后，罗卓英立即令在乐安的弟 52、第 59 师东进，令第 11 师由宜黄南下，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第 1 纵队部署以后，即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 1、第 3 军团，第 21 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 52 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 5 军团，第 22 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地区歼击敌第 59 师。2 月 27 日，敌第 52、59 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 52 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 59 师师长陈时骥。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洛口、南团地区休整。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

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上述部署，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命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歼击敌后纵队。陈诚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月20日，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线，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已达百里，而后纵队的兵力又明显减弱，出现了红军歼灭敌人后纵队的极好战机。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决心定下以后，即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主力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师与第9师的联系；第22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个师，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取得的。

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赣、湘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以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袭击、消灭敌人，主力转至外线，求歼小股敌人，配合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随着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侵入邻近苏区的敌人也先后撤走。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夏，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创办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策划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前方组织指挥作战。

1933年6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拟订了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要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后称东方军)入闽作战，消灭第19路军和驻闽的国民党军；另一部分(后称中央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地区活动，打击敌人修筑堡垒封锁线的部队，然后两军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江西省的首先胜利。7月初，红一方面军按照上述计划，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归化、朋口、青州等地歼灭第19路军和新2师各一部，红军也遭受相当损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赣江东岸活动的以红1军团为主的中央军，除在乌江地区歼敌3个团外，未能阻止敌人修筑堡垒封锁线的行动。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不但没有力量去会攻抚州和南昌，反而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还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

剿”作战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 万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 1、2、3 路军，计 34 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 3 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 11 个师为南路军。此外，由蔡廷锴指挥的第 19 路军和福建驻军共 10 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有 15 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 5 个空军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中央苏区是巩固的，正规红军已发展到 8 万余人，随着反“围剿”作战的发展，又增建了第 7、第 8、第 9 军团。第 7 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肖劲光；第 8 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第 9 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鼓舞下，苏区军民参战支前热情很高，红军如果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敌人“围剿”的。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已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正确的军事思想和原则被否定。他们在已知蒋介石准备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仍要红军实行进攻战略，分兵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派遣李德(又名华夫)来担任军事顾问，他与不懂军事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结合在一起，垄断了红军的指挥大权，事无巨细，均由他们决定。李德只用地图指挥作战，甚至连迫击炮的位置也标定死了，前方指挥员没有一点机断专行之权。这样的军事战略和拙劣的军事指挥，决定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失败的命运。

1933 年 9 月 28 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闽赣省府所在地黎川，拉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北上就敌，企图收复黎川，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 月上旬，红军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在洵口歼敌 3 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预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10 月中旬，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驻防的资溪桥，仍不胜。11 月中旬，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战场上越来越陷于被动地位。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 月 20 日，国民党第 19 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协定。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和南京、上海地区抽调 11 个师去镇压 19 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处于停顿状态。“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和各派势力不满蒋介石对内“剿共”、对日妥协政策的反映，它对中央苏区粉碎“围剿”是个良机。如果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能够调动敌人回援，粉碎敌人“围剿”；或者红军能够鼎力援助第 19 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入闽，把蒋蔡之战变成旷日持久的战争，红军乘机发动反攻，也能打破敌人“围剿”。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极“左”的错误观点出发，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 19 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

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让第 19 路军单独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蔡廷锴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继续由博古负总责，红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镇压第 19 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 1 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在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险关、隘口构筑碉堡，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 1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多次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不仅没有顶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到重大损失。

4 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 11 个师进攻广昌。党中央、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 9 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的口号，博古、李德亲自到前线指挥。敌人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碉前进。红军在抚河两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被迫于 27 日撤出广昌。广昌保卫战，历时 18 天，中央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付出了 5000 余人伤亡的代价，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仍陷于敌手。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感到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开始作撤出苏区的准备，一面向共产国际报告，一面于 7 月间派出由红 7 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牵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8 月间又令湘赣苏区的红 6 军团转至外线作战，向湘中转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敌人占领广昌以后，一面补充整顿，一面作继续进攻的准备。7 月上旬，敌军分六路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中革军委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9 月初，敌北路军集中 9 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 5 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以步枪、机枪和大刀、手榴弹，抗击敌人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集团冲锋，终因伤亡过重而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 9 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均已匮乏，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希望。1934 年 10 月，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实行战略大转移。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的红军，担负着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和抗击敌人进攻的任务，形势十分艰险；作战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

消耗战，因此大都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 6 军团战斗失利后转移到永新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和依托井冈山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1934 年 8 月，红 6 军团奉命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徙，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第 16 师于 1934 年 6、7 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与敌浴血奋战后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 10 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苏区东部执行扰敌后方的任务，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盘山等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堡垒战、消耗战，使自己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战越小。1934 年 11 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 10 军合编为红 10 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委员乐少华。

蒋介石为消灭闽浙赣红军，又增调部队加紧“围剿”。红 10 军团转入外线作战，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这一行动。1935 年 1 月，红 10 军团在皖南地区作战中接连受挫，被迫返回赣东北地区，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截成两段，先头部队 1000 余人在红 10 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过封锁线，回到老苏区，随后组成挺进师，转战于闽浙赣边地区；军团主力约 2000 人，被七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于怀玉山区，大部壮烈牺牲，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等不幸被俘，不久被蒋介石杀害。方志敏，江西省弋阳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党的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起义，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写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向往。就义时年仅 35 岁。刘畴西，湖北省望城县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和南昌起义，曾任红 1 军团师长和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央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总指挥。就义时年 37 岁。

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最终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一样遭到失败。

1932 年至 1934 年，从整体上说是红军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加紧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始则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继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最后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其结果，除个别苏区外，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八、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和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除了打仗以外，还肩负着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任务。红军通过发动群众，加强了政权建设，创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还使自身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红军承担筹款任务，也是客观需要形成的。红军初创时期，没有后勤供应保障，全靠作战缴获和自己筹款解决给养。有了根据地之后，由于地区不大，又处于贫困的边界，财力有限，虽能给前方解决一部分经费，但仍难满足红军的需要，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给养，还要靠红军自己解决，有时甚至还要供给白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经费。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各苏区大同小异。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之间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争取几十万群众，摧毁一批被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建立苏维埃政权，筹足作战经费，扩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事迹。鄂豫皖红军利用战斗间隙，积极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分配土地，建立新区政权，帮助群众生产劳动。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主要是执行“负担加在剥削者身上”的原则，除地方政府供给一部分外，主要靠军队自筹。红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大任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改进，就更趋完善、更制度化了。

红军不仅在反“围剿”作战中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而且在自身建设上也有新的发展。

1930年冬，党中央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其中有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等10个具体条例。条例总则指出：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靠红军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把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团结于红军的周围。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红军指成员明了红军所担负的阶级的政治责任和与敌人作战的意义。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与颁布，使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条理化。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讨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巩固红军内部的工农联盟等问题。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著名论断，再一次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反“围剿”作战，是红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各地红军积极贯彻政工条例和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政治思想工作的许多宝贵经验，促进了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自创建以来，特别是反“围剿”以来，经常同比自己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作战。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红军养成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具体地可以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狠”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部队从上到下都有一股有敌无我，有我无故，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的狠劲。红军物质生活

差，武器装备落后，要取得胜利，靠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部队有了这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在战场上，经常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人有飞机、大炮和自动武器，红军主要是步枪、大刀、手榴弹，靠什么去战胜敌人？除了正确的指挥和人民的支援，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靠有一般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第二是“硬”。有“泰山崩于前丽色不变”的气概，在战役战斗十分严重、惨烈、危急时刻，能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第三是“快”。“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作战，练就了“走”和“打”两套本领，走和打都离不开一个快字，运动战更是这样。走是为了打击敌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和弱军歼灭强敌的基本要求。红军的许多胜利，都是靠一个“快”字赢得的。第四是“猛”。部队的勇猛作风，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两军相遇勇者胜”。红军打起仗来，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使本来在兵力、装备上大大优于红军的敌人，兵败如山，许多高级将领，束手就擒。第五是“活”。灵活机动，是红军指战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运用和发挥。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灵活运用和不断变换战术，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模式，充分发挥指战员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红军养成的这套战斗作风，不仅对当时完成建军、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在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红军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通信兵、炮兵、工兵以及兵工厂。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以龙冈战斗中俘虏的敌第18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和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为基础，成立无线电队，以后又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培训通讯和技术侦察人员。鄂豫皖、湘鄂西红军也先后以缴获敌人的电台装备自己。无线电通信兵的建立，使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与各苏区红军建立无线电联系，为各苏区和红军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给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及时提供敌军情报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反“围剿”中，各地红军以缴获敌人的火炮装备了自己。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红3军团炮兵连为基础，连同白沙战斗中缴获的三门“克鲁白”山炮，在江西兴国的头陂镇成立军委炮兵团，备军团也陆续建立炮兵营和炮兵连。鄂豫皖、湘鄂西红军把缴获的火炮配属给部队。这些炮兵，在以后的反“围剿”和长征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红1军团炮工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大龙坪战斗中，一举摧垮敌第52师师部，使敌人失去指挥，一片混乱，很快被全歼。

红军需要的武器、弹药，过去几乎全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供应。为适应红军队伍和战争规模扩大、武器需求剧增的需要，红军除继续依靠缴获补充外，还建立许多小型的修械所和兵工厂。仅兴国官田的中央军委兵工厂，就装配和修理4万多支步枪，2000多挺机枪，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

制造 40 余万发子弹，5000 多枚地雷，6 万多个手雷。鄂豫皖苏区也兴办了不少兵工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鄂豫皖军委兵工厂、余富山兵工厂和红山兵工厂。它们的规模都是二三百人，除修理枪械，打造刀矛外，还可生产撇把子枪、来复枪、子弹、手榴弹、地雷，并能仿造“汉阳造”步枪。各苏区生产、修配的武器装备，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作战规模的扩大，红军急需大批各类军政干部。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在江西瑞金附近成立规模较为齐全的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肖劲光、何长工、刘伯承担任校长。建校初期分为步兵、炮兵、工兵三科，以后又增加重机枪连和防空、装甲连。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都设立分校。1933 年，红军军政学校改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和特科学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干部。

这些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较正规的军事、政治、步兵和特科学学校，在红军建设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有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水平。

第三章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红军坚持游击战争

一、中央红军和红 25 军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为了减轻中央红军从赣南突围向西转移的阻力，中共中央利用敌南路军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和陈济棠想对红军保持中立的愿望，由朱德、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月 21 日晚，中革军委以红 1 军团为左路前卫，红 3 军团为右路前卫，红 9 军团掩护左翼，红 8 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 5 军团担任后卫，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通过敌人设在湘南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此时，蒋介石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于 11 月 12 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 16 个师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以 4 个师到湘粤桂边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以 5 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这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红军主力，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杀一个回马枪，以扭转战局。彭德怀也建议以一个军团向湘中前进，威胁长沙，攻击敌军必救之地，迫使蒋介石改变部署，避免到湘桂边与桂军作战。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湘南歼敌的机会，使红军继续处于被动地位。

11 月下旬，中央红军袭占道县以后继续西进。敌人迅速调部队沿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人浴血奋战五昼夜，于 12 月 1 日保卫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此时，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

蒋介石已判断红军将向北到湘西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遂命令何键将“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其主力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修筑工事，张网以待。红军如果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12 月 12 日，党中央在通道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预设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到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避免了覆灭的危险。在此前后，红军进行整编，撤销红 8 军团，合并军委第 1、第 2 纵队，改为中央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前进，强渡乌江，于 1935 年 1 月 7 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红 25 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红 25 军向京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同时还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红 25 军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

军长。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共2900余人，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向京汉路以西转移。蒋介石得悉红25军突围后，急忙调动3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实行堵截和追击，红军边打边走，冲破敌人的阻击，相继进入桐柏山和伏牛山区，鉴于这两个地区都不便建立根据地，又决定向陕南进军。12月上旬，红军巧妙地通过敌人在卢氏县境的封锁线，进入陕西省洛南县使家河地区。红25军在陕南地区，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并同陕甘红军会师，红25军于1935年7月16日从西安以南的沔峪口出发，西征北上，进占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切断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在泾川县四坡村，全歼马鸿宾部1000余人。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幸牺牲。吴焕先，湖北省黄安县人，参加领导黄麻起义，1928年以后，参加领导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卓越领导者，牺牲时年仅28岁。随后，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于9月15日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红15军团组成后，立即参加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0月，红15军团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东北军1个多师，俘敌4000余人，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

正当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陕甘苏区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肃反”，逮捕红15军团副军团长、陕甘苏区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政治生活和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的困难局面。

遵义会议召开。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确定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前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创建新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相继占领土城、习水，给川敌郭勋祺部以重大杀伤。1月29日，红军主力从元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中革军

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争取由黔西向黔东的有利发展。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这时，滇军孙渡部队和川军分别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周浑元纵队正向古蔺、叙永追击。为了迅速摆脱川、滇两敌的侧击，中革军委决定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前进。2月18日，中央红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一部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急忙抽调遵义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道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26日，红军攻占娄山关，并乘胜追击，于28日再占遵义。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吴奇伟纵队第93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第59师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求歼该敌。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向忠庄铺突击，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吴奇伟惊恐万状，率残部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跑。红军跟踪追击，吴奇伟率先逃过乌江，下令截断江桥铁索，使残部当了红军的俘虏。留在遵义地区的敌第59师，见指挥官逃之夭夭，急忙向西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歼其大部。在遵义地区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邓萍，四川省富顺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国民党军第5师作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参加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5军军长，红5军随营军校校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7岁。

遵义战斗，是中央红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猖狂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遵义会议后，决心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引导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胜利的豪情壮志。

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气急败坏，飞往重庆部署新的围攻，决定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所部向川南进击，声称若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中革军委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红军主力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分路向南急进，令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继续向南急进，于31日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

北。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当各路敌军奔向贵阳时，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向东继进，并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伪装东渡。蒋介石信以为真，急令各路敌军向东追击。中革军委抓住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运动，云南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令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两路向西南急进，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留在乌江北岸的红9军团，以积极行动牵制敌人，曾在打鼓新场以东击溃黔军5个团的进攻，西进水城地区，同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后又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敌人向北，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直逼昆明。此时昆明周围兵力空虚，龙云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并调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进一步削弱了敌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条件。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由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也由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主力会合。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城，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破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5月15日开始，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经泸沽、越西、冕宁，进入彝民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歧视，对汉人抱有根深的民族仇恨。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红1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先遣队进入彝民区后，遇到不明真情的彝族群众的拦阻和袭扰。红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按照各家族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刘伯承是四川人，从小对彝族的风俗就有所了解，他根据彝族的习俗，同我友好的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其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说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的罗洪家族尽量争取；同时还释放了被国民党扣压的彝族群众数百人。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纪律严明，深受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经过160多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是一层层群山，只有一个口子可以上岸，而且对岸的口子有敌军防守，大部队要通过非常困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边。因北渡未成，陷入清军的重围而全军覆没。蒋介石妄想利用大渡河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25日，红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条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挡勇士们前进。神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4发迫击炮弹，两发打掉了大渡河北岸的两座炮楼，两发摧毁了敌人据守的河防阵地，掩护17

勇士强渡大渡河，击溃了川军的防御，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也难飞越的天险大渡河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不能架设浮桥，全军数万人靠几条小船短期内难于通过。而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正以两个旅沿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真是军情紧急，千钧一发。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的泸定桥渡河。红4团须受了先头部队的任务后，他们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多次击溃川军的阻拦，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当日下午红4团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第2连22名突击队员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击。第3连指战员扛着木板，跟随突击队铺桥前进。敌人在东桥头烧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英雄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迟疑地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铁索桥，迅速歼灭残余守敌，占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继续北进，准备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进入川西北地区。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之中。广大指战员顶严寒，冒风雪，手拉着手前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咽一把冰雪。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终于翻越了夹金山，到达川西的达维。

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别北上、南下

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和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时，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1935年3月28日，嘉陵江战役开始，第1梯队各部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分别实施渡江作战。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红30军，首先强渡成功；位于阆中以北的红9军和苍溪以北的红31军，相继突破敌军防线，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红4军投入战斗。此役历时24天，歼敌1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的广大地区。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川陕苏区的困难和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川陕苏区斗争的战略意义和嘉陵江战役后所引起的变化，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

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令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于江油、中坝地区。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以及党政机关、学校、工厂等共8万多人，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占领茂县、威州、理县；另一部沿岷江北上，占领松潘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和第9军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相继攻占懋功、达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党中央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斗争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共10万余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川西北系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语言不通，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为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甫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但是，张国焘不同意这一方针，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中革军委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回到红四方面军后，立即要求中央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甚至策动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他又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攻击党中央，破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有利于党的北上方针的执行，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为了统一指挥，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红四方面军军的

番号不变。此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向胡部靠拢，川军进占懋功、茂县及岷江东岸地区，企图围歼我军，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在卓克基以南的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为左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第3、第4、第30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北上。8月中旬，左右两路先头部队先后开始北进。从卓克基到阿坝，从毛儿盖到班佑，都要经过茫茫的草原。草地气候恶劣，忽而浓雾弥漫，忽而风雨冰雹。地理环境极坏，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可食用的东西。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甚至有没顶之灾。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顶风雨，冒寒冷，忍饥耐渴，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8月29日，右路军第4、第30军歼灭了包座守敌及援敌第49师约5000人，为全军打开了北进的通道。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达陕北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0日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的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人，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并借口噶曲河涨水，强令已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又命令当时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9月8日，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同时指示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在周恩来处举行会议，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因素却一意孤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决定，并于9月9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这份电报，发现了张国焘的这一企图，立即报告毛泽东，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当时有人不明真相，电话寻问要不要拦截北上红军时，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由阿西地区北进，11日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12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红军北上,腊子口是必经之路,这儿像个小小的喇叭口,整座山像被巨斧劈开,仅仅裂开一条缝儿。喇叭口两侧是悬崖绝壁,那条腊子河从喇叭口里喷涌而出,出口处有一座小桥,桥右前方悬崖上修了一个大碉堡,可以火力封锁红军前进的通路。红4团苗族战士李小猴,毛遂自荐攀登上悬崖绝壁,引导战友炸毁了碉堡,使我光头部队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回忆这次战斗时指出: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不打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红军进入甘南,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得知陕北有一块相当大的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去陕北。陕甘支队接着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的这一不朽诗作,是中央红军英雄们万里长征的真实写照。

陕甘支队11月初到达甘泉,与红15军团会合。党中央帮助陕甘苏区和红军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人释放出来,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边苏区的危局。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负责军事和党的组织工作。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辖第1、第15军团。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编为第1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全军1万多人。

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有名的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下午4时,敌第109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次日拂晓,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被包围之敌展开猛攻,激战至下午2时,将其大部歼灭。23日,又在张家湾歼其援敌1个团,被围在直罗镇的残敌见侍援无望,在向东突围时全部被歼。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以后,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和右路军第30、第4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许多干部战士因此牺牲了生命。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构,通过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并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查办

叶剑英和杨尚昆。张国焘公开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会上，朱德、刘们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反映了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原则性。

张国焘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路线，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10月8日，南下部队分左右两纵队发起进攻，十多天内，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10月20日，张国焘又决定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歼敌5000余人。

敌人为了阻止南下红军东进成都平原，调集80余团兵力与红军决战。11月中旬，南下红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大道破垒前进，克重镇百丈。川军10多个旅在航空兵和地面炮火掩护下，向百丈地区反扑。红军浴血奋战七天七夜，歼敌1.5万人，但自己伤亡近万人，未能战胜敌人。川军的援军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红军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张国焘南下碰壁之后，决定主力转向川康边。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

1936年4月，部队编成28个团，共4万余人，与南下时人数相比，减员一半以上。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南下部队十分关怀，经常通告情况，希望他们迅速北上。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劝其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越来越不满，迫切要求同党中央会合。

三、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红2、红6军团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共同北上

湘鄂川黔苏区的建立和红军反“围剿” 1934年8月上旬，湘赣苏区的红6军团奉命向湖南中部转移。红6军团9000余人，在以任弼时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及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江西省遂川县向南突围，开始西征。途中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经湘南、湘桂边进入黔东，击溃敌人10个团，红军也遭受严重损失，余部3000余人于10月24日在印江县的木黄同红3军会师。两军会师以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建立以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军事上成立总指挥部，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红2、6军团会合后，决定向湘西地区发起攻势。从10月下旬至1935年1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旅，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初步建成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主力红军发展到1.2万余人。在此期间，红2、6军团在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领导下，集中地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方面的严重错误。为团结教育夏曦，组织上仍保留其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并任命他为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

2月，蒋介石在湘鄂两省调集10余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对湘鄂川黔边苏区发动“围剿”，企图乘红2、6军团立足未稳之际，将其围歼于湘鄂两省边界地区。红2、6军团实行集中主力正面迎击敌人的战法，几次作战均未打好，部队受到严重伤亡。省委决定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北渡长江，转移到鄂西去创建新的根据地。4月中旬，红军在陈家河地区与敌1个旅遭遇，将其全歼，接着又在桃子溪地区歼敌1个旅。6月中旬，红军主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援敌，歼敌第41师师部和1个多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8月，又在板栗园和芭蕉坨歼灭和击溃敌人10多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迫使敌军转入防御。至此，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被粉碎。

红2、红6军团长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9月，蒋介石纠集130个团的兵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红2、红6军团准备在内线寻机歼敌，但由于敌人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成，敌人堡垒封锁线越来越紧，在内线粉碎“围剿”已无可能，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向湘黔边转移，创造新的根据地。11月19日，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向东南方向猛进，直插湘中地区。蒋介石集中5个纵队，分路追击，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沅江、资水之间。红2、红6军团到达武冈以北地区，突然掉头西进，于1936年1月中旬进入黔东。留在苏区的部队，也突出重围，与主力红军会合。红2、红6军团于1月20日开始西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连克瓮安、平越，进至贵阳以北60里的扎佐，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在这里红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20天内，扩大红军5000余人。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周素园先生，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2、红6军团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途中他给孙渡写信，晓以大义，使孙渡

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周素园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延安。

2月上旬，蒋介石令川军、滇军各一部，堵截红军北渡长江和西入云南，调集5个纵队向红2、红6军团进逼。各路敌军纷至沓来，将红军压缩在毕节狭小地区，红2、红6军团被迫西进乌蒙山区，在优势敌人围追堵截之下，历时1个月，转战1000多里，击破敌军的阻拦，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3月30日，红2军团总指挥部在盘县接到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关于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于是军委分会决定，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红2、红6军团撤离盘县后，冲破滇军的防线，向滇中疾进。4月8日，进抵普渡河，遇到滇军的堵截，打了一场恶仗，西渡未成。红军转向昆明附近，采用“攻其所必救”的战术，调动敌人。红军经富民以东转向西进，连克楚雄、南华、祥云等地，到达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抛在后面。红2、红6军团从石鼓、巨甸两处渡过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将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南的计划。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沿金沙江东岸的雪山北进。4月30日到达中旬，尔后分两路向甘孜前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严寒、缺氧、缺粮的困难，胜利地翻越了几座大雪山，7月2日，红2、红6军团到达片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匠任副政治委员。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正值日军进一步侵华，在我国东北强化其殖民统治，中日矛盾不断上升，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做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向湖南进兵。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去湖南，甘南地区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共同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分裂活动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反对、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的情况下，被迫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6月29日，红四方面军颁布第二次北上的政治动员令。7月上旬，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后开进。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过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极为关怀，不断通报敌情，并于7月27日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组成第1、第2纵队，红二方面军组成第3纵队，相继出发，向甘南急进。第1纵队于9日抢占天险腊子口，10日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包围了岷县城，26日攻占渭源。第2纵队于8月20日攻占洮州，歼敌1个营，接着击退了敌马步芳1个旅的进攻，9月7日攻占通渭。第3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于9月初进至哈达铺地区。接着东进，占领礼县、成县等地。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肃南部，占领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南方八省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留下红24师和10几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万人，还有伤病员3万余人，在苏区坚持斗争，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继续向苏区腹地进攻。苏区军民为掩护红车主力的战略转移，以阵地防御战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从12月起，敌人又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实行白色恐怖。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配合国民党军对苏区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国民党反动政府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被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共70余万人。

当时项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迅速的组织退却和坚持革命的游击战争，而主张把留在苏区的部队全部集中起来，准备打大仗。他将许多小游击队编入各独立团，将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24师，继续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使红24师等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5年2月5日电示项英并中央分局，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指定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任命项英为军分会主席，统一指挥军事斗争。苏区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随即决定将红24师等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此时，中央苏区几乎全部被敌占领，红军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分途突围过程中，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军又受到很大损失。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不久英勇就义。何叔衡，湖南省宁乡人。早年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曾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2月在长汀附近被敌人包围，坠崖后与敌人搏斗时牺牲，时年60岁。瞿秋白，江苏省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持过党中央“八七”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新文化运动。1934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武平被敌人逮捕。6月在长汀就义。贺昌，山西省离石人。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南昌起义，党的五大、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江西会昌地区与敌

人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 29 岁。苏区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至赣粤边、闽西等地，同当地群众一起继续坚持斗争。从此中央分局和党中央以及自己领导的其他地区失去联系。

与中央军委战略转变的同时，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八个省的红军和地方部队，亦独立坚持游击战争，并逐渐形成 15 个游击区。这 15 个游击区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边和琼崖地区。

1935 年 3 月，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率领 300 余人，突围后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与先期到达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坚持游击战争，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新方针。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在赣粤边活动，曾三次“清剿”这一地区。陈毅在梅岭被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部队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至 1937 年，游击队尚有 300 余人。

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 100 余人，从中央军委突围后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闽西地区的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打破了敌人两次大“清剿”，游击队一度曾发展到近 2000 人。

红 25 军长征以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鄂豫皖区党组织和高敬亭领导下，成立红 28 军，共 1306 余人。红 28 军以大别山为依托，坚持鄂豫皖边的斗争，他们打破敌人的反复“清剿”，游击范围扩大到近 50 个县。至 1937 年，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 2000 余人。

在湘鄂赣边地区活动的红 16 师余部，在中共湘鄂赣省委和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一度曾发展到 5000 余人。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边进行反复“清剿”，红军损失较大，至 1937 年，红军游击队尚存 900 人。

在皖浙赣边地区，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皖浙赣省委和唐在刚、余金德、关英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至 1936 年，使游击武装发展到近 3000 人。

其他各地区的红军也对国民党军的“清剿”展开了极其艰难困苦、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在闽赣边，有中共瑞金特委和赖昌祚、钟得胜领导的游击战；在闽粤边，有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黄会聪领导的游击战；在浙南，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栗裕、刘英领导的游击战；在闽北，有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黄道、黄立贵、卢文卿等领导的游击战，在闽东，有中共闽东特委和叶飞领导的游击战；在闽中，有中共闽中特委和王于洁（即吴梅）、吴德标、刘突军领导的游击战；在鄂豫边，有中共鄂豫边省委和张星江、周骏鸣、仝中玉、王国华相继领导的游击战，在湘赣边，有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谭余保、曾开福、彭辉明、段焕竟、刘培善领导的游击战；在湘南，有中共湘南特委和方维夏、彭林昌、李林等领导的游击战；在海南岛，有中共琼崖特委和冯白驹领导的游击战。

南方八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挫败敌人的反复“清剿”，牵制大量

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长征，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与各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陆续停止对南方游击区的进攻，胜利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来，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军侵略的主力。毛泽东高度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第四章 发展巩固陕甘苏区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发展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年的形势和瓦窑堡会议 在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前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之后，又于1935年把侵略魔爪伸到华北，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建立“华北国”。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的侵略行动，已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已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继续调动大军“围剿”红军，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公开声明他们没有抗拒日本充当亚洲“主人”和中国“保护者”的举动，继续把日本帝国主义称为“朋友”，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甚至同日本签订出卖中国领土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公然颁布《邦交敦睦令》，禁止组织抗日团体，其卖国投降的可耻面目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投降的前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倡议其它军队和红军订立停战协定，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党和红军的真诚愿望，得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响应，促进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推动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和16日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革命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出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方针，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相应地调整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确定红军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第一步打击南、北两面之敌，巩固陕甘苏区；第二步进入山西作战，初步开辟晋西苏区；第三步，视情况转到绥远，直接对日作战。会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量发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应尽量恢复和发展，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在战略战术上，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并赋予中央军委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进行不懈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东征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旨意下，部署于庆阳、鄜县（今富县）、延安、洛川、宜川之线，阻止红军向南、西南方向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其第15路军和第35师在宁夏、陇东地区，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84、第86师和晋军5个旅部署在绥德、

横山、定边之线，阻止红军向北、东北方向发展，并“清剿”吴堡、神府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东面，由于有黄河天险，在晋西黑峪口至禹门口 300 多公里的沿河线上，晋军只有 3 个多旅的兵力，虽然晋中、晋东和绥远尚有 20 个旅，但距离尚远，一时对红军构不成威胁。这个态势表明，红军东征的条件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于 12 月 24 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12 月下旬向南进击，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 28 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 86 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1.27 万人，新组建红 29 军和 6 个独立营、10 个基干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 年 2 月 20 日晚，红一方面军（当时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由清涧东部的河口和沟口一举渡河成功，到 23 日，控制了辛关到三交之间的全部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等重镇的宽 50 公里、纵深 35 公里的广大地区。

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阻止红军前进，急调入陕的 4 个旅返回河东，会同原在晋西、晋中的 10 个多旅，在红军占领区的北、东、南三面设防。为打破敌军防堵，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27 日前后越过吕梁山脉，占领水头、大麦郊、兑九峪（今兑镇）、三泉地区，歼敌两个团。

从 3 月 4 日起，阎锡山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 14 个旅的机动兵力，编成 4 个纵队，向红军反扑。10 日，红 1、红 15 军团各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之第 1、第 4 纵队，集中主力打击敌之第 2、第 3 纵队，在兑九峪一举将敌 5 个多旅全部击溃，巩固了占领地区。

从 3 月 16 日起，红一方面军实行分兵作战。红 1 军团和红 15 军团第 81 师（后合称右路军）由大麦郊出发，突破敌军汾河封锁线，迅速向南挺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和襄陵县城，破坏同蒲路 100 余里；红 15 军团主力（后称左路军）佯攻灵石县城，转兵北上岔口，派出部分兵力袭击晋祠，威胁太原，随后经娄烦进至曹家坡，歼敌两个多营，再转至康宁休整；新成立的红 30 军和红 15 军团 1 个多团、山西游击支队组成的中路军，积极活动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配合左、右路军行动；留在陕北的红 28 军乘晋军东返之机，收复吴堡、神府苏区大部，并于 3 月底由黑峪口东渡黄河，同左路军会合，随后沿黄河东岸南移，4 月 14 日进攻三交时，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领导过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红 26 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牺牲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进入 4 月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11 个师陆续进入山西，和晋军一起，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在山西面临不利作战形势。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 5 月 5 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甘苏区，集中在延长、延川地区休整。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 75 天，共歼敌 7 个团，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4000 余支，扩兵 8000 余人，等款 30 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红一方面军西征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党和红军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重大突破，红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达成准备并肩抗日的协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谈，在军事行动上达成谅解。此后，东北军、西北军的大部分部队和红军处于停战状态，有时被迫向红军进攻，也是预先通知红军，实弹演习一番而已。在与地方实力派达成谅解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于 5 月 5 日也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双方互派代表，共同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蒋介石无视我党的正确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他随即以 3 个多师渡河入陕，配合其原在陕北的第 84、第 86 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并在河东配置 5 个多师，防止红军再次东渡；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由南线，第 15 路军由西线向陕甘苏区进攻。在上述敌军中，只有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反共坚决，但其防区宽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方向。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于 5 月 18 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 1、红 15 军团和第 81 师等部组成四方野战军，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扩大陕甘苏区；以红 29、红 30 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东线的游击战争。中央总的设想是：造成敌军阵势在东，我军阵势在西，争取向北打通同蒙古、苏联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 2、红 6 军团的联系，并争取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5 月 20 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由延长、延川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挺进，至 6 月 4 日，红 15 军团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围困安边，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红 1 军团攻占曲子、早城、环县和洪德城，俘敌约 1300 人。6 月 7 日至 13 日，右路军红 15 军团占领同心城，并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 1 军团进至七营附近，切断了陇东之敌第 35 师退回宁夏的大道；中路军红 28 军和第 81 师等部在占领区开展群众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同时，红 29、红 30 军等部在东线坚持游方战争，打破了敌军占领陕甘苏区和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

6 月 16 日，西方野战军以巩固占领区，摧毁安边、定边、豫旺等敌军据点，解决部队供应和冬装材料为目的，开始第二阶段作战。第 78 师攻占定边、盐池，左路军一部攻占七营，右路军攻占王家团庄和豫旺，并击退敌军 86 师 1 个团、第 15 路军 3 个多团的反扑，巩固了占领区域。

7 月底，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通过草地。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转入休整。此役共俘敌 2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支，战马 500 余匹，开辟新区纵横各 200 余公里，把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山城堡战役 1936 年夏，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迅速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明显进展，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更加接近我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开始同我党商谈共同抗日问题，并准备订立联合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开始倾向反蒋，准备联共抗日，山西的阎锡山开始容纳共产党员，筹建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妇女、职业等各界救国会、后援会已普遍建立。同时，蒋介石在坚持以军事手段消灭红军的同时，也在寻找以其他方式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并于6月派代表同中共进行了秘密会谈。

在全国抗日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和红军的首要战略任务，今后以南京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不放松同各地方实力派的谈判。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央深入与张学良协商后，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并制订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中旬占领将台堡、界石铺、打拉池和会宁等地。此时张国焘突然变卦，认为红四方面军“以快向西进为宜”，决定渡过黄河，到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另创局面，经过中央的耐心说服、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加之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渡计划。红四方面军遂于9月底由岷县、漳县地区北上，先头部队于10月8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敌军已大批集中，使静、会战役无法进行；并使红二方面军陷于敌军10个师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地区北上，22日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至此，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毛泽东曾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当红军主力会师时，敌军正以10多个师向北推进，蒋介石也来到西安督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沿岸。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

11月中旬，红军主力东移至山城堡、洪德城地区。此时，敌军一部已西渡黄河，追击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被我劝阻于豫旺堡地区；敌第3军到同心城后也停止了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1军行动积极，正分三路追击红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敌第1军右路军第73师，随即置红1军团于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于山城堡以东和东北，红31军于山城堡以北，红4军于山城堡西南，相机歼灭进入山城堡之敌；另以红二方面军和红28军、第81师等部担任预备队和两翼掩护任务。21日下午，红军各部队对进入山城堡之敌发动突然猛攻，战至22日9时许，歼敌1个多旅，迫使其他敌军全线撤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再一次大振红军声威，对巩固陕甘苏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都起了巨大作用。

西路军的失败 11月中旬以后，西路军2.1万人艰苦转战于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等地，广大指战员同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艰苦卓绝的

斗争，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歼敌 2.5 万余人，终因敌情、地形和某些社情等条件对我不利，1937 年 3 月在祁连山最后失败。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等万余指战员英勇牺牲，部分失散的指战员陆续回到陕甘宁苏区；另有数百人由李先念率领到了新疆，抗日战争开始后大部回到延安，少数人留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成为建设我军空军的骨干。董振堂，河北省新河人，1931 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赵博生一起，率领国民党第 26 路军 1.7 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 5 军团副总指挥兼第 13 军军长，红 5 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过中央苏区 1932 年以后历次重要战役和红军长征。牺牲时年 42 岁。

在西路军处境危急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制止马步芳部对红军的进攻，并以红 4、红 28、红 31、红 32 军组成援西军，准备西进接应。然而，中央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西路军的失败是最令人痛心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视死如归的忘我革命精神，却是我军最可宝贵的财富，值得全党全军永远敬仰。

二、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党和红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斗争 1936年秋冬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仍在继续发展，一方面，由于日本和伪蒙军对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侵略，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以支援察绥抗战为契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上海、青岛等地的工人也举行反日大罢工，走上抗日救亡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镇压抗日群众运动的反动政策，纵容、包庇汉奸和亲日派，逮捕爱国青年，解散救亡团体，枪杀爱国群众，并于11月间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即：“救国会七君子”)。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更适应各项斗争，各项政治主张深得人心，南方游击区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仅华北地区的党员就发展到5000余人。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等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红军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0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呼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如果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随后，毛泽东、朱德等19人又致信蒋介石，再次呼吁其放弃内战政策，使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警告蒋介石不要走到“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的可耻下场。

蒋介石仍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告，继续一意孤行，于12月5日再次飞到西安，不顾张学良、杨虎城的“哭谏”，公然命令张、杨不准抗日，继续“剿共”，并下令开枪屠杀向他请愿的学生。富有爱国思想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其随行委员10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且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它公然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暗中支持亲日派何应钦“讨伐”张、杨。把持国民党军权的何应钦，随即操纵南京政府下达“讨伐”命令，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军沿陇海路进攻陕西，集结飞机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正确方针。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支持国民党无老派、欧美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争取以西安事变为转机，开展全国的抗日局面；在外交上，争取英、美支持，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在军事上，准备以红军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为此，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三次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力陈利害，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开和平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对张、杨及其将领作耐心说服工作，周恩来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动全国各界群众支持

张、杨的爱国行动。

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了积极努力，同时为了防备和平努力失败，在军事上也做了准备。事变当天，中央军委就把情况通报部队，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3日，军委领导人致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西北军在政治上加紧动员，军事上完成部署，防止亲日派的进攻。21日，周恩来同张、杨商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各以部分兵力阻击顾祝同、胡宗南之西集团，集中主力于渭河下游，同刘峙之东集团决战。依照这个计划，对红军进行了部署。

由于周恩来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首先接受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接着，又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势力的支持下，迫使蒋介石于24日口头允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保证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了撤兵“手谕”，张、杨随即释放蒋介石。25日，“讨逆军”东集团开始向潼关撤退，红军也随即停止于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地监禁了陪送他返宁的张学良，迫使杨虎城下野，并纵容何应钦集中25个师向西安进逼。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同国民党谈判，促其履行诺言；一面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于1937年1月3日下令红军主力进军关中和商南，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了延安。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中共代表团坚韧不拔的努力，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主张团结抗日人士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因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充分准备，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放弃了进攻西安的企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党和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积极进行准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目的，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第一，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的五项要求，同时表示，如果国民党确定上述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实质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南方游击队的领导，通过各种渠道，把瓦窑堡会议后党的各项决定传达给南方8省15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指导这些地区打破国民党“北和南剿”消灭红军游击队和利用谈判吃掉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0月正式承认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第二，着手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和红军指导思想的转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中国革

杨虎城下野后，被迫令出国考察。“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投入牢狱长期监禁，于解放前夕被秘密杀害。时年57岁。

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正确的军事原则，批判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教育全党全军不要重蹈这个历史覆辙。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对提高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转变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3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争取我党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权、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和重新教育干部等重大问题。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后合称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八七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准1935年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确定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作为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第三，开展政治军事教育，提高红军战斗力。国内和平的实现，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出于对国民党在历史上屠杀工农群众和自己亲属的义愤，对党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产生了若干怀疑和抵触情绪；少数人则对国共合作后出现的新问题认识不足，盲目乐观，麻痹松懈。为了克服上述不正确的倾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许多指示，各部队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领导干部也深入基层，就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坚持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和新形势下的复杂斗争等问题，作了反复、耐心的解释，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顺利地实现了全军的思想转变。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计划，开展战术、技术、体育、文化大练兵，以方面军或军团、军为单位进行训练检阅，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第四，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大量培养干部。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并以红军大学第三科(又称教导师)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为抗大第2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同时创办通信、供给、卫生、摩托等学校，培养抗日人材。为了提高抗大的教学质量，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领导人亲临抗大讲演或讲授主要课程。抗大除轮训红军干部外，还大量吸收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和少数国民党军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抗大(包括1936年下半年的红大)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研究对日战争、军事教育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并着手编译军事参考材料，准备出版军事刊物。

第五，扩大红军，巩固苏区。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进入关中平原人口稠密区，为扩大部队带来了有利条件。各部队根据前敌指挥部的指示，在驻地附近积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扩大到7.4万人，比红军会师时扩大了一倍。中央军委还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五个区域，组织3个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共消灭土匪2100余人，从而减轻了苏区内的匪患，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同时，苏区的建设也有很大进展，北起长城，南到淳化，西临固原，东界黄河，总面积近13万平

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共设置 36 个县和 1 个特区。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采取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设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苏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复苏，红军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苏区社会安定，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此期间，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1937 年 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同时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应该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决不允许把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曲解为反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中央的决定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全军随即召开各种规模的会议，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通过这一斗争，党对红军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红军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面对全党全军的严肃批判，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内心里却继续对抗，终于在 1938 年 4 月公开投靠国民党，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和特务。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红军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全军团结一致，斗志高昂，为出师抗日加紧进行准备。

三、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领导红军战争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还领导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自行炸毁柳条沟附近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始了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方针，命令驻沈阳和东北地区的10多万部队撤到关内，把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富饶国土、3000万骨肉同胞置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以不足2万人的兵力、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烧杀，无恶不作；在占领区推行“一人犯法，十人负罪”的法西斯统治，规定不准学中国历史、地理，而必须学日文，接受奴化教育，诱骗人民种植、吸食鸦片，强征青壮年男子充当他们的炮灰，妄图在文化上、精神上消灭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具有反侵略传统的东北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当国民党军队奉命撤出东北时，东北各地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便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来。这些武装有的是马占山、李壮、苏炳文等拒绝撤退的东北军组成；有的是由王德林、邓铁梅等部分军队和群众武装组成，有的则由各式各样的农民游击队、自卫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改编而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受到全国各界的热情支持，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周保中、李延禄、于洪仁等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参加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动员铁路工人罢工，募捐钱财、被服，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从各方面支援这些部队的发展和作战；设在北平的、由著名人士高崇民、阎主航、杜重远、冯基平、车向忱等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多次派人到东北对这些部队进行联络、训练和改编；张学良也在暗中给予支持，使义勇军一度发展到30多万人。义勇军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在嫩江桥、富拉尔基等地给日军以重创，在其它地区开展游击战，扫“击日伪军，1932年一年中就袭击重要城市30余次，焚毁沈阳、哈尔滨机场，破坏抚顺煤矿发电厂，成为我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极为壮观的一幕。

但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统一的组织指挥，没有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部队本身组织涣散、成份复杂，各部队之间互存戒心，又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义勇军的战斗力，加之国民政府拒绝援助，致使义勇军于1933年初大部为敌击败，许多领导人或逃或降，邓铁梅、苗可秀等英勇牺牲，只有极少数部队继续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一面组织支援抗日义勇军，一面派遣杨靖宇、杨林(毕士佛)、童长荣、王德泰等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南满、东满、北满地区，发动各族人民组建由共产党领导的抗口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在盘石、海龙地区建立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建立延吉、辉春、和龙、汪清游击队，在吉东(今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右岸)地区建立宁安、饶河游击队，在哈东建立珠河(今尚志)游击队，在松花江北建立巴彦、海伦、汤原游击队，党还掌握由救国军余部编成的抗日救国游击军、辽吉边区军，争取一些基础较好的山林队。这些游击武装，打退日伪军的多次进攻，攻占

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歼敌数百人，初步建立了南满、东满、北满游击根据地。

从 1933 年春季开始，当抗日义勇军在日伪军进攻下纷纷失败时，党领导的游击队却多次粉碎敌人的“讨伐”，使部队不断发展，游击区不断扩大，战斗力日益提高，杨靖宇、李红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发展到 1000 余人；董长荣、王德泰领导的东满游击队发展到 700 余人，周保中领导的辽吉边区军一部转战到绥芬河、宁安地区，联络抗日武装 1000 余人，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李延禄领导的游击军也在宁安、汪清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得到日军士兵伊田助男送来的 10 万发子弹的帮助。

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人民革命军 1933 年 1 月，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要求省委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此作为党的总策略方针。同年 5 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检查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决定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广泛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争取党在游击战争中的领导权。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南满游击队于 1933 年 9 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此后，独立师转战于辽吉两省东部边界，打击敌人的“讨伐”部队，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等重要村镇。1934 年 4 月，独立师联络附近 20 多支抗日武装，在濛江（今靖宇）那尔轰附近开会，通过抗日联合宣言，产生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此后，各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在通化、临江、金川县境同日伪军激战多次，给敌人以严重打击。11 月，独立师扩编为第 1 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军辖两个师，共 1600 余人。

东满游击队于 1934 年 2 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2 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接着，独立师避开敌人“讨伐”部队主力，分兵向汪清、宁安、安图等地转移，开辟新区，先后攻克汪清大甸子、大沙厂子和安图县城等地，歼敌 600 余人。1935 年 5 月，独立师扩编为第 2 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军辖 4 个团，共 1000 余人。随后，第 2 军又联络附近的抗日武装，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珠河游击队于 1934 年 3 月联络 20 多位义勇军首领，商定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并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珠河游击队改编为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哈东支队和联合军其它部队互相配合，先后在三岔河、五常城和哈尔滨至牡丹江铁路沿线打击敌人，歼敌数百人，开辟了道南、道北两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政权，拥有 1000 余人的青年义勇军和 5000 余人的农民自卫队。1935 年 1 月，哈东支队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3 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第 3 军又联合谢文东的民众自卫军、李华堂的吉林自卫军和祁明山的明山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选为联合军总指挥。

游击军于 1933 年 6 月由宁安、汪清地区北上，在密山会合亮山、金山、友山、常山、小白龙等山林队，约定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独立活动、协同

伊田助男是日本共产党党员，被强征到日军服役。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3 年 3 月 13 日，他开车将子弹送到游击队附近，留下致敬信，然后破坏了汽车，从容自尽，表现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

作战，组成人民革命军，推选李延禄为负责人。随后，革命军主力第2团返回宁安，一部留在当地，会合密山游击队打击敌人，并一度攻破密山县城，缴枪130余支，筹措了大批物资。1934年11月，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

1935年5月，烧河游击队编入第4军，全军发展到1600余人。在此期间，绥宁反日联合军也粉碎敌人的两次“讨伐”，1935年2月，同宁安反日游击队、革命军第2团合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军辖两个师，约1000人。1936年1月，汤原游击队在第3、第4军的帮助下，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6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至1935年这段时间，党和游击队纠正了“左”的政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游击队发展成为6个军，共6000余人，为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1936年2月，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现有各部队全部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准备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便统一各部队的指挥。

根据上述决定，人民革命军第1、第2军于1936年春改称抗日联军第1、第2军，两军各有3000人，领导人不变。在粉碎敌人的“讨伐”中，两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第2军一次就在敦化寒葱沟歼敌500余人。同年6月，第1、第2军合编为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接着，第1路军为了打通同党中央和红军的联系，以第2军在原地坚持斗争，第1军由金川地区出发西征。6月下旬，第1军在本溪赛马集歼灭伪军邵本良部1000余人，前进到岫岩以北地区，因部队伤亡过大，被迫东返，同年冬，又进行第二次西征，仍未达到目的。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2军先后取得抚松城、扫荡河、代马沟等战斗的胜利，歼敌700余人，并两次进入朝鲜作战，部队发展到6000余人，军长王德泰在11月战斗中牺牲。王德泰是山东人，幼年随家人逃荒到东北，1932年参与创建东满游击队，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牺牲时年仅28岁。

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后，以一部兵力坚持哈东游击区斗争，军部率两个团东征，活动于依兰、方正、通河、汤原地区，并在汤旺河建立后方基地。坚持哈东斗争的第2团遭敌重兵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治委员、著名女英雄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英勇牺牲。1936年夏，第3军开辟了木兰蒙古山游击区，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余人。此后，为避开敌军“讨伐”，第3军军部率部分兵力，经铁力、海伦翻越小兴安岭，向黑龙江沿岸的逊河远征，当到达逊河时，兵力损失过半，被迫返回汤原地区。

在此期间，抗日同盟军第4军改称抗日联军第4军，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反日同盟军第5军改称抗日联军第5军，周保中任军长，宋一夫(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人民革命军第6军改称抗日联军第6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原第4军第2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各部队都在原游击区的基础上，扩大了活动区域，壮大了部队，粉碎了敌军“讨伐”。

除上述我党直接组织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抗日武装，在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团结争取下，先后加入了抗日联军序列。这些部队是：原依兰土龙山民众自卫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3军，谢文东(后投敌)任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原吉林自卫军余部编成的抗日联军第9军，李华堂(后投敌)任军长，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原东北反满义勇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10军，汪雅臣任军长；以金矿工人为基础组成的反日义勇军(原明山队)编成的抗日联军独立师(后扩编为第11军)，祁致中(祁明山)任师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个军、1个独立师，共2万余人。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一部分。经过近6年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形成了相当多的部队，相当大的游击区，相当规模的斗争局面，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但是，东北游击区态势孤立，游击战争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各部队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同时，游击区域虽扩大到南起鸭绿江口，北至黑龙江畔，绵延千余公里，但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没有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游击战争的发展。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极重要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实现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领导全国广大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有计划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扩大，中国工农红军实现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组成主力兵团，依托根据地，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巩固，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使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长征。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战胜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终于将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最后，党和红军经过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国内和平，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和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过渡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不但粉碎了强大敌人的多次围攻，而且消灭了近百万敌人；克服了自己内部的多次重大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错误，保卫了革命斗争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走向成熟；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

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但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自己正确的军事路线，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锻炼出一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

国、治军的坚强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党和红军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几十万革命者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它不仅为直接抗战做好了准备，而且为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

第五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我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全国抗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抗战，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早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逐步推行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采取边沿“蚕食”的策略，先后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同时向中国勒索了白银2.3亿两的巨额赔款，从而促使其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野心，1927年6、7月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的东方会议，并在会后写成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由边沿“蚕食”步入局部“肢解”和全面“鲸吞”的阶段，并把灭亡中国作为它“征服世界”的先决条件。

时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1927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又陷入了全面经济危机，至1931年达到了顶点，工业生产下降32.5%。虽然通过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入侵华北，大肆进行掠夺，使它先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然而，到1937年又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征兆。经济危机加剧了政治危机。财阀转嫁危机于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工人罢工和农民抗交租税的斗争愈演愈烈。

1936年斗争浪潮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反映财阀和军阀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加紧侵略扩张要求的军内外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多次更迭内阁，政局严重不稳。为了摆脱危机，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日本帝国主义者遂铤而走险，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就积极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在政治上，通过1936年“二·二六”政变，建立起以军部为主体的法西斯统治体制，为扩大侵略战争铺平道路。在思想上，对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经济上，大力发展以军需为主的重工业，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在军事上，积极进行扩军备战。1937年日本陆军兵力已由1931年23万、居世界第6位上升到56万、居世界第3位；同时，大幅度增加军费，1937年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9%，并于1936年5、6月间就确定了全面侵华的战略方针和兵力部署。在其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提出“以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在其《昭和12年度(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以2个军8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以2个军5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中，以1个师团用于华南。并依计划，将其驻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00人增加到5700人。同时，频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

演习并抢占北平附近的丰台、通县等军事要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因而，1937年7月初，在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盛传：“7日晚上，华北将要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果然，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其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出兵入侵淞沪地区，中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通电全国，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坚决抗战。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为公布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与蒋介石等会谈。在中共全国人民推动下，蒋介石千同日发表谈话，虽然仍存在和平幻想，“希望由和平的外文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他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因此，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中共的宣言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是构成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

“七·七”事变，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同反响，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华，支援中国抗战，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直接援助中国抗战。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坑漕一气。英、美等国虽因日本独占中国、损害其在华利益而反对日本全面侵华，但它们为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和德、意法西斯在西方的挑战，并惧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和希望日本北进侵苏，因而极力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并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从而纵容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国际形势，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

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在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自1937年2月开始，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共同纲领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先后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我党我军的目的，因而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1937年2月中旬，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在西安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就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陕甘宁苏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3个师、上设总指挥部，以及扩大民主，分批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进行谈判，至3月8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然而，两天后，国民党推翻原议，将红军改编后人数限定在3万人，而且不能设总部，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副职，陕甘宁苏区不能成为特别行政区，而要分属

陕甘宁各省管辖。这实质上是把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之下，因而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开僵局，3月下旬，周恩来赶赴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并就几个具体问题阐明中共的立场：陕甘宁苏区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特别行政区；红军改编为3个师，人数须在4万以上，并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人到红军任职；以及红军防地须增加等。蒋介石表示：只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这些具体问题容易解决；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除行政区长官须由南京派人担任外，其他政务由中共决定，他不干涉，军队人数他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当蒋介石及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提出：确立一个共同纲领是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介石则要求中共方面先提出两党永久合作与共同纲领的方案。

6月4日，周恩来携带由他起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到达庐山。8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蒋介石一反杭州会谈时的态度，把他要中共起草的两党永久合作的共同纲领草案撇在一边，却提出要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各若干人参加的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宰两党一切对外行动，而且要由他当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同时，推翻其在杭州会谈时允许红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的承诺，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等等。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为顾全大局，中共准备再作重大让步，同意蒋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惟须先确立共同纲领以为同盟会的政治基础；可以由蒋任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并派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大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于7月中旬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然而，蒋坚持红军改编后直属行营管辖，不能设总指挥部，并且由国民党派人任各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对中共提交的合作宣言却搁置一边，不予发表。因而谈判仍无结果。

“七·七”事变后，华北战局危急，而且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也蠢蠢欲动。迫于形势，蒋介石电邀中共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8月10日，周恩来偕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11日参加会议并提出中共关于全国抗战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应采取的作战原则的建议。12日，蒋介石派康泽与周恩来就中共提出的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急需红军出师抗战。于是，在18日蒋介石同意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原则，决定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至此，红军改编问题始获解决。

9月中旬，中共中央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同蒋介石、康泽进行会谈，至21日达成协议。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对实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我党我军的企图。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之后，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当局不愿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而实行一条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与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实行的正确路线和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原则。早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的通电中就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说：“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就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指明：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役上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在敌之侧后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主力歼敌。依此“提案”精神，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8月11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明，这对国防会议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有着积极的影响。

为使全党全军适应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顺利实现军事战略转变，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两党关系，他指出：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全国抗战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我军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歼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我军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和扩大自己，我军的主要战场是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同时，他要求全军迅速实现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我军的战略任务与战略方针。会议在最后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实行全而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艰苦的持久战，要求全党全军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要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为适应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一说是张闻天)、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

友军系指国民党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三、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其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陕北红军第74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全师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第2、第6军团、第32军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全师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和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第386旅(旅长陈赓)，全师共1.3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万人。在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时，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2月，改称留守兵团，直属中央军委)，以肖劲光为主任(12月改称司令员)，统一指挥备师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后为邓小平)分任各师政治委员，萧华(兼)、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任各旅政治委员。

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援，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太原、南京、上海、武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长沙、香港、桂林、洛阳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通讯处、交通站。这对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扩大影响，争取和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求得他们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援我军，均起了重大作用。

出师华北和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日军侵占平津后，为实现其“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不断由侵占我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国内向华北调集大量兵力。并于8月10日和31日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方面军，总兵力计8个师团另5个混成旅团、2个支队共37万余人。其具体部署：以华北方面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实施主要突击，以一部沿津浦铁路南进，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铁路西进，对华北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为阻止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调整部署，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并决定以第1、第2战区共61个步兵师和8个骑兵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沿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的两侧组织防御。尽管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

平汉铁路，系指北起北平(今北京)南至汉口的铁路。

津浦铁路，系指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铁路。

平绥铁路，系指东起北平西至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

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陷入十分被动和不利地位，以致纷纷败退。

在华北战局极端危急的关头，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于8月22日即以第115师为先遣部队，由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誓师出征。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按预定战略部署向晋、察、冀、绥四省交界恒山地区抗日前线挺进。9月3日和30日，第120师和第129师先后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誓师出征，随第115师之后，开赴抗日前线。在敌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纷纷败退、人民渴望能有一支军队迎敌而上的时候，八路军肩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因而倍受沿途人民的欢迎。人们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夹道迎送，从而更加激励了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杀敌报国热忱。

当八路军向晋东北、晋西北抗日前线急进时，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以一部沿平绥路继续西进，夺取包头，控制平绥全线；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直趋雁门关国民党军防线。与此同时，敌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团，则由宣化、怀来经浑源、灵丘直逼茹越口、平型关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月17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首先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国民党军之侧背而击破之，以夺取黄河以北地区，进而威胁河南、山东侧背并夺取山东，实现其侵占华北五省的企图。据此判断，恒山山脉必将成为敌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原定八路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宜，如不改变必将陷入敌之大迂回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在战略上处于机动地位，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和钳制敌人，援助友军，为了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壮大自己，以利于长期支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必须改变原来全部集中于恒山地区的部署，采取分散配置、控制四方的战略部署。据此，第120师须转向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29师准备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步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20日，毛泽东再电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于立足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迅速变更部署，令第120师转向晋西北开进，第115师进军晋东北，第129师转向晋东南地区。

9月中旬，第115师进至晋东北平型关附近。这时敌第5师团正由浑源、灵丘向茹越口、平型关进犯。为配合友军阻止敌人进攻，保卫山西腹地，第115师即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在灵丘与平型关之间侧击敌人的指示，组织各级指挥员勘察地形，最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之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利用谷深路窄并便于我军隐蔽和发扬火力的有利地形，抓住敌自开战以来长驱直入、未遇有效抵抗，因而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采用伏击战术歼灭进犯平型关之敌。并据此确定了战斗部署：以一个团“拦头”，截击敌之先头部队，以一个团“斩腰”，分割歼灭放行军纵队中间部分；以一个团“断尾”，切断敌之退路并阻击增援之敌；以一个团为预备队。9月24日夜，各部冒雨进入伏击阵地，并完成一切战斗准备。25日晨7时许，当骄横丽毫无戒备的敌人行军纵队完全进入我伏击地域时，在帅首长统一号令下，全线突然开火，

同蒲铁路，系指山西省境内北起大同南至蒲州镇附近之风凌渡的铁路。

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并乘机发起冲击，分割围歼敌人。敌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我军英勇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退敌多次反扑，至13时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第5师团是日本常备师团中的精锐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官兵极富“武士道”精神，战斗力很强。我军以劣势装备歼其千余人，极为不易。因而，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由于国民党军茹越口防线为敌突破，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于是国民党军放弃内长城防线，退却至忻口东西预设阵地，抗击敌人。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向冀西、察南地区出击。该师先后收复灵丘、蔚县、平山、唐县等县城10余座，切断张家口至代县问敌后方补给线。与此同时，第120师以一部挺进雁门关外，收复平鲁，威胁大同，主力则于雁门关南北伏击敌之运输卒队，连续获胜，并切断了大同至宁武间敌后方补给线。10月19日，第129师先头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毁敌机24架。八路军上述作战行动，使进犯忻口之敌后勤补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敌华北方面军遂以2个师团兵力沿正(定)太(原)铁路西进，配合其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攻取太原。至此，山西遂成为华北敌军的主攻方向。

为协同友军阻击沿正大铁路西进之敌，八路军总部遂令第129师和第115师主力转向正大路上作战。第129师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刘伯承师长判断敌可能按“兵无常势”的一般原则，认为我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的心理，决定继续在七亘村设伏，结果敌人再次遭我伏击。两次七亘村伏击战，我军仅以30余人的伤亡代价取得歼敌第20师团辎重部队400余人的胜利。然而，由于防守娘子关的友军败退，致使敌人得以西进，威胁忻口、太原的侧背。为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主力迅速南下正太路，并与第129师先后在黄崖底和广阳镇打击敌人，歼敌第109师团和第20师团共400余人，迟滞敌人达一周之久，从而使娘子关和忻口、太原的友军得以安全撤退。11月8日，太原失陷。

自平型关首战告捷至太原失陷，八路军在1个多月中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深得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誉。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山西各山区抗日根据地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于11月12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并且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也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坚决抗战的左翼力量，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鼓吹民族投降主义的右翼势力。13日，他又致电八路军总部，明确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

“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对部署作了调整，令第115师以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创建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师部率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令第129师由正大路南下开辟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令第120师继续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要求各部以一部兵力打击和钳制敌人，大部分散发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 以山西五台山区为中心，包括平汉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平型关战斗前，罗荣桓即率

第115师工作团，开赴冀西阜平、曲阳地区，着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斗后，聂荣臻率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等部约3000人，配合工作团与中共地方组织一道，宣传并实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各抗日组织，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参战，部队很快发展到7600余人，并于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4个军分区。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标志着八路军首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侵占四周铁路沿线和平、津、石家庄、太原等大中城市的日军构成严重威胁。1937年11月14日，敌华北方面军集中2万余人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从各铁路沿线出动，分八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有利战机，打击敌之一路。在第120、第129师的配合下，至12月22日，经近一个月的作战，共歼敌2000余人，粉碎敌八路围攻。反围攻胜利后，边区发展到30余个县，部队发展到2万人，从而为向平西、平北和冀东发展创造了条件。

晋西北地区 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线以南，黄河以东和汾(阳)离(石)公路以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联系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枢纽。1937年9月下旬，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进抵晋西北后，即由师政治机关和教导团共700余人组成的工作团，分赴朔县、俯关和平鲁、左云等县，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随师主力展开于晋西北全区。至1938年初，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第120师也由出师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人，对敌占之同蒲路北段和大同、太原威胁颇大。

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伪军1万余人，于2月下旬分五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侵占宁武、神池等地。我第120师遂以一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敌军，集中主力，选择深入腹地孤立突出之一路敌军，采取袭击、围困等战术手段，迫使敌弃城出逃，在运动中歼灭之。至4月1日，共歼敌1500余人，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粉碎敌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首次围攻。与此同时，配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打退了敌对黄河渡口军渡、碛口和府谷的进犯，有力地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晋冀豫边区 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1937年10月中旬，第129师在刘伯承、张浩率领下进入晋东南地区后，即以教导团、骑兵营。政治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分赴太谷、榆次、阳泉、长治、武乡和河北之临城、赞皇等县以及河南省北部之道(口)清(化，今博爱)铁路沿线地区，紧密依靠中共地方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2、3月间，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为阻止日军沿邯(郸)长(治)公路西犯，配合友军保卫晋南，第129师先后于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歼敌2000余人。敌为解除后顾之忧，于1938年4月4日集中3万余人兵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辽县(今左权)、榆社和武乡地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企图摧毁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我军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敌军，集中主要兵力打击一路敌军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武乡以东

长乐村等战斗的胜利，我第 772 团团团长时成焕在长乐村战斗中光荣殉国。至 4 月 27 日，我军共歼敌 4000 余人，在国民党军配合下，粉碎了敌之“九路围攻”，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也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晋西南地区 北起汾(阳)离(石)公路，南至大宁、蒲县，东迄同蒲铁路，西至黄河，中有吕梁山脉，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晋西南的介休、孝义等地，吕梁山部分地区沦为敌后。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率第 343 旅立即进至这一地区，在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为友军误伤后回延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后为政治委员)指挥下，先后于 3 月 16 日、18 日取得了隰县午城、蒲县井沟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以吕梁山区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并在此前后，多次配合八路军留守兵团，粉碎了敌对黄河河防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八路军各部在开辟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除了粉碎日军的多次围攻外，还主动向平汉、正太、同蒲、浦津、道清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炸火车、毁桥梁、拆铁路，断敌交通和后勤补给，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自太原失守至 1938 年 4 月，八路军先后作战 400 余次，歼日军 2 万余人，创业了四个山区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展开，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并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得到了较大发展。“七·七”事变前后，以薄一波等人组成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与阎锡山商定，帮助其建立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新军。1937 年 8 月 1 日，决死队第 1 总队(相当于团)成立。随后，又建立了第 2、第 3、第 4 总队。11 月，决死队进至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配合八路军作战和创建抗日根据地。不久，决死队由 4 个总队发展成 4 个纵队(相当于旅)。另外还组成了工人武装自卫总队(通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第 209、第 212、第 213 旅和暂编第 1 师等，总兵力达 5 万余人。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加入八路军战斗序列，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鲁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是敌我必争之地。“七·七”事变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即令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冀中，中共保属省委于 1937 年 9 月保定失陷后，发动群众，组成河北游击军。10 月，国民党第 53 军 691 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命令，返回冀中，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共同打击敌人，与此同时，北平以西地区的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游击第 5 支队，活动于平西石景山、香山一带城近郊区。在冀东，中共冀热边特委积极发动群众，准备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暴动。在冀南，中共冀南特委，发动群众，组建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和第 5 路军等抗日武装。1938 年 2 月，第 129 师以一部组成东进纵队，由司令员陈再道率领到达冀南；3 月，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骑兵团进入冀南，协同当地抗日武装打击敌人，建立

中共保属省委，系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于 1937 年冬由中共保(定)东特委改组而成，负责领导冀中地区抗日斗争。1938 年初，又改称冀中省委，4 月改称为冀中区党委。

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冀南军区。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自 1937 年 11 月开始至 1938 年春，在全省先后组织领导 10 次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 10 支较大的抗日武装，在冀鲁边、鲁西北、鲁西、鲁中、胶东、清河、滨海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河北、山东等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八路军由山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它们本身由于缺乏战斗骨干，也急待主力部队的支援和加强。

鉴于山区根据地已初步巩固，而冀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急待加强，以及敌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等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以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 4 月 21 日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河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应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广大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并划分若干军区、分区，有计划有系统地发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遵照上述指示，八路军总部于 22 日作了具体部署：令第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一部兵力挺进冀南，协同先期到达的宋任穷、陈再道所部发展冀南，并以一部挺进冀鲁边：令第 120 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 1 个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挺进冀东；令山区各部队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我军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部署，4 月下旬，徐向前率 2 个团、1 个支队由太行山区挺进冀南，5 月初到达南官地区，与冀南军区部队会合，并立即对敌展开攻势，先后收复临清、高唐、永年、肥乡等近 10 座县城，收编游杂武装 2 万多人，尔后采取以老带新对部队进行整编，改造了收编的部队，充实了战斗骨干，提高了军政素质；同时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协助地方党建立与改造抗日民主政权。8 月成立冀南行署，到 9 月，在全区建立了 30 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西起平汉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沧(县)石(家庄)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与此同时，第 115 师第 344 旅副旅长杨得志奉命率 1 个团由晋东南到达平汉路东，与冀南部队一部组成漳南兵团，发起漳南战役。经一个月的作战，开辟了豫北安阳、内黄、汤阴、滑县地区，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发展冀鲁边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1938 年 5 月，第 115 师之第 5 支队、第 129 师之津浦支队，由冀南挺进冀鲁边。7 月，这两个支队到达冀鲁边乐陵、宁津地区，与中共冀鲁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随即对敌展开攻势，摧毁伪政权，打开了该地抗战局面。为加强这个地区的领导，9 月下旬，第 115 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 100 余名干部到达乐陵，随即成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将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至 1939 年，部队扩大到 2 万人，以乐陵、宁津为中心包括 15 个县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发展冀东的部署，第 120 师雁北支队于 1938 年 5 月到达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 1 分区的一个支队会合，并编成八路军第 4 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6 月下旬第 4 纵队进抵冀东，随即协同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有 20 多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组建了 7 万多人抗日联军，初步形成有 20 余个县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由于冀东地处华北与东北的咽喉地带，是敌人必争之地，因而敌人集中大量兵

力对该地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加之，新组建的部队成分复杂，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乏平原游击战争经验，因而在敌人疯狂进攻之下，第4纵队除留少数部队分散坚持斗争外，大部撤向平西根据地。

为了发展冀中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冀中军区，并将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统一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任军区和纵队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对敌占平汉、津浦、平津之铁路线进行破袭战，使敌之交通经常中断。其中，由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英勇善战，被冀中军区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荣誉称号。在积极开展游击战的同时，还大力发动群众拆城挖沟，改造地形，以限制敌机械化部队行动。至1938年10月，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北宁路，南至沧石公路包括41个县800多万人口的冀中根据地基本形成。

至此，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已由山区扩展到平原，形成山区与平原相互依存，相互策应的广阔的敌后战场。

发展与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分兵一部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以主力积极扩展和保卫山区根据地。1938年4月下旬，第129师令第386旅主力由晋东南进至平汉路西晋豫边区，连克峰峰、彭城等日军据点，尔后进至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的豫北地区，并与先期到达的赵(基梅)涂(锡道)支队协同作战，初步开辟安阳、林县、辉县等山区根据地和道清路两侧的游击区，将晋冀像边根据地推进到豫北地区。7月下旬，第120师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乎绥路北沿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一部兵力组成大青山支队，在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领下，由晋西北五寨出发，于9月下旬进至大青山地区，与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尔后转战绥西、绥中、绥南地区，并放手发动群众，成立了带政权性质的绥蒙总动员委员会，至11月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使晋西北根据地扩展成晋绥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的指示精神，组织领导所属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8月间，清河地区抗口武装先后袭击了胶济铁路上的张店、周村等车站，并于13日夜袭入济南城，使敌人极为震惊，同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在此期间，胶东的抗日武装数次袭击烟台敌军据点，并痛击了进占掖县之敌。9月，鲁中抗日武装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进行破袭战，毁铁路数十公里。鉴于山东各地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抗日武装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各抗日武装。这标志山东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各白为战的游击队成长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成为发展与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为贯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听确定的努力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晋察冀军区决定向东、向北发展，以扩大根据地，并相机切断平汉、平绥敌占交通线，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自4月下旬至7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120师第359旅，先后向察南以及平汉、平绥、正太等铁路线上出击，破坏铁路130余公里，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并使察南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华北敌军构成严重威胁，因而

北宁路系指北平（今北京）到辽宁省的铁路。

敌在南夺广州、中取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多路围攻，企图摧毁我根据地，解除后顾之忧。

9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集中3个师团另2个旅团共5万余人兵力，由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同时出动，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进行空前的大规模围攻。针对敌之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120师主力，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粉碎敌之围攻。自9月20日开始至11月7日反围攻结束，历时48天，作战136次，歼敌5200余人，击毙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特别是滑石片战斗毙伤日军达500余人，俘20余人，予敌以重创。在反围攻作战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来电慰勉，并赞誉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敌在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以第108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黄河渡口，威胁陕甘宁边区。为打击敌人，保卫陕甘宁边区，我第115师令第343旅于汾离公路阻击敌人，该旅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取得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三战三捷，共歼敌1200余人，解除了敌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

八路军在1938年4月至10月期间，先后共作战1000余次，歼敌2万余人，不仅保卫了山区根据地，而且发展了平原游击战争，完成了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从誓师出征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敌5.1万人，缴获各种枪1.2万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部队也由出师时3.2万人发展到15万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对华北敌军构成致命的威胁。

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进行集中和整训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红军主力的进攻，但却实行所谓“北和南剿”的方针，先后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分散在湘、赣、闽、浙、鄂、豫、皖、粤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继续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后，虽陆续停止了军事“围剿”，但又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这些红军和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附近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取得合法地位，但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经过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和红军游击队不懈努力，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始同意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叶挺到达延安，在毛泽东主持的欢迎大会上表示：一定遵照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相继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

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叶挺奔走于南昌、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参加新四军的斗争。与此同时，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人一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一面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教育部队正确认识全国抗战以来的形势，停止土地革命斗争，迅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经过约3个月的艰苦工作和尖锐斗争，终于胜利完成了改编任务。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军部下辖4个支队：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闽边和赣东北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由鄂豫皖边红23军和豫南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除第4支队辖4个团外，其他各支队均辖2个团。全军共1.03万人，枪6200余支(挺)。

1938年春，新四军各支队向指定地区集中。第1、第3、第2支队先后于3、4月间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结。第4支队于3月中下旬集中在安徽金寨县流波疔地区。至此，新四军完成了集中的任务。军部也于4月5日进驻岩寺。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四军集中后立即进行了军政整训。在军事方面，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持久战的思想，着重进行了射击、投弹等技术训练和游击战术训练。在政治整训方面，着重进行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同时还成立了戏剧、歌咏、绘画、舞蹈等组织，既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又促进了群众工作的开展。

自1937年9月至1938年底，新四军先后在南昌、长沙、武汉、重庆、

福州、桂林和湖南平江、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镇等地，建立了 50 多个办事处、留守处和通讯处，负责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界对新四军的支援。

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于 11 月 12 日攻占上海，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24 日占杭州。国民党第 3 战区部队纷纷败退。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尸骸成山，血流成河，甚至连 8 岁的幼女和 70 多岁的老妇也难逃日军兽行，南京 30 多万同胞惨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全市 1/3 的房屋化为灰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日军继占南京之后，于翌年 5 月 14 日占合肥，19 日陷徐州。国民党第 5 战区部队不仅未能发展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而且纷纷败退，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大部沦为敌后。但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乡村尚无敌踪。然而，汉奸横行，盗贼蜂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对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而且苏皖地区中共党组织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群众工作，这又为新四军挺进这一地区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 1938 年 2 月 15 日、5 月 4 日和 14 日，连续对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新四军应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敌后挺进。4 月初，高敬亭率领第 4 支队由金寨县流波疃出发，于月底展开于皖中敌后的舒城、庐江、无为和巢县地区。5 月 12 日，第 4 支队先头部队于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歼敌 20 余人。在江南，由第 1、第 2、第 3 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的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于 4 月 28 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6 月 17 日 8 时许，当日军 30 余人乘 5 辆汽车由镇江向句容行驶，进至韦岗(卫岗)时，遭到预伏该地的先遣支队突然攻击，敌我展开白刃格斗，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佐以下 20 余人，击毁军车 4 辆。韦岗首战获胜，犹如一声春雷响彻江南，使人民看到了希望。陈毅即兴赋诗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旗开得胜，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大江南北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

在先遣支队挺进苏南之后，陈毅率第 1 支队主力，张鼎丞率第 2 支队主力，先后于 6、7 月间进入苏南敌后，分别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和江宁、当涂、高淳、溧水地区，开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乘日军主力西进，后方空虚之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珥陵、高资、仓头、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等 100 余次战斗的胜利。甚至连南京的城郊机场、麒麟门外，雨花台畔，也响起新四军游击健儿的枪声。

敌为消除后顾之忧，于 8 月 22 日至 26 日，集中 4500 余人由秣陵关、溧

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出动，水陆并进，分八路围攻小丹阳地区，企图消灭新四军第2支队。新四军第2支队遂以主力荫蔽在内线，伺机打击日军一路；以一部阻击、袭扰敌军后转向外线，在第1支队的配合下，袭击敌之据点和交通线，迫敌回援，从而粉碎了敌军的围攻，歼敌50余人。此后，新四军第1、第2支队又进行了禄口、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等战斗，粉碎敌军“扫荡”20多次。

为策应新四军第1、第2支队的行动，谭震林率第3支队于7月1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在东起芜湖、西至青阳、南迄章家渡、北至长江的地区活动。同时，新四军军部也随同第3支队进驻泾县云岭。10月30日敌对我军发起进攻。第3支队以机动防御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敌300余人，迫使敌军撤退。

与江南相呼应，活动在江北的第4支队主力，自6月至10月，在合(肥)安(庆)、合(肥)六(安)公路沿线地区，采用伏击、袭击战术，连续在无为以东运漕、桐城以南棋盘岭、铁铺岭和六安以东三十里铺等地作战数十次，歼敌1000余名，毁敌军车150辆，初步打开了皖中敌后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各支队一面作战，一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陈毅亲自做社会名流、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部队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利用戏剧、歌曲、漫画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社会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即“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充分表达出人民对子弟兵的拥戴之情。新四军对当地的各种武装，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改造和发展抗日的进步武装，坚持打击反对抗日，投靠日伪的反动武装。并大力摧毁伪政权，成立抗敌总会、抗战动员会和抗敌自卫委员会等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后来逐步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成立以来，在十分曲折复杂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改扁、集中和整训的任务，并挺进大江南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800余人，初步建立起苏南、皖南和皖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并使部队发展到2.5万余人，这就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五、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和艰苦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时，东北抗日联军正处于发展时期，至 1937 年秋部队已发展到 11 个军共 3 万人，并建立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抗日游击根据地。1937 年 7 月以后，东北抗联第 1 路军总部，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先后发出告东北同胞书、布告和通告，指出：中日战争已全面展开，举国一致，以抗战驱逐敌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时期已经到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武装自卫，别无他策；中国同胞必须迅速崛起，救国光复东北；凡系中国人皆抛弃旧仇宿怨，亲密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斗争。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团结东北广大人民，在东迄乌苏里江、西达辽河、南起长白山区、北抵小兴安岭的广大地域内，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

“七·七”事变至 1937 年底，第 1 路军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先后进行辉南县城、宽甸县四平街、本溪附近的南营房和濛江(今靖宇)排子等较大战斗 33 次，毙伤日伪军 1300 余人，俘虏 120 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 大米、棉布、绒衣等。1938 年 5 月，东北抗联第 2 军第 5 师师长陈翰章率部化装成民工和车夫，打入宁安县斗沟子部落，一举击毙伪自卫团团团长，全歼这个团。6 月，杨靖宇率第 1 军连续取得辑安(今集安)县蚊子沟和老岭隧道战斗的胜利，痛歼伪军 1 个营，解放劳工近千人。

1937 年 9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 4、第 5、第 7、第 8、第 10 军。为打通与第 1 路军的联系，第 2 路军以第 4 军主力和第 5 军第 5 师于 5 月 27 日从宝清地区出发，开始西征，其余各部坚持原地斗争。6 月中旬西征部队到达依兰莲花泡和刁翎地区，与第 5 军军部及其第 1 师会合，7 月 12 日取得了苇河县楼山镇战斗的胜利，俘日伪军 40 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和大批粮食。尔后，第 4、第 5 军协同作战，打破日伪军的因追堵截，于 8 月底进入五常、宁安、敦化地区。

活动在北满地区的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顽强战斗，扒铁路、毁桥梁、袭击据点，捣毁伪警察署，发展了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日军为巩固东北占领区，更加疯狂地推行 1936 年至 1939 年“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重点指向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以一部兵力固守点线，严密封锁；以主力反复进行“清剿”。在政治上，大力加强殖民统治，实行归屯并村，设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制、连坐法，提出专打共产党、不打山林队的口号，大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逮捕抗日救国会人员，分化瓦解抗日武装。在经济上，实行配给制，凡属棉花、粮食、食盐和药品等，不准人民群众带出村子和部落，以断绝东北抗日联军的物资来源。在思想上，实行奴化教育，灌输日满一体的思想，清除反满抗日思想，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此外，日军还在哈尔滨、长春、海拉尔和牡丹江等地设立代号为“731 部队”和满洲“100 部队”的细菌研究机构，以抗联被俘人员和群众进行试验，杀害中国军民。在敌人多方面的残酷进攻之下，东北抗日联军自 1938 年下半年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

为适应艰苦斗争的需要，第 1 路军于 1938 年 7 月，撤销第 1、第 2 军的番号，改编成第 1、第 2、第 3 方面军和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以灵活多变的战术，胜利地进行了辑安县长岗、桦甸县富尔河苇子沟等多次战斗，并在

临江县岔沟地区突破日伪军 1500 余人的包围。

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第 2 路军西征部队在五常等地难以立足，遂采取分散活动的办法。1938 年 10 月，当第 5 军一部东返至林口县时，遭敌包围，冷云、安顺福等 8 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宁死不屈，毅然跳入滚滚的乌斯浑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后来被人民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

1938 年 6 月、9 月和 11 月，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 3、第 6、第 9 和第 11 军的主力，分成三批，由汤原、萝北和绥滨地区出发，远征至海伦、德都地区，至 1939 年春开辟了黑(龙江)嫩(江)平原游击区。为统一指挥各军行动，5 月成立了抗日联军第 3 路军，张寿箴(李兆麟)任总指挥。在远征胜利后，张寿箴写下了著名的《露营之歌》，歌中道：“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灭，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这首歌既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悲壮的战斗生活，也洋溢着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为民族解放奋斗不息的豪情壮志。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抗日联军及东北全体同胞的致敬电，几经辗转始到抗联手中。电报高度评价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与敌血战 7 年的英雄业绩，称赞他们是不怕艰难困苦、英勇奋斗的模范，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抗战，准备反攻收复东北。在中共中央致敬电的鼓舞下，东北抗联继续坚持艰苦斗争。

1939 年 10 月，日伪军集中 7.5 万余人，对东北抗联第 1 路军开始进行重点“讨伐”。第 1 路军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战。部队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鉴于严酷的斗争形势，第 1 路军遂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杨靖宇率一部转战在濛江、抚松、临江、金川和辉南山区，历时 4 个多月，虽沉重地扫击了敌人，但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日军野蛮地解剖了他的尸体，在胃里没有发现一粒粮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其家乡领导农民暴动，后到东北参与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由于部队严重减员，从 1940 年初起，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先后撤消方面军和军的番号，缩编成支队。第 3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3、第 6、第 9 和第 12 支队，活动在黑嫩平原地区。第 2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2、第 5 和第 8 支队，活动在同江、富锦、宝清、虎林地区。第 1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1 支队，活动在东宁、绥芬河地区。至 1941 年，东北抗联的全部兵力只有 2500 人。魏拯民、李延平、夏云阶、汪雅臣等一批军以上领导干部相继牺牲。

在斗争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为保存骨干力量，中共南满、吉东和北满省委决定除图一部在国内坚持抗日斗争外，大部转移至中苏边境苏联一侧进行整训，以备再战。1942 年初，原抗联第 2 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率小部队返回国内坚持斗争，不幸在攻打萝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重伤被俘，于 2 月 12 日慷慨就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8 月 1 日转至苏联边境的部队组成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箴任政委。1945 年 8 月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全境。在长达 14 年的艰苦抗战中，抗联共歼日军 17 万余人，自己牺牲了 3 万余人，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为中华民族解

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新形势下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部队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使我党我军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变为友党友军；新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客观形势要求我党我军必须实行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为使全党全军顺利实现转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

一、深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军委总政治部就通过传达学习会议决议以及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民族危机感和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在1937年5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后，又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在红军改编前后，军委总政治部还编写了《抗日军人读本》、《抗日紧急动员课本》，下发部队作为教材，通过上政治课、座谈讨论和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等多种形式，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红军改编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大意义。然而，由于长期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人民所造成的阶级仇恨，有些人仍对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存有疑虑。特别是摘下红五星帽徽，换上国民党军“青天白日”帽徽使许多指战员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红军许多负责人和各级政治机关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说服动员。罗荣桓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红军改编、换装是为了整个民族利益，要顾大局、识大体。朱德亲自参加第120师动员大会，他在会上说：为了全国抗战，解除民族危难，我们可以换服装、戴白帽徽，但红军传统、人民军队本质没有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没有变。刘伯承在第129师万人大会上说：换帽子算得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本质不会变，红军传统不会变，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是红的。并带头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戴上，为全师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作出了表率。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得以顺利实现。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陈毅、张云逸等，在部队改编过程中，分赴各地游击队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胜利完成下山集中和改编。

二、坚持共产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健全政治机关。统一战线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党对我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国民党企图通过“统一”、“改编”达到消灭或削弱与控制我军的目的。我党我军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又不能不作出必要的让步。而我军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因受国民党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而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这些情况表明，不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健全政治机关，就不能保持我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就有可能被国民党“统掉”。因此，我党在同国民党谈判时，始终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实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健全政治机关，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编后的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军委总政治部也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这些决定重申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根据新情况作出组织上的规

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部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在师、团两级及总部等直属队，建立党务委员会；重申党的支部仍建立在连上。8月29日，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宣告成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为委员，负责领导八路军的一切工作。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兼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

红军改编时，因受国民党干涉曾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并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改各级政治部为政训处，从而削弱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建设受到一定损失。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后由王稼祥任主任，傅钟、谭政任副主任)。

22日，根据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部，接着任命了各师、旅政治委员，从而健全了全军政治机关，使思想政治工作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军队的发展壮大。

三、贯彻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军队抗战三个月来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10月25日，他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作了进一步论述，并对我军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他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第一是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肃清军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而全军团结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减轻人民负担，打击危害群众的汉奸，因而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是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仅依靠自己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为贯彻三大原则，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周恩来在《抗日军队政治工作》一文中，都对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作了具体阐明，并提出一些贯彻措施。同年底，八路军总部在其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中，把三大原则写入总则。从此，三大原则成为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而保证了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使我军得以继续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顺利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转变。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后勤供给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过去靠部队自己“打土豪”和战场缴获等方式自筹供给为主，转变为由政府筹措供给为主。为适应这一转变，我军后勤工作也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到工作方式方法上作较大的改变。

首先，确立独立自给的指导思想。本来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国民党政府承诺按国民党军队同样标准供给。然而，改编后，国民党政府不仅未按承诺给予应得的补给；而且百般刁难克扣经费粮弹，致使我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吃不上、穿不暖。平型关战斗后，在华北已是秋末冬初，然而我军广大指战员仍然身着单衣。几经交涉，国民党政府始按4个人一套被服的标准

配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1月13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时指出：“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6日，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中说：“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断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才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独立自给思想，对我军后勤工作克服困难，保障供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健全后勤体制。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后勤工作，在红军后勤机构基础上，建立健全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后勤机关。除原有的供给部、卫生部外，增设了兵站部，负责组织人员、物资的转送。各师、旅设供给部、卫生部，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级供给部下设财务、军需、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供给等处(科)和医院，兵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建立健全，提高了后勤工作的效能，初步保障了部队作战、生活的必需供应。

第三，广开门路，筹集资材。首先是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筹措供给。本来在红军改编时，同国民党达成协议：由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经费50万元(法币。下同)，给新四军13万元。这点经费根本不敷应用，而国民政府还不能如数按时拨给。因此，我军的供给主要依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筹措。各地民主政府，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广泛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并逐步建立起公粮、税收制度，从而保障了部队的最基本的需要。此外，在抗日前线或敌占区，则由团以上机关、部队组织募捐队进行募借和没收汉奸财产，以充军用。其次是向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筹集，通过我党我军驻上海、南京、西安、广州、香港、武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办事处，利用各种关系向各民族、各界爱国人士和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筹集经费、医药器材和通信设备等。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国内外爱国人士包括宋庆龄、陈嘉庚等共捐赠300余万元。这是我军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就是取之于敌。我军出师抗战初期，主要对敌交通线进行破袭战。这样一方面断敌交通补给，配合友军作战；另一方面截获敌人粮弹资材以补充自己。

由于我军后勤机关确立了独立自给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了各级后勤机构，采取广开门路筹集资材的有效办法，因而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并为以后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对我军的供给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也是我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军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了1938年5、6月间发表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两篇对全国抗战尤其对敌后抗战具有伟大指导意义的光辉著作，使我军广大指战员明确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懂得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掌握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因而取得了伟大胜利，顺利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在一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780余次，歼敌5.48万人，缴枪1.2万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侵华日军兵力达58%，对停止敌之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奋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华中的抗战。

第六章 打退敌顽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和我军的方针任务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16个月战争，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实现了部分战略意图，但面临重重困难：在政治上，因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遭到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在经济上，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直接军费已占总支出的69%以上，耗费了近百亿日元，财力拮据；在军事上，战线太长，兵力严重不足。至1938年底，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战线绵延数千公里，而兵力却只有24个师团另6个旅团共60万人，其中50%多被牵制在我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因而它无力再对正面战场实行战略进攻。特别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和我敌后战场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所以它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策略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地区的资源，日本则考虑从华中、华南撤军，以此引诱国民政府妥协！在军事战略上，放弃“速战速决”，停止战略进攻，转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准备长期对华作战，并决定以主要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确保其占领区。

在国际上，英、美为了在西方同德、意抗争，在东方继续推行对日绥靖政策，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同日本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多次同日本政府商谈，英、法还分别封锁滇缅公路和滇越路，压迫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和谈。而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当时日本的愿望与要求。作为交换条件，日本表示只要英、美承认其侵华现状，它就不与英、美为敌。英国则满足日本的要求，宣布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局面。在英、法各国的推动下，以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压迫蒋介石对日妥协为目的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达到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和英、美国日本照顾其在华利益不够而未能实现。然而，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却并未放弃，这给中国抗战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动摇，使中国抗战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

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继续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由抗战比较积极转为消极，由与中共关系较好，转为积极反共。一向以英、美马首是瞻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为了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反共，所以也表示欢迎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则更加活跃，以其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伙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卖国

英、法为使自已免遭德国侵略，于1938年9月同德、意等国在德国慕尼黑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的协定》。会后，英、法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这个协定。在远东，英、法等国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将战火引向苏联，企图召开一个类似慕尼黑会议的“远东国际会议”，压迫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这个行动，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贼。而国民党主体蒋介石集团虽未投敌，但其代表却在港，澳等地同日本代表密谈，讨价还价，窥测时机。一时，妥协投降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在抗日战争的重大转变时刻，中共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进程，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同时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会议还强调人民抗日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全党学习军事，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会议确定党的主要工作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方针。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会后成立了中原局和南方局，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

这次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及确定的方针任务，是我军打退敌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保证。

二、八路军加强对敌作战和自身建设，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巩固与发展平原和山区根据地 1938年冬，华北日军只能控制点、线，占据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其他大都是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活动地区。敌华北方面军为把点、线占领扩大为面的占领，将其作战重点首先指向平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针对敌人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以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底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平原和山东地区，协同当地抗日武装，打退日军的进攻，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120师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12月从山西岚县和绥远大青山出发，顶风雪，战严寒，突破日伪军数道封锁线，至1939年1月到达冀中河间县，与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随即同冀中部队一起粉碎了日伪军对冀中的第3、第4次围攻，歼敌1400余人。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同时，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3月中、下旬，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粉碎日伪军对冀中的第5次围攻，歼敌900人。接着，以120师两个团为骨干与冀中军区一部合编为独立第1、第2旅，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4月23日，日军第27师团1个大队800余人包围我120师驻任丘东南齐会村的部队。贺龙和关向应指挥7个团的兵力与敌作战。广大指战员冒着日军施放的燃烧弹、毒气弹顽强战斗，英勇拼杀。贺龙在中毒后仍坚持指挥作战。齐会战斗持续3昼夜，毙伤日军700余人，创平原歼灭战的范例。齐会战斗后，第120师在冀中部队配合下粉碎了日伪军多次围攻，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帮助第3纵队开办各种军政人员训练班，以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在此期间，120师也得到发展壮大，由挺进冀中时1个旅，共3个团（欠1个营）、1个独立支队计6400余人，扩大到2个旅，共7个团、6个独立支队计21900余人。

为巩固冀南，坚持鲁西北抗日游击战争，第129师386旅主力及先遣支队一部，在刘伯承率领下于1938年12月下旬从太行山出发，越过平汉路，进到冀南平原。刘伯承到冀南后，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与师的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将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分开，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任东进纵队司令员。1939年1月初，敌华北方面军调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日伪军3万余人由东西两线分11路进犯冀南地区。当敌向冀南中心区南宫、冀县、枣强等县推进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将第386旅主力及冀南军区部队分为6个作战集团，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并将作战重点指向日军后方补给线。为诱歼敌补给线上重要据点威县城之日军，陈质、王新亭根据日军在冀南平原还没有遭受较大打击，每次受袭后必派部队追击报复的情况，决定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布置圈套，引敌就范。于是，将第386旅作战集团主力预伏于威县东南的香城固附近待机，以一部连续3日袭击威县之敌，打了就撤，诱其追击。敌连遭攻击后，遂以1个加强中队200余人，乘汽车8辆出城追击，被第386旅骑兵连等部诱至香城固地区。我预伏部队将其全部歼灭。刘伯承称赞：“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及冀南部队共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图谋。其间，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跃在武邑东

南徐沙村战斗中壮烈殉国。他在负重伤昏倒苏醒后，对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叫部队快后撤，我来对付敌人！”说着，举枪射杀疯狂进攻的日军，在他舍己为国的崇高精神鼓舞下，广大指战员奋勇冲向敌群，将敌人打退。

1938年12月，第115师主力奉命东进山东。该师除以第344旅补充团与晋西南3个游击大队合编为师独立支队留晋西坚持斗争外，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兼主任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第686团等部约5000人，于20日由晋西向山东挺进，次年3月1日进到鲁西平原。首战樊坝告捷，全歼郟城伪保安团800余人，打开了鲁西抗战局面。尔后，留一部(7月扩编为独立旅)坚持运西，主力东进泰西，与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不久，日军第12军调集8000余人兵力“扫荡”泰西，第115师在陆房突围中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的胜利。随后在梁山战斗中又歼日军300余人，缴获野炮两门，击毙日本皇亲长田敏江少佐。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祝贺。8月，为统一山东和江苏北部我军的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1纵队指挥机构，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10月，陈、罗率第115师师部东进，与山东纵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会合(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改称苏鲁支队，归第115师指挥)；接着派部队协同山东纵队临郑独立团攻占码头镇，控制了郟(城)码(头)平原：尔后集中主力三夺鲁南重镇白彦，连续作战14昼夜，歼灭日伪军800余人；继而开辟天宝山区，巩固和扩大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第115师还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争取了鲁南抗日进步人士万春圃和著名士绅孔昭同率部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并接受第115师领导。1940年初，第115师将鲁南地方武装整编为5个支队，实行统一指挥。同时，将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并兼鲁西军区，杨勇、萧华分任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月，日伪军8000余人合围抱犊崮山区，第115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作战近一个月，歼敌2200余人，保卫了根据地。6月，徐向前回延安。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8月，党中央决定第115师主要领导人为山东分局委员，从而协调了我山东地区的党、政、军的行动。9月，山东纵队进行整军，将所属部队编为5个旅、2个支队，约5万人。10月，第115师亦进行整编，所属部队编为7个教导旅共7万人。在此前后，冀鲁边、鲁中、清河等地都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至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含湖西)6个区，拥有人口1200万，面积3.6万平方公里，建立了行使政府职能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和14个专署、95个县的民主政权。在第115师主力东进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于1939年2月由晋东南进至直南，4月初同早已在该区活动的旅独立团、特务团及八路军游击第2支队等合编为冀鲁豫支队，辖5个大队，共4700余人。6月，粉碎日军万余人的7路进攻。至8月，

指山东境内的京杭运河以西地区，包括郟城、鄆城、濮县、寿张、范县、观城等。

指泰山以西地区，包括泰安西部，肥城、长清、东平、东阿、平阴、汶上、宁阳等县。

河北原名直隶，直南即其南部，包括今河北南部之南宮、威县、大高等县及河南之南乐、清丰、濮阳、浚县、内黄、安阳等县。

又新建两个大队和许多游击队，部队扩大到 7000 多人。次年 4 月底，第 2 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 344 旅(欠 688 团)、独立支队和河北民军第 1 旅到达冀鲁豫，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仍称第 2 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下辖 4 个旅。同时，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至此，包括直南、鲁西南、豫北地区的冀鲁豫根据地初步形成，并直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

1939 年夏，华北日军将作战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第 129 师主力由冀南返回太行山后，与原留在该地的各部队协同作战，粉碎日伪军 5 万余人的夏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 70 余次，歼敌 2000 余人，收复榆社等 4 座县城。与此同时，日军 5000 余人于 5 月上旬合击晋察冀军区机关。军区部队与第 120 师之第 359 旅分别在上下细腰间、大龙华等战斗中予敌以重大杀伤。9 月下旬，日伪军 1100 余人袭陈庄，被由冀中返回晋西北途经该地的第 120 师主力歼灭。10 月中旬，日军调集 2 万余人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为重点进行更大规模的冬季“扫荡”。晋察冀军区 1 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 3 个团在涞源县东南的雁宿崖地区歼灭日军 500 余人。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 1500 余人向雁宿崖地区急进，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主力。聂荣臻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 1、第 3 军分区部队和第 120 师一部共 7 个团的兵力歼灭这股敌人。当该敌被诱至黄土岭时，立即遭到预伏部队 4 个团及分区炮兵连的猛烈攻击，突围 10 余次均被击退。此次战斗，歼灭日军 900 余人，击毙阿部规秀。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撰文哀叹，“护国之花凋谢了”。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可见，日本对阿部被击毙是何等震惊！抗日军民也付出了 2000 余人的伤亡代价。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为黄土岭战斗下来的伤员动手术时被病毒感染，不幸于 11 月 12 日病逝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时年 49 岁。毛泽东专门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盛赞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人，号召中共党员和根据地军民都要学习他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11 月底，日军 60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合击北岳中心区阜平。军区部队跳出包围，袭击曲阳、唐县、完县等县城，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运输线，迫使其于 12 月初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中，北岳区部队作战 108 次，共歼敌 3600 余人。翌年 3 月，日伪军对平西的 14 天“扫荡”也被粉碎。

1940 年 1 月底，第 120 师主力回到晋西北。日军遂调集 2 万余人，连续“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 120 师在决死第 2、第 4 纵队等部配合下，进行大小战斗 200 余次，歼敌 4500 余人，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其间，晋绥行署第 11 专署秘书长、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女青年李林，在掩护专署机关突围时，自告奋勇指挥 1 个骑兵连来回冲杀，调动敌人，不幸身负重伤，当日军迫近时自戕殉国。中共中央妇委在唁电中称赞她，“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

望军和培养干部八路军各部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过程中，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将起义武装编入主力部队，大量收编杂色武装，以及策动伪军投诚、起义，使自己得到很大发展。1939 年，发展到 27 万人。由于在大发展中组建的一些部队军政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又处于长期分散活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同程度地滋长了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迫切需要整训，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6月和次年2月发出整军训令，要求在坚持战斗、坚持发展的同时，分期分批地整编和训练部队。1940年4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报告中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任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目前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军委、总政在训令中要求主力部队指定得力人员以考察团、巡视团等名义，分别派往指定地区部队中帮助工作，并确定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第129师整理冀南和晋冀豫军区地方部队；第115师帮助山东纵队；第120师整理冀中军区部队，第359旅整理6支队及两个独立团。

依据军委、总政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八路军各部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战斗间隙，在1939到1940年间，分期分批地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整训。整编的目的是：充实和扩大主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实现正规化；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把军区武装力量建设成为地区性的基干力量；并发展游击队和自卫队，以补足地方武装升级后的缺额。至1940年底先后共编成近30个主力旅，整编了150多个团。但也有少数地区过多把地方武装编入主力部队，致使这些地区游击战争一度发生困难。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部队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我军光荣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注意加强对收编的杂色武装的改造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同时注意发展党员，使老部队中的党员占部队人数的30~40%左右，新部队达到25~30%左右，并建立健全党支部、小组，完善党政工作的各种制度；此外，还注意加强锄奸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审查，进一步纯洁与巩固部队。在军事建设方面，加强技术训练，战士在进行射击、投弹、刺杀训练的基础上，学习近战、夜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动作，提高杀敌本领；干部侧重学习管理方法和指挥艺术，提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在后勤建设方面，统一编制，加强领导，充实人员；调整后勤机构，各大单位后勤机关增设军工、生产和财经管理部门，健全交通运输网络，组建交通部队；

加强卫生部门建设，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进保障方法，在大块根据地内，尽量争取实现统筹统支。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各部队要开展热烈的生产运动，以解决必需的给养。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全军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努力搞好部队生产，广开财源，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争取战争胜利。于是八路军各部展开了生产运动。经过整军，扩大了主力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提高了战斗力。至190年冬，整军基本结束。

为就地给八路军培养军政干部，以适应作战和部队发展需要，1938年底，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一部和第1、第2分校，开赴华北敌后办学。12月下旬，第1、第2分校在校长何长工、陈伯钧率领下由陕甘宁边区向华北敌后挺进，1939年初，分别到达晋东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月27日，军委鉴于两分校已抵华北，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抗大以培养八路军及其游击队之军政干部为目的，学生来源以八路军战

士及干部为主，毕业生应分配到八路军工作。7月10日，抗大总校除留一部在延安成立第3分校，负责培训留守部队军政干部外，大部在副校长罗瑞卿等率领下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晋察冀，到晋东南，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办学。此后，还在晋绥、太行、太岳和山东等地建立了抗大分校。抗大深入敌后就地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对坚持华北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路军通过整军和大力培养干部，加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战斗力也明显提高，为在华北地区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敌顽进攻，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百团大战 在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的条件下，八路军于1940年8月发动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1940年4月，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在第129师师部驻地榆社县潭村举行作战会议，在研究华北战局和我军的作战行动时，一致认为正(定)太(原)铁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切断正太路，将使山西敌人的运输补给难以保障，而且有利于我军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抗日根据地，还可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我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因此，大家赞同对正大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7月中旬，左权受彭德怀委托到第129师师部同刘、邓商讨发起正太战役问题。他传达了彭德怀关于战役的总设想，并说明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对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路也要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的破袭行动，第129师、第120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各纵队都要参加。刘、邓欣然赞同。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部制定了这次战役计划。

7月22日，由朱德(在延安)、彭德怀、左权签署的《战役预备命令》，下达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和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命令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据此，决定：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0师4至6个团，第129师8个团，加上总部炮兵团大部 and 工兵团一部，总共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参加作战。同时，明确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关隘据点，较长期地切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的命令》，规定战役从8月20日开始，并明确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区和作战重点。18日，指示参战部队应争取延长破袭时间，注意侦察敌情，适时进行新的机动作战。20日20时，正太战役正式开始，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等铁路和部分公路进行大规模破袭作战。22日，彭德怀、左权等在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当作战科汇报到实际参战兵力共105个团时，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

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配合日伪军“扫荡”之“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住，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构成状似囚笼的格子网，以束缚我军机动和根据地发展。

白晋路系指山西省境内北起白圭南至晋城的未完成的铁路。

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于是，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了。

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袭，重点摧毁正太路。由于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开始比较顺利，先后攻克娘子关及阳泉东西一些重要据点，井陘煤矿被破坏，蜿蜒200余公里的正太路上的路轨、车站、桥梁、水塔等大都遭到破坏，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被切断，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敌遭受打击后，急忙由石家庄、榆次东西对进增援正太路，同时以一部兵力向八路军后方攻击。在阳泉西南狮脑山，第129师与日军激战6昼夜；并在榆次西北双峰镇地区，该师歼灭由同蒲路来援的第36师团永野大队400余人。与此同时，第120师在康家会地区歼灭日军200余人。以上战斗打得非常出色。然而，在袭击潞城时，决死第3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所率一部被日军包围。他身先士卒，指挥28人掩护突围，与敌激战3小时，全部壮烈牺牲。在攻打井陘火车站时，晋察冀军区部队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聂荣臻亲笔写信并派人把信和孩子送到石家庄附近日军据点，体现了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9月20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重点攻击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主要目标在榆社、辽县地区，涞源、灵丘地区和任丘、河间、大名地区以及同蒲路朔县至原平段。在攻扫辽县、涞源时，八路军前仆后继，几度拼搏，歼灭了一些日伪军，但终因伤亡增大、日军增援，无法实现预定计划，遂停止进攻。10月6日至12月，中心任务是粉碎日伪军的报复“扫荡”。从10月初起，日军调集3万多人实施所谓“反击作战”，企图摧毁八路军领导机关、歼灭八路军主力和恢复交通线。日军首先“扫荡”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地太行地区，次及太岳、晋西北和平西、北岳地区。在“扫荡”中，日军四处烧杀，并施放毒剂，使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摧残。

百团大战历时3个多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军20926人、伪军18922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克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缴获各种枪5600余支（挺）、炮53门和一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次。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增强了胜利信心。因而，它受到国共两党的祝贺和国内外舆论的赞扬，但同时也震惊了敌人，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向华北增兵，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

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是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部队由15.6万人发展到40万人，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根据地扩展到华北6个省区，建成有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5大抗日根据地，形成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对敌人构成致命威胁。

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走向反共和中共中央的对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出于其阶级本性，惧怕迅速增长的人民抗日力量，仇共、恐共情绪日益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并先后秘密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使全国许多地方反共乌云翻滚，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柞邑、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制造流血惨案。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对国民党仍然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竭力避免大规模内战爆发。1939年，中共在《七七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时候，毛泽东于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时郑重宣布，共产党对磨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共产党的严正警告于不顾，公然于11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自12月开始，先后对陕甘宁边区、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军事进攻，从而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制止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8战区部队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向八路军留守兵团进攻，先后占领关中地区的柞邑、淳化和陇东地区的镇原、宁县、正宁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指使各县保安队破坏八路军抗日后方。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调第359旅从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驻防绥德地区。何绍南集中5个县的保安队准备偷袭我军。由于我军已做好迎击顽军进攻准备，何恐被歼，遂率一部逃到榆林。此后，第359旅清除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5县的顽固派势力，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暨专员。从此绥德5县面貌为之一新，边区东大门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沟通了与晋西北的联系。

中共中央为从政治上揭露顽固派倒行逆施，以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名义多次给蒋介石，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出通电，抗议顽固派进攻边区，攻城掠地，杀害我军民。同时，毛泽东于1939年冬派谢觉哉与朱绍良的代表在陇东西峰镇谈判，至翌年2月达成“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打退阎锡山军队的进攻 在山西，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由于惧怕经他同意、由共产党协助建立的山西新军发展壮大，成为与其抗衡的革命力量，遂决心消灭这一革命力量。经过一系列策划部署后，他于1939年12月初令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纵队破击灵石至霍县段同蒲铁路，以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紧随其后，企图配合正面日军夹击而消灭之。第2纵队发现这一阴谋后，遂停止行动。阎锡山以此为借口，下令进攻，首先袭击了永和地区的第2纵队第196旅旅部，接着捕杀晋西6县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及第115师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200余人。第2纵队在独立支队协同下奋起反击，苦战10余天，击溃阎军两个旅，突破离石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进抵晋西北临县南之招贤镇。这时，阎锡山又令陈长捷与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南北夹击晋西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军部队。针对这

一情况，中共中央军委派参谋长滕代远赴晋西北指挥八路军、新军作战，令第120师主力从晋察冀边区返回，集中力量打退阎军的进攻。晋西北新军各部，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罗贵波为政治委员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实施反击，终将赵承绶部两个军压缩于临县地区。

1940年1月上旬，滕代远决心集中兵力在临县地区打击赵部。同时，第359旅第717团根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进到碛口地区配合作战。赵见形势不妙，遂率部弃城南窜晋西南。第120师主力5个团返回晋西北后，彭绍辉所率之第358旅主力及暂1师一部北进肃清了盘踞河曲、保德、苛岚等地的国民党顽军。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晋西北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在此期间，阎锡山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部在国民党中央军5个军的配合下向晋东南地区的决死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进攻，先后摧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约400人，绑架千余人，并策动决死第3纵队旧军官叛变挟走4000余人。为粉碎阎军进攻，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坚守抗战阵地，积极配合新军作战。该师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在陈赓指挥下进入太岳区阻击蒋军。太(行山)南地区的第115师第344旅和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杨得志、黄克诚指挥下，歼灭了孙楚的独立第8旅等部，恢复了太南部分阵地。同时，第129师主力歼灭了由北向南进攻太岳区的阎军新编第2师和暂编第2旅。为对太南、豫北部队实行统一指挥，1940年2月初八路军总部决定组成八路军第2纵队，左权兼司令员(不久由副司令员杨得志代职)，黄克诚任政治委员，辖2个旅、1个纵队、1个支队共8个团。八路军力量的加强和反击作战的胜利，迫使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2月底，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秋林与阎锡山谈判，达成以汾阳至军渡公路为界，路南为阎军驻区，路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防区。

反击进攻冀南和太行的顽固旅军队 1939年11月，蒋介石在布置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部队配合阎锡山进攻新军的同时，命令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入太行山北部，配合其冀察战区鹿钟麟部控制冀西，割裂我太行区同冀南区的联系，令第39集团军石友三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部向冀南进攻。当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时，蒋介石令八路军退出太岳和太行山南部，令朱怀冰、石友三加紧反共活动。八路军总部为顾全大局，多次电请制止反共磨擦，彭德怀赴冀南与鹿钟麟商谈团结抗战。朱德、左权规劝朱怀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磨擦。刘伯承一再警告朱怀冰“不要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然而，他们不听忠告。在平汉路西，朱怀冰部由高平、辉县地区北进，配合鹿钟麟部进攻驻赞皇地区的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并把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驻地，遭到第129师和冀中军区各一部的痛击，国民党华北游击挺进第4纵队侯如塘等部8000余人大部被歼。朱、鹿率部南撤武安、涉县、磁县地区。在平汉路东，石友三率部进攻冀南，血腥屠杀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八路军总部遂令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冀南、冀鲁豫和冀中军区部队共25个团兵力进行自卫反击。石部惧歼南逃，被八路军截击部队歼灭7000余人，余部逃至卫河以东的清丰地区，与其新8军高树勋部和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部靠拢。这时，蒋介石令黄河以南的第41、第71军北上，配合朱怀冰、鹿钟麟和石友三、丁树本等部再犯太行、冀南。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平汉线两侧同时打击猖狂进攻的国民党顽

固派军队。宋任穷、程子华指挥 17 个团的兵力于 1940 年 3 月 4 日开始向卫河以东濮阳地区的石友三、丁树本部反击，至 4 月 8 日，歼灭石友三等部 6000 余人，将其逐出冀南。邓小平亲到前线指挥 13 个团的兵力于 3 月 5 日向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的朱怀冰部反击，至 11 日，歼灭其两个师及其他武装共万余人。

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适可而止，主动停战。3 月 7 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巩固临汾、屯留、平顺及沿漳河至大名一线，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朱德、彭德怀接电后，即令该线以南部队停止追击并北撤。4 月 12 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要朱德与国民党第 1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来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两军划区而治，对减少磨擦，维护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至此，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此次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攻势，坚决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军事上取守势，后发制人狠狠打击不听劝告、一再发动进攻的顽固派军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保卫了抗日根据地，而且维持了同国民党继续合作抗战的局面。同时，取得了反顽斗争经验，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原则。

四、新四军东进北上，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

东进北渡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受中央书记处委托，由重庆经广西、湖南、江西，于1939年2月23日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同项英作了恳切谈话，并商得他同意，具体确定了新四军的任务：“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同时，周恩来还充分肯定了陈毅等广大指战员坚持东进、坚决向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次年2月19日，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新四军的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为发展沪宁地区的游击战争，陈毅派叶飞率第6团东进，开辟澄(江阴)、锡(无锡)虞(山)和苏(州)常(熟)太(仓)地区。5月1日，第6团700余人从茅山地区出发，进至武进以南戴溪桥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梅光迪、何克希部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第6团改称江抗第2路，梅、何部仍为江抗第3路，共1100余人。5月上旬，江抗总部率第2、第3路东进，中旬抵阳澄湖地区，与中共常熟县委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简称民抗)会合，袭击常熟东北梅李自卫团，歼敌1个连。月底，在黄塘与日军遭遇，毙伤敌百余人。6月24日，夜袭浒墅关车站，使沪宁铁路3日不能通车。8月2日，袭击上海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经过以上一系列作战，江抗建立了以东塘寺为中心的阳澄湖游击根据地，部队扩编为5路，连同地方武装达6000余人，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尤其是袭击虹桥机场，轰动了上海，震惊了沪宁地区的敌军，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网罗土匪、特务、流氓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不断挑衅，多次袭击江抗部队。江抗根据陈毅的指示，以团结抗战为重，除留下30多个伤病员隐藏在阳澄湖休养外，西撤扬中整训，途中连遭忠义救国军攻击，江抗被迫奋起自卫，第2路司令员吴焜不幸牺牲。江抗转移到江阴西石桥，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尔后，江抗陆续派部分干部返回沪宁铁路东段，并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后改称指挥部，亦称新江抗)和西路司令部继续坚持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斗争。为加强领导，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这两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军部为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于1939年8月决定第1、第2支队统归陈毅指挥。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宣告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在1940年7月陈、粟渡长江北上后，重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辖4个团，共3000人，坚持茅山抗日阵地。)

为执行渡江北上的战略任务，陈毅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指示精神，做了长时间的准备：首先整编管文蔚领导的丹北抗日自卫总团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在第1支队第2团1营配合下开辟了丹阳以北地区；第二，派惠浴宇去江北联系地方党，成立苏北工委及3个县委，加强江北地方党的领导力量；第三，争取团结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使其在一段时间保持中立；第四，沿长江勘察选择北渡地点；第五，派挺进队攻占扬中，建立过江跳板。1939年初，挺进队一部进入扬州以东的仙女庙、大桥一带，主力活动于扬中地区，守护过江通道。10月，江抗与挺进队合编

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下辖4个团。11月,日军3000人“扫荡”扬中,挺纵除第2团在丹阳以北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预先转移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此时,根据陈毅的指示,陶勇率领第4团第2营以苏皖支队名义北渡长江,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地区,次年2月间西进六合的挺纵第3团两个营合编,仍称苏皖支队。这时,由苏南进入江北的部队共达3500余人,控制了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为开展苏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皖东 为打开皖东抗战局面,叶挺于1939年5月到庐江东汤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有以庐江、无为地区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成的江北游击纵队,有以徐海东兼司令员的第4支队,有以罗炳辉为司令员的新组建的第5支队。7、8月间,第4、第5支队分别进入津浦路东、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在津浦路西,第4支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击日伪,消灭土匪武装,很快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2月中旬,日军从南京、蚌埠等地抽调2000余人,在滁县地区集中后,分多路“扫荡”全椒西南的周家岗、大马厂和古河等地。徐海东指挥第4支队主力撤至周家岗西南山地,以1个营采用“牵牛鼻子”方法把日军引到一个山沟里,派小部队彻夜袭扰,使敌人不停地开枪、开炮,饥困交加。第3日晨,日军开始撤退,第4支队分两路追击,又歼日军一部,迫其余部仓皇逃回原驻地。

在津浦路东,第5支队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来安、嘉山、盱眙、六合地区打击敌人。来安是日军在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的重要据点之一,离半塔集仅20余公里,对我威胁很大。罗炳辉决定乘日军在来安新设据点、十分狂妄、疏于防范的机会,打它个措手不及。第5支队摸黑进到来安城下,翻墙入城,把一束束手榴弹和炸药包扔进日军驻的大院内,一时火光冲天,敌大部被歼。经过3个月作战,第5支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新四军第4、第5支队南调,同时令李品仙、韩德勤两部夹击南调的新四军。一时,反共乌云弥漫华中。1940年春,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纠集桂系顽军分3路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大桥镇的部队。这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已由延安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当时顽军进攻的情况,他与张云逸商量后,集中第4、第5支队主力进行自卫反击。经过9天战斗,取得了路西反顽作战的胜利。此时,韩德勤乘第5支队在路西作战路东空虚之机,率8个团围攻半塔集之新四军所部。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根据刘少奇的决定,同罗炳辉率第5支队主力速返路东,在苏皖支队和挺纵一部支援下,会同在半塔集坚守8昼夜的第5支队的留守部队,一举歼灭韩德勤部1000余人。大桥镇和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淮南地区歼灭新四军的图谋,坚持并扩大了津浦路东、西地区的抗日阵地,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开辟豫皖苏边区 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决定彭雪枫率游击支队进入豫东。10月,彭部由河南竹沟进抵西华社岗,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征战月余,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1939年1月,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率领下挥师东进,开辟商丘、亳县、永城地区。芦家庙一战歼灭伪军500余人,后在永城刘集生俘伪军旅长以下

百余人，接着又攻占永城东南古城寺，群众为之欢欣鼓舞。于是，游击支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以一部向睢县、杞县、太康扩大游击区，主力在彭雪枫直接指挥下，转战萧县、宿县、永城、夏邑、涡阳一带，连战杜集、仁台，均获胜。并争取了永城县地方实力派鲁雨亭参加新四军。

5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各一部南下苏皖边区，游击支队一部进入皖东北配合作战，主力转战于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公路以东地区。8月，游击支队回师永城、涡阳边的新兴集整训，同时再抽出一部分人员在豫皖苏边区党委领导下参加根据地建设。11月，刘少奇到新兴集视察工作，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和任务，深刻分析了在淮北津浦路两侧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要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至年底，建立了豫皖苏边联防办事处和萧、毫、永、夏、杞5县政权，以及萧西、宿西、碭(山)南3个办事处，形成了以新兴集为中心的豫皖苏边游击根据地。1940年2月1日，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直属团及4个总队，共17800余人。

同年春，第6支队粉碎了日伪军对萧、永地区的两次“扫荡”，第1总队长鲁雨亭在反“扫荡”作战中英勇殉国。

为加强华中抗战力量，黄克诚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八路军第2纵队及第344旅、新编第2旅主力及教导营共5个多团1.2万余人，从冀鲁豫南下华中，6月中旬抵新兴集与第6支队会师，7月初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归中原局领导。7月下旬，黄克诚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率新2旅两个团、第344旅第687团及纵队部等进入皖东北，8月与第6支队第4总队、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执行“向东发展”任务。第4纵队重新整编，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3个旅共8个团、1个特务营，1.6万余人，担任“向西防御”任务，在中原局的直接指挥下，第4纵队保卫了豫皖苏边区；第5纵队坚持了皖东北斗争并创建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为开辟苏北迈出了第一步。

发展苏北，黄桥决战 苏北有两千多万人口，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又是控制长江航道的重要翼侧，也是连结新四军、八路军的纽带。因此，苏北成为日伪顽和新四军的必争之地。刘少奇到华中后，根据当时华中敌、顽、我斗争形势，对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几经研究，认为：向西发展政治上不利，并且国民党顽固势力大，易引起磨擦，不利抗战；而向东、向苏北发展比较有利，那里是敌后，且顽固派势力不大。因此，经1939年底中原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苏北发展，并向党中央建议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共同发展苏北。

1940年6月，驻泰州的鲁苏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在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挑唆和压力下，由中立转向反共，调集13个支队的兵力向在郭村休整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进攻。陈毅得知后，一面令苏皖支队星夜驰援，一面令挺进纵队避免冲突但做好应战准备。同时，亲自渡江北上解决武装冲突问题。28日，李长江部对郭村发动10路围攻。叶飞当机立

运盐河以西、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的苏北淮阴、海州地区。

断，指挥坚守郭村的挺进纵队4个营的兵力顽强抗击，后在苏皖支队的援助下组织连续反击，奋战3昼夜，歼其3个支队，击溃10个支队，直追泰州城下。陈毅到郭村后，坚持“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令追击部队不入泰州城，再次派人同李长江谈判，并释放其被俘人员，归还部分枪支，重新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部同新四军团结抗战。

在此期间，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两个团于8日到达吴家桥与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7月中旬，成立苏北指挥部，陈、粟分任正副指挥，将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下旬，陈、粟率部挥戈东进，在黄桥、古溪、蒋垛、营溪等地歼灭阻我东进抗日的国民党军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陈泰运一部。新四军进占黄桥后，随即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等县抗日政权，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接着在各县建立了几十人至200余人的地方武装，同时攻克孤山、西来镇等据点，粉碎日军两次报复“扫荡”。至此，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但韩德勤坚持反共，进攻古溪受挫后又指使驻姜堰的保安第9旅封锁黄桥地区粮食运输通道，企图勾结日伪军围困新四军。9月中旬，新四军夺取姜堰，后又退出，交由李明扬、陈泰运部接防，从而博得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使顽固派更加孤立。

韩德勤气急败坏，调集第89军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人于9月30日从海安、曲塘一线分3路南犯，并以李明扬、陈泰运部和5个保安旅分置两翼，企图聚歼新四军于黄桥地区。陈、粟指挥部队顽强坚守，勇猛出击，首歼独立第6旅，再击第89军，打得顽军溃不成军。韩德勤领着残兵败将逃回兴化。新四军连下东台、海安，10月10日在白驹镇与由涟水南下援助新四军的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此役，共歼顽军1.1万余人。作战期间，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于家万户赶做当地特产“黄桥烧饼”，车推担挑从四面八方送往前线，对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黄桥决战胜利，一举解决了苏北问题。11月7日，陈毅在海安欢迎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领导人时慷慨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充分表达了他对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和见到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时的喜悦心情。

11月中旬，在苏北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集中10个团发起曹甸战役，再予韩德勤部以打击。

开展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 武汉沦陷后，其外围各地的中共党组织便纷纷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为适应抗战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豫鄂皖边、鄂中和鄂西北4个区党委，以推动和领导武汉周围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9年1月，李先念为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160余人从河南竹沟镇出发南下，转战豫南、鄂北和鄂中。并向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指示，从而推动了上述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

6月初，独立游击大队在安陆县赵家棚同陈少敏领导的部队会师。中旬，

在京山养马贩召开的鄂中区党委会议，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决定统一豫南和鄂中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职)，辖4个团队，分散于汉水和淮河两岸打击敌人，先后取得朱堂店、新街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在鄂中、豫南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

11月中旬，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3个区党委，并将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不久由任质斌代职)，辖5个团队，1个总队。

1940年春，李先念指挥所属主力三越平汉路，出击鄂东，打退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控制了黄安西北的大小悟山。一部渡过襄河，攻打汉阳侏儒山，武汉日军闻讯一度实行戒严。6月，日军进攻襄阳、樊城，直下宜昌。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纵队主力西越平汉路，进军随县以北的白兆山，4个月内先后打退日军对于坝的3次进攻，开辟了以白兆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7、8月，继续向敌后发展，挺进京山南山，开辟襄河以西地区，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边区党委大力加强政治、军事和政权建设。至年底，相继在豫南四望山、鄂中白兆山和京山南山、鄂东大悟山等地建立了多块根据地，成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后改行政公署)，管辖范围扩及十几个县，在9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部队也由一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拥有万余人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在东海之滨和上海、南京、武汉、开封、徐州外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无数次进攻，坚持了皖南，巩固并扩大了苏南和皖中根据地，发展了皖东、鄂豫皖边和豫皖苏边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底，根据地总面积达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00余万，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五、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和根据地的建立

日军侵入广东及中共广东省委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秋，日军为封锁华南海口，切断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调集3个师团、1个飞行团在海军支援下，于10月12日以主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沿坪山(今惠东)、惠阳、博罗、增城向广州突进；一部溯珠江而上，配合主力夺取广州。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因而，仅十几天，日军即占领广州及其周围各县和东江下游大片地区。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广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全国抗战开始后，派廖承志、潘汉年和张云逸到香港、广州组建八路军办事处，在华南开展统战工作和动员民众抗日；同时，还派张文彬到广东改组临时南委，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广东各级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在广东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1938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广东省委。在日军于广东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东江敌占区开拓游击区”。11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人占领的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利用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工作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并在各地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香港与中共香港海员委员会书记曾生、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商定，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畴等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抗日武装。曾生到坪山后，组建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在淡水周田村叶挺的老家育英楼成立以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100余人，在淡水镇周围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与当地民众武装一起收复淡水镇，建立了第1个抗日民主区政权。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把通过统战关系组建的东莞常备壮丁队、东莞模范壮丁队，以及增城、宝安等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共120余人。

1939年春，日军收缩兵力，撤出惠阳等一些城镇，国民党军乘机进占惠阳，设立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基于斗争需要，根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经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为第4游击纵队直辖第2大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第3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取得了合法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同年夏开始，新编大队在惠阳、宝安间的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与日伪军作战30余次，收复葵涌、沙头角等地。尔后，又在马栏山、鸡心石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开创了以坪山为中心的惠东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第2大队进入宝安至太平公路沿线，炸毁大涌桥，破坏电话线，逼日伪军退守据点，并于12月1日攻占宝安县城一南头，在龙华、乌石岩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至年底，两支武装共发展到700余人。

1940年春，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波及到华南，其第4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集中惠阳“整训”，企图解除我军武装。阴谋败露后，遂纠集1个多团、4个支队及保安队等共3000余人于3月8日将曾

王两部分别包围在坪山和乌石岩。当晚，两部秘密跳出包围圈，分路向海陆丰紧急转移，沿途遭顽军围追堵截，损失巨大。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廖承志转来党中央要曾、王两部返回东莞、宝安、惠阳敌后的指示。8月上旬，两部秘密回到宝安县上下坪村，部队仅有100余人。为加强领导，广东省委决定将曾、王两部交由中共东江特委领导，并以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

9月，东江特委在上下坪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国民党军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部改为第3大队，王部为第5大队，分别进入东莞的大岭山和宝安的阳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进入阳台山后，在望天湖、乌石岩一带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许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部队由30多人扩大到600余人。第3大队进入大岭山区，不久日伪军200余人来犯。该大队于黄潭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部队迅速由70多人发展为800余人。至1940年底，以大岭山、龙华两地为中心的广九铁路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珠江三角洲燃起抗日烽火 在珠江三角洲，日军占领区各县人民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前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指导与帮助下，组织南海县抗日义勇队，并与国民党设在广宁县的广州市区司令部谈判，接受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番号(简称广游2支队)，吴勤任司令。10月下旬，在南海县平洲夏膏村附近河面袭击日军运输船，接着袭击广三铁路小塘车站。在此期间，中共顺德县工委委员林豁云领导的顺德人民游击队，两次袭击顺德县城，击毙日伪军多人。

1939年7月底，日军进犯中山县横门口，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阻敌7昼夜，迫其撤退。9月初，日军再犯横门口，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14昼夜，迫敌退走。12月，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顺德金桔咀，广游第2支队英勇抗击，打退敌人两次进攻。

1940年6月，为了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广东省委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同时，在中山县大南沙成立了中山县抗日游击小队。从此，珠江三角洲的3支游击队由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不久，顺德游击队改番号为独立第1中队。同年冬，广游第2支队主力转向顺德，配合独立1中队打退日伪军1000余人的进攻，开创了以西海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中共琼崖特委为团结抗日，1938年10月22日同国民党海南当局达成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改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共300余人。

1939年2月，日本陆海军联合进攻海南岛，国民党军弃守沿海城镇和交通线，退入五指山区。独立队一部进至南渡江之潭口阻击日军。这一行动，激励了海南人民的抗战热情，许多青年参军，一些失散的国民党区乡行政人员和地方民众抗日自卫团要求加入游击队。3月，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总队成立后，第1、第2大队分别取得罗牛桥、海口市郊长村桥和文昌北门等战斗胜利，迫使日军放弃文岭、龙发等据点，从而打开了琼山、文昌地区的抗战局面，开辟了琼文游击根据地。6月，日军出动1000余人“扫荡”琼文地区，第1、第2大队并肩作战，

取得许多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与扩大了琼文根据地。在此期间，第3大队收复琼西石桥等地，尔后在那大周围组织抗日武装及群众2000余人配合下攻克那大，毙伤日军多人，俘伪军80余人，打开了琼西抗战局面。

194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海南岛应作长期抗战的打算，应以全岛为目标，大力发展抗日武装，要自力更生把琼岛创造为争取广大南洋侨胞的中心根据地。遵照这一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进入琼山、临高、澄迈交界处的美合山区，发动群众，打击日伪，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创建了美合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在部队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党的领导，调整和充实了总队的领导，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同时，将部队整编为两个支队又两个大队，共3000余人。独立总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惊慌和恐惧，国民党琼崖当局一面要冯退出根据地，一面加紧策划武装进攻。12月15日，顽军3000余人分5路进攻，制造了“美合事变”。独立总队奋起反击，但因寡不敌众，突围后东移，集中力量巩固琼文根据地。

当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和进攻汕头时，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都组织人民起来抗日。中共潮梅特委在组织自卫团、救国会、青抗会等群众抗日组织的基础上，在桑浦山李姑洞建立了潮汕青年抗日游击大队，先后在莲塘、阁州、云路等地打击敌人，游击队由200多人扩大到400余人，并建立了桑浦山游击基地。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创建了海南岛、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

自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我军虽处于敌、顽夹击之中，但由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抗日与反顽的关系，不仅抗击了58%至62%的日军、100%的伪军，粉碎其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而且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同时使自己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我军已发展到50余万人：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的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多，这就为以后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1940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横扫西、北欧。日本帝国主义决心乘英、美被牵制在西方而无力东顾之机，实行南进政策，于9月23日侵入印度支那北部，27日与德、意结成了三国军事同盟，从而加刷了与英美的矛盾。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直接影响中国战局。

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亟谋解决中国问题，遂于11月13日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促进蒋汪合流；特别要确保重要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其《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强调“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据此，侵华日军更加强以巩固占领区、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的方针，集中其75%以上的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军仍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频繁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指使一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我军，从而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敌顽夹击和连年自然灾害，使敌后抗战从1941年起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敌后抗战将要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预见。自1940年7月至11月期间，多次向全党全军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便正在采取各种方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诱降)，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我们心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以便有把握的迎接任何一个可能的变化”；“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政策，不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对敌斗争的军事战略方面，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继续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要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建设方面，要坚决执行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和劳动、经济、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合理税收及锄奸等政策，以便调动各界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增强抗战力量，战胜可能出现的严重困难。我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加强对敌斗争，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积极同严重困难作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敌后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日本为了放手南进，积极拉蒋介石，在港、澳等地与其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英美为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也积极拉蒋，重开滇缅国际公路，并增加援华贷款。苏联为避免与德、日两面作战，也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以牵制日本。正如周恩来当时所分析的那样：“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在此国际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认为自己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而且，日本集中力量南进，又不会向其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他决心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集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遂将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企图消灭陇海铁路以南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发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敌后一切抗日民主政权，无理要求已发展到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冀察两省，企图限制或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党我军。10月19日，他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发出皓(19日代号)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不打敌人，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1个月内，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区。何、白皓电的发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斗争方针和对策。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11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给所属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极力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内战，并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和内战的最黑暗局面：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名义发出佳(9日代号)电，以我军抗战以来，抵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为国人所共见的事实，驳斥了何、白皓电对我军的诬蔑和攻击；揭露新的反共高潮是“为投降扫清道路”，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以期限”。佳电的发表，表明了我党我军的严正立场和相忍为国的真诚态度。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视我党我军顾全大局的态度为怯弱可欺，竟于11月14日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随后，密令其第3集团军、第21集团军、第31集团军和鲁苏战区准备进攻豫皖苏边区、淮南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特别要求其第3战区围歼皖南新四军。同时，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50万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毛泽东于11月中、下旬连电各方，指出，我们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准备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软则给蒋以面子，硬则给蒋以压力；各地必须积极准备，

指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于1940年9月27日在德国柏林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给敢于进犯者以迎头痛击。

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坚持其皓电中的反动立场和无理要求，于12月8日，又以何、白的名义发出齐(8日代号)电，重申将八路军、新四军在“黄河以南的部队，悉数调赴河北”。9日，蒋介石直接发出命令：限12月30日前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开到长江以北地区；翌年1月30日前，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0日，又密令第3战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同时，有意泄露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渡长江的信息，致使日军增调兵力，加强沿江巡逻和封锁。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决定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集中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企图向北压迫我军到长江南岸与日军夹击而歼灭之，另以一部截断新四军皖南部队与苏南部队的联系，并要求其各部于31日前秘密推进至指定位置，完成进攻准备。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多次电令项英率领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指出：“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并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党组织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高压政策，做好应付严重局面的充分的准备。

在中共中央的严令督促下，项英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确定部队由军部至地径县云岭出发，向东南绕道茂林，经三溪、施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将军部机关和部队编成三个纵队。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3个纵队分为3路由云岭地区出发，向大康王、凤村和茂林地区开进。由于连日下雨，部队行动缓慢，至5日下午始到达上述地区，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却乘机紧缩包围圈。7日，当我各路纵队分别向旌德方向前进时，遭到顽军攻击，我军被迫自卫，并继续前进，但至星潭遭顽军围堵，前进受阻。在此情况下，军部于百户坑开会讨论是攻下星潭夺路突围、还是后撤改道问题竟达7小时之久。最后，否决叶挺提出的坚决攻下星潭夺路突围的正确主张，按项英意见，部队转向西南经高岭，出太平，入黄山。8日，当部队改向西南高岭前进时，又遭顽军疯狂阻击，遂又改向西北茂林突围。但茂林已被顽军占领，而且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当晚，虽一部向东突出重围，但大部被顽军重重包围，经过辗转冲杀，于10日拂晓始进至石井坑，遂集结整顿部队，以便寻机突围。由于项英离队单独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1日电令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全权指挥部队，以游击方式突围北移。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文涉，即日撤围，以便我皖南部队北移。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查明真相；一面密令顾祝同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在叶挺坚决果断指挥下，广大指战员顽强战斗，与顽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多次打退顽军进攻。但终因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殉职，军长叶挺赴顽方谈判被扣，身陷囹圄。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蒋介石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坚持团结抗战，1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军事磨擦直至皖南事变的罪行，提出了包括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项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和公正人士团结一致，制止顽固派挑起内战，坚持抗战。为打破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的消息，周恩来于1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婉转的方式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封锁，从而轰动了整个山城重庆，争取了大后方人民的声援。我党我军这种坚持原则、义正辞严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和苏联等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陷国民党顽固派于不利地位。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接着，将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编入新四军，共编成7个师：以苏中地区部队改编为第1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以皖中和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从而挫败了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图谋。

为了摆脱政治上不利局面，蒋介石企图以邀请中共代表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欺骗伎俩，来掩盖其破坏抗战的真面目。对此，中共中央于3月2日提出了包括“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等项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这就在政治上又一次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把皖南事变说成是整顿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政治问题，作为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的一招。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再次暴露了他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嘴脸。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并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国抗战继续进行。

继皖南事变之后，顽军还进占我豫皖苏边区，我第4师撤至皖东北地区。

二、1941年的敌后艰苦抗战

1941年，敌后抗战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敌为巩固其占领区，实行所谓“总力战”，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和大规模的“扫荡”，并采取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年内，仅在华北，敌以千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即达78次，其中万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的大“扫荡”就有9次。与此同时，敌人还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并结合“扫荡”、“蚕食”推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除“扫荡”、“蚕食”外，还进行彻底的“清乡”。而国民党顽固派则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日、伪军形成对我之夹击态势。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和敌、顽的经济封锁，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人口开始减少，部队开始减员，军民缺吃少穿，有的地区军民以黑豆、糠麸为食。为打破敌、顽夹击，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应形势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敌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华北敌后军民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上半年，敌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并以步兵和坦克、汽车组成机械化部队，有重点地对鲁西、冀东、冀鲁豫和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1月8日，八路军鲁西军区部队在郸城西北的潘溪渡伏击歼敌近200人。随后，敌第12军以万余人兵力，对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我鲁西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在部队掩护下迅速转移。担负掩护任务的军区特务营为拖住敌人、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与敌展开激战，大量杀伤敌人，敌遂施放毒气，致使我两个连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日军第27师团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并于1月25日突然包围素以抗日堡垒著称的潘家峪，将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和火烧，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尔后，敌企图围歼我冀东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发挥熟悉地形、行动隐蔽、机动灵活等特长，同敌人兜圈子，使敌人到处扑空，疲惫不堪，最后只得撤退。4月中旬，敌第35师团等部集中8000余人兵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内黄、濮阳和滑县之间的沙区进行“扫荡”。我军除以一部兵力与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外，主力和领导机关插入外线，袭击敌后据点清丰县城等地。敌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南张堡、薛村等140多个村庄，屠杀群众3400余人。但在我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被迫撤退。日军的“扫荡”，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其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企图都彻底破产。实践证明：只要能够准确掌握敌情，发挥我熟悉地形、行动隐蔽、灵活机动的特长，适时组织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采取以分散对付集中之敌、以集中对付分散之敌和内外线紧密配合的作战原则，就能粉碎敌之“扫荡”，否则就会遭受损失。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24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提出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也要为解决“中国事变”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下半年，敌在华北方面军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等手段，重点对晋察冀、太行、太岳和鲁中等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秋冬季“扫荡”，企图围歼我党

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之“扫荡”，八路军总部于6月21日发出准备反“扫荡”的指示，要求加强侦察，掌握敌之动向，做好反“扫荡”各项准备工作。

8月14日，敌军7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敌在“扫荡”平北、冀中地区后，于23日突然转向：“扫荡”北岳、平西地区。晋察冀军区为避敌锐势，遂决定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留在原地，与敌周旋，消耗、疲惫敌人；主力部队按照预订计划转至外线作战，袭击平汉、正太等备主要交通线上的敌军据点，调动敌人回援，并在敌必经之地，进行伏击或阻击，大量杀伤敌人，以粉碎敌之“扫荡”。敌在合围我平西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同时，集中5万余人兵力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合围。我平西地区领导机关先期转移，使敌扑空，但在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于近万人行动不便，一时未能跳出敌之包围圈，陷在阜平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段，迷惑敌人，于9月1日黄昏，派出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向阜平东北行动，在台峪地区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制造军区机关向东转移的假象，以便机关向西转移，2日，敌人果然集中兵力和火力进攻台峪当晚，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一部，乘机隐蔽向西转至常家渠一带山区，并中断与各方的电台联系，同时不准烧火做饭，只依靠当地群众供给的红薯和瓜果充饥，成功地隐蔽了5天。

7日，各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使敌之企图落空。并且在敌分兵进行分区“清剿”时，我内线部队和民兵采取伏击、袭击等战术，取得多次战斗胜利，当敌疲惫不堪开始撤退时，我军适时集中，在敌退却的道路上不断袭击敌人，给敌以重创。至10月16日，敌大部退出我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我军共作战800多次，歼敌5500多人。在这次反“扫荡”中，担任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5名战士，于9月24日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打退敌人4次疯狂冲击，毙伤敌90余人，直到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宁死不屈，五人毅然跳下悬崖。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脱险。这就是人们广为赞誉的“狼牙山五壮士”。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保证了我军对敌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1月9日“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山黎城奔袭荷崖洞、水腰地区的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山区险要地形，以刺刀、手榴弹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连续打退日军数十次冲击，奋战8昼夜，歼敌800余人，但兵工厂被毁。敌在“扫荡”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于11月初以5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于4日拂晓，由马牧池向东经南墙峪，分散转移至新泰西南石莱一带，跳出敌人合围圈。5日黄昏，日军分多路向驻孙祖、留田地区的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领导机关进行合围。第115师政委罗荣桓等根据敌在东面沂河沿岸一带预伏重兵，西面津浦铁路沿线戒备森严和北面集结兵力向南发展进攻的情况分析，打破以往多向东南海区转移的规律，率机关5000多人，在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至6日拂晓，先后在敌之一公里半和两公里半的间隙中，隐蔽地通过两道封锁线，成功地跳出包围圈。当时，随军行动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曾热

情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经过反合围与反，“清剿”斗争，至12月28日，终于粉碎了敌之“扫荡”，基本上恢复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扫荡”和反“扫荡”是敌我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与之相辅而行的是“蚕食”反“蚕食”、封锁反封锁斗争。敌为切断山区与平原及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缩小抗日根据地，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沿路两侧挖沟筑墙。同时，在华北平原地区，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我抗日根据地切割成“格子网”状，再加以严密封锁。在此基础上，敌或是依托据点和交通线，向抗日根据地边缘区或游击区，进行所谓边缘“蚕食”，或是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我根据地内部，建立据点，再由据点向周围地区扩张，进行所谓跃进心蚕食”。为了打破敌之“蚕食”和封锁，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6日和6月9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必须打破敌之“蚕食”封锁，否则我在敌后将难以立足。击破敌之“蚕食”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对被“蚕食”地区应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另一方面，抗日政权应采取隐蔽斗争方式，坚持斗争。遵照上述指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并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一是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努力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7、8月间，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组织了由党政军基层骨干组成的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开展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攻势，冀南军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散发宣传品39万份，并以争取过来的伪军作内应，攻克了近30个据点。第120师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在山西宁武、崞县、神池和朔县间，恢复了200多个村的抗日政权。武装宣传队的建立，对于打破敌之封锁、“蚕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斗争，攻碉堡，拔据点，对敌之公路、铁路和封锁沟进行交通破袭战。1941年5月，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动7万群众，对区内各主要公路，进行了5昼夜的大破袭战。7月中旬至8月底，冀中军民乘青纱帐起之际，破坏敌公路、铁路150多公里，有效地打击敌之“蚕食”和封锁。

敌在“扫荡”、“蚕食”的同时，于1941年在华北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整顿伪政权，加强伪军和乡村伪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搜捕抗日工作人员。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提出所谓“经济战”。在其占领区内实行经济掠夺、严格控制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推行配给制、计口售粮、售物，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我军的物资来源，从经济上窒息抗日军民。为了打破敌之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敌后军民一方面以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揭露日伪军的政治欺骗宣传和推行配给制，进行经济掠夺等罪行，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购入医药和电信器构；另一方面，在抗日根据地内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加强金融、市场和物资管理，积极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中敌后军民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2月2日，赋予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为了执行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华中

局(1941年5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而成)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在苏北盐城召开了高干会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全会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为了执行巩固基本根据地、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战略任务,华中军分会(由新四军分会改称)于下旬召开扩大会议,陈毅作建军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以适应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两个会议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进一步完善“三三制”抗日政权,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建立公粮、田赋和税收等财经制度,实行合理负担,以保证军需民用。新四军各部队主要抓了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军事训练和司令部机关建设及后勤保障工作。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新四军大力开展对敌斗争。华中日军为“扫荡”苏中抗日根据地和威逼利诱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军李长江部投降,于1月中旬由泰兴进占黄桥镇。新四军一面大力争取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同时也准备一旦李部投敌即予以歼灭。2月13日,李部公开投敌。新四军第1师于18日发起讨李战役,20日攻克李部盘踞的泰州城,李残部逃窜。是役,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日军为授救李逆,分由扬州、高邮等地出动,对我苏中进行“扫荡”。我军主动撤出泰州,并展开广泛的游击战,至4月,攻克敌据点多处,粉碎了敌之“扫荡”。7月1日,日伪军1.7万余人“扫荡”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寻歼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我军先期分散转移外线,使敌连连扑空。我第3师部队,利用自制触发式和引发式水雷,炸沉多艘敌特制装甲汽艇。为配合盐阜区军民反“扫荡”作战,苏中军区部队对当面之敌展开攻势,袭击敌于泰兴、靖江、南通等地之据点,围困泰州、姜堰等城镇,攻克黄桥、古溪等据点,共歼敌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牵制和调动了敌人。在陈毅和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盐阜、苏中两区军民相互协同,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至8月底,我军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在苏南地区,日伪军1.5万余人于7月1日开始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清乡”。敌首先在要“清乡”的地区周围,集结兵力、增设据点,并依托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加强巡逻,防止我军转移;同时,以铁丝网、电网和竹篱笆等建立封锁线,企图切断抗日根据地的内外联系。“清乡”开始后,日伪军首先采用分进合击和“梳篦清剿”等战术,寻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尔后以大批经过训练的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逐乡清查户口,搜捕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建立保甲制度,强化伪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

反“清乡”斗争之初,活动在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18旅认为是敌之一般性的“扫荡”,遂以党政军机关和主力一部留在内线,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而以主力转至外线,袭击据点,调动敌人回援,但未能奏效,致使我留在内线的机关和部队,遭受较严重损失。9月初,当日伪军转向对澄(江阴)、(无)锡、虞(山)地区“清乡”时,第18旅接受了在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教训,党政机关和主力大部转至外线,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化整为零坚持内线斗争,并以隐蔽斗争为主,成功地打破了敌之“清乡”计划。11月28日,日伪军3000余人突然包围驻苏南溧阳塘马的新四军第16旅旅部。我军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伤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

在盐阜、苏中和苏南军民反“扫荡”、反“清乡”期间，鄂豫边区和皖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四军第5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新四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了坚持鄂豫边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据此，3月中旬东进开辟了鄂皖边区，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多次粉碎敌对鄂中、襄西根据地的“扫荡”，巩固了鄂中、豫南基本区。11月17日至翌年2月初，新四军第5师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南进、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三次进攻汉阳以西的侏儒山，全歼伪军1个师，击溃其另1个师，俘伪军近千人，开辟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发展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第7师以巢湖、无为地区为基点，东向含山、和县，西向桐城、庐江和泊湖发展，从而扩大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华南敌后军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6月10日，日伪军600余人，奔袭大岭山区的百花洞村。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在自卫队的配合下，迅速抢占周围高地，将日军一部包围于百花洞村内。11日，从拂晓激战至下午3时，日军数次突围未逞。12日，日军以飞机和步骑兵1000余人，进行支援。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遂撤出战斗。此战，歼敌大队长以下50余人。7月7日和8月18日，日军400余人先后两次“扫荡”阳台山区，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大队采用伏击、袭击战术，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至年底，我第3、第5大队发展到2300余人，另成立独立大队100余人、民兵1000余人，成为东江地区抗日的主要力量。

在珠江地区，我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于1941年春，初步建立了顺德县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构成了对日伪军珠江交通运输线的威胁。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进犯西海地区。我第2支队在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展开围歼战，共歼伪军团长以下600余人，从而发展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在海南岛地区，我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由美合地区转至琼(山)文(昌)地区后，于1941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打退顽军的进攻。7月，袭击日军美德村据点，歼日军60余人。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文昌、澄(迈)临(高)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5万多人参加的群众性抗日组织。我独立总队也发展到3500余人，从而促进了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1942 年的敌后艰苦抗战

1941 年 2 月 8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基地，侵华日军根据其大本营的指令，对国民党军继续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正面战场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而更加强调以“剿共”为主，集中其主要力量对我各抗日根据地更为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推行第 4、第 5 次“治安强化运动”。仅在华北，1942 年内敌以千人以上至 5 万人兵力的“扫荡”即达 77 次，其中万人以上至 5 万人兵力的大“扫荡”达 15 次之多，比 1941 年增加 6 次，致使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 1/6，人口减少了 1/3，八路军由 40 余万人减少到 30 余万人，全国抗日根据地人口也由 1 亿减少到 5000 万人。加之，自然灾害和敌、顽实行经济封锁，因而许多根据地军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饥馑状态。有的地区军民以草根、树叶充饥；有些部队指战员没有鞋袜，只得赤脚行军作战，有些部队冬季没有棉被，指战员偎依在一起取暖；有的地区群众，全家只有一套衣服，不得不轮流外出劳动或办事。所以 1942 年成为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成，中共中央于 1941 年 12 月 17 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益严重的困难应有充分的认识，树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明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并号召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 1942 年敌后抗战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这些指示，对敌后抗日军民继续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华北敌后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打破敌第 4、第 5 次“治安强化运动”。敌华北方面军为巩固与扩大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于 1942 年 2 月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治安肃正”作战计划，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积极地下间断地进行讨伐作战。2 月初，敌华北方面军以 3 万余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及太岳、晋西北等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春季“扫荡”。我太行、太岳和晋西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以一部兵力于内线，主力大部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转入敌之后方，展开攻势，从而粉碎了敌之“扫荡”。5 月 17 日，当袭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兴县之敌 700 余人撤退时，我军乘机集中兵力，前堵后追，两翼截击，于 19 日将敌 500 余人围歼于田家会地区。

敌华北方面军在其年度肃正作战计划中规定：上半年以冀中平原为“扫荡”的主要目标。为迷惑我军，敌在“扫荡”冀中之前，于 4 月初，首先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进行“扫荡”。尔后，于 5 月 1 日，集中 5 万余人兵力，在方商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和“拉网”大“扫荡”。首先，从边缘区开始，稳进稳扎，增建据点，至 10 日，沿滹沱河、阳河、德石路和沧石路，构成了环绕我冀中抗日根据地中

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的“铁环阵”；尔后，逐步向内压缩。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大部，被迫退向中心区。11日，日伪军对我中心区进行分割“清剿”。每次包围都以飞机轰炸，地面部队采取多梯次、大纵深的“拉网”战术，逐步搜索和推进。我冀中军区决定军区和各军分区主力转入外线，对敌之交通线和守备薄弱的据点采取攻势；坚持内线的部队则分散以连、排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依托村落、利用地道，顽强地进行斗争。坚持在无极县赵户村第7军分区的两个连，利用该村地道和巧妙布雷，在23天中打退敌1000余人4次进攻，歼敌300余人。27日，军攻入定县东南的北疃村，向地道内施放毒气，致使我800余人中毒身亡。6月初，敌对我中心区进行全面“清剿”。为坚持长期斗争，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机关和主力部队向邻区转移。至7月初大部转移至冀鲁边和冀鲁豫边等邻近抗日根据地。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民共作战270余次，歼敌1万余人，但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块，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部队减员46.8%，第8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壮烈殉国，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达5万多人，形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这次反“扫荡”后，冀中军民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力改造地道，使之成为村村相通、户户相连，干线、支线纵横交错，形成地下、房上、地面三位一体，能藏、能打、能机动，能防火、防水、防毒的完善的战斗地道体系。从此，地道战成为打击敌人，坚持平原抗战的有效战法。

敌华北方面军第1军为策应对冀中区的“扫荡”和消灭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机关，于5月中旬集中3万余人兵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夏季“扫荡”。敌首先以7000人兵力对太岳地区进行“扫荡”，但我第129师第386旅先期转移，使敌扑空，挫败了敌之“扫荡”。5月19日，当敌集中2.5万余人兵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为确保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亲自指挥担任掩护任务的第385旅一部，与敌展开激战，保证了领导机关安全转移。然而，左权将军却在辽县十字岭壮烈殉国，时年仅37岁。左权将军，湖南醴陵人，早年参加大革命，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历任红军军长、代理军团长等职，是我军高级指挥员和军事家。为纪念这位名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左权将军，当时曾赋诗一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敌人在进行“扫荡”的同时，还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从而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退缩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制止敌之“蚕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4日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展开全面对敌斗争，才能打破敌之“蚕食”。根据这一指示，华北敌后军民展开了积极的反“蚕食”斗争，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山东敌后军民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有力地打击了“蚕食”之敌。晋绥敌后军民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自11月至翌年3月，共摧垮827个伪维持会，恢复535个自然村的抗日政权。5月至7月，太行、太岳区军民摧垮伪组织“维持

会”1064个。至秋季，华北敌后军民基本上制止了敌人“蚕食”，扭转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

与“扫荡”、“蚕食”相配合，华北方面军自1942年3月30日至6月中旬，推行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以“东亚解放”和“剿共自卫”为口号，利用其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进行广泛的欺骗宣传，同时对我抗日根据地加紧封锁，大肆构筑封锁沟墙，企图压缩我根据地，巩固扩大其占领区。为打破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武装宣传队的基础上，普遍组织由军队中优秀的基层干部、战士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及翻译人员组成的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太行地区的武工队在9天中就摧垮伪维持会300多个，开辟和恢复了5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敌后军民组织了37支武工队，在4个月中收复了200多个自然村。晋察冀北岳区部队，以主力的三分之一兵力，组成几十支武工队，恢复和建立了1600多个村庄的抗日政权。实践证明，武工队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适合于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有利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面对敌斗争，对打破敌之“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0月8日，日军又推行了以“治强战”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太行、太岳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同时，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经济上大肆掠夺、严密封锁，企图以军事、政治和经济多管齐下的手段，摧毁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各邻区部队密切配合，内外线夹击，时而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分区坚持斗争；时而集中兵力，打击孤立分散之敌，特别是彻底坚壁清野，使敌人进退维谷，疲惫不堪，最后只得撤退。至12月打破了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中敌后军民开展反“清剿”、反“扫荡”斗争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中斗争的形势，确定“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积聚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方针，并据此规定了对敌斗争、开展群众工作等具体任务。

敌为巩固华中占领区，以苏中地区为重点，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和“扫荡”。3月，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6月、7月和9月，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泰兴、靖江、泰州、如(皋)西和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准确地掌握敌之动向，及时将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至较安全地带隐蔽待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与民兵相结合，并紧密依靠群众，坚持广泛、分散的游击战，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斗争、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乘敌发动浙赣战役、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军撤退之际，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此派出干部和部队到浙东，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工作，采取公开和隐蔽的斗争方式，巩固了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开辟了沿海地区和四明山区，达到了保持浙东战略支点之目的。冬季，敌对淮海、淮北、淮南和鄂豫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

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袭扰、疲惫敌人；主力转至外线，不断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迫敌回援，并在其回援途中，抓住有利战机予以打击，先后粉碎敌对各区的“扫荡”。

华南敌后军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变华南地区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前进基地，以琼崖地区为重点，加紧对华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1942年春，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增加据点和兵力，以据点为“锁”、公路为“链”，逐步向琼崖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压缩，企图围歼我军，琼崖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以内线部队破坏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桥梁和交通设施，断敌交通；以外线部队袭击敌据点。敌遭我打击后，集中了1100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实行“三光”政策，对我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处境困难，群众损失很大，除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外，主力于12月转至琼山西部和澄迈、临高及定安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东江、珠江地区我军，也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打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坚持了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战，特别是东江地区我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小分队深入香港、九龙，先后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以及国际友人800余人，对中外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四、1943年的敌后抗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意法西斯转入战略防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转入守势，而且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濒于破产，军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激增。据此，日本帝国主义制定所谓“对华新政策”，强调“以华制华”，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力促蒋汪合流，并规定其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区，特别是保证资源开发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采取“上山”、“观战”政策，把主力摆在云南、贵州、四川的大后方，并加紧反共，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针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毛泽东于1月5日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他在纪念抗战6周年会议上还要求敌后军民，继续加强对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之“扫荡”、“蚕食”，继续加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以及大力开展生产与整风运动，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并且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再发展时期。

华北敌后军民进一步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3年上半年，敌华北方面军依据年度作战纲要，将“扫荡”重点指向我北岳、太行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我八路军总部根据敌之动向于2月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及早做好准备；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同时，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各大战略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和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派出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将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取得很大成效。由他们收复扩大的根据地面积占整个收复扩大面积的3/5。山东军区在年初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敌后武工队，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争取伪军。晋绥军区抽调320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武工队扩大到37支，另以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促进了全区斗争形势的好转。晋察冀军区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甚至1/2，分别组织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逐渐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在此期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了蓬勃发展。冀中请苑县冉庄民兵，依托完善的地道工事，两次打退日伪军3个多团兵力的进攻，地道战由冀中发展到冀南平原地区，不仅范围扩大，而且日臻完善，成为能藏、能打、能机动、能防毒、防水、防火的完备的战斗地道体系，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有效战法。在对敌斗争中，地雷战则更为普及，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山东、太行和晋察冀北岳区，军民协力，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力生产炸药，研制出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多种地雷。不仅埋设方法巧妙，在敌人可能通过的道路、河川以及村落和房屋里的水缸边、门楣上，甚至在敌人的办公室、操场、浴池和厕所等地也埋上地雷；而且引爆的方法多样，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炸得敌人魂飞丧胆，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大大发挥了人民群众杀敌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由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发展为全区性民兵联防，一处发现敌情，信号迅速传遍联防区，全区立即投入战斗。并把村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不知所措。山东抗日军民根据敌人活动规律，还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和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冀中军民还创造了埋伏在敌碉堡附近的堵门战和潜伏擒敌的捕捉战。战斗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利用湖泊、水荡和芦苇草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水上，时而陆地，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正是由于群众性游击战的多种多样和机动灵活，因而粉碎了敌人的春、夏季“扫荡”。

下半年，华北敌后抗战形势进一步好转，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军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步向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攻势作战的转变。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意图下，太行、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先后以5至12个团兵力，相继发起卫(河)南、林(县)南战役，共歼伪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1.2万余人，解放了卫南、林南大片国土。

敌华北方面军为了改变日益被动的局面，减轻我对其后方和主要交通线的威胁，不甘心于春、夏季“扫荡”的失败，于秋、冬季，对北岳、太岳、冀南、冀东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毁灭性“扫荡”。自9月2日至12月15日，日伪军4万多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长达3个多月的“扫荡”。我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3及大量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和交通线展开广泛的破袭战，以主力2/3及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内，以营、连为单位与民兵相结合，大摆地雷战，杀伤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退。北岳区爆炸英雄李勇带领的爆破组，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在反“扫荡”中毙伤敌300多人。敌人气急败坏地声称，要以一百个“皇军”的代价活捉李勇。由于敌人制造多起惨案，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仅在8个县中，敌烧毁房屋13万间，抢走牲口1.2万多头，杀害群众5000余人。10月1日至11月22日，敌第1军集中日伪军2万多人，又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敌人采用多梯队大纵深所谓“铁滚式”新战法，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为推广这种新战法，敌华北方面军组织了所属军官120人参加的“战地观摩团”。10月24日，我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第16团在临汾东北韩略村设伏，一举歼灭其“战地观摩团”，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不久，敌即暂停“扫荡”。11月9日，敌第12军以万余人兵力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待各路敌人出动尚未形成合围时转入外线，使敌扑空；而坚持内线作战的军民，对敌展开反“清剿”作战。其中，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第8团第8连的93名指战员，被敌包围在沂水西北的岱崮山上。这个连凭险固守，以近战火力和滚石，多次挫败敌1000余人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攻势，坚守阵地达15天，歼日伪军300余人，最后安全突围，被山东军区授予“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为策应鲁中、清河地区军民反“扫荡”，鲁南、渤海军民，乘敌兵力薄弱之机，于11月15日、19日和12月上旬，先后发起对伪军刘桂棠、李亚藩和吴化文部的攻势作战，击毙作恶多端的匪首刘桂棠，为山东人民除一大害，并争取李亚藩率部投降，一度解放了赣榆只城，先后共歼伪军3000多人。

1943年，华北敌后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为1944年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继续坚持艰苦奋斗，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敌以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为重点，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奋斗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2月16日，日伪军2万多人以“梳篦拉网”战术“扫荡”盐阜抗日根据地。敌在合围我领导机关和主力扑空后，于27日转入分区“清剿”。3月18日，我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170余人，苦战终日，全部壮烈牺牲。25日，我军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粉碎了敌之“扫荡”。共歼敌1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

4月1日，敌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清乡”。首先实行军事“清乡”，集中1.5万余人兵力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向以南通、如皋、启东、海门为中心的苏中第4军分区反复合击、搜剿。在敌开始合击时，我军以大部主力转到“清乡”区边缘线上，袭击敌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仅4至5月，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多次破击，烧毁敌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我坚持内线斗争的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6月初，敌由军事“清乡”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和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实行和平编查保甲，搜捕我党我军人员和抗日群众团体成员。为了打破敌之政治“清乡”，我军紧密依靠群众，团结中小地主、开明士绅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进行民族大义的教育，揭露编查保甲的阴谋，并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结合起来。至9月打破敌之政治“清乡”。接着，敌又进行了3个月的“延期清乡”。为了减少损失，坚持斗争，我苏中第4军分区减少公开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斗争。并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在边缘区和敌据点附近，打击敌人。至12月，又粉碎了敌之“延期清乡”。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我苏中军民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向我投诚，从而打破了敌之“清乡”。

与此同时，敌在我淮海、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针对敌之“蚕食”特点，我淮海军民开展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5月，乘青纱帐起，发动以攻取沭阳东南塘沟为中心的夏季反击，歼日伪军5000余人。苏北、淮北和鄂豫皖边区敌后军民，普遍组织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仅新四军第4师组织的武工队在夏秋之交，深入淮北的泗(县)灵(璧)睢(宁)宿(迁)敌占区，就恢复和开辟了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有效地制止了敌之“蚕食”。

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也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尔后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进一步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抗战阵地 1943年，东江、

珠江和琼崖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1月，东江我军发展到4000余人，另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州)九(龙)铁路运输线构成威胁。18日，日军以近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我军依托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战至黄昏分路突围。一部转至宝安地区，另一部则袭击东莞县城据点，并在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开展破击战。敌遂撤出大岭山，回防广九路沿线。至此，其万人“扫荡”以失败而告终。12月2日，广东东江地区各抗日游击队统一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成为发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军。

同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后，五桂山区和周围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得到了发展。至1944年1月，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

与此同时，海南岛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夏秋之交，琼崖我军除以一部兵力在儋县、临高、澄迈地区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至外线，转战月余，逐步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和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把澄迈、临高、儋县、昌江和感恩等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部队发展到4个支队。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和限制共产党等进步、民主力量的增长，于1943年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攻击共产主义和我党我军，并暗示两年之内要解决共产党。同时，密令其接近我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积极包围进剿，从而揭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3月，顽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分由阜阳、蒙城和淮阴地区出动，企图采取东西对进，攻占我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主力被迫还击，并在第2、第3师各一部的配合下，胜利地进行了山子头战役，俘韩德勤及其官兵1000余人。尔后，为团结抗战，又释放了韩德勤，归还其人枪。6月中旬，顽军李仙洲部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微山)湖西地区形成南、西、北三面包围，企图首歼湖西我军，再东犯鲁中、鲁南，建立山东反共阵地，切断我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冀鲁豫军区以有力反击，迫使李仙洲部退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集中20余个师的兵力分九路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7月7日，以一部兵力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我军发动进攻。至此，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原则，在政治上发动强有力的攻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活动。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表明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自卫的坚强决心。4日，毛泽东致电我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要他向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大后方人民，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朱德先后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挑衅的反共行径。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质问国民党》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以反共姿态出现破坏全国抗战的实质；警告其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是不能容许的；号召全国人民及国民党爱国人士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决心抗战到底，保卫边区，保卫抗日救国事业。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集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内战。国民党统治下的大

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分裂，要求团结抗战。苏、美、英等国为借助中国抗战牵制日本，以利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也不赞成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同时，我军也作了自卫反击的准备，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部分兵力，增强了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

在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充分的自卫准备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进攻。此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新四军第5师等，又分别打退了李仙洲和李品仙部的多次进攻，坚持了抗战阵地。至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完全制止。

五、深入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胜利渡过难关

为战胜严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战，从1941年至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陆续发布指示，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著名的“十大政策”。这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方针政策，大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日、伪、顽军和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精兵简政 敌后军民在面临日伪顽军夹攻，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改变“鱼大水小”的状况，才能克服物质困难，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客观环境，把注意力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与扩大上，主力军应采取“精兵主义”。与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参议员、民主人士李鼎铭等11人联名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提案。该提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形成决议。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施政方针，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明确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从1941年12月起，全军陆续实行精兵简政。八路军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连队，减少指挥层次，先后撤销各纵队指挥机关，并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将大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以加强地方军，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比例趋于合理，从而达到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人数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各部在精简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妥善安排超编干部和老弱病残战士，加强编余干部的学习、培训。经过精简整编，晋察冀军区取消了挺进军番号，全区部队由12.5万减至9.59万人。晋绥军区主力部队由3.9万余人减至2.5万人，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分期分批将新1、新4、新7、新8、新10、新11旅与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武装。冀鲁豫军区撤销了第2纵队番号。在山东，撤销山东纵队，成立山东军区，将原山东纵队3个旅与第115师1个旅全部地方化，与军分区合并。新四军在军部统一部署下，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并以一部主力实行地方化，在苏南则全部地方化，以加强军区和军分区建设，从而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提高。

全军的精兵简政工作至1943年底基本结束。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部队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同时，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对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开展整风运动 从思想上加强党和部队的建设，是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时党内、军内都严重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风气，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存在，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和夺取抗战胜利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延安，然后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一次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次年2月，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上述报告中，

毛泽东着重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论述了整风运动的意义和宗旨，并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中共中央宣传部于4月3日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6月16日发出了《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解放日报》也于7月2日发表了《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强调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以上指示精神，八路军、新四军在保证不松懈战斗警惕、不妨害战斗准备和指挥关系、不影响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除将一些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延安集中学习外，各部队采取了在职学习、轮流学习、分级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整风，从而保证了整风、战斗两不误。在整风过程中，部队各级党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启发干部自觉检讨错误，总结工作，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干部在整风中转变作风，纠正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全军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夏季开始，至1945年春胜利结束。通过这次普遍深入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打破了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束缚，从而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我军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增强了团结，纯洁了组织，提高了战斗力，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大生产运动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向各根据地军民发出自力更生，克服经济困难的号召。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朱德总司令的倡议下，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到了1941年以后，由于日军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军供给非常困难，有的部队甚至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展开。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绩，并为财政经济工作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次年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口号，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在生产运动中，各部队遵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旅以下至连队各级普遍建立专门负责领导生产的组织，并依据部队的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生产指标。生产内容以农业为主，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广大指战员与根据地人民一道，饼手胼足，辛勤劳动，在不妨害作战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纺纱织布，采煤造纸、兴办军工，大力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牧业和工商业。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纺纱种菜，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大生产运动的辉煌胜利。粮食总产量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0

万石；棉花产量由 1941 年的 50 万斤，猛增到 1944 年的 300 多万斤。由于大力垦荒，农民大部分实现了“耕三余一”，有的还做到了“耕一余一”。农户、机关、部队大部实现了丰衣足食。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一定发展。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单位和个人。其中，八路军第 359 旅就是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0 年底，该旅奉命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至 1943 年，该旅共垦荒 26 万余亩，除实现部队吃穿用全部自给外，还上交粮食 150 多万斤。同年 7 月 10 日，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看到第 359 旅屯田成功的繁荣景象，即兴赋诗赞扬：“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素以贫瘠著称的晋绥边区，到 1943 年已基本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吃饭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晋冀鲁豫边区到 1944 年，部队一般能实现每人自给 3 个月的粮食和当年的蔬菜；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部队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华中解放区军民也通过自己动手，逐步做到丰衣足食。由于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敌顽经济封锁，保证了部队供给，改善了军民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军政和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劳动观念，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由于敌人疯狂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被封锁状态。客观形势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的行动，才能适应艰苦的环境。为此 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中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组织，各地党委为各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党委的决议，党政军民均须无条件地执行；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长决定；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游击区的党政机关必要时亦可与军队的军政机关合并，实行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方面体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根本原则上。

遵照上述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相继调整机构和领导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并了下属的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和冀东等地方和军队的党的工作机构，形成统一的党委员会，领导全面对敌斗争。晋绥边区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西北区党委，成立了以关向应书记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在晋冀鲁豫地区，成立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区党委。1943 年 3 月，第 115 师与山东纵队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山东地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华中地区，各根据地以中共地方党委为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现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各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一般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为保证一元化领导的顺利实现，各部队都十分注意教育指战员，充分认识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队的关系，自觉服从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战胜敌人的有效措施。

它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拥政爱民 在 1942 年整风期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上，军地干部各自检讨了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军队方面着重检讨了某些部队对党、对政府尊重不够，对人民群众爱护不够，骄做蛮横，甚至有军阀主义表现等问题。为了增进军政、军民团结，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首先于 1943 年 1 月 15 日，颁布了《拥军公约》，在全边区发起拥军运动，并把 1 月 25 至 2 月 25 日，定为全区拥军运动月。接着，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于 1943 年 1 月 25 日颁布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保护、帮助、尊重政府，爱护公共财物，减轻人民和政府负担，不侵犯群众利益等项内容的《拥政爱民十大公约》。随后，留守兵团把当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定为拥政爱民月，使拥政爱民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反响，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基于陕甘宁边区的经验，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军各部队于每年农历正月普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纷纷响应号召，开展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他们各自制定《拥政爱民公约》，组织召开检讨会，召集军民联欢会，邀请当地党政领导人参加，帮助群众进行各种劳动，有损害群众利益的实行赔偿、道歉。从此，拥政爱民活动相沿成习，形成制度，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此外，我军还协助各根据地党、政机关贯彻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和减租减息以及其他各项政策，从而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以对敌斗争、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重点的“十大政策”，全面地加强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大力地开展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清乡”，制止了敌军的“蚕食”，并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战胜了自然灾害。到 1943 年，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基本扭转了被动不利局面，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 年，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战胜了严重困难。从此，我军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对敌军进行攻势作战的转变，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展开局部反攻。

第八章 实行反攻，夺取抗战胜利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深刻变化。苏联在欧洲，美、英等在欧亚两洲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国战场展开了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反法西斯阵营的节节胜利，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同德国法西斯一样转入战略防御。但是，日军大本营为摧毁位于华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防止美机从这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和准备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能够经由中国大陆交通线救援孤悬于东南亚地区的50万官兵，遂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又称“打通大陆交通作战”。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由于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和军事上缺乏准备及战略上失误，并在保存实力的方针指导下，仅9个月，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共25万平方公里以及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酿成了又一次大溃败。

为大量牵制和消灭敌军，援救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我军于1944年春在华北、华中、华南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展开了局部反攻。局部反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根据地为依托，集中较大兵力向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发动攻势，大量消灭敌军，扩大解放区；另一方面，以一部主力远离根据地，打到外线去，向日军新占领的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直接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

一、实行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

八路军 1944 年春、夏、秋季攻势 1944 年春，华北日军大部主力抽调参加平汉铁路南段作战。八路军各部队自 2 月起乘敌调动之机，发起春季攻势。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收复朝城、榆社、沁县、林县，攻入太谷、武乡、沙河县城，攻克林县至水冶公路沿线敌据点及其他据点 200 多个。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度袭入肃宁、安新、赵县等县城和涞源、大台等煤矿，攻占据点、碉堡 150 个。山东滨海军区部队向临沂、莒县、赣榆间日伪军发动进攻，打通了滨海同鲁中、鲁南的联系；尔后，配合鲁中军区部队向驻南麻（今沂源）、悦庄等地的伪军吴化文部发动进攻，歼其 7000 余人，攻克据点 49 个，使鲁中各山区根据地沟通了联系。晋绥军区部队在围困据点和破击交通作战中，挤走蒲格寨等一批据点的日伪军。

在八路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驻守华北各地的日军处处吃紧，纷纷告急。因此，敌华北方面军未待平汉作战结束，赶紧从平汉路南段前线抽调部队回援华北，以巩固占领区和抢夺夏粮。八路军继春季攻势之后立即转入以保卫麦收为主的夏季攻势。冀鲁豫军区（5 月冀南军区并入）部队发起昆张战役，攻克据点 50 余处，歼敌 1200 余人，收复昆山、张秋产麦区；随后攻克清丰、内黄等县城，粉碎伪军在浚县、滑县地区的抢麦计划；同时向微山湖以西开展为期 10 天的攻势作战，摧毁据点、碉堡 90 多个，歼灭日伪军 1300 余人，恢复了单县、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太行军区部队在保卫麦收的同时，加强对左权、陵川等县城的围困，攻克一些据点。太岳军区部队向济源、垣曲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据点 20 多个，毙伤日伪军 800 余人，争取伪军 1300 多人反正，解放人口 11 万，控制了大坡头至芮村一带黄河渡口。晋察冀军区北岳区部队在保卫麦收作战中，袭入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攻克一批据点。冀中部队先敌展开，伏击抢麦之敌，并一度攻克任丘、肃宁、大城，袭入武强、深泽、河间等县城，攻克据点 40 个，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迫使抢麦之敌回撤。山东鲁南军区部队向费县以南岗口地区的伪军荣子恒部发动进攻，歼其 1 个师。滨海军区部队以泊儿镇为重点发动进攻，攻克据点 40 多个，歼灭伪军 700 余人，收复滨海北部地区。晋绥军区部队挤退史家庄等敌军据点 29 个，扩大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7 月，日军从华北调走主力 3 个师团，同时以 4 个独立旅团为基础扩编成 4 个新师团。八路军乘日军一些主力师团调走之机，从 8 月开始，发起以夺取敌占城镇和交通线为主的秋季攻势。晋察冀军区北岳部队攻克蔚县、广灵间据点 14 个，收复平山县回舍区 1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唐县、曲阳间 100 余个村庄；冀东部队在攻势作战中恢复了蓟县、玉田、宝坻基本区，并将根据地扩展到香河、武清地区；冀中部队攻占藁城、无极间 42 个据点和肃宁县城，攻入武强、深泽、献县等县城。在作战期间，晋察冀军区相继建立 4 个二级军区：冀晋军区，辖 4 个军分区；冀察军区，辖 4 个军分区，冀中军区，辖 5 个军分区；冀热辽军区，辖 5 个军分区。4 个二级军区的成立，加强了对各该地区的作战指挥。晋绥军区部队以忻县至静乐和离石至岚县公路沿线之敌为重点发动进攻，作战 297 次，歼灭日伪军 1900 多人，攻克据点 48 个，收复国土 77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5 万。太行军区部队先后袭入长治、和顺、太谷等县城，在邢台、沙河地区摧毁敌第 3 道封锁线，在新乡、辉县地区攻克薄壁镇等 10 多个据点。太岳军区部队向济源以南和中条山以西

发动进攻，攻克一批据点，打开了平陆、安邑地区的抗战局面。冀鲁豫军区集中3个团、5个县大队及部分民兵向郸城伪军进攻，作战一周，歼其3000人，攻克据点36个，使35万人民获得解放，并乘胜摧毁菏泽、考城、东明间敌封锁线，使鲁西南根据地与濮阳、范县、冠县中心区联成一片。尔后，乘伪军第2方面军南调之际，攻克莘县、濮阳、寿张、清河、肥城等县城和许多据点。山东鲁中军区部队攻占沂水县城，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随后又主动进攻“‘扫荡’滨海回拗之敌，在沂水县城西北葛庄和陶沟(今草沟)地区歼灭日伪军1600多人；渤海军区部队攻克利津、乐陵、临邑、南皮县城，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鲁南军区部队进攻滋阳至临沂和临沂至枣庄公路沿线之敌，一度切断两线交通。胶东军区部队攻克文登、荣城等县城，歼敌5000余人。11月中旬，鲁中军区集中1个旅又5个团和5个独立营共1万人，在民兵配合下，向莒县城及外围据点进攻，歼灭日军一部，迫使伪军3500多人反正，解放莒县全境。与此同时，渤海军区部队在冬季攻势中，歼灭日伪军2200余人。胶东军区部队粉碎敌冬季“扫荡”后，攻占栖霞县城，并争取了刘公岛、龙须岛伪海军600余人反正，合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八路军在1944年共进行50多次较大进攻战役，同时粉碎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68次，进行大小战斗约2万次，歼灭日伪军15.5万余人，争取伪军2万人反正，攻克县城22座、据点2348个，解放国土14万平方公里、村庄1.2万余个、人口1000余万，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1944年春、夏、秋季攻势 1944年春，日军从华中地区调出9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新四军利用华中日军兵力明显减少的时机主动出击，从1月开始发起春季攻势作战。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以高邮、宝应、兴化、东台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连续发动进攻，相继攻克大官庄、王家营、古溪、安丰等17个敌军据点，同时争取了伪军1000多人反正。随后，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队长三泽大佐以下460多人、伪军480余人，攻占车桥、曹甸、泾口等13个据点，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雷官集，瓜埠集等据点。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展开反击日伪军“第二期治安肃正”的作战，袭人涟水县城，攻克塘沟、史集、王集、钱集等30多个据点，基本收复了日伪军1942年冬大“扫荡”时占领的地区，扭转了苏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的局面。继之，又集中1个主力团、5个独立团以高沟、杨口为重点发动攻势，连续作战10余天，攻克高沟、杨口等14个据点，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并击退从新安镇(今灌南)、大伊山(今灌云)等地来援的日伪军，收复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和盐埠区连成一片。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对守备薄弱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经3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克大店集、灰古集、归仁集、阚疃等51个据点，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收复泗县、灵璧、睢宁3县的许多地区，切断泗县至宿县、睢宁至灵璧和唯宁至泗县公路，并控制了一段运河。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在发展豫南、鄂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向嘉鱼、蒲圻、临湘地区发动攻势，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从5月起，新四军开始发动夏、秋季攻势。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南通(今南通市)、如皋、海门地区攻克据点28个，歼灭日伪军近千人。紧接着，在如皋之海河滩，歼灭日伪军500多人，攻击串场河南萧家场池，全歼伪军3个连。入夏后，又在通、如、海地区连续发动45天攻势，攻克一批据点，基本恢复了日伪军“清乡”时占领的地区。在苏南活动的第16旅攻入长兴、

溧水、溧阳县城，攻占溧阳和长兴间的周城、社渚镇、南渡镇等据点，迫使伪军弃守竹箠桥、玉华山、罗林坝等地，共歼灭伪军 1000 余人。第 2 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先后攻克三和集、殷家涧等据点，袭入盱胎、定远县城和安子集等市镇，并粉碎了日伪军对津浦路以西的“扫荡”。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苏北沿海地区发动历时 5 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进攻陈家港、合顺昌、合德镇等重要据点，共歼灭日伪军 800 余人，开辟了灌河、射阳河间的滨海地区。与此同时，还攻克了运河线上的林公渡，歼灭日伪军 160 多人。第 4 师兼淮北军区部队攻占张楼等一批据点，歼灭伪军 500 余人，收复泗县以北大片地区。第 7 师兼皖江军区部队在粉碎日伪军“扫荡”、抗击顽军多次进攻的同时，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动攻势，攻克许多据点，开创了青弋江、芜湖、贵池游击根据地和东流、至德及彭泽以东的游击区。

新四军在 1944 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6582 次，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争取伪军 1853 人反正，攻入县城 6 座，攻克据点 1334 个，收复国土 7400 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60 多万，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和“屯垦”计划，大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华南游击队 1944 年的对敌斗争 1944 年春，广东地区之敌第 23 军加紧调整部署和集结兵力，准备参加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作战。在此情况下，华南游击队为牵制日军行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和扩大根据地，在东江两岸和海南岛等地不断袭击日伪军，进攻其据点和交通运输线。东江纵队以广九铁路为重点连续发动进攻，先后袭击常平、平湖、横沥、宝安、石滩等地，还攻入九龙市区，炸毁市区铁路桥，同时攻入东莞，进攻寮步、清溪、厚街等据点，威胁日军后方安全。珠江部队粉碎日伪军年初对五桂山区的“扫荡”后，袭击横门岛，炸毁大环公路桥，攻入顺德县城和市桥等地。琼崖总队在调整防区和建制的基础上，连续在才坡、永荣、极板、港门、南桥、六弓等地打击日伪军，把游击战争逐渐扩大到全岛。

7 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日军的动向对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发出加紧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会议上决定：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游击区；扩大抗日游击队建立文队，加强主力团及脱产的自卫队和常备队建设；号召共产党员都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斗争中去，为打开广东新局面而斗争。同时，决定在中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领导。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东江纵队把部队整编为 3 个支队、4 个独立大队，共 5440 人，并以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进增城、博罗、从化地区活动，一度攻占了清远县城。同时，粉碎日伪军 2300 人对广九铁路沿线的“扫荡”后，乘胜攻占沙井、霄边等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珠江抗日游击队指挥部，为发展粤中抗日斗争，在新会、鹤山(今鹤城)成立新鹤大队，同时派泰山大队尾敌西进新会、台山边境活动，配合国民党军先后收夏天亭、双水，一度攻克台山县城。10 月下旬，指挥部率由逸仙大队改称的挺进粤中主力大队渡过西江，进至高明(今明城)地区的皂幕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1 月，以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中区人民解放军，梁鸿钧、罗范群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 4 个团。琼崖总队于是年秋改称纵队后，为建立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阜龙乡文头山区。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进军河南 1944年4月18日，日军向河南郑县(今郑州)及其以南平汉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22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应乘敌南犯后方空虚之机，开展豫北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河南地方党，“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鉴于河南大部地区为敌占领，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河南”，并作了具体部署：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之豫鄂边区党委和淮北区党委负责。6月23日，刘少奇、陈毅从延安致电新四军，要求第5师“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此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指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以一部兵力进入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令冀鲁豫军区扩大水东、发展水西；令新四军第5师一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令新四军第4师主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恢复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豫皖苏边区，原是新四军第4师开辟的。1941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重兵进攻该区，第4师主力被迫从津浦铁路西撤到铁路东。1944年8月15日，师长彭雪枫遵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率师主力4个多团从砀县等地出发，西进萧县、永城地区，攻占了小朱庄等一批据点，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的袭扰，继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迅速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此时，国民党第1战区调集重兵，企图乘第4师立足未稳，夺占该区。新四军军部决定第4师在第3师一部配合下，反击向西和向北进攻的顽军。我军在反顽作战中取得不小胜利，打乱了顽军的进攻计划。但是，彭雪枫师长于9月11日在指挥收复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7岁。彭雪枫，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大队长、师长、师政治委员，八路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支队长、师长等职。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得悉他不幸牺牲时，曾赋《哭彭雪枫同志》，诗中云：“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江苏省洪泽县和宿县人民为他修了陵墓和纪念碑。彭雪枫牺牲后，由张爱萍接任师长。10月，顽军再次发动进攻。我第4师在第3师一部和冀鲁豫军区南下部队的配合下，打退顽军约万人对萧县、永城地区的进攻，尔后肃清了攻入涡河以北的顽固派军队。经过4个多月艰苦斗争，第4师在路西解放了约拥有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第2专署和8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边区。

在恢复豫皖苏边区的同时，由太行、太岳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向河南西部地区共派出5个支队10个团，在豫西人民的支援下，歼灭了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创建了北至黄河、南抵伏牛山、西接崤山、东临平汉铁路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及河南行署，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徐子荣任行署主任，辖6个专署、26个抗日县政权，拥有人口300万，部队由6000多人发展到万余人。新四军第5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从7月至翌年3月，先后派出5批部队，转战豫南各地，在平汉铁路两侧敌后，建立了7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了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先后派出3个多团南下睢县、杞县、太

1938年6月6日，国民党军为迟滞日军进攻，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经贾鲁河、淮河，流入黄海。改道后的这段黄河称新黄河。在河南境内之新黄河以东称水东，以西称水西。

康地区，扩大了水东抗日根据地，并西渡新黄河，建立了水西抗日根据地，进而继续南进，同新四军第5师打通了联系。八路军、新四军依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以一部协力发展河南抗日根据地，从而打通了华中、华北和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达到了缩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八路军一部进军湘粤边 1944年下半年，日军南攻广西时，又向粤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进攻，粤北危在旦夕。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建立南方反攻的战略基地，中共中央决定第120师第359旅挺进湘粤边，同时令东江纵队北上，共同开辟以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5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359旅分两个梯队南下。第1梯队由7个营4000人组成，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阅兵。10日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跨越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突破了日伪军利用河流、铁路建立的封锁线，于1945年1月27日同新四军第5师在湖北省礼山县大悟山会师。稍事休整后，南下支队在第5师两个团协同下于2月19日至23日横渡长江，进入鄂城、大冶、阳新地区，在大田畈战斗中击毙日军70多人，歼灭伪军200余人，尔后直插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建立了南北13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人口200余万的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湘鄂赣军区，南下支队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部队扩编为5个支队。7月7日，该部以主力3000人在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下，由大幕山出发，继续沿粤汉铁路南进，8月28日抵广东省南雄县百顺地区。此时，东江、珠江北上部队前进受阻；南下支队又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堵，处境危殆。鉴于日本投降，形势骤变，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决定北返，并报情中共中央批准。该部艰苦奋斗，突破顽军重兵包围，翻越崇山峻岭，冲过数道封锁线，跨越浙赣、粤汉铁路，于9月27日在鄂城附近北渡长江，10月5日在礼山县境同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中旬部队进行整编，取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番号，恢复第359旅番号，编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

在近一年中，南下支队从敌封锁中渡过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江河，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九岭等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线，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行程7920公里，堪称第二次长征。毛泽东在致王震的电报中称赞他们“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第359旅留延安部队3000人组成八路军游击第2支队，在刘转连、张启龙率领下，1945年6月18日从延安出发，8月中旬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值日本投降，15日奉命开赴东北。

新四军一部南下苏浙皖边 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期间，为防上美军在浙东沿海登陆和保障其舰艇基地的安全，1944年7月18日令其中国派遣军占领浙东沿海要地。敌第13军一部在海军协同下，先后占领了温州、福州等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发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以便配合盟军在沿海登陆和迎接全国规模反攻，遂于9月27日致电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时，要求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并建议派叶飞等一批干部、

部队过江，担任南进任务。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得悉中央决定新四军南进时，自告奋勇，请求率部南丁。中共中央批准了粟裕的建议，并电示华中局：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为此，华中局和新四军确定：第1师抽出3个主力团组成第1批南下部队，会同已在江南的第16旅，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然后相机向南发展，第7师继续坚持皖江地区，进一步发展皖南根据地，贯通与苏南部队的联系；苏中军区在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以北、上海以西组建第5、第6军分区，加强武装斗争，保证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系，浙南游击队，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福建游击队，向福建沿海敌后发展。

12月下旬，粟裕率第3旅第7团和特务第1、第4团共7000余人和地方干部300多人分两路从仪征、扬州附近渡过长江天险，突破沪宁铁路日军封锁线，穿越丹(阳)北、茅(山)东敌占区，于1945年1月6日在长兴西北地区与第16旅会合。2月5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将南下部队、苏南和浙东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9个支队；同时，在茅山地区组建第1军分区，辖2个独立团，7个县总队；在太湖、溧湖地区组建第2军分区，辖1个独立团、7个县总队。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统一领导苏浙皖、浙西两个区党委工作。为打开浙西局面，第1纵队于2月10日冒着纷飞的大雪涉过西菩溪，挺进莫干山，前进中粉碎了安吉等地日伪军的袭扰，乘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此时，第3纵队第7支队进到广德以南、柏垫以东，与第1纵队并列展开于天目山两侧地区。天目山位于浙皖边界，绵延百余里，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党顽固派为同我苏浙军区争夺天目山区，集中5个团进攻第7支队。该支队在第3纵队主力和第1纵队支援下展开自卫反击，至2月18日取得了天目山第1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并进驻孝丰，控制了天目山北部门户。顽军不甘心失败，又以3个多师12个团于3月1日向孝丰地区发动猛攻，第1、第3纵队全力反击，至27日取得了天目山第2次反顽战役的胜利，乘胜占领天目山和临安县城，控制了浙西纵横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4月，叶飞率新四军第1师教导旅3个团及地方干部二、三百人渡江南下，所部编为第4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5月19日夜，第4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进入萧山、金华地区，同依托四明山向西发展的第2纵队打通了联系。

1945年夏，日军收缩防线，放弃萧山、新昌、金华、兰溪等地，国民党第3战区部队乘机进入上述地区，企图控制富春江，切断浙东与浙西联系。为保持浙东、浙西联系，我苏浙军区遂以3个支队攻占新登城。然而，顽军极力反扑。我军主动放弃新登、临安和天目山区，撤至孝丰以北地区，而顽军则紧追不舍。顾祝同为肃清天目山区的新四军，以10个师34个团5.7万人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向孝丰进行合击。粟裕抓住顽军左翼兵团孤军冒进的良机，指挥6个支队一举将其歼灭，又乘顽军前敌总指挥李觉举棋不定之际，迅速转移兵力攻击顽军右翼兵团，歼灭其大部。至此，天目山第3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尔后，苏浙军区在坚持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以第4纵队再渡富春江，进至浦江、金华附近，配合第2纵队横扫日伪军，进一步扩大了在江南进行反攻的前进阵地。

在1944年的对敌斗争中，由于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同时反攻，并在内线作战中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目标，实行先打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再

向根据地外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等作战指导原则，不仅攻克了残留于根据地内和靠近根据地边缘的敌军据点，而且将进攻目标扩及到敌占区纵深守备薄弱的城镇和交通线。经过1年胜利作战，我军共收复县城22座，使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200万，全军主力部队发展到65万，连同地方武装共77.9万余人，民兵达到168.5万余人，这就大大增强了全面反攻的力量。

1945年初的形势和我军任务 1944年底和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德、日法西斯已处穷途末路。我军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根据形势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提出全国的唯一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号召解放区军民“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25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解放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和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用极大的努力扩大解放区的面积与人口，并利用新区的人力和物力扩大部队。于是，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在1945年更加猛烈地展开，其范围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

八路军1945年春季攻势 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任务，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春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里应外合手段，1月16日夜一举攻克大名县城，歼灭日伪军400余人，并争取伪军1个团反正。同月下旬，太行军区为开辟道清铁路南北地区，打通同豫西的联系，以4个团又3个独立营的兵力发动道清战役，经过1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入辉县和原武县城，攻克据点30多个，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扩大解放区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4月，太岳军区4个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豫北战役，至月底结束，攻克据点40多个，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争取1700余名伪军反正，将解放区扩大到沁阳、孟县、济源地区。在此期间，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南乐战役，攻占南乐县城及周围据点32个，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解放了卫河以东大片地区。此外，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部队还先后收复陵川、沁源、阳城、左权、晋城、和顺、南宫、新河、安泽等县城。

山东军区的春季攻势以打击大股伪军为主要目标。2月初，鲁南军区部队在鲁中军区一部配合下，向泗水地区的伪军荣子恒部进攻，攻克泗水县城及据点16个，歼灭伪军1600余人，争取伪军400多人反正。2月中旬，胶东军区5个团又5个营在民兵配合下，向盘踞在莱阳东南玩底(今万第)为中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的伪军赵保原部发动进攻，激战8昼夜，歼其9300余人，赵率残部逃入即墨县城。3月上旬，鲁中军区4个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蒙阴战役，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攻克蒙阴县城。4月中旬，渤海军区3个团向寿光东北侯镇至羊角沟一线的伪军张景月部发动进攻，至5月15日战役结束，攻克据点24个，歼灭伪军4200余人，解放沂河以北、小清河以南大片地区。

晋察冀军区确定1945年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等地区，在全面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从5月开始大规模的战役攻势行动。冀中军区针对当时情况，先于4月中旬发起任何战役，一举攻克任丘、河间县城。5月初，冀中一部发动文新战役，收复文安、新镇县城；另一部发起安饶战役，相继攻克安平、饶阳和武强县城。尔后，冀中军区部队又收

复了深泽县城和重要据点新安镇。冀晋和冀察军区部队向边缘区和被根据地包围的敌占城镇进攻，袭入平山、繁峙、徐水、崇礼、山阴和保定，攻克灵丘县城和 100 多个据点，逼近北平近郊。冀热辽军区部队在粉碎日军和伪满军的春季“扫荡”中，积极打击敌人，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之“扫荡”，而且乘胜解放了大片地区。

晋绥军区部队春季攻势的重点首先向离石至岚县公路展开进攻，尔后又转移兵力攻击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之敌。历时 68 天，作战 537 次，歼灭和瓦解日伪军 2400 余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县城及据点 54 个，扩大解放区 384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9.4 万余人。

八路军在春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 5.7 万余人，收复县城 24 座，扩大解放区 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百万以上。

新四军 1945 年春季攻势 1945 年初，日军为便利物资运输和分割我淮北与淮南联系，集结兵力打通淮河与运河交通。淮南军区在 2 师主力尚在津浦铁路西参加反顽作战的情况下，集中民兵伏击、袭扰敌人，使敌在 1 个月中几乎天天遭到攻击。随后，淮南地区武装攻入旧县、金沟、黎城。淮北军区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袭击五河、新集、泗县，迫敌撤退，使其开辟淮河交通计划破产。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针对日伪军调整部署，防务疏漏等情况，在沭阳、淮阴、灌云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3 月，攻克据点 22 个，歼灭日伪军 700 余人，解放灌河以北广大地区。4 月，第 3 师调集 11 个团发起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和据点 22 个，毙伤伪军 339 人，俘 2073 人，扩大解放区 250 平方公里。苏中军区部队在三垛至河口间设伏，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第 5 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在集中主力恢复白兆山、四望山根据地的同时，一部兵力以洪湖为依托，将解放区扩大到石首、公安、华容地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军准备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1945 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德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也面临最后崩溃。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走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强调指出我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必须准备“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并提出准备大反攻的各项任务与措施。在“七大”精神鼓舞下，我军发起规模巨大的夏季攻势，并积极准备大反攻。

八路军 1945 年夏季攻势 太岳军区一部于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在晋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20 余天，攻克据点 40 多个，收复安泽和高平县城。太行军区部队，6 月底至 7 月上旬发动安阳战役，同时向元(氏)获(鹿)、武(安)沙(河)、沁(阳)博(爱)地区进攻，共歼灭日伪军 4800 余人，攻克据点 50 多个，逼近平汉铁路和安阳等城镇。冀鲁豫军区部队，5 月发动东平战役，歼灭日伪军 1900 余人，解放东平全境。尔后，向成安、临漳、安阳地区和丰县、单县、虞城地区展开攻势，攻克和收复丰、单、虞 3 座县城。7 月，发起阳谷战役，歼灭伪军 2300 余人，攻克阳谷县城。配合阳谷战役的各部队分别收复巨鹿、广宗、馆陶、冠县、武城等 5 座县城。

山东军区部队，5 月粉碎日伪军 3 万余人对鲁中、滨海的“扫荡”，作

战 20 天，歼敌 5000 余人，击毙日军第 53 旅团少将旅团长；尔后集中兵力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发起攻势。6 月，鲁中军区 5 个团及地方武装共 5 万人向潍县、昌乐地区伪军厉文礼部发动进攻，作战 20 余天，歼灭伪军 7300 多人，攻克据点 60 余个，扩大解放区 1700 多平方公里。嗣后，鲁中与滨海军区部队向诸城地区的伪军张步云部发动进攻，作战半月，歼敌 5000 余人，扩大解放区 2500 平方公里。在此期间，渤海军区部队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于 7 月底发动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战役，8 月中旬结束，歼灭伪军 2540 人。此外，还进行了蒲滨、临费边、郯码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 1.1 万多人，攻克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邳县、郯城等 7 座县城和柳庄等一批重要据点。

晋察冀军区所属之冀晋军区以 6 个团及 6 个县支队的兵力于 5 月 12 日发起雁北战役，连续作战 50 余天，攻克和逼退敌据点 40 多个，歼灭日伪军 700 余人，扩大解放区 5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40 万。与此同时，冀察军区 6 个团及部分游击支队在民兵配合下发起察南战役，胜利后又将攻势指向察北、平北和北平外围，经过近两个月作战，共歼灭日伪军约 2000 人，攻克怀安、涞源、崇礼县城及其他据点 117 个，扩大解放区 34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57 万。冀热辽军区部队于 6 月中旬发起热辽战役，7 月末战役结束，摧毁了敌人在热南的部分“人圈”，解放锦州至承德铁路两侧大片地区。冀中军区部队于 6 月 8 日至 7 月下旬相继发动子牙河东战役及大清河北战役，共作战 200 多次，歼敌 7100 余人，攻克和收复大城、献县、交河及据点 100 多个，扩大解放区 5300 多平方公里，逼近平、津市郊。

晋绥军区部队向忻县至静乐和神池至义井公路沿线之敌进攻，作战 40 余天，攻克一批据点，炸毁桥梁 40 多座，切断公路 50 余处。

八路军在夏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 6.8 万余人，收复县城 33 座，扩大解放区 6.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40 余万。

新四军 1945 年夏季攻势 5 月 21 日，第 4 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集中 1.3 万人兵力，采取攻点打援战术发动宿南战役，至 7 月 1 日战役胜利结束，歼灭伪第 15 师 2100 余人，解放宿县西南大片地区。在此期间，淮北军区还以地方武装 9 个团在 4 师主力一部配合下发动睢宁战役，作战 20 天，歼灭伪军 2200 余人，攻克睢宁县城及据点 17 个，扩大解放区 3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0 万。与此同时，第 7 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 7 月上旬一度收复至德县城及彭泽与至德间部分地区。苏北和苏中军区部队继续打击伪军孙良诚部，攻克敌据点数十处，歼敌一部并争取伪军近千人反正。淮南军区部队争取嘉山县伪军保安大队反正，并乘胜攻入该县城。

新四军在 1945 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 3.8 万余人，扩大解放区 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40 多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联成一片。

华南抗日游击队 1945 年攻势作战 1945 年初，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鉴于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南段，重占沿海地区，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决定将攻势作战重点指向粤北和南路地区。据此，东江纵队以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由东江向粤北发展，进入英德后分开活动。北江支队经过半年频繁战斗，在佛冈、新丰、翁源间建立了拥有 20 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西北支队跨过粤汉铁路，攻占清远东北之横石和高田等据点，建立了以文洞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第 3、第 5 支队北渡东江，会同第 4 支队等部横扫增

城、博罗地区的日伪势力，经过几个月作战，开创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使东江两岸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留在东江以南的各支队，出击广九铁路两侧、惠阳东部和海陆丰地区，攻克许多据点，扩大了解放区。

在珠江三角洲，1月15日正式成立珠江纵队，在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指挥下，对该地区日伪军展开攻势，解放村庄400多个，巩固和扩大了五桂山根据地。入夏后，第2支队一部挺进西江，与广宁、四会地区的起义部队会合，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尔后向怀集、阳山、连县推进，同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打通了联系。

在粤中，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打退顽军5路围攻和两打高明获胜后，集中主力向阳春、阳江地区挺进，途中在新兴县焦山村遭顽军突然袭击，司令员梁鸿钧等60余人壮烈牺牲。部队折回粤中，袭击恩平县城，取得春湾、合水战斗胜利，继在新兴、恩平、开平、阳春、阳江、台山、新会等地坚持斗争，开辟了以台山县大隆洞为中心的游击区。

在雷州半岛，中共南路特委于1945年1月，在高州、雷州地区，先后组织武装起义，成立南路人民解放军，转战于高州、化州广大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4月，在廉江新塘集训主力，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5个团3500余人，在遂溪北部、廉江南部30万人口的敌后地区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

在潮汕地区，中共党组织于1945年初恢复武装斗争，先后在潮(安)汕(头)地区各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曾发展到3个支队2000多人，在上述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在1945年对敌斗争中，共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缴枪1000多支(挺)、炮6门，扩大与巩固了华南解放区。

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由于我军加快了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指挥日趋统一，打击重点进一步集中，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0多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上及沿海地区。至8月初，解放区面积达86.4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军队达93万余人，民兵达220多万人，为展开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二、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最后胜利

准备全面反攻 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早于 1944 年 4 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积极采取措施，在局部反攻过程中，加紧进行全面反攻的准备工作。

一是加强对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城市和交通要道，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极为重要的地区。为了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6 月 5 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和准备城市武装起义提到极重要的地位，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开展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军队政治部都建立健全了城市工作部和有关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委员会，从地方和军队抽调并训练一大批城工干部，派往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对群众及伪军警、伪政权人员，深入开展宣传、组织与争取工作。这时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工作，而且对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长治、杭州、宁波、郑县(今郑州)、开封、香港等城市及许多敌占县城与交通要道也加紧了工作。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加强，使我党控制了一部分伪军、伪组织，在若干城市动员了群众，准备了武装起义的内线力量，为在大反攻时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创造了条件。

二是加紧整训部队。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要求我军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提高质量，逐步实现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为此，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7 月 1 日发出由毛泽东拟订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出为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并对付国内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的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10 月 12 日，又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实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 4 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 60%、游击队 30%和轮训全部民兵。中央的指示与决定，还分别对整训的时间、内容和练兵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训练干部和班以下骨干。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央的指示与决定，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训练计划，开展了军政大整训。政治整训主要是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 1944 年 4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修改，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个政治工作历史文献，对加强我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部队在深入学习上述文献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并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官兵之间、上下之间达到了空前团结。军事整训着重开展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为主要内容，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形式，使冬季练兵运动获得良好效果。此外，还通过各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团和教导营、轮训队

等培训大批干部和骨干。经过整训，部队极大地提高了军政素质和技术、战术水平，尤其锻炼了干部带兵、练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为在大反攻时大量扩编部队和建立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

三是建立联络机关，搜集战略情报。1944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建立联络机关的通令》。通令指出，为准备在大举反攻时配合同盟国军队作战，决定在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新四军军部、鄂豫皖及东江、琼崖等部队中设立联络处，在胶东、浙东、苏北、苏中、苏南、冀中、冀东等地部队中设联络科，在某些军分区根据需要设联络站，对日伪军经常不间断地进行战略侦察。根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都先后抽调人员，配备器材，建立了机构，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搜集工作，基本掌握了日伪军的重大动向和分布状况，为我军的反攻作战提供决策依据。有些重要情报还及时通报给盟军和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第5师与驻华美军第14航空队建立军事情报协作关系，为其派驻大悟山地区的情报组提供大量情报，对美国空军准确攻击日军目标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加强军需、军工生产，改善后勤保障。为准备反攻和加强后勤工作需要，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第一，统一供给制度。继《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颁行后，1945年正式公布《第18集团军暂行供给办法》，明确规定了各级供给干部的职责、规章制度及实施方法，使我军后勤保障工作向统一和正规方向迈进。第二，扩大军工企业，增加军工生产人员。八路军军工部的直属单位增加到8厂和一个实验所等，连同军工部机关，共有人员1600多人；各大军区均尽力发展军工生产。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有百名以上工人、10台以上机器设备和固定厂房的军工厂达50余个，总人数近万人。第三，加紧采购军用物资，尤其注重购买棉花、染料，以及药品和有线、无线电讯器材。第四，调动军工生产积极性，增加军品产量。广大军工在“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口号的鼓舞下，以多造武器，造好武器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到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第1、第2、第3、第4师最高月产步、机枪弹8万多发（不含3师）、手榴弹4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迫击炮弹1500多发。手榴弹已能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自给70%，其它弹药自给30~35%。晋绥军区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比1943年增长了5倍，还制造了掷弹筒500个、各种炮弹6万余发。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太行军工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第五，调整交通兵站线，加快物资运输。八路军加强了由延安至前方的交通运输线。晋绥军区于1944年9月决定将各军分区兵站统归军区后勤部领导，在兴县设立兵站总站，管辖7个分站和15个派出所。新四军成立淮南交通总站，开辟了从军部至各师以及一些邻近师间的交通运输线，运输方式亦由人、马运送发展到部分用汽车、汽艇和轮船输送。

五是学习与贯彻“七大”精神。八路军、新四军认真传达大会的精神，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深刻地领会了党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斗争任务和奋斗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从而为全面反攻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展开全面反攻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对日本投降起了加速作用，使中国抗战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

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利用大部敌军及其所占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均处于我解放区包围之中的有利态势，向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全面反攻。从8月9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对日伪军盘踞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发起大规模进攻。

由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程子华等领导的晋察冀军区部队约11万人，以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大同、丰镇等城为重点，向平汉、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东段，北平至山海关间北宁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同时以冀热辽军区主力向东北挺进，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各部奋勇前进，积极作战，至9月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集宁、丰镇、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蠡县、安国、怀安、涞水、无极等县以上城市35座，并包围北平、攻入天津、保定和石家庄等城市，收复了冀、热、察等省广大地区。

由罗荣桓、黎玉等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23万人，组成5路野战军，在10万民兵与民工的支援下，同时向山东省境内的日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以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第1路军，向胶济铁路西段及泰安、临沂等地日伪军进攻，并在渤海军区部队配合下以主力进军济南。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第2路军，北向胶县地区进攻，配合胶东军区部队进军青岛；南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及连云港以北沿海之日伪军进攻。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第3路军，以青岛为重点，向潍县（今潍坊）以东胶济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一部进攻胶东沿海各敌占城镇。由渤海军区部队组成第4路军，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县（今沧州市）和胶济铁路西段沿线之日伪军进攻。由鲁南军区部队组成第5路军，向徐州及津浦铁路滋阳（今兖州）至徐州段沿线之日伪军进攻。各路部队互相配合，取得了重大胜利，至9月2日，山东军区部队分别攻占威海卫、烟台、莱阳、蓬莱、即墨、临朐、胶县、章丘、吴桥、莱芜、泗水、赣榆等县以上城市36座，切断了胶济、津浦铁路，包围了济南、青岛、徐州等地的日伪军。

由贺龙、吕正操、林枫领导的晋绥军区部队3.4万余人，在北线，向以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平绥铁路西段攻击；在南线，向以山西省会太原为中心的同蒲铁路北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至9月初，晋绥军区部队分别攻克武川、和林格尔、清水河、神池、文水等县城11座及许多据点，并攻入归绥，逼近太原，收复了山西、绥远省一些地区。

由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约19万人，向晋冀鲁豫边区周围各主要交通线及城镇之日伪军进攻。以太行军区主力，向上党地区、道清铁路沿线及榆次、太谷等地进攻，并以一部兵力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太岳军区部队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和潼关至孟县间黄河北岸地区的日伪军进攻。冀鲁豫军区部队除一部配合山东军区部队进军济南外，另分兵3路：以11个团和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向平汉铁路安阳至邯郸段以东地区和德石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以13个团组成中路军，围攻新乡、开封地区的日伪军，以3个团组成南路军，配合中路军进逼开封，歼灭以开封为中心的陇海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各部昼夜进军，连续作战。为适应大反攻作战需要，8月20日，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4个军区部队。至9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分别攻占昔阳、襄垣、博爱、辉县、平陆、冀县、临清、沛县等县城42座和许多据点，包围了开封、郑县、安阳等城的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国土。

由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1 万余人，分路向郑县以西和以南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密县、登封县城和数十个日伪军据点，收复豫西一些地区。

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领导的新四军 31 万多人，向华中各地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皖江军区部队分别向津浦铁路南段、长江下游北岸及运河沿线的日伪军进攻，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以武汉为重点，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及鄂南的日伪军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向南京、上海和宁沪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至 9 月初，新四军各军区部队分别攻克了永城、沐阳、涟水、六合、兴化、无为、溧水、金坛、广德等县城 32 座及数百个集镇，攻入芜湖，逼近南京、上海、杭州、鄞县、宁波、武汉等大中城市。

由曾生、冯白驹、林锵云、罗范群、林美南、周楠等领导的东江、琼崖、珠江、中区、韩江、南路等纵队共 2.7 万人，分别向粤汉铁路南段和广九铁路沿线、海南岛、雷州半岛及香港至汕头沿海地区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至 9 月初，攻克了宝安县城及数十个重要据点，逼近广州、香港、海口、汕头等地，收复广东省大片沦陷区。

从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在不足 1 个月的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向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及交通要道进攻，收复县以上城市 150 多座，几乎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纷纷向大中城市撤退。据延安总部不完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 7.6 万多人，缴获长、短枪 7.3 万余支，轻、重机枪 900 多挺，各种炮 160 余门，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也积极向日、伪军盘踞的一些据点和交通要道展开进攻，予敌以有力打击，配合了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

歼灭拒降之敌 在中国解放区军队和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强大打击下，日本帝国政府于 8 月 14 日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 月 2 日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也已完结。9 月 3 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美国为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美国总统杜鲁门通过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日军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械。美国还派出大批飞机和舰船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仅如此，美海军陆战队先后在秦皇岛、天津、塘沽、青岛等地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夺城市、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日军屈从美国，听命于蒋介石，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他指挥下，日、伪军不仅固守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而且还出动兵力夺取已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文水、益都、即墨、延津、封丘、海门等 10 多座县城和一批据点，准备交给国民党军队。国民党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抢夺抗战果实，不准我军参与受降，而由国民党在南京单独接受日军投降，并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令他指挥日、伪军扼守城镇及交通要道，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同时将沦陷区(包括解放区)划分为 16 个受降区，下令

各战区、各方面军以各种输送方式加速推进，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占领华南、华中和华北各解放区，进而夺取东北。

针对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于8月22日决定改变原定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转取以夺取中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为主的方针，指令我军继续歼灭拒降之敌，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扩大反攻战果，同时，坚决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经过两个多月的胜利作战，八路军各部队在华北地区攻克了蓟县、玉田、迁安、浑源、蔚县、阳原、高阳、邯郸、邢台、焦作、离石、菏泽、平度、临沂、平原等县城90多座，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完全解放了热、察两省和晋、冀、鲁、豫的广大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与东北解放区贯通了联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占萧县、灵璧、淮阴、淮安、盐城、高邮等县城8座和一批集镇。华南游击队在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一度攻克儋县、感恩（今感城）和许多日伪军据点，取得了很大胜利。东北抗日联军也攻克一些敌占城镇据点。

在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审时度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发动全面反攻，并适时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因而使我军能在短期内歼灭日军1.3万余人，伪军38.5万多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多挺，各种炮1300余门。攻克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援下，在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配合下，彻底地打败了凶残、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八年抗战，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民1.255亿，抗击、牵制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且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使我军从抗战开始的9万余人发展到127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成为一支经受了长期战争锻炼和考验的巨大革命力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首先是在我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断克服了抗战中出现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危险，巩固和坚持了团结抗战，其次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参战，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低劣等缺陷的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前提，第三是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在敌后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并适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第四是发挥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克敌制胜的各种战略战术，第五是我军继承并发扬了红军的艰苦奋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成为全国抗日军队的楷模，此外，还有国际援助等等。中国抗战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人民的觉醒，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我国各族人

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奴役、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时也是积极支援与配合世界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长达 14 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几乎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全部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的日本陆军兵力一直比太平洋战场多。据日本统计材料，在整个战争中死伤军人 185.8 万中，就有 138 万是在中国战场，超过死伤总数的 70%。我国军民在抗战中死伤和失踪达 2180 余万人，其中军队伤亡约 370 万人，财产损失 1000 多亿美元，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最大代价。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束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迫其不得不放弃“北进”计划，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避免了两面作战，得以从远东地区先后抽调共 54 万余人用于对德作战。同样，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延缓了日军的“南进”时间，打乱了其“南进”部署，为美、英等国在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的进攻和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人民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一支主力军，中国抗战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九章 争取国内和平，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国共两党的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6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德、意、日被打败；英、法受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它利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妄图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在中国，它极力支持蒋介石垄断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从各方面援助蒋介石，企图把中国作为它的势力范围。为此，向蒋介石提供大批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内战前线，并先后派出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同时，期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有利于国民党的那种在“军令、政令统一”下的“和平”。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风起云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日益高涨。

世界形势的发展，为各国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美苏之间从各自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既有斗争，又谋求妥协，特别是在某些问题上，包括某些重要问题上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竟认为中共应解散军队，与国民党达成某种暂定的条款；并致电中共中央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的对华政策，使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更加复杂。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与安宁，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人民的意志，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而，采取了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但是，由于国内外人民反对中国内战，加之蒋介石要把大部位于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完成进攻解放区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蒋介石采取了反革命两手。他一方面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和美国的帮助下，迅速运送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全面内战。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1945年8月16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25日，党中央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作为争取和平建国的总方针，并决定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告诫全党全军，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某点上，作好反内战的准备，并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敢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以制止内

战，或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使我党我军在同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二、配合重庆谈判，力争实现国内和平

重庆谈判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这一行动，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我党的和平诚意，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29 日，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对蒋介石企图取消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为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

经过 43 天曲折、复杂的斗争，10 月 10 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享有各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民主自由；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实现地方自治；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但是，军队整编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仍未解决。关于军队整编，我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我军可以缩编成 24 个师或 20 个师，但国民党未作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说“可以考虑”。关于解放区的人民政权问题，我党先后提出四种解决方案，都遭国民党无理拒绝。国民党坚持不承认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立场，证明它始终坚持反革命内战的方针。

重庆谈判，使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主动。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上党战役蒋介石在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同时，加紧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犯。8 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 4 个师又 1 个挺进纵队共 1.7 万人，侵占了我长治(古称上党郡)地区，企图以此为基地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为保卫解放区，配合毛泽东赴渝进行和平谈判，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要歼灭侵占上党地区之敌。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遂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太岳 3 区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共 3.1 万人，发起上党战役。鉴于部队正在整编，编制很不充实，装备亦差，又缺乏大兵团攻坚作战经验等情况，决定采取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敌主力出援，力求在运动中歼敌，尔后再攻长治的作战方针。战前，我军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

9 月 10 日至 20 日，我军相继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城，并开始围攻长治。24 日，阎锡山部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 2 个军共 8 个师 2 万余人由于洪镇沿白晋路南下增援。我军随即以一部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北上求歼援敌。10 月 2 日，将援敌合围于虢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地区后，展开猛攻。敌凭借有利的地形和火力优势，进行顽抗。我即采取围三阙一的部署，在北面虚留生路，诱敌突围。5 日夜，敌果然向北突围，被我迂回部队截住，敌即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发起冲击，我太岳军区第 20 团团长江大明率部反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打退了敌 8 次集团冲击。6 日，我军发起总攻，全歼该敌，击毙彭毓斌。8 日，长治之敌第 19 军突围西逃，12 日，被我军歼灭于桃川堡附近地区，军长史泽波被我生擒。此役，我共歼敌 11 个师又一个挺进纵

队共 3.5 万人，缴获山炮 24 门，机枪 2000 余挺，长短枪 1.6 万支，沉重打击了进犯之敌，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为促成谈判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三、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调整战略部署

在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适应这一战略形势，及时作出了由抗日战争时的以游击战为主向现在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8月11日，党中央决定：在目前阶段，为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20日，党中央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对日大反攻期间编组野战兵团的基础上，各战略区野战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3/5到2/3，并应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使其既可在本战略区实施机动作战，也可到其他区域作战，从组织上迅速完成由游击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准备战胜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同时，指示全军应加强炮兵等特种兵建设，要把这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要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的建设。

在编组野战兵团的过程中，各部队深入地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和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使广大官兵提高了阶级觉悟，进一步认清了美蒋反动派的假和平、真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克服了“抗战胜利，可以解甲归田”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家乡地域观念；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树立了当野战军最光荣、四海为家干革命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采取逐级升级的办法，即区小队升编为县大队，县大队升编为独立团或旅，分区独立团升编野战纵队。为保持野战部队的战斗力和光荣传统，坚持了新老合编和重点保证主力相结合的原则，每个纵队至少保留一个战斗力强的旅，每个旅至少保持一个战斗力强的团，其余旅团也有一定数量的老部队作骨干，从而既保证了主力部队在合编后不丧失其突击力量，又保证了多数部队的迅速巩固与提高。

国民党在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一面拖延时间，毫无诚意；一面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至9月中旬，国民党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了长江以南备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和长江以北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向解放区挺进。我苏南、浙江、皖南、皖中和豫西、鄂豫皖、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也面临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但东北和热河地区，国民党统治势力极为薄弱，其军队还无法在短时期内大量到达，而苏军在东北仅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肃清日、伪势力，我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在东北抗联的配合下，控制了若干地区。东北地区当时有人口3400余万，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将对我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包围态势；如我党我军能控制东北，既可摆脱敌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又可利用和依靠已有的工业和资源，将东北建设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对敌斗争。

依据上述情况和分析，中共中央于9月19日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

略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此，决定抽调山东军区主力和大部干部及其他解放区的部队各一部开赴东北，新四军大部北上山东和冀东，长江以南八个省区的人民武装和主要党政干部迅速撤至江北，各军区部队坚决打击进犯之国民党军。

为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并先后调派4名政治局委员、1/4以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2万余名干部进入东北；

10月31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决定我军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至11月底，进入东北的部队计有：山东军区主力6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以及其他解放区的部队各一部共11万人；同时，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延安炮兵学校等调往东北。这些部队迅速扩编成21个师(旅)，建立了10个军区，并以收集和修复的日军坦克、飞机为基础，成立了我军第1支坦克队——东北坦克大队，全队共30人，和第1支航空队(1946年1月改为航空总队，3月改称航空学校)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我军在向东北进军过程中，各部队深入地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进军东北的伟大意义，从而克服了家乡观念、地域观念，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精神，由陆上和海上日夜兼程，终于抢在敌人前面，胜利到达东北。进军东北的各部队所路过的各解放区人民，也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北上部队安排食宿、指定向导，设立开水站、鼓动棚等，给部队以极大鼓舞。

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长江以南的部队开始撤离根据地。撤离前，各部队普遍学习了党的新的战略方针，使大家懂得了服从革命大局和政治需要的道理。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不能转移的伤病员和抗属进行了妥善安置，对需要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做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使部队有秩序地撤退，10月1日，新四军军部发表了《关于江南部队北撤事告全体民众书》，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军北撤是为促进和谈成功，迅速实现全国和平团结而作出的一个极大让步，希望人民给予支持和谅解。在北撤途中，又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伪军的拦截，至11月中旬，苏浙军区部队全部撤到江北，一部到达苏中，另一部和皖南、皖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12月上旬，由华中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军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下辖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军区，及其所属部队18万人；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由新四军北上部队组成的第1、2纵队，第7师和原山东军区第8师，共7万余人。苏皖边区的部队组成属新四军建制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由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下辖淮南军区和7个军分区，约11万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辖由苏浙军区北移部队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部队组成的第6、第7、第8、第9纵队，共4万人。

活动于鄂南、湘东、粤北地区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八路军南下支队改编)和河南军区部队于10月下旬，撤至河南省以桐柏山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区，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下辖由上述3支部队组成的第1、第2纵队共3万人和江汉、鄂东、

河南军区部队 3 万人。

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中分出，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由李井泉代政治委员(后由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辖吕梁、雁门、绥蒙军区；另组成晋绥野战军，贺龙任司令员，下辖 4 个旅，全区部队共 3 万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军区分出后，仍保留原番号，王世泰任代司令员，下辖 5 个旅和 6 个分区，全区部队共 3 万人。

冀鲁豫、冀南、太行、大岳军区组成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上述 4 个军区和由上述 4 个军区主力部队组成的第 1 纵队(组成不久便奉命进军东北，后留在热河，归晋察冀军区指挥)，第 2、第 3、第 4、第 6、第 7 共 5 个野战纵队，全区共有野战部队 8 万余人，地方部队 23 万人。

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冀热辽、冀察、冀晋、冀中军区，并将上述 4 个军区的主力整编成 8 个野战纵队，同时，为对付国民党军对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进攻，组成了第一、第二两支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 4 个纵队；第二野战军由肖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下辖 4 个纵队和原晋冀鲁豫第 1 纵队。全区野战部队 18 万人，地方部队 12 万人。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而又艰苦的工作，我军基本完成了战略部署的调整和野战兵团的编组，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和以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创造了条件。

四、坚持自卫原则，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从日本投降至9月中旬，蒋介石共调动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至10月中旬，已侵占解放区城市31座。10月、11月，美国军舰、飞机陆续将国民党军4个军从华南等地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接应沿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党在谈判中屈服。否则“即以土匪清剿之”。

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国民党军以火烧、剥皮、活埋、刀铡、枭首、打肉靶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在平汉路沿线为许多城镇大肆屠杀我区、村干部、民兵、抗战军人家属和群众。这种暴行，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无比愤慨。

为坚决打击和阻止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保卫解放区，加强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争取和平，并掩护我军调整战略部署，我军相继进行了以下主要战役。

邯郸战役 上党战役胜利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主力依次编成第1、第2、第3、第4纵队，每纵队辖3个旅，第2、第3、第4纵队并以上党战役缴获的大量火炮组建了炮兵部队。10月14日，国民党军第11战区以3个军的7个师分两路由新乡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集中3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6万人，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采取诱敌深入至我预定战场的作战方针，求歼北进之敌。24日，敌在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节节抗击引诱下全部渡过漳河，进入马头镇、磁县间我预设战场，被我主力包围。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即令各部先以1/3的兵力与敌保持接触，选敌弱点，逐个歼灭其小部兵力，以消耗其实力，并派许多精干小分队，携带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插入敌人纵深，袭击其部队和首脑机关，使其不得安宁；然后主力部队以钳形攻势，分割围歼敌人。并派军区参谋长李达赴国民党新编第8军军部，争取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举行起义，从而加快了战役进程。接着，我军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迫敌向南突围，于11月2日将其全歼。此役，除新8军等部起义外，共歼敌2万余人，其中俘敌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人，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津浦战役 10月，国民党以7个军及伪军2个军分别抢占济南、泰安、兖州、临城(今醉城)及浦口、蚌埠等地，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南段，尔后向平津及东北推进。为截断津浦路阻敌北上，新四军与山东军区主力各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0月18日在徐州至济南间发起津浦战役。战至1946年1月13日，被歼和被迫起义的国民党军和伪军达2.8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在微山湖畔柏山战斗中，山东野战军第8师第23团3连班长陈全合在炸药用尽，残敌仍龟缩在最后一个碉堡内顽抗待援的情况下，毅然冲到碉堡跟前，拉响速爆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被陈毅司令员誉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

绥远战役 日本投降后，驻绥西(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万余人，强行抢占被我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及已被我军解放的武川、陶林、集宁、丰镇、兴和等城镇，并企图夺占晋察冀解放区首

府张家口。晋察冀、晋绥军区首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集中 14 个旅 5.3 万余人，于 10 月 18 日发起绥远战役，在各歼敌一部后，敌主力即全线西撤，退守归绥、包头。随后，我军对归绥、包头进行围攻。但因敌军凭坚固守，我军数次攻击未克，于 12 月 14 日主动撤围。此役共歼敌 1.2 万人，打破了国民党军控制平绥路的企图。

与此同时，冀热辽部队和山东第 7 师在山海关抗击了国民党两个军的进攻，为我军在东北为展开赢得了时间。华中我军歼敌 2 万余人，使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蒋介石在 3 个月军事进犯为失败中，发觉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国民党军主力还未完全运到内战前线。同时，他们破坏和平，向解放区进攻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2 月 15 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声称“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但同时又表示赞成国共两党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随后，决定派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27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公报，希望“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应停止内部冲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欺骗和敷衍应付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加紧战争准备，被迫同意我党提出的首先无条件停战，召开政协会议的建议。接着，在我党代表的努力下，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从 13 日零时起双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时，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并在北平设立了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等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1 月 10 日至 31 日，在重庆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等 5 项决议。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有利于人民。这是我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同国民党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民主要求，也使广大人民获得了暂时的和平。

五、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一步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停战协定签订后，全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是，蒋介石对此毫无诚意，而是乘机加紧调动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并不断蚕食、进攻解放区。自1月13日至5月底，先后违约向解放区周围运送和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共130万人；先后使用227万人的兵力，向解放区进攻达4365次，占领城市46座，村镇2577个，造成了关(山海关)外大扫，关内小打的局面。

我党我军坚决拥护和执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整军复员。同时，对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从各方面进一步做好了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在关外，国民党拒不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945年9月，成立了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积极收编伪满军警和上匪武装。10月底，又由美国军舰运送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于10月1日向我山海关守军发动进攻，16日攻占该地。接着，又相继攻占我绥中、锦州、黑山、阜新、义县、朝阳、凌源、平泉等城镇。

我党对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中共中央鉴于苏军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国民党政府，而我调往东北的部队尚未来得及休整，新扩编的部队又很不巩固，无法阻止国民党军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等情况，于11月下旬指示东北我军退出中长路沿线大城市，在东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12月28日，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我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等工作。据此，东北我军迅速调整部署，整顿部队，将原来的10个军区合并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个军区，同时抽调部队剿灭土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到1946年3月，全区歼灭武装土匪和伪满军警7万多人，收复了许多中小城镇，部分地区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反奸反霸清算斗争；部队进行了整补，总兵力发展到31万人。至此，东北解放区初具规模。

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由于在东北的兵力不足，无法继续进攻，使东北获得暂时稳定。2月上旬，当其“五大主力”中的新编第1、第6军到达东北后，即由沟帮子、彰武等地分兵三路，向辽阳与营口、沈阳、法库方向发动进攻。我军当即组织反击。2月14日，我军集中2个师的兵力，全歼进占法库以西秀水河子之敌4个营1600余人，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3月初，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兵。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接着又进占我抚顺、辽阳。随后，国民党违背已达成的关于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又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继续向我军大举进攻，企图迅速抢占四平、本溪、鞍山等地，消灭我军。为配合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党中央指示东北我军应不借任何牺牲，扼守四平街地区，确保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长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据此，东北我军决心在四平地区集中新四军第3师(辖4个旅)，山东第1、第2师及第7纵队，予北进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以第3、第4纵队及保3旅在本溪地区作战，策应四平方向的作战；以山东第7师主力等部夺取长春，以第359旅等部夺取哈尔滨，以新四军第3师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东北地区原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

一部夺取齐齐哈尔。

4月上旬，敌在进占法库、开原后，以新编第1军、第71军主力共5个师的兵力，继续向四平进攻。我军实行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16日，我军在大洼、金山堡地区组织反击，歼敌1个师大部。18日，敌开始攻击四平城，遭我顽强抗击，伤亡惨重，未获进展。4月中下旬，我军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5月初，敌在攻占本溪后，抽调新编第6军等部共5个师至四平方向，使进攻兵力达10个师。14日，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实施轮番进攻，并于18日突破我军阵地。我军被迫撤出四平，向松花江以北和东满、西满地区转移。接着敌又相继占领长春、吉林等地。敌人由于兵力不足，无法继续发展进攻。我军则乘机在东满、南满地区打击孤立、薄弱之敌，歼敌一部，争取了敌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师直和一个团起义。6月6日，国共双方分别发表了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

在此期间，关内我军在冀鲁豫、晋南、冀东等地粉碎了敌军的蚕食进攻，歼敌近万人。山东我军在胶济、津浦线发起讨逆战役，攻占了胶县、泰安、枣庄、德州等城，歼灭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3万余人。这些战役战斗，巩固了解放区，改善了我军的战略态势。

在反击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我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首先，按照“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的原则，进行了精简整编。至1946年6月，全军整编成野战军27个纵队(含相当于纵队的师)、6个旅；地方军划分了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独立师(旅)；并加强了特种兵，特别是炮兵的建设，全军建立了两个炮兵旅、另14个炮兵团、17个炮兵营、38个炮兵连；纵队建立了工兵连。整编后，野战军共61万余人，地方军66万人。其次，开展了军政大练兵，在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的基础上，着重抓了以投弹、刺杀、射击、爆破为主和近战、夜战等技术战术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第三，在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活动中，采取派人员打入国民党部队，有组织地将经过教育的被俘国民党官兵释放回去等多种形式，进行瓦解敌军工作。第四，积极参加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加强解放区建设，并发动群众支援战争。这一切，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和支持长期战争作好精神和物质准备。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期间，我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争取了中间力量，初步形成了反美反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壮大了人民力量；解放区军民沉重地打击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基本上完成了迎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十章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军实行战略防御

一、全面内战爆发时的形势，敌我双方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在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后，于1946年6月17日向我党提出了包括要我军立即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线以及东北大部分地区等无理要求。在遭到我党坚决拒绝后，即于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总兵力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装备和得到了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因而拥有大量的现代化的步兵武器、火炮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以其整编第11师为例，全师共有2.8万余人，装备各种枪11520支(挺)，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火炮440门，其中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8门，火箭炮(筒)120门；汽车360辆。同时，国民党统治着全国3/4的上地和3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近代工业，能够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此外，还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就对国民党政政府提供了价值13.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当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和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很少的火炮。以较为充实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为例，全纵队共有2.7万余人，装备各种枪13991支(挺)，其中冲锋枪仅92支；各种火炮(主要是小口径火炮)46门，其中75毫米的山炮12门。解放区人口仅1亿多，经济上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没有外援，全靠自力更生，军工生产极为薄弱，据1946年7月统计，月产迫击炮2门，步枪1030支，机枪15挺，手榴弹28万余枚，迫击炮弹4710发，步机枪子弹29万发，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用占其全部正规军80%，即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向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东北各解放区实施全面进攻，妄因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踌躇满志，狂妄地声称：“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于7月20日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号召全党树立战胜蒋介石的“充分的信心”。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拟制了整编军队的计划，准备从1946年3月起，分三期陆续将86个军全部缩编为整编师（每师辖2至3个旅），师缩编为旅（绝大部分的旅辖2个团）。但到全面内战爆发时，只完成了陇海路以南部队的整编。

坚定了解放区军民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在军事上，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争取和平，曾于1946年6月下旬拟制了敌进我进的出击计划，以求在给予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后，迫其停止进攻。后来，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出击计划，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解放区内粉碎敌人的进攻。在7月20日的指示中，党中央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9月16日，中央军委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我军战胜蒋军的进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二、在内线实施机动作战粉碎敌之全面进攻

中原我军胜利突围 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时，全区已发展到60余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即调集重兵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至1946年6月，将我军压缩到以宜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6月26日，国民党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的兵力，对中原我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我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以一部分兵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以第1纵队第1旅伪装主力向东突围，迷惑和牵制敌人外，李先念司令员、郑位三政委率主力于6月底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中原军区直属队和第2纵队（欠第15旅）共1.5万人，于29日晚越过平汉路，7月下旬进入陕南，同陕南游击队会合。接着在秦岭以东、伏牛山以西、陇海路以南、汉水以北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8月3日组成鄂豫陕军区。其中第359旅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左路第1纵队（欠第1旅）和第15旅共1万余人，于7月1日越过平汉铁路后，进至长江以北、大巴山以东、汉水以南，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8月27日组成鄂西北军区。向东突围的第1旅7000余人，于7月下旬进入苏皖解放区，尔后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在突围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牵制了敌军30多个旅在自己的周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和华东战场我军的作战。

华东我军举行苏中、清北、鲁南、莱芜等战役 华东解放区南濒长江，北跨胶济线，东临黄海，西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地区。敌为消灭华东我军，于1946年6月底已集中58个旅，以其中31个旅进攻苏皖解放区，27个旅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胶济铁路和鲁南台（儿庄）、枣（庄）地区，企图首先消灭苏皖我军，或逼我北撤山东，然后在山东与我主力决战，占领整个华东解放区。华东我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由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在淮北的津浦路东地区打击进犯之敌；以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淮南津浦路东地区迎击进犯之敌；山东野战军一部和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线、鲁南地区迎击进犯之敌。

1946年7月上旬，敌第1“绥靖”区在长江两岸的南通、靖江、泰兴、泰州、扬州、江阴等地集结了15个旅约12万人，在侵占我一些城镇后，计划于15日向苏皖解放区的苏中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此时，在苏中地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仅19个团3万余人，为争取先机，打乱敌进攻部署，创造歼敌机会，华中野战军集中2个师12个团的兵力，于7月13日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83师第19旅发起攻击，战至15日，全歼该敌主力3000余人。此时，敌除以一部由靖江北援泰兴外，以整编第49师由南通乘虚进攻如皋。华中野战军除以一部兵力继续肃清泰兴残敌，造成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吸引援敌，并引诱南通之敌放胆前进；主力则挥师东进，于18日至22日在如皋以南地区歼敌整编第49师1个半旅1万余人。战后，我军主力北移海安东北地区休整。30日敌集中6个旅进攻海安，我军一部歼敌3000余后，于8月3日撤离海安。10日至23日，我军乘敌调整部署，兵力分散之机，

连续进行了李堡战斗和丁(堰)林(样)战斗，歼敌 1 个半旅和交通警察 5 个大队共 1.1 万余人。这时，敌为防我北攻如皋，乃调兵增防，同时为配合淮北之敌对准阴的进攻，以整编第 25 师向邵伯进攻。我军除以一部兵力坚守邵伯外，主力采取“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25 日至 27 日，我军将由黄桥出援如皋之敌整编第 69 师的第 99 旅和由如皋西出接应之敌第 187 旅等部 1.7 万人歼灭于分界、加力两地。战斗中，我军第 6 师第 48 团 8 连机枪手陈瑞林和战友们一起，沉着机智地打退了敌多次反扑，一个人就打死打伤敌人 200 余，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第 52 团 3 连副排长徐秀文，用轻机枪击落敌机 1 架，亦被评为战斗英雄。进攻邵伯之敌，遭我顽强抗击，伤亡 2000 余人，在得悉第 99 旅等部被歼后，于 26 日撤回扬州。31 日，我军攻占黄桥。至此，被誉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 5 万余人。9 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北上苏北。

在敌第 1 绥区部队进攻苏中的同时，淮北之敌 12 个旅，于 7 月 18 日由徐州、夹沟、固镇分三路进攻淮北解放区。20 日前，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进入淮北，27 至 29 日，在朝阳集地区全歼由夹沟东犯之敌整编第 69 师第 92 旅等部 5000 余人。9 月上旬，敌整编第 74、第 28 师和第 7 军进攻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华中、山东野战军各一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于 19 日撤离淮阴。随后，华中、山东野战军主力逐步会台，继续在苏北地区打击进犯之敌。

战斗在淮南和胶济线的我军，在给进攻之敌以一定杀伤后，分别于 7 月底和 10 月上旬撤至苏中和山东解放区。

1946 年 12 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 25 个半旅，从东台、淮阴、宿迁和台儿庄、枣庄地区分四路向苏北、鲁南发动新的进攻，企图迅速结束苏北战事。15 日至 19 日，华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在宿迁以北晓店子、峰山地区全歼进攻之敌整编第 69 师 3 个半旅 2 万余人。接着，又于 1947 年 1 月 2 日向位于鲁南向城、卞庄地区之敌整编第 26 师和第 1 快速纵队发起突然攻击。该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尤其是第 1 快速纵队，是蒋军仅有的两个快速纵队之一，由 1 个步兵旅以及炮兵 1 个团另 1 个营、战车营、搜索营、工兵营、汽车团组成，全部美式装备，被国民党军视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战斗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火烧、或用汽油瓶、集束手榴弹炸毁等手段与敌坦克作斗争，第 1 师第 8 团排长李教清连续攀登两辆坦克，从其顶盖塞进手榴弹，吓得另 1 辆坦克的驾驶员举白旗投降，创造了只身缴获敌坦克 3 辆的英雄事迹。战至 4 日下午，敌除少数逃入峰县外，全部被歼。随后，我军乘胜于 9 日至 20 日又全歼峰县、枣庄守敌整编第 51 师和第 52 师 1 个团。此役，我军共歼敌两个整编师、1 个快速纵队计 5.3 万余人，缴获坦克 24 辆、汽车 470 余辆以及各种火炮 200 余门。为后来组建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创造了条件。

鲁南战役后，华东我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所属部队编成第 1、第 2、第 3、第 4、第 6、第 7、第 8、第 9、第 10、第 11、第 12 纵队，并组建了特种兵纵队。除第 11、第 12 纵队留置苏中、苏北，坚持敌后斗争外，其余 9 个步兵纵队 27 万人和特种兵纵队均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同时，成立华东军区，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下辖苏中(由第 11 纵队兼)、苏北(由第 12 纵队兼)、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 6 个军区，全部地方武装

约 30 万人。

1947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帅部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 31 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在临沂地区同华东野战军决战。其中南线 8 个整编师 20 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由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北犯；北线由第 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率 2 个军，1 个整编师共 9 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从明水、淄川、博山等地南下，实行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在几次求歼南线之敌未成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毅然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2 月 10 日，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兵力伪装全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秘密北上，19 日，将李仙洲集团包围在新泰、莱芜地区，20 日晚发起攻击，至 23 日，全歼该敌 7 个师。接着，我军乘胜横扫胶济线之敌。此役，共歼敌 7 万余，收复县城 13 座。

自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2 月，华东我军认真执行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以放弃苏中、苏北、鲁南解放区的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 22 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严重挫折了敌人的攻势。

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定陶、临浮、巨金鱼、吕梁等战役 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和德(州)石(家庄)铁路，南跨黄河和陇海路，是联结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各解放区的枢纽。国民党军集中了 28 个旅 25 万人进攻这一地区，其中以郑州“绥靖”公署和第 11 战区所属 18 个旅位于开封至商丘之线和新乡至安阳之线，准备进攻冀鲁豫和豫北解放区；以第 1、第 2 战区所属 10 个旅(师)，位于运城、临汾、平遥地区，准备进攻晋南我军。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我军之敌增援陇海路，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 3 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共 4 万人，举行出击陇海路作战，挺进豫东，打击敌人；以一个纵队和冀南、太行军区主力监视平汉路新乡、安阳段之敌；第 4 纵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晋南打击进犯之敌。

8 月 10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避开敌军前锋、直捣其纵深的“掏心战术”，以秘密急行军通过敌人密布据点约 30 公里纵深的地区，在 150 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之敌发起攻击。至 22 日，歼敌 2 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共 1.6 万人，攻克县城 5 座，调动了围追中原我军之敌一部回援。

陇海路战役后，敌军迅速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了 14 个整编师 30 万人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分 6 路夹击位于冀鲁豫地区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官“长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的指示，除以地方武装和民兵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钳制 5 路敌军外，以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我预定战场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于 9 月 3 日至 8 日将由郑州出犯之敌整编第 3 师和第 47 师共 4 个旅 1.7 万余人歼灭于定陶地区。在歼灭敌整编第 3 师的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亲临担任攻歼大杨湖地区敌整 3 师第 20 旅主力的第 6 纵队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动员，给指战员以很大鼓舞。他们前赴后继，顽强苦战，特别是第 54 团，在人员大部伤亡的情况下，团首长亲率炊事员、饲养员、通信员、警卫员与敌拼刺刀、于榴弹，最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消灭了顽强抵抗之敌，为夺取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接着，又于

10月3日至7日举行了巨野战役，歼敌5000余人。10月中旬，敌集中8个旅进攻鲁西南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于10月29日至31日在鄆城地区歼敌1个旅9000余人。

11月初，敌郑州“绥署”除以第4、第5“绥区”部队守备东明、菏泽和滑县、浚县、封丘地区外，以整编第26、第27军分别由鄆城、郟城和安阳地区出动，准备合击大名，直趋邢台，尔后与石家庄南下之敌会师，然后夺取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于月底前打通平汉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打破敌之企图，采取远距离奔袭和首先歼击敌首脑机关的战术，于18日晚至22日，在鄆县地区歼敌第5“绥区”两个旅大部共1.2万人，调动了敌整编第26、第27军来援。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与敌在豫北周旋20余天，未获歼敌机会，乃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以一部于12月22日围攻聊城，主力由观城、朝城地区大踏步前进100余公里，于30日突然向钜野（今巨野）、金乡、鱼台地区之敌发起进攻，至1947年1月14日，相继攻克巨野、嘉祥、聊城等地，并在金乡以西地区歼灭由鱼台、定陶、菏泽来援之敌3个半旅。此役，我军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迫使进占濮阳、大名之敌抽兵回援，粉碎了敌打通平汉路的计划。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陇海路中段两侧敌兵力薄弱之机，于1月24日至2月4日举行了豫皖边战役，歼敌9000余人。

在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战场作战的同时，第4纵队等部在晋南地区积极打击进犯之敌。1946年7月上旬，敌第1战区6个旅和第2战区1个军分别由运城、介休南北对进，企图消灭晋南我军，打通同蒲铁路南段。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乘两敌相距尚远之机，于7月13日至22日在闻喜、夏县地区歼敌第1战区第31旅6000余人。接着，乘敌第2战区抽兵增援晋北战场，同蒲路灵石至洪洞段守备薄弱之际，于8月14日至9月1日发动攻势作战，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歼敌1万余人。我军发起攻势后，敌第1战区4个旅由运城地区进至临汾、翼城地区，企图配合由平遥、介休南下的敌第2战区部队夹击我第4纵队于洪洞、赵城地区。第4纵队除一部在灵石以北钳制敌第2战区部队外，集中主力3个旅隐蔽集中于洪洞东南地区，准备在临汾、浮山间捕歼敌整编第1师第1旅，该旅号称“天下第一旅”，武器装备精良，士兵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军事技术较好，并深受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中将旅长黄正诚号称“百战百胜的将军”，曾留学德国，住过希特勒的军事学校。22、23日，我军将该旅包围于官雀、陈堰两地，并于23日晚发起总攻。守敌拼死顽抗，频频发起反扑，一间房一堵墙地和我争夺。我军用炸药、手榴弹开路，与敌反复冲杀，许多同志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有为战士刺刀捅坏了，手榴弹打光了，捡起敌人的武器，继续战斗；第29团2营营长赵桂海头部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有的排只剩下一个人，仍继续往前冲。战至24日晨，终将敌4000余人全部消灭，黄正诚亦被生擒。

11月上旬，蒋介石抽调晋南地区之第1战区主力西渡黄河，准备进袭延安。为粉碎敌之企图，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会同晋绥军区第2纵队等部于11月20日至1947年1月28日，相继进行了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歼敌2万余人，推迟了敌进攻延安的行动，并解放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坚持冀鲁豫地区水东分区敌后斗争的地方武装，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了国民党许多地方政权，扩大了根据地，12月12日以水东分区和华中军区第8

分区为基础，组成了豫皖苏军区，辖第1、第2、第3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1个特务团。军区组成后，采取“敌进我进，避强击弱”的战法，继续打击敌人。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绥军区部队一部的配合下，经过半年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作战，共歼敌12.3万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该区的进攻，并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和中原我军的作战。

晋察冀、晋绥野战军进行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晋察冀军区部队转战保定南北地区。晋察冀解放区西倚五台山，东跨冀中、冀东平原，南傍正太、德石路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接东北。晋绥解放区西濒黄河，东抵同蒲路北段，南与太岳军区接壤，北越平绥路。国民党军于1946年6月底已集中了12个军38个师计33万人，准备向晋察冀、晋绥两解放区大举进攻。

晋察冀和晋绥两野战军遵照军委的指示，各以一部兵力于7月4日至8月15日继续进行晋北战役，共歼敌8000余人，攻克朔县、繁峙等县城10余座。同时，两野战军集中30多个团的兵力，于7月30日开始围攻大同，至9月4日肃清外围之敌，接着除以一部继续包围大同，主力北上集宁地区打击沿平绥路南援之敌，但由于部署失当，援敌于13日攻入集宁城，我再战不利，乃于16日放出对大同的包围。此役，共歼敌1.2万人。

9月底，敌集中第11、第12战区11个师计7万余人，从北平、归绥等地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动进攻。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晋绥野战军一部配合下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于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

战后，晋绥野战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编为第1、第2、第3纵队，归晋绥军区直接指挥。晋察冀野战军领率机关也于12月撤销，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各纵队作战。

11月初，敌第11战区以两个军的兵力向晋察冀解放区的腹地发动进攻。晋察冀军区主力于11月2日至12月26日，进行了易满战役，粉碎了敌人对易县、满城地区的3次进攻，歼敌7900余人。战役中，我坚守在范家台西北刘家沟的第3纵队第8旅第23团1营，同十倍以上的敌人恶战13个小时，指战员大都负伤仍坚持战斗，歼敌700余人，守住了阵地。战后，该营被纵队授予“钢铁第1营”的光荣称号。接着，我乘平汉路望都至正定段敌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于1947年1月20日发起保(定)南战役，至28日，歼敌8000余人，解放了望都、定县、新乐三座县城，控制铁路百余公里，使冀晋、冀中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晋察冀、晋绥我军相互配合，经过半年作战，虽主动撤出了张家口等重要城市，但分散了敌人，并歼敌6万余人，为根本扭转两区的战局创造了条件。

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7月，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乘国民党军暂时停止对东北解放区进攻的时机，从各机关和各主力兵团抽调1.2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并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活动。至8月底，歼灭北满大股土匪万余人；同时，整编部以，认真准备迎击敌人进攻。至10月，将所属部队整编成第1、第2、第5纵队。连同布满的第3、第4纵队，计有野战军5个纵队，另1个旅和3个独立师共约12万人，并建立了10个炮兵团及1个高射炮兵大队。11月，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辖各特种兵。另外，调整了军区、军分区，将全区划

分为南满、东满、西满、松江、合江等 5 个军区。至 11 月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约 36 万人。

10 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集中 7 个军 25 万人，连同地方保安团队共 40 万人，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以一部监视北满我军，主力向南满解放区发动进攻。至 10 月中旬，占我柳河、辉南、清原、兴京(今新宾)等地。随后，集中 8 个师分三路向通化、安东(今丹东)地区进攻。南满我军采取以内线歼敌为主，内外线配合的方针，抗击敌之进攻，并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诱歼号称“千里驹”的中路之敌第 52 军的第 25 师 8000 余人。

新开岭战役后，敌继续集结重兵，进攻临江地区。此时，南满解放区仅剩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四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集结在这一地区，处境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确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并派肖劲光、陈云到南满直接指挥，粉碎敌人对临江地区的进攻。12 月 18 日至翌年 4 月 3 日，南满我军采取内外线配合的部署，粉碎了敌军对临江、通化地区的四次进攻。北满我军则于 1947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8 日，克服由严寒带来的重重困难，三次向松花江南岸出击，配合南满部队保卫临江的作战。此役，共歼敌 4 万余人，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及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并为尔后反攻创造了条件。

三、粉碎敌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春的敌我形势与作战方针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共损失正规军66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71万余人。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虽然已由战争初期的193个旅增至219个旅，但由于战线延长，守备兵力增加，能使用第一线担任攻击任务的兵力反而由1946年10月的117个旅锐减至35个旅，其兵力不足与战线不断延长的矛盾更加尖锐。由于部队大批成建制的被歼灭，新兵增多，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减弱。同时，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激起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

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军事政治危机，除对爱国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外，在军事上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即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暂取守势，集中94个旅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在消灭这两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再转用兵力在华北战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进而占领全东北。

人民解放军在抗击敌军全面进攻的同时，大力加强军队建设。至1947年3月，全军发展到168万余人，由于将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部队，使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并在作战中积累了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丰富经验。这些都为粉碎敌军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1947年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针对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确定我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陕北、山东战场，我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逐批歼灭进攻之敌；在其他战场，我军举行战略性反攻，收复失地，消灭和牵制敌人，配合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进攻。

陕北我军进行延(安)南阻击战和“三战三捷” 陕甘宁解放区东临黄河中流峡谷，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 and 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首府延安，自1937年1月以来即是我党中央和我军总部领率机关所在地，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国民党依据“重点进攻”的方针，于1947年春调集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进攻这一地区，其中以第1战区胡宗南部主力整编第1、第29军等部共15个旅从南面担任主攻，以5个旅为预备队；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部3个整编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晋陕绥边区总部1个军由榆林向南配合，夺取延安，进而占领整个陕甘宁解放区，以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和边区部队，或迫我东渡黄河，尔后会同敌华北部队，消灭我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早就指出：蒋介石欲以打延安的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蒋介石在日暮途穷、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当时陕北

敌重点进攻开始时，其第一线攻击兵力为50个旅。

人民解放军虽然只有4个野战旅1.7万人(后增至6个旅2.7万人),和3个地方旅,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但陕北有有利地形和优越的群众条件。于是,中共中央确定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地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于运动中的作战方针,牵制胡宗南集团于陕北战场。同时,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第1、第2纵队和新编第4旅、教导旅(7月31日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边区地方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粉碎敌人进攻的任务。

为予进攻延安之敌以有力杀伤,同时,掩护党中央机关与群众安全地进行转移,中央军委决定,以3个团的兵力,在鄯县(今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进攻之敌,另以第1纵队及新编第4旅在富县西南地区待机。3月13日,胡宗南部主力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宜川、洛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发起全线进攻,在90余公里宽的正面上,敌军集中了15个旅14万人,各种火炮2000余门。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防御部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鼓舞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故斗空前激烈。在夺回被敌占领的松树岭制高点时,教导旅第1团2连班长李国玉第一个冲上敌阵,在班里战友的配合下,用刺刀、手榴弹歼灭了敌人,缴获机枪2挺,俘敌排长。战后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经6天激战,在歼敌5000余人,完成掩护党中央安全转移和群众疏散任务后,我军于19日撤出延安。

为坚决用战斗精神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发展西北解放区,并有利于组织指挥全国解放战争,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了中央和军委的后方委员会,在晋绥解放区的临县开展工作。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始终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于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起了重大作用。

我军撤出延安以后,利用敌军急于寻我主力进行决战的心理,采取以小部兵力伪装主力与敌保持接触,对敌进行不断袭扰的战法疲惫消耗敌人,然后集中主力寻机歼灭分散之敌。3月21日,我军以小部兵力将敌主力5个旅诱向安塞方向,以主力5个旅隐蔽于延安东北的青化泛、甘谷驿等地。25日,当敌第31旅主力进入我军在青化泛的设伏阵地时,我军立即拦头了截尾,和两侧夹击,仅经1小时战斗,即全歼该敌2900余人,并生俘其旅长,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此时,胡宗南始发现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遂纠集其主力11个旅东进,寻我决战。我军则转移蟠龙镇西北地区隐蔽休整。敌因连连扑空,疲惫不堪,给养困难,乃于4月5日将其主力南撤蟠龙、青化砭补充。此后,敌判断西北我军在蟠龙西北地区,即以8个旅向我军进攻,并令其第135旅由瓦窑堡沿公路南下青化砭策应。中央军委获悉敌军这一行动后,即令西北我军以伏击手段求歼敌第135旅于运动中。西北我军遂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敌主力引至蟠龙西北地区;而以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设伏。14日,当敌第135旅进入羊马河我军预设阵地时,我军便以4个旅的兵力向敌展开围歼,经8小时激战,全歼敌第135旅4700余人。毛

泽东总结西北我军的作战经验，于4月15日发出了《关于西北成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其中提出了著名的“蘑菇战术”。接着，我军又乘敌主力北上绥德寻歼我军主力之机，集中4个旅的兵力，于5月4日攻克了胡宗南部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蟠龙，歼敌68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作战，我军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敌1.4万余人，给了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稳住了陕北战局，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这就是被广为赞誉的西北我军“三战三捷”。

随后，我军主力挥师西进，打击侵占我陇东、三边分区之敌马鸿逵、马步芳部，自5月29日至7月7日，先后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敌军惧怕被歼，纷纷西逃，我军追歼敌2400余人，收复了大片失地。至此，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形势，开始好转。

华东野战军举行孟良崮等战役和分兵内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依据“重点进攻”的方针，抽调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人进攻山东解放区，并以其中最精锐的主力整编第11、第74师和第5军为骨干，编成第1、第2、第3三个机动兵团；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下旬，敌发起进攻，至4月上旬，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公路，并继续向我鲁中山区进犯。

在敌军发起进攻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中地区实施高度机动，曾先后五次定下求歼进犯之敌的决心，但由于敌接受了屡次失败的教训，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不轻易为我调动。因此，我除4月下旬在泰安歼敌整编第72师外，几次决心均未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华东野战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诱敌深入”的指示，率主力于5月上旬退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待机。顾祝同随即令各部“跟踪进剿”。

11日晚华东野战军首长查明了敌将于12日发起全线进攻，并以其第1兵团所属整编第74师为主攻占坦埠等地的计划，遂决心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集中5个纵队求歼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以4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分别阻击其余各路敌军。13日晚，我军在击退敌整编第74师向坦埠进攻的同时，实施分割迂回，于15日拂晓将该敌全部包围在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接着，我军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奋勇作战，敌拚死顽抗，与我进行反复争夺。我军每克一点，往往要经过数次、数十次的冲击，有的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至16日下午，战斗基本结束，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在清点战果时，发现孟良崮地区仍有敌电台活动，粟裕同时发现各部所报歼敌数与整编第74师编制数相差甚大，遂严令各部队继续进行严密搜索。各部队不顾疲劳，复又投入战斗，至下午5时，终将隐藏在孟良崮至雕窝之间山谷中的7000余名残敌全部肃清。与此同时，阻援部队阻住了敌10个整编师向孟良崮的增援，保证了围攻整编第74师的胜利。此役，共歼敌3.2万余人，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对山东解放区为进攻。蒋介石哀叹整编第74师的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并将其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

敌经40余天的整顿和准备后，6月25日，再次向鲁中解放区发起进攻。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准备于月底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这一行动和最后粉碎敌军对山东的进攻，除以4个纵队继续留在内线打击进犯之敌外，以5个纵队转入外线，分别向鲁南和鲁西挺进，歼敌有生力量。7月7日至10日，外线部队攻占了费

县、峄县、枣庄和津浦路大万德至大汶口段敌据点；接着在攻击济宁、汶上、邹县、滕县等城，迫敌抽调7个整编师回援后，于7月底8月初进入鲁西南地区。内线部队则于7月17日至29日进行了南麻、临朐战役，歼敌1.6万余人。至此，敌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态势瓦解。

与此同时，坚持在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地区的第11、第12纵队等部，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采取内外线配合，机动跳转等手段，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群众。第11、第12纵队先后在苏北、苏中的沈灶、李堡、栟茶线，淮阴至沐阳公路和南通至赣榆公路等地进行小规模的运动战，粉碎了敌军的多次“清剿”，稳定了局势。坚持在淮北、淮南地区的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恢复了洪泽湖周围的5个县、11个区政权，建立了高邮、宝应地区的小块游击根据地，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一年中，坚持华东敌后斗争的部队，牵制了敌正规军近20个旅和10万土杂武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我军的作战。

四、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我军举行战略性反攻

在陕北、山东战场我军沉重打击进犯之敌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我军乘敌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相继转入战略性反攻。

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豫北、晋南攻势 为策应陕北、山东我军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豫北、晋南之敌主力调至陕北、山东战场之际，于 1947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25 日和 4 月 4 日至 5 月 11 日分别在豫北和晋南地区发动攻势，歼敌 5.4 万余人，攻占了濮阳、封丘、延津、淇县、浚县、滑县、汤阴和浮山、曲沃、河津、闻喜、平陆、垣曲、乡宁等城，迫使豫北、晋南之敌缩踞于安阳、新乡、汲县和运城、临汾等几个孤立据点，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豫皖苏军区武装相继攻克了睢县、通许、宁陵，阜阳等城，巩固与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晋察冀我军举行正大、青沧等战役 晋察冀我军乘敌正太线守备薄弱之机，以地方武装一部于大清河北胜芳地区，对付保定、天津地区国民党军的进攻，主力毅然于 4 月 8 日发起正大战役，至 12 日，攻占正定、栾城等石家庄外围据点 90 余处。14 日沿正太路西进，至 5 月 4 日，又克井陘、娘子关、阳泉、寿阳和盂县等城镇，歼敌第 33 军大部，此役，共歼敌 3.5 万余人。随后，为钳制关东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东北战场，于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先后进行了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歼敌 2 万余人，策应了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为适应战局的发展，6 月，晋察冀军区重新建立了野战军指挥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 2 政治委员，下辖第 2、第 3、第 4 纵队及炮兵旅，共计 12 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夏季攻势 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彻底转变东北战局，东北民主联军乘敌暂取守势，等待关内授军之际，于 5 月 13 日发动夏季攻势，17 日攻克怀德，18 日在该城以南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由四平来援之敌第 71 军主力。战斗中，第 1 纵队 9 团 3 连与敌 1 个营相遇，3 排长丁学源率全排冲入敌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丁学源一连刺死 3 个敌人，八班长黄炳刺死 4 个敌人后，拉响手榴弹与围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王贵生战斗小组在刺死 8 个敌人后全部壮烈牺牲，表现了我军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战后，3 排被命名为“丁学源刺杀英雄排”，排长和七位战士荣获“刺杀英雄”的称号。至 6 月 3 日我军又相继攻克梅河口、东丰、通化、安东、庄河、双阳、海龙以及赤峰、昌黎、抚宁等城镇，沟通了东、西、南、北满的联系。6 月 11 日开始围攻战略要地四平，至 7 月 1 日攻占市区的西半部，由于援敌迫近，遂撤出战斗。在夏季攻势中，我军共歼敌 8 万余人，收复城市 42 座。

1947 年 3 月至 6 月的 4 个月作战中，我军共歼敌正规军折合 31 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 40 万人，基本挫败了敌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并在其他战场举行了战略性反攻。战局的这一变化，说明战略上的主动权已逐步转入我军之手。

五、国民党统治区游击战争与民变武装的发展

一年来，除被国民党军侵占地区的游击战争迅速展开，积极配合我军作战外，处在江南国民党统治区的苏浙皖边、闽浙赣边、粤桂边、滇桂边、海南岛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抓紧时机进行艰苦的发动与武装群众的工作，先后点燃了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有的地区进一步发展了游击战争。

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苏、浙、皖三省的人民武装，已遍及 80 个县区，有的还建立了根据地。他们主要是以新四军复员军人为骨干，为反抗国民党的迫害，面纷纷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独立纵队，自全面内战爆发至 1947 年 5 月，先后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歼敌 2800 余人，巩固与扩大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 6000 人。在新疆的伊犁、塔城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人民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民党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并夺回了被占领的阿山首府承化。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征粮、征税、征丁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一年来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并由此发展起来的民变武装亦正在兴起。到 1947 年初，川康滇黔民变武装已达 30 万人，并屡败蒋军“围剿”。仅四川民变武装即发展近 20 万人，武装组织共 100 余单位，活动地区遍及 150 余县。国民党重庆行辕及西昌警备司令部，仓皇抽调 5 个旅到川康边境“进剿”民变武装，但屡遭失败。粤桂闽、赣湘鄂等省的民变武装亦达 10 余万人，活动地区近 200 个县。台湾省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于 1947 年 2 月 28 日举行起义，提出了“改革台湾省政治建议案”32 条，并强迫蒋军缴械，但遭蒋介石武力镇压，近 4000 人惨遭杀害。蒋介石还从苏北抽调整编第 21 师至台湾实行戒严。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1947 年春夏，从东海之滨到川康山地，从长江南北到珠江琼崖，民变武装继续发展。蒋管区游击战争和民变武装的兴起和发展，正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有力一翼。

六、加强军队建设，保证作战胜利

为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紧张、激烈、频繁战争的环境中，我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贯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的方针，认真抓了军队建设，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扩大军队数量，加强野战军、特种兵建设，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战争第一年，我军采取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将经过改造的俘虏兵补入部队等方式，不断扩大部队的数量，使我军的总数不但没有因为残酷的战争而减少，反而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增加到 195 万人。在扩大数量的基础上，重点充实野战军和建设特种兵，使野战军由战争开始时的 61 万人，增加到 100 万人，各野战军相继建立了直属的炮兵纵队或特种兵纵队，或炮兵旅，炮兵团，各纵队和师、团也普遍建立了队属炮兵，有些部队还组建了工兵、坦克分队。

与此同时，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继续加强军政大学、随营学校和各类专业干部学校、训练班的建设，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各纵队、师、团则采取举办各种教导队的方法，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素质；各部队充分利用作战间隙，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方法，进行以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和近战、夜战等战术技术训练。

加强党的领导，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有些指战员胜利信心不足！部分指战员对党中央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领会、理解得不深，特别是战争初期我军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后，部队中一度出现过一些思想波动。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大批解放战士补入部队，部队中的成份和思想作风较前更加复杂。这一切，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军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在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生动活泼的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健全和恢复各种政治工作制度，取得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经验，从而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第一，恢复和健全党委制，加强党支部建设。抗日战争中，我军一度取消了部队党委，改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指导部队工作。党的“七大”时，曾决定恢复军队中的党委制。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有些部队在团以上单位恢复了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中央于 1947 年 2 月 27 日发出了《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要求全军恢复和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从此，全军在团以上各级逐步恢复了党委，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和作战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各部队还进一步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利用作战间隙，短期轮训支委、党小组长，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党支部工作方法的教育；加强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及时发展党员，充分发挥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整个连队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第二，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教育，提高全体指战员战胜国民党军的决心和信心。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用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教育全军指战员。同时，结合不断取得的胜利，进行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正确认识放弃地方与歼灭敌人，走与打之间的关系，不断坚定

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和信心，提高进行运动战、歼灭战的自觉性。例如，战争初期，华中野战军从苏中退到苏北，后又退到山东，许多同志对这种大踏步后退想不通，有人写起了打油诗：“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经过教育，思想有了提高，特别是莱芜战役后，广大指战员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运动战的好处，战士们又编起了快板书：“运动战是法宝，想打胜仗别怕跑”，“陈军长电报嗒嗒嗒，小兵脚板扑扑扑，为了歼灭敌人多跑路，人人心里乐开花。”

第三，开展诉苦教育、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运动。战争第一年，根据部队成份的变化和思想实际，我军创造了诉苦教育、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运动等一套新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诉苦教育是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首先组织出身贫苦家庭的干部战士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罪恶；进而“挖苦根”，帮助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解放战士认识受苦受难的总根源，提高阶级觉悟，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提高战斗积极性。

团结互助运动亦称王克勤运动，王克勤是在邯郸战役中被我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加入我军后，经过教育认识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于是他积极工作，英勇作战，被晋冀鲁豫第6纵队某部提升为机枪班长。他当班长后，带领全班开展以思想互助、技术互助和体力互助为基本内容的“三大互助”活动，使这个班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被晋冀鲁豫军区树立为团结互助的典型。1946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新老战士之间，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之间，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中、战斗中相互帮助、相互体贴。从此，“王克勤运动”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成为群众性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部队，促进部队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立功运动是由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2团在苏中战役中首创的。战斗中，第7连有个解放战士在战斗中缴获了4支枪，战后，他把枪背到指导员面前说：“这次战斗我缴了4支枪，你给我记下来”；指导员就把他事迹记在本子上。后来，连队发现这个方法很受战士们的欢迎，于是就向全连发出号召：“好同志到战场上去立功，有功的就记在本子上。”屈党委及时总结了记功经验，在全团进行推广。10月，又在功劳簿的基础上，开展了一“证”、一“簿”、一“状”活动。即个人有“功劳证”，叫作功劳跟人走，调到那里也光荣；连队有个“功劳簿”，部队光荣，永远光荣；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这一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为了在全军推广这一活动，《解放日报》于1946年11月11日发表了《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接着，各战略区相继作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和指示，颁发了立功条例。从此，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机关部队中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处处立功”的广泛群众运动，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

加强后勤建设，保障部队供应 战争第一年，我军根据“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的方针，加强了后勤工作。

首先，健全和充实了各级后勤组织机构。战争初期，我军各级后勤组织机构基本沿袭了抗战时期的组织形式，即设置后勤部，下辖供给、卫生、军工、兵站等机构，组织不够完善充实，不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因此，各战略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充实了各级后勤机构，基本情况

是：中央军委设立总后勤部，主要负责搜集反映情况，参予制订政策，指导全军后勤工作，并负责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后勤保障，但不负责全军的经费物资供应和各项勤务保障。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设置后勤部，西北野战军设置后勤司令部；晋冀鲁豫军区将后勤部与供给部合并为供给部，保留了卫生部，另设财政处、军实处和兵站办事处；华东军区设置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和兵站部；华东野战军设置供给部、卫生部和总兵站；东北民主联军设置后勤部，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和军械部，晋察冀军区设置了后勤部，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和摩托管理处。各纵队、师(旅)、团三级设置供给部(处)、卫生部(处)，在部、处机构内，按业务分工设立了若干上下相对应的科、股以及工兵、辎重、担架等勤务分队和野战医疗所；营设供给员、会计、医生或医助及卫生班、大车班，连设事务长、上士、卫生员等。

第二，建立和完善战勤工作制度，做好战役的后勤保障。我军军需物资的供应和战役的后勤保障，主要是靠动员解放区人民的支援来实现的。战争初期，战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军和各级地方党政组织不断完善了各级支前组织，制订了一系列的战勤制度：县、区、乡各级政府建立了战勤支前机构；在重要战役期间，还组织了由党、军、政人员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和兵站线，负责粮秣、弹药的前送和伤员的转运后送；根据军民兼顾的原则，规定了部队本身物资、弹药的携带数，战勤民工使用范围和调度权限，以减少对民力的浪费。如晋冀鲁豫军区参战民工与军队的比例，从战争开始时的四至六比一，减少到后来的一到一点五比一；同时，制定完善了战勤民工制度，实行常备民工制和临时民工制，以满足大规模战争对民工的需求。

第三，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发展军工生产，认真执行缴获归公。战争第一年，由于战争在解放区内进行，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同时战争物资的消耗愈益增加，使得解放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战略区遵照党中央关于“一切作持久打算”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节约运动，紧缩开支，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清理资财，杜绝浪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在1947年上半年，精简和妥善处理了党政军后方机关工厂人员12万余人，复员随军民工万余人，精简军马3000余匹，清理出来的款项和资财，够各机关部队支用3个月以上。晋冀鲁豫军区规定一个士兵每年的生活费标准不超过15石小米，经清理家务后上交中央的白银49斤，什银224.8斤，银元135103块，铜钱669斤，制钱39.3万斤，什铜29788斤，晋冀鲁豫货币1959万余元。同时，积极发展军工生产，经过努力，至1947年上半年，东北地区先后正式投产的军工厂达36个，能够生产步兵武器、弹药和部分炮兵武器、弹药。晋冀鲁豫也由只能生产手榴弹、迫击炮弹发展到能复装山、野炮弹，生产力也提高了4至6倍，其中月产炮弹4.6万发，步枪弹10万余发；晋察冀的军工生产也增加了3倍，可月产炮弹5000余万发，炸药10万斤。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部队的弹药、物资靠后方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各战略区重申和强调了一切缴获归公的纪律，经常对部队进行爱护战利品和一切缴获归公的教育，坚决同任意破坏、私藏和随意处理战利品的行为作斗争，制定了对战利品登记保管，呈报上级统一分配等一套制度。

第十一章 转入战略进攻，内外线配合作战

一、战争进入第二年时的形势，我军的方针、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内线作战，歼灭敌人 97.5 个旅，连非正规军共 112 万人，在粉碎敌全面进攻后，又基本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军虽经多次补充，但其总兵力已下降至 373 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 150 万人，一半左右还是曾遭到我歼灭性打击或被歼灭后再重新补充或组建的，士气急剧下降，战斗力已严重削弱。在战略态势上，国民党正规军的 92% 陷于解放区。其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而机动兵力又不敷使用，其他战场则已丧失了主动地位。其后方十分空虚，仅有 21 个旅，既要担负战略预备队，又要维持治安和“清剿”我游击武装。在政治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宣布任何和平运动为“法外之滋扰”，严禁 10 人以上的群众活动，指使军警宪特肆意屠杀、拘捕爱国人士和平民百姓，镇压人民运动；对外出卖国家主权，连续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予美国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一切行动的自由权。在经济方面，其国民生产急速下降，物价飞涨，逾千万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一年中在其统治区内竟饿死、冻死了近 400 万人，人民到了无法活下去的地步；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继续打内战，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加紧搜括人力物力财力，竟然规定一切可以用于反革命内战的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和妨碍其搜刮者“均应依法惩处”。总之，国民党在军事上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其机动兵力已无优势可言；政治上更加孤立，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经济上民生凋敝，百业皆废，面临崩溃边缘。

与国民党日见衰败的不利闲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越战越强，总兵力增加到 195 万人，能够机动的兵力已多于国民党军；山东和陕北战场已渡过最闲难的时期，其他战场则先后开始了内线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且我军连打胜仗，装备改善，士气高昂，军事素养和指挥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解放区近 7000 万人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翻身做了主人。为了保卫胜利成果，他们一方面积极生产，另一方面踊跃参军支前，从而使我军后方日益巩固；生产日益发展。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指引下，于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掀起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口号的广泛和平民主运动；在农村，反征粮、反征税、反征兵的斗争则遍布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一切，汇成了一条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和爱国华侨的极其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军事上我军越战越强；政治上人心所向，威望日长；经济上也有办法。当然，由于国民党军已侵入解放区腹地，使生产遭到破坏，人民负担加重，且我军的回旋余地也在缩小。

但是，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正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面临上述形势，国民党军统帅部仍然过高估

计了自己的力量，决心继续坚持对山东和陕北两战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上述地区再转兵其他战场，进一步破坏利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军不能持久作战。为此，将南线用于山东、晋冀鲁豫和陕北战场的157个旅，绝大部分置于两翼的山东和陕北战场上，只将10个整编师置于中央西起潼关、东至运河的千里战线上，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布局。为弥补其中间薄弱状况，1947年3月5日蒋介石竟置黄河下游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强令花园口合拢，使黄河改归故道，造成河水泛滥，认为此举“能抵40万大军”阻止我军渡河作战。北线国民党军用于我晋绥、晋察冀、东北战场的70个旅，摆在乎绥、平汉、北宁和中长铁路上，依靠大中城市互相支援，并对我军进行骚扰，以求巩固现有阵地，拖住我军，待其主力抽出后再各个击破。

中央军委根据敌人两头强、中间弱、后方空虚的战略态势，决心不待敌人进攻完全被粉碎就开始战略进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并且不和敌人在邻近解放区的地区纠缠，而于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一线以东，津浦路以西广大地区机动歼敌，开辟新战场，“彻底打乱敌之战略部署，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经过多次审慎研究，中央军委决定了中间突破、两翼配合的方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12万人（亦称刘邓大军），由鲁西北强渡黄河，向冀鲁豫边区与豫皖苏边区之敌进攻，尔后跃进大别山，于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由陈度、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共6万人组成一个集团（亦称陈谢大军），自晋南南渡黄河，首先攻占陇海铁路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宗南部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与刘邓主力共同经略中原；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直属队和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亦称陈粟大军），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先西出鲁西南，然后挺进豫皖苏，恢复和扩大豫皖苏解放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吸引并歼灭回援之敌，将战线从黄河一直推到长江以北，创建广大的中原解放区，配合陕北、山东我军作战，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华东野战军留在内线的第2、第7、第9及刚组建的第13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率领，继续在内线积极行动，牵制与歼灭山东境内之敌。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向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吸引胡宗南部北上，并相机歼灭之，北线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以及南线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亦转入进攻，恢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

9月1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于1947年7月至9月间逐步转入

了战略进攻。对此，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二、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展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了统筹新区工作，1947年5月中旬，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同时决定李先念为刘邓野战军副司令员。豫北攻势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着手外线作战的准备，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每个纵队平均补充了8000翻身农民及部分经过训练的解放战士，还补充了经费、粮、弹、装具，编组了随军民工。7月下旬，将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及原中原军区北撤部队扩编为第8、第9、第10、第11和第12纵队，以执行晋冀鲁豫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任务。

经过周密准备，刘邓率主力4个纵队于6月30日在黄河南岸我预设部队两个旅接引下，从东阿至濮县间横宽300里之正面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

蒋介石为了堵住黄河防线的缺口，慌忙由豫北、豫皖苏等地区抽调4个整编师由王敬久指挥，北上增援，企图以郟城守军吸引我主力，而王敬久集团则拊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刘邓洞悉了敌之阴谋，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从7月7日至10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郟城、定陶，收复曹县，歼敌整编第55师主力及第153旅。接着趁敌援兵正从金乡出发向北运动而摆成一条长蛇阵时，以远距离奔袭手段，一举将敌4个整编师砍成数截，14日，歼其被围于六营集的3个半旅；接着，继续围攻位于羊山集之敌整编第66师。此时，华东野战军转入敌后的5个纵队正在围攻滕县、济宁、邹县，鲁西南地区之敌完全被我夹击于运河两岸。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9日慌忙飞抵开封，决定从西安、洛阳、汉口和豫北地区抽调6个半旅由王仲廉指挥东援王敬久，另从山东抽调4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刘邓大军趁敌援兵未到之际，22日先歼金乡援敌1个旅，27日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次日全歼该敌。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6万多人，为挺进大别山创造了条件。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集中了8个整编师共18个旅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分进合击，企图压迫我军于郟城、鄆城之间而歼灭之；同时还企图炸开黄河大堤，以水淹没我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邓决心提前结束预定15天的休整，按中央提出的“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之要求，立即出动。8月7日将此决心电告中央军委，当晚即隐蔽南进，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之包围圈。中央军委接到刘邓电报后，立即复电，称赞刘邓的“决心完全正确”，并指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8月11日，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分东、中、西三路向大别山疾进。

此时，蒋介石发觉刘邓大军已越过陇海铁路，但却错误地判断是刘伯承部“北渡不成而南窜”，因而仅以少量部队堵截，集中主力尾我追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黄泛区。黄泛区是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在花园口炸黄河大堤而造成的，宽达20公里，遍地积水污泥，浅处及膝、深处至腹，既无人烟，又无道路。8月17日刘邓大军广大指战员手拉着手，对重武器和辎重车辆拉的拉，推的推，扛的扛，抬的抬，冒着烈日酷暑和敌机轮番袭击，奋勇前进，以一天时间胜利跨过黄泛区。并于18日渡过沙河。

渡过沙河后，刘邓首长向部队再次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的口号，同时全军进行了轻装，把笨重武器和车辆等就地掩埋，以加快前进速度。

8月23日，刘邓大军东路第3纵队进抵淮河；西路第1、第2纵队胜利渡过汝河；当中路中原局、野司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发现敌整编第85师等部已抢占了南岸渡口，毁掉了民船，而尾追之敌3个整编师与我相距仅20余公里，情况十分危急。下午我抢占了河对岸之大小雷岗村，架起了浮桥，但立即遭到敌人优势兵力从三面而来的反复冲击，小雷岗村数次易手。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渡口察看，并指示第6纵队领导干部组织强渡，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24日夜，在刘邓亲临的鼓舞下，指战员利用夜色掩护，取密集多路队形，以有我无敌的气势，用刺刀、手榴弹开道。6纵16旅48团1营，冒着敌人炮火，冲过开阔地，用刺刀把敌人4个营逐出小雷岗村外，吓得敌人待在村边再不敢前进一步。就这样，我一夜连克9个村镇，终于杀开一条通路，使部队继续前进。

8月26日，中路部队到达淮河边，恰逢河水猛涨，而渡船也只有十几只，且后有追兵，如不能在两日内渡过淮河，形势将十分险恶。这时，邓小平政委到后卫组织阻击敌人，刘伯承司令员到淮河岸边，严肃地指出：“越到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侦察，粗枝大叶能够害死人！”然后登上小船，亲自拿着竹竿一下一下地探查水情，终于找到了可以徒涉的场所，使部队于次日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到达大别山。接着，迅速实施展开。

9月上旬，国民党军统帅部以23个旅进入大别山，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寻歼我军或逼使我退出大别山。刘邓首长指示部队采取分散大敌，歼灭小敌，同时发动群众，解决物资供应，开辟根据地的办法，以主力继续向鄂东、皖西实施展开；以一部兵力在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和开展群众工作。10月18日，第3纵队于皖西张家店歼敌1个旅。26日，刘邓首长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主力于蕲春以东高山铺地区伏击歼敌1个整编师主力又1个旅共12000余人，取得了进入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为加速根据地的建立，从10月份开始先后抽调3个旅又3个团，改为地方武装，分散在皖西、鄂豫边地区开展地方工作，至12月，先后组成了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和军区。

经两个多月的作战，刘邓大军共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建立了33个民政权，初步建成了大别山根据地。

陈谢集团挺进豫西 根据中央指示，陈谢集团于8月20日进抵邵源、平陆等地准备渡河。这时胡宗南主力被我西北野战军吸引在米脂以北；而原在豫西的整编第10师等部尾刘邓大军南下，黄河南岸当面第一线防御的部队只有5个保安团，洛阳至潼关间也只有2个整编师零1个旅，依托铁路进行机动防御。

8月22日夜至次日晨，陈谢集团分左、右两路从大教至官阳间和茅津渡以东渡过黄河。至31日，相继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城镇多处，歼敌4800人，截断了陇海路，前锋直逼洛阳城郊。我军一举突破黄河，国民党军统帅部大为震惊，急忙从尾追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零1个旅，加上原驻洛阳的4个旅组成第5兵团，由李铁军指挥，从东面进击陈谢集团，又令胡宗甫将主力自米脂、绥德地区南撤，拱卫西安，并以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向东进击，企图阻止我军发展。

针对敌东强西弱的情况，陈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一部兵力牵制洛阳之敌，主力向兵力空虚的豫陕边挺进，从9月2日至17日，连克虢略镇、灵宝、卢氏、陕县，在运动中歼敌陕东兵团大部，直逼潼关，威胁胡宗南老巢西安。这时，慌了手脚的蒋介石又从大别山和陕北、晋南等地抽调10个半旅布防于潼关、西安地区，并命令东面第5兵团向西出击。由于西面敌人已加强，而东面敌人正处于运动之中，陈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一部兵力迷惑敌人，主力于9月26日隐蔽回师东进，寻歼敌第5兵团。10月2日，在铁问歼灭敌整编第15师师部和第64旅大部，其师长武庭麟带几名随从慌忙逃往临汝，敌第5兵团主力惧怕再遭打击，逃回洛阳。陈谢集团主力乃转入体整，并以一部在浍池、栾川、卢氏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洛阳地区集中10个旅，潼关地区集中8个旅，再次东西对进，企图打通陇海路。陈谢集团遵照军委指示，继续以一部兵力在陇海路牵制敌人，主力向敌守备空虚的陇海路南广大地区挺进，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临汝、郊县、登封诸城。11月4日，在攻克郊县时，俘虏敌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随后，陈谢集团在方城、舞阳、泌阳地区和洛阳东南地区，采取“牵牛战术”分散疲惫敌人，敌第5兵团等部被迫分别退守南由、洛阳和平汉路，我军乘机放手歼灭保安团队，并分遣一部分主力组建军区和军分区。

截止11月底，陈谢集团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和一度解放10余座县城，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8个军分区，建立了8个专署，39个县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地区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1947年8月底，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野直、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到达阳谷、寿张地区。会同8月上旬转到该地区的第10纵队，于9月2日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与在该地区之第1、第3、第4、第8纵队会合，组成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准备在鲁西南打几仗后，转入外线作战。

此时山东之敌一面拼凑16个旅准备发动“胶东攻势”，一面令在鲁西南的4个整编师分兵寻歼我军。针对敌骄狂失慎的弱点，陈粟首长以第1、第3纵队引诱鲁西南之敌北上，7日集中主力将北进之敌整编第57师包围于沙土集地区，并于9日将其9000余人全部歼灭。之后，西线兵团主力及由李先念率领的由豫北南渡黄河准备转用于大别山的晋冀鲁豫第12纵队，乘胜南下，于26日开始跨越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执行协同刘邓、陈谢两军共同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任务。

陈粟大军进入豫皖苏后，遵照中央军委在1至2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首先肃清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的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划定地境，一面放手消灭敌保安团队，一面派遣大批干部做群众工作。至10月下旬，攻克县城24座，歼敌1万余人，新成立了3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

此时，敌集中6个整编师的兵力利用平汉、陇海、津浦3条铁路组成机动兵团，尾我进行纠缠。为此，陈粟大军集中主力7个纵队分成3个集团，从11月8日开始，对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此役历时10天，共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1万余人。敌匆忙调动了15个旅应援，其原定于11月20日围攻大别山的计划，亦被迫推迟执行。

三路大军密切协同，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地区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成为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对此，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国民党军统帅部，一怕我军在大别山生根，二怕我军渡江南进或西去入川，慌忙以其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集中15个整编师又3个旅的兵力，实行所谓“总力战”，围攻大别山我军。

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敌情，指示中原三路大军必须长期配合，密切协同作战，“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并要求刘邓大军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军大规模破击平汉、陇海路，调动敌人，寻机歼敌。

刘邓大军面对敌人绝对优势兵力和自己刚刚站住脚的严峻形势，没有被敌人所压倒，决心发扬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困苦，也要拖住敌人主力于自己周围，以利陈粟、陈谢两军大量歼敌。因此，决定由邓小平率3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由刘伯承率中原局机关和第1纵队转入淮西区，以刚进入大别山的第10、第12纵队向平汉路西的桐柏和江汉地区实施再展开，创建根据地，调动敌人。从12月初开始，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部队，在衣薄、人疲、弹少的情况下，采取“以小部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战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在固始、广济、关口、蕲春等地沉重打击进剿的敌人，歼敌1.1万人，始终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转至外线的3个纵队，大力歼灭敌保安团队，创建根据地，迫敌从大别山调出了两个整编师，策应了主力在大别山的作战。

陈谢集团于11月下旬，东进与陈粟大军会合。从12月13日开始，陈粟、陈谢两军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战，至22日，共破路400余公里，歼敌2万余人。25日至27日，又在西平将敌第5兵团部及整编第3师歼灭。战后，被俘的第5兵团参谋长李英才说：“我们被你们拉着走了一个大圈子，肥牛拖成瘦牛，最后被杀掉了。”由于我军斩断了平汉线，前锋直逼信阳，迫使敌不得不先后从大别山抽出13个旅，增援平汉线，敌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遭到了惨败。

我三路大军内外线积极配合，经过1个月的艰苦斗争，共歼敌6.9万人，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区的围攻，创建了桐柏、江汉解放区，并使鄂豫陕与豫皖苏两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了挺进中原的战略企图。

三、西北、华东战场我军举行反攻作战

西北我军举行沙家店等战役 为配合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6日开始，我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守敌进行攻击。蒋介石为确保榆林安全，派10个旅分路驰援，我军在调敌北上目的达成后，于12日撤围榆林，主力转至榆林、米脂间隐蔽位置，准备待机歼灭敌人；并以一部兵力掩护后方机关东渡黄河，迷惑敌人。

胡宗南误认为我军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遂令其所部由绥德、米脂和榆林地区分两路向葭县(今佳县)急进，企图夹击我军。其中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自恃援榆有功，十分骄狂，孤军冒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遂决心在沙家店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该敌。8月18日上午，当敌整编第36师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我军即展开攻击，战至19日，敌被迫龟缩于沙家店和乌龙铺以北地区。当晚，钟松令第123旅由乌龙铺西撤沙家店与主力会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第1、第2纵队对沙家店之敌师部和第165旅发起攻击；14时，教导旅与新4旅向正在西援并进至常高山之敌123旅发起攻击，战至黄昏，歼敌整编第36师6000余人，仅钟松率少数人逃脱。是役，彻底粉碎了敌在陕北的进攻，成为陕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9月中旬，胡宗南因潼关受到陈谢集团威胁，为拱卫西安和关中，乃急令绥德以北的8个旅南撤。西北野战军乘机于14日至16日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歼敌4000余人。此后，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延安以东、以北和延长、清涧、子长、绥德等地和黄龙地区敌兵力空虚等情况，决定以两个纵队转向外线之黄龙山地区寻歼敌人，主力在内线发起延清战役。9月25日至10月21日，第2、第4纵队(以警备第1、第3旅和骑兵第6师组成)在黄龙山区连克白水、石堡、韩城、宜川等地，歼敌整编第90师一部。10月1日至11日，第1、第3纵队攻克延长、延川、清涧，全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及1个旅。上述两役，我西北野战军以较小代价歼敌1.5万余人，为尔后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于10月9日以新4旅，教导旅组成了第6纵队。

华东战场我军举行保卫胶东等作战 1947年9月初，国民党军统帅部为迅速结束山东战事，以16个旅分别由潍县、高密、胶县地区向胶东解放区发动“九月攻势”。我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以第9、第13纵队由许世友率领，在内线实施运动防御，由谭震林率第2、第7纵队又两个师在外线寻机歼敌。我内线部队从9月1日至30日，虽放弃了烟台等10余座城镇，但消灭敌人1.4万余人，主力安然跳出敌人包围圈。与此同时，外线部队在诸城地区给进犯之敌以一定打击后，于9月24日挥戈北上，在高密以西与转出外线的第9纵队会合。接着，于10月2日至8日进行了胶河战役，共歼敌1.2万余人；同时，第13纵队攻克掖县。从此，山东我军开始转入反攻。

11月，敌准备从山东战场抽兵前往中原，我东线兵团乘敌整编第9、第64师西撤之时，于6日发起追击战，至30日，又歼敌1万余人，收复高密、胶县、平度等广大地区，使胶东、滨海、鲁中三区再度连成一片。接着乘胶东腹地敌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于12月4日至13日攻克莱阳，歼敌5000余人。经过4个月的胶东保卫战，共歼敌6.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胶东的进攻，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

与此同时，我坚持在华东敌后的第11、第12纵队，本着“一面坚持阵

地，一面举行反攻”的方针，继续打击敌人。8月上、中旬，乘敌调整部署之机，举行了盐城战役，歼敌8000余人，后又主动撤离盐城，向敌侧后出击，于10月上旬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如皋等县的大部地区，切断(南)通(赣)榆公路，迫使敌人最终放弃盐城。接着于10月中下旬，在苏北地区发动攻势，至11月中旬，攻克了东新集镇及淮阴至沐阳，李堡至栟茶公路沿线的一些敌据点。为加强苏中、苏北地区工作，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2月成立了华中指挥部，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华中我军的英勇斗争，使津浦路以东直至海边的广大地区与新建立的中原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为尔后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创造了条件。

四、华北、东北战场我军发动攻势

华北我军大量歼敌 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经过内线反攻后，已将敌人分别压缩在以平律为中心，沿平绥、平汉、北宁、正大、同蒲等铁路沿线和太原、临汾等孤立地区。

9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了大情河北战役。继于中旬，为配合东北我军发起秋季攻势，决心再出保北围攻徐水，准备视机歼灭南北来援之敌。10月11日，我军在保北开始行动，敌果然从南北西面驰援徐水，我按预定计划围歼由固城南援之第94军的第5师等部，至17日战况呈胶着状态。此时，石家庄之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1个师另1个团北上，企图经保定夹击我军。鉴于罗历戎所部处于运动之中，晋察冀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定主力南移，在保南清风店地区歼灭该敌。18日我军除以一部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继续围攻徐水，并抗击北面敌援军外，主力绕过保定秘密星夜兼程南下，一昼夜急行军100余公里，于19日晨到达预定位置。而原离保定只有50余公里的罗历戎部，在我民兵和地方武装的节节阻击下，经过一夜和大半天，才走了10余公里，终于在午后被我晋察冀野战军包围于清风店地区。20日拂晓，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战至22日中午，全歼该敌，俘敌军长罗历戎，是役共歼敌1.7万余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记录。

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守敌兵力大为减弱。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军区首长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并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首长认真组织实施。我军经周密准备，于11月6日拂晓，开始攻打石家庄。石家庄为华北平原上的战略重镇，虽无城垣，但敌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环行铁路20多公里，并用装甲列车、坦克昼夜巡逻拱卫。我军各部队采用近迫作业接敌，步炮协同，实施连续爆破和连续突击的手段，突破了敌防御阵地，至12日中午，攻克石家庄，歼敌第3军之第32师等部2.4万余人。12月3日，我军又解放石家庄以南的元氏县，歼敌4000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石家庄是解放战争进行1年多来所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为尔后我军继续攻克大城市提供了经验，朱总司令曾誉此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党中央在刘邓率主力出击中原时，即决定由徐向前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会同军区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等共同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工作，率领第8纵队和军区部队，继续在内线“拔钉子”，并支援中原我军的作战。

1947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集中第8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等部开始围攻运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在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的协助下，采取坑道爆破手段，于12月28日，攻克运城，歼敌1.3万余人，使晋南除临汾外全获解放，同时积累了攻坚作战经验，培养出能打硬仗善于攻坚的新主力部队，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北我军的秋季攻势 1947年8月，蒋介石决定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并以其参谋总长陈诚代替熊式辉兼任行辕主任。同时从华东调整编第49师到东北。陈诚上任后，制订了“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方针，企图确保北宁路，维护中长路，待关内更多援军到达后，视机转守力攻。同时，撤销原5个“绥靖”区，收编杂牌部队，扩充主力军，使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增至50万人。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将原辽吉纵队改编为第7纵队，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组成了第8、第9、第10三个纵队。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9个纵队共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计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配合夫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秋季攻势。

9月14至17日，东北民主联军南线两个纵队将由绥中、锦西分两路向建昌方向进犯的敌两个师主力，歼灭于梨树沟门和杨家杖子地区。接着又于19至23日，在杨家杖子以东的旧门地区，歼灭由锦州出援之敌第49军主力1.1万余人。随后转而破击北宁线，终于调动铁岭地区之敌南下。从9月29日开始，我军北线7个纵队即乘机向沈阳以北中长路上各据点守敌发动攻击，歼敌第116师等部，打乱了敌军的防御体系。10月8日，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部署，并调华北国民党军5个师驰援沈阳。10月中旬，华北援敌到达兴城、锦州一线，并准备继续向沈阳前进。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及时指出，在东北各敌占据点之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应以9个师左右组成头等野战兵团，4至6个师组成二、三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据此，东北民主联军于10月中旬在长春、吉林间，四平附近，开原、铁岭间，辽西地区分别开始行动。第8、第9纵队于义县西北地区，诱歼来自华北的援敌两个师大部。至11月5日，秋季攻势结束。东北我军在50天的作战中，克城15座，扩大解放区3.8万平方公里，歼敌6.9万人。

五、1948年初的战争形势。我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3年春的战略形势和敌我的战略方针 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经过半年作战，至1947年12月，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54个旅，连非正规军共75万余人，完全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在北线，已将敌人压缩在以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为依托的点线上；在南线，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威胁国民党统治腹地的江淮河汉地区。我军以积极机动的作战手段，牵着敌人东奔西走，不断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已经开始攻克敌设防坚固的中等城市。至1948年2月，我军总兵力上升到249万人，其中野战军有50个纵队，156个旅(师)，约132万人，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大为提高。

国民党军统帅部在连续失败的形势下，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后备力量的组训，阻止我军向长江以南挺进，确定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并将作战重心放在中原战场。为此，制订了所谓分区防御计划，将中原、华东、西北战场分戍20个“绥靖区”，每个“绥靖区”直接掌握3至5个旅的兵力，进行分区防御，同时编组成若干整编军或兵团，往来应援，以求阻止我军继续扩大攻势，或至少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安全。在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使我军难以在运动战中创造战机，以此牵制东北我军；在华北，实行所谓“主力对主力”的新战法，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在后方，组成若干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扩建二线兵团，并加强后方的守备。此外，为实施“总体战”，从1947年12月底起，先后成立了华北、东北、徐州、华中4个“剿匪”总司令部，分别以傅作义、卫立煌、刘峙、白崇禧任总司令，统一掌管各战区内的军政大权。

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发出“戡乱总动员”的形势下，毛泽东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于1947年10月10日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以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系统、科学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就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

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对提高我军战斗力和作战指挥水平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成为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

1948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我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并根据过去两年敌我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明确提出我军如在今后仍能每年歼灭敌军一百个旅左右，则“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1日由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于24日东渡黄河，离开了工作和生活达13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于4、5月间，先后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统一领导全国解放战争。

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强调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4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对夺取与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随着我军在战场上开始全面转入战略进攻，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也在解放区深入展开。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发动群众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措施。因此，如何对待土地改革运动，就成为我军每个成员对待革命的态度与立场问题。同时，随着我军的壮大，新成份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份大量增多，部队中不良作风有所滋长；而且在胜利的情况下，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一些干部、战士身上时有发生。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认识和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增强内部和外部团结，教育日益增多的解放战士，已成为进一步提高战斗力的迫切需要。为此，毛泽东主席于1947年9月28日，亲自修改和批转了辽东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由此开始，各战略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先后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一般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学习党的土地改革和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作为“诉苦三查”的思想准备；二是进行诉苦、

追根；三是进行三查，端正每个指战员对土改的根本立场和态度，查清每个人的阶级成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整顿；四是把教育同整训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群众的热情引向练兵和杀敌立功运动。教育中，以诉苦追根为重点，改造思想为中心，不在清查组织上纠缠不休，而是通过提高阶级觉悟，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白和确立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极大地提高了为解放被剥削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战的觉悟。解放战士高家凯，原认为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都一样。通过诉苦教育，他懂得了解放军战士就是要为阶级复仇，为自己求解放的道理，作战中更加自觉主动，英勇杀敌。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被敌人包围时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毛主席在听了诉苦三查运动汇报后曾高兴他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增强了部队内部外部的团结。在部队中干部更加关心爱护战士，战士更加尊重干部，守纪律、讲团结，广大指战员更加自觉地拥政爱民；拥护和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移防时，实行“四不走”，即“庭院不扫不走，缸内水不满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不走”。从而大大加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指战员之间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坚强团结。

通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民主生活的领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新式整军后期，部队政治民主作风有了较大改善，创造出评论党员、推荐干部以及讨论部队建设的多种民主例会的经验，成立了在行政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后称革命军人委员会)，使新式整军运动成为名符其实的“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参加的民主运动”。在经济民主方面，由战士选出的代表组成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经济和伙食。经济民主使人人了解和管理家务，为革命负责，检查和解决了贪污浪费问题，增强了战士主人翁的感觉。军事民主开展最为活跃，战前召开“想办法会”、“诸葛亮会”，把作战任务交给群众，大家出主意，人人胸中有数；战中研究如何处置新的情况，克服遇到的障碍。临汾战役中就是战士通过民主讨论才找到简易方法保证坑道作业对准预定目标，而最后取得胜利的；战后开展评指挥、评战术、评纪律、评作风的活动，做到打一仗进一步，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指出：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从而概括了我军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的内容，明确了开展民主运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发展，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毛泽东对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六、中原我军发动新攻势，打破敌防御体系

敌为加强其中原防御，于1948年初将其在中原战场的部署重新划分为8个“绥靖”区和6个主力兵团，将86个旅66万人主要摆在状如“十字架”的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线上，企图分割中原我军，以便往来机动作战，以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针对敌人企图，中央军委决定将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区域，以巩固中原解放区。为此，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组成一个兵团（亦称粟裕兵团），在休整两个月后，南渡长江，开辟闽浙赣新解放区，吸引中原一部敌人回防江南，刘邓率所属主力及陈谢集团和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的第3、第8、第10纵队（即陈唐兵团），在中原机动作战，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地区取得重大胜利，胡宗南急调在洛阳、潼关间的裴昌会兵团西援，洛阳地区守敌顿陷空虚。我陈谢集团和陈唐兵团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及掩护刘邓大军休整，集中28个团兵力，乘机于3月8日发起洛阳战役。11日黄昏，未待外围之敌完全肃清，即开始向城垣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8师23团1营由于战前群策群力、准备充分，用连续爆破、轮番突击手段，以2个小时扫清15道障碍，首先突破洛阳东关。尔后，我军相继从南门、西门突破，战至14日，全歼守敌2万余人，活捉敌整编第206师师长邱行湘。战后，华东野战军首长授予首先突破东关的第1营以“洛阳英雄营”光荣称号。17日，因援敌迫近，我军乃主动撤出洛阳，转向豫西、鄂北和许昌、新郑等地活动。在敌再度分散后，我陈谢集团于4月5日再克洛阳，歼敌4600余人。从此，洛阳为我军控制，敌中原“十字架”上横的一线与西北之联系被我完全切断。

4月初，刘邓大军主力完成体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陈谢集团、陈唐兵团亦统一由刘邓指挥，在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5月2日，由陈赓率第2、第4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以及桐柏军区部队，发起宛（南阳古称）西战役，至17日战役结束，歼敌2.1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

宛西战役后，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基本巩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适应尔后作战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于5月9日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一、二、三书记，同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野战军及陈谢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军区，中原野战军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9、第11纵队。原第10、第12纵队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分别组成桐柏、江汉和豫西军区。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在审慎考虑了粟裕提出的粟兵团暂不渡江，而求得在雨季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的建议，并经与陈毅、粟裕、李先念等研究后，决定粟部留在中原，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彻底改变中原形势。

为配合粟裕兵团行动，中原野战军于5月24日发起宛东战役，至6月3日，中野主力及陈唐兵团连续扭击敌张转兵团，歼敌1万余人，有效地牵制

了敌人。接着，主力转战于平汉路南段钳制敌胡璉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率华野主力5个纵队，于5月底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敌即调集11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寻华东野战军主力进行决战。为调动敌人，粟裕即令陈唐兵团由睢县、杞县地区北上，夺取开封。6月17日，陈唐兵团发起开封战役，战至20日占领城内大部。此时，蒋介石急忙飞临开封上空督战，下令空军昼夜轰炸，但终不能挽救开封残敌被歼厄运。21日下午，我军前赴后继，突破古龙亭、华北运动场敌核心阵地，至22日晨，全歼守敌3万余人，胜利攻克开封，将敌人中原“十字架”横杠东端与津浦线之间联系拦腰截断，完全打乱了敌之防御体系。

我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为稳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的慌乱，严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和第4“绥区”部队共7个整编师由鲁西南和豫东地区分两路夺回开封与寻求我军决战，并声称“战争能否胜利，全靠中原这次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华东野战军首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决定放弃开封，以一部兵力向通许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向南，主力南下睢县、杞县地区，寻歼区寿年兵团。中原野战军以主力在乎汉路南段的西平、上蔡、商水地区阻击胡璉兵团，以一部位郑州东南阻击郑州之敌东援，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区寿年兵团。6月26日，我军撤出开封，以一部兵力引诱敌邱清泉部向通许地区前进，使敌邱、区两兵团间出现了40公里间隙。华野主力抓住有利时机，于27日晚向位于睢县、杞县地区的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战至7月2日，歼灭了敌区寿年兵团部及一个整编师。接着，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区兵团残部外，主力移师东进，求歼由商丘来援之敌黄百韬兵团，至6日在帝邱店歼其3个团。因邱清泉兵团迫近，我军遂撤出战斗。豫东战役，我军共歼敌9万多人，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华中敌人胡璉等部北援豫东后，我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一部，以远距离奔袭手段，于7月3日袭占老河口、谷城；继于6日解放南漳，16日攻克襄阳，共歼敌2万多人，活捉敌第15“绥靖区”司令官、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从攻克洛阳到豫东、襄樊战役的连续作战，中原地区我军共歼敌27万余人，给敌以重创，为尔后决战中原，全部歼灭中原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西北、华东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

西北我军转入外线作战 西北野战军经过 9 个月的作战，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敌人则陷入被动地位。胡宗南为阻止西北我军南进，于 1947 年底以延安、洛川、宜川各点为基础，实行“机动防御”。

1948 年 2 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等地完成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制定了南下作战计划，并决定以围城打援的手段发起宜川战役。24 日，西北野战军第 3、6 两纵队包围了宜川，至 27 日将敌压缩于城内。26 日，敌整编第 29 军军长刘戡率 4 个旅由洛川等地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驰援，于 27 日进至瓦子街我预先设伏阵地。29 日，我第 1 纵队攻占瓦子街，并抢占了瓦子街以南高地，完全截断了敌之退路。在战斗中，第 1 纵队第 358 旅第 714 团之营 6 连第 2 班班长刘四虎英勇顽强，一连刺死 7 个敌人，自己也受伤 11 处，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接着，第 1 纵队协同第 4 纵队和第 3、第 6 纵队主力攻击被围之敌，第 2 纵队也由晋南赶到加入战斗。至 3 月 1 日下午 17 时许，我军将敌全歼，3 日攻克宜川，又歼敌 1 个旅。是役，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顶着风雪严寒，积极主动寻机歼敌，在战斗中不怕疲劳饥饿，勇敢冲锋陷阵，全歼敌 5 个旅 2.9 万余人，击毙敌整编第 29 军中将军长刘戡和整编第 90 师中将师长严明；粉碎了胡宗南阻止我军南进的企图，充分体现了新式整军运动给我军带来的巨大成果。

4 月 16 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攻洛川不克，敌援军迫近时，分三路向西府(即泾渭两河之间)挺进，以分散和歼灭敌人，于 26 日攻克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歼敌 2000 余人。随后，西北野战军针对敌人主力回援的情况，于 28 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沿途击破敌人的多次合击，于 5 月 12 日转回老解放区关中之马栏等地。在此期间，我西北野战军一部于 4 月 21 日收复延安，25 日解放洛川。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作战，共歼敌 2.1 万人，解放或一度攻占县城 14 座。

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兵团发动攻势 华东战场我山东兵团(原东线兵团)于 1948 年 1、2 月间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3 月 11 日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经过 10 天战斗，歼敌 3.8 万余人，收复城镇 14 座，使渤海、鲁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4 月 2 日起，又发起胶济路中段战役。第 9 纵队和渤海、鲁中纵队于 4 月 8 日分割和包围了潍县、昌乐之敌。随后，经过 20 多天的围城战，依靠近迫作业和炮火、爆破、突击相结合之手段，稳扎稳打，于 23 日晚，第 9 纵队首先攻克北城。突破口撕开后，该纵 27 师 79 团在突破口上整整坚持了 20 个小时，弹药用完后，用石头、铁锹、十字镐和敌人搏斗，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向纵深发展，战后该团荣获“潍县团”光荣称号。经 3 天激战，26 日完全攻克潍县，并攻克昌乐、安邱两城。第 7、第 13 纵队歼灭来自济南和青岛的援敌一部。是役我军歼敌 4.5 万余人，使山东我主要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尔后，我山东兵团转向津浦路中段作战，从 5 月 29 日开始，先后攻占泰安、曲阜、邹县等城，并于 6 月 20 日包围了津浦路中段战略要点兖州。从 7 月 1 日起，攻击兖州，战至 13 日下午，全歼守敌，胜利结束津浦路中段战役，再歼敌 6.3 万余人。至此，山东战局根本改变，济南敖军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

1948年3月，中央军委撤销华中指挥部，以第2、第11、第12三个纵队组成苏北兵团，由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苏北兵团于3月16日发起益林战役，歼敌6000余人。5月下旬进行了盐(城)南战役，歼敌3000余人。尔后，又于6月中旬集中3个纵队主力在涟水附近歼敌1万余人。从而，基本恢复了苏北失地，并在淮南、淮北地区组建了新的江淮军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山东战场我军的作战。

八、华北、东北我军连续发动攻势

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举行察绥和临汾等战役 晋察冀野战军在新式整军后，决心遵照军委关于“实施宽大机动，迫敌分散而歼灭之”的指示，向察南绥东地区之敌发起进攻，调动北平敌人西援以歼灭之。从1948年3月20日至4月7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平绥铁路及其附近攻克丰镇、天成、广灵、蔚县等城镇10余处，迫敌往返驰援，被我军歼灭1.8万余人，并截断了平绥铁路，使华北敌军无法抽兵转用于东北战场。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攻克运城后，徐向前副司令员率部5.3万人向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临汾发动进攻。3月7日至4月11日，我军肃清外围之敌，并攻占东关。接着，经艰苦奋战，将坑道挖掘至临汾城下，5月17日黄昏，我军向临汾守敌发起总攻，两条分别装有黑色炸药6200公斤和黄色炸药3000公斤的坑道爆破成功，将临汾城墙撕开两处各近40公尺的缺口，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乘势突入城内，于当晚24时全歼守敌。是役，历时72天，共歼敌2.5万余人。第8纵队23旅战绩突出，被晋冀鲁豫军区前指授予“临汾旅”光荣称号。

华北军区成立。华北我军举行冀热察、晋中等战役 为加强华北解放区建设，5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由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第1兵团，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第8、第13、第14纵队，晋察冀军区部队编为第2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4、第6纵队和炮兵旅。8月，以北岳军区第1纵队和第2兵团第2、第6纵队组建第3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兼政治委员。

第2兵团在结束察南绥东战役稍事休整后，决定以杨得志、罗瑞卿率领7个旅在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部队配合下，向热西、冀东地区挺进，实施宽大机动，寻歼敌人，杨成武率另一部在平汉路以西活动，寻机歼敌，策应主力作战。5月13日杨得志部开始由蔚县东进，与第11纵队协同作战，至6月25日，相继攻克丰宁、平泉、丰润、昌黎、隆化等城，歼敌2.4万人，截断了北宁线。在5月25日攻克隆化城的战斗中，突破隆化中学敌据点时，第11纵队第32师第96团2营6连班长董存瑞以左手托起炸药包，贴在挡住我前进的桥形碉堡上，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同志们，冲啊！”，与敌人同归于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7月15日至20日，杨成武部举行了保(定)北战役。华北第2兵团在热西、冀东、保北三个方向上密切合作作战，歼敌3万余人，迫使傅作义集团往来应援，陷于被动地位，第1兵团为保卫晋中地区麦收和为攻取太原创造条件，集中了6万余人兵力，于6月11日发起了晋中战役。我军一部首先围攻高阳镇，诱使阎锡山“闪击兵团”13个团由平遥、介体、汾阳三路出援；主力则于18日向平遥、介休、祁县地区出击，19日，敌“闪击兵团”仓促回援。21日，我军将其亲训师、亲训炮兵团5000余人歼灭于平遥以南地区，接着在平遥、祁县间歼敌第19军军部和暂编第40师大部。迫使

阎锡山第7集团军赵承绶部由榆次南援。我军针对放军兵力集中，不易割歼的情况，于6月29日以一部破击榆次、太谷段铁路，断敌退路，迫其北撤，创造战机，主力进至太谷、祁县间待机歼敌。7月7日，我军将北撤之敌赵承绶集团2个军又1个暂编总队主力包围于太谷以北地区，激战至16日晚，全歼该敌，并于文水以北截歼另部逃敌8000余人。随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21日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胜利结束了晋中战役。是役，我军歼敌10万人，并包围了太原。

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冬季攻势 东北我军在秋季攻势后，总兵力已达73万人。针对敌人集中固守大、中城市，我军难以寻找打运动战机会的情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心发动冬季攻势，集中最大兵力打较大据点，并寻机歼灭援敌。1947年12月15日起，首先向北宁线锦州至沈阳段及其两侧敌人发起进攻。至16日先后包围了法库、新立屯。由铁岭、沈阳出援之敌发觉我军打援企图，即中途回窜，我军仅追歼其一部。20日敌急调长春、四平、开原、锦州、辽南地区的3个军至铁岭、新民、沈阳地区，以解除我军对沈阳的威胁。我军为创造战机，即以一部兵力西克彰武，佯攻法库；以一部分别向沈阳以南、以西地区出击。我军这一行动，使敌误以为我主力已分散，遂于1948年元旦，集中15个师兵力分3路，出援法库。此时，我军隐蔽在沈阳西北的主力突然出动，将援敌左路新5军包围于公主屯地区，战至1月7日，全歼新5军主力，俘敌军长陈林达，其余两路敌人惧怕被歼缩回铁岭、沈阳。我军因暂无战机可寻，乃转入休整。

蒋介石为挽救东北危局，于1月10日飞抵沈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2月5日，陈诚调返南京，卫接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并在秦皇岛成立冀热辽边区指挥所，任命范汉杰为司令官，同时将山东战场之整编第54师调到锦州地区，以加强防御兵力。东北我军为发展胜利，于1月20日结束休整，继续发动攻势，至2月27日，相继攻克辽阳、鞍山、营口、新立屯、法库、开原等地。3月2日，我军包围四平，激战至13日晨，攻克四平，全歼守敌，切断了长春、沈阳之间的联系。

冬季攻势历时90天，克城18座，歼敌8个师，争取起义1个师，共15.6万人。毛泽东主席称赞说：“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经中央军委的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原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领导人不变。东北军区下辖辽宁、辽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冀察热辽(含热河、冀东、冀热察军区)等军区，军区武装共31万人。野战军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共9个纵队另10个独立师，共42万人。

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我军歼敌152万余人，解放人口3700万，收复和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同时各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并创建了新的中原解放区，奠定了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战争第二年的实践表明，国民党军必将灭亡的结局已经是十分清楚了。

第十二章 举行战略决战，歼灭敌军主力

一、战略决战前的形势，敌我双方新的军事战略

经过两年作战，战争形势已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深刻变化。

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入严重困境。蒋介石于1948年秋称：“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都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从军事上说，两年来国民党军共损失309万人，其中被歼264万人，虽经不断补充，总兵力仍有365万人。但其中正规军仅有285个旅198万人，且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大为下降。其用于第一线的正规军249个旅174万人。已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留在后方的36个旅，多是新组建的，战斗力极弱。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头两年中，有365名他“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战败后：甘当俘虏，而不能“慷慨成仁”，有163万下级官兵被俘后不能相机“反正”，其中有约80万人反而加入解放军。从经济上说，由于浩额军费支出。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陷于空前的危机，生产凋零，民族工商业倒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情况时说：“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在加速继续，物价已成了天文数字，它们上涨得这样快，使政府来不及印出每天所需要的钞票。”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从政治上说，整个国民党营垒，由于战场上屡巡失败，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日益加剧，一些地方实力派正在酝酿反蒋倒蒋。同时，由于蒋介石出卖民族权益、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已完全陷于孤立，连美国在中国的观察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为摆脱失败的厄运，于1948年8月上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了两年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新战略”规定：采取北守南攻的作战方针，即继续固守东北、华北和西北，置作战重点于中原地区，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使之成为各战场的坚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以加强应援；恢复整编师、旅为军、师，军以3.5万人定编，师以3团建制；迅速在后方编练二线部队150万人，使全军总员额保持500万人。蒋介石幻想上述措施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与敌人的情况相反，我军在两年作战中虽然损失80余万人，但却有110万翻身农民、44万伤愈战士和大量俘虏的补充，总兵力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3:1，大大改变了战争开始时那种兵力对比上的悬殊状况。我军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普遍得到改善，两年中仅缴获各种炮就达1.4万余门，其中山炮以上的重炮有1100余门，炮兵部队由战争开始时的14个团发展到35个团。经过实战锻炼和新式整军运动，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在南方各省广大地区，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壮大到4万余人，威胁着敌人的大后方。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增至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在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广大翻身农民生产和参军支前的积极性。随着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老解放区得到了休养生息，生产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后，

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响应和赞同，并表示以共同的行动来促其实现。

为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刘少奇说：消灭敌两三个兵团的大会战这一关也没有过，现在我们是准备大的会战；并说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重兵集团来援，那是于我们有利的。这种思想要在将领中大大宣传，这就是围城打援。周恩来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

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同时规定战争第三年应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其中：华东野战军歼灭40个旅左右(7月歼灭的7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中原野战军歼灭14个旅左右(7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3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左右(8月已歼1个半旅在内)；华北第1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14个旅左右(7月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第2、第3兵团，歼灭卫立煌和傅作义两集团35个旅左右(7月华北第2兵团已歼1个旅在内)，并攻克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3点以外的一切城市。

二、全军展开秋季攻势，华东我军攻克济南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1948年秋，我军在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8月，西北野战军发起澄城战役。9月，华北第2、3两兵团发起察绥战役。东北野战军发起北宁线攻势。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发起徐济间作战，并首先攻克敌重兵集团坚守的大城市济南。

济南战役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处，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2“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人口70万。自1948年7月以后，济南即成为孤悬于山东解放区内被我军包围的孤城。

1948年秋，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在中原和华东实行“三角、四边、十二点的计划”，济南就是这一计划最北端的战略要点。蒋介石企图以10万重兵依托坚固工事，坚守济南，北与平津相支撑，东与青岛作呼应，以屏障徐州。为此，制定了以徐州3个兵团27万人的北上“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第2“绥靖”区王耀武部坚守济南，消耗疲惫我军，以第2、第7、第13兵团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解围济南。

为发展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军委、毛泽东于1948年7月14日曾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集中华野全力南下，“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8月12日，毛泽东又提出“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的作战方案。据此，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其中以2个纵队组成东集团，以3个纵队为西集团，以1个纵队为总预备队；另以9个纵队和3个旅共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分别于巨野、兖州等地区夹运河而阵，担负对徐州北上之敌的阻援、打援任务。攻济作战于1948年9月16日正式发起，至22日，攻克了敌外阵地，打退了敌多次反扑，争取了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西集团占领了商埠，东集团直逼城垣。当夜，发起攻城作战，激战至24日晚，连续突破外城和内城，全歼守敌10万，生俘王耀武，解放济南。在攻克内城的战斗中，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和第13纵队第37师第109团，首先突破城墙，为解放济南作出了贡献，被中央军委分别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由于我军仅以8昼夜迅速攻克济南，以及打援兵团严阵以待，敌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惧怕被歼，而未敢北援。

济南的攻克，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坚守大城市的信心，蒋介石惊呼“该城失陷实出乎意料之外”。济南的攻克，为我军夺取敌重兵坚守的大城市取得了许多经验，过了“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给予全军将士以极大的鼓舞。中央军委于9月25日批准了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两天以后，又向东北野战军首长提出歼灭卫立煌集团36个旅，并夺取长、沈的任务。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65个整编师（军）共100万兵力，企图保持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线、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郑州、开封、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13个重要据点。

三、辽沈战役

东北我军同国民党军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殊死较量之后，到 1948 年秋，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已经具备。

此时，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总兵力虽然还有 55 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地区，所占面积不足东北总面积的 3%。蒋介石深知东北情势危急，于 8 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确定“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敌固守东北的部署是：由“剿总”副总司令兼第 1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 2 个军 6 个师共 10 万人防守长春；由“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 4 个军 14 个师共 15 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以锦州、锦西为防守重点；“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亲率 7 个军另 1 个整编师共 24 个师(旅)计 30 万人，防守沈阳及其周围地区，并以此为防守东北的中枢。

经过东北我军两年作战，东北 97% 以上的土地和 86% 以上的人口已获得解放，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部队在围困长春的同时进行了新式整军，军政素质大力提高。奉中央军委命令，8 月中旬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为便于战场指挥，将原第 1、第 2 前方指挥所改为第 1、第 2 兵团，肖劲光、肖华分任第 1 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程于华、黄克诚分任第 2 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野战军共有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另 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1 个坦克团，共 70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33 万人，总兵力达 103 万人。装备也大有改善，拥有轻型炮 1600 余门、重炮 660 门、高射炮 116 门。东北野战军已完全有力量就地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依据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早在 1948 年 2 月东北我军冬季攻势正在进行时，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9 月 7 日又指示东北野战军首长，主力南下北宁路后，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榆唐诸点，特别是锦州一点。因为该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并明确提出“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战役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虽然在南下北宁路作战问题上有所顾虑，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反复批评启发下，最后定下了决心。9 月 10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了北宁路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路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我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 300 余公里战线上向敌人发起进攻。至 10 月 1 日，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绥中、塔山、高桥、兴城、义县，并夺取锦州外国要点葛文碑、帽儿山，锦州飞机场也为我炮火控制。在攻克义县后。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亲往城南突破口观察炮击情况，不幸于途中触雷牺牲，时年 43 岁。朱瑞 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 年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军和军团政治委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等职，曾就读于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熟谙炮兵知识。1945 年夏，他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10 月，率领炮校迁往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器材和弹药，培训炮兵干部，为发展炮兵部队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

当我军在北宁路发起攻势后，蒋介石深恐“锦州一失，则沈阳比长春亦不如。盖长春今日尚可望沈阳增援也”。因此，他匆忙飞北平，赴沈阳，与华北、东北将领几经磋商，最后确定：令锦州集团坚决固守，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会同锦西、葫芦岛部队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从沈阳地区抽调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以求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首长遵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的指示，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兵力部署：以第4、第11纵队和另两个师位塔山地区，由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共16个师及炮纵主力计25万人攻歼锦州之敌：以第1纵队位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第5、第10、第6、第12纵队共14个师位彰武、新立屯、黑山、通江口地区对付敌西进兵团；以12个独立师由第：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围困长春。

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至13日扫清外围敌据点。14日10时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我军从北、南、东3面打开了10个突破口，继向市区纵深发展进攻。在激烈的巷战中，我军表现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舍身炸碉堡的梁士英烈士就是光辉代表。梁士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总攻前他拿山两块银元交给战友，说：“我要是牺牲了，这钱给我交党费。”战斗中他曾用一根爆破筒炸死十几个敌人。当部队进一步向前发展时，紧靠铁路旁的一座大碉堡里两挺重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梁士英自告奋勇地冲上去用爆破筒炸毁了碉堡，为战友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

而他自己则永远地留在了这片热土上。

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至15日18时，全歼锦州守敌，解放锦州，俘范汉杰以下8.8万人，毙伤约两万人。我军在锦州攻坚战的同时，南、北两线阻援部队也胜利完成了任务。北线我军在彰武、新立屯地区实施运动防御，敌西进兵团徘徊于新立屯、彰武之间，未敢前进。我南线部队在塔山一带进行坚守防御。防守核心阵地塔山堡的第4纵12师34团，面对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多次顶住了号称“赵子龙师”的敌第95师和“放死队”的疯狂进攻，不少连队伤亡过半，但锐气不减，鏖战6昼夜，歼敌6000余人，屹立塔山，岿然不动。战后，该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锦州守敌被歼后，困守长春之敌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感于形势危殆，加之在我军政治争取下，乃拒绝蒋介石的突围命令，于17日率部起义。19日，敌新7军也谈判投降。21日，郑洞国率直属队放下武器。我军和平解放了长春。

战役第二阶段：围歼廖耀湘兵团 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给了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打击。10月18日，蒋介石又匆忙飞赴沈阳，部署“总退却”。他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规复锦州”，并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备西撤受阻时改由营口撤退。同时，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幸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直接指挥撤退行动。

10月18日，我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廖耀湘兵团已占领新文屯，并继续南进，即向军委提出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新立屯、黑山、沟邦子地区聚歼

廖耀湘兵团的建议，毛泽东立即批复同意，并指示：还须以一部兵力控制营口，堵塞沈阳之敌向营口的退路。

据此，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耀湘兵团，并于10月20日作了如下部署：以塔山地区的两个纵队继续阻敌东进兵团；以攻锦主力7个纵队，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新民、大虎山、黑山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以1个纵队与5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由长春地区挥师南下，拖住沈阳地区之敌；以独2师赶赴营口布防；以第5、第6纵队位于阜新东北和彰武地区；以第10纵队及第1纵队第3师、内蒙骑1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迟滞敌人，待野战军主力赶到后，配合主力围歼敌人。21日，敌廖兵团在猛烈炮火和空军掩护下，向我军黑山、大虎山阵地猛攻。我军顽强坚守，寸土不让，激战5昼夜，751名指成员献出了生命，为主力部队合围廖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0月25日，敌廖兵团因西进受阻，即改向营口逃窜，与我独2师、第8纵队在台安遭遇后，又掉头向沈阳撤退。26日，我军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大约120平方公里区域内，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廖兵团被围而无力援救，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东北野战军各部大胆穿插分割，至28日拂晓，全歼被围之敌。此役，我军共歼敌5个军12个师(旅)共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军和新6军，生擒廖耀湘，创我军边分割边围歼敌军重兵集团的范例。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战役第三阶段：攻占沈阳、营口，歼灭东北残敌 敌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沈阳交由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坚守。自29日起，东北我军乘胜东进，先后解放新民、抚顺、辽阳、鞍山、海城。11月1日，对沈阳发起攻击，守敌不战自溃，纷纷请降。2日，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歼敌13万余人。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1月9日，壮幸明率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乘船南逃。10日，我军解放锦西、葫芦岛。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东北“剿匪”总部、锦州指挥所及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共47万余人。我军伤亡6.9万人。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成为支援战争的大后方。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所说，东北的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为配合辽沈战役，华北第2、第3兵团，于9月8日至11月15日举行察绥战役，歼敌两万余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迫使华北“剿总”傅作义部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而不能大量抽兵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我军的作战。

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于10月6日至18日进行了荔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西安绥署胡宗南所部2.5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毁坦克两辆。荔北战役的胜利，“完全打破了胡宗南此后分兵援助中原或太原的可能”，同时也力进一步开展西北战局准备了好的基础。

辽沈及济南等战役胜利后，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

军总兵力已下降至 290 万人，我军总兵力增至 300 万人，这样，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估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四、淮海战役

济南战役特别是辽沈战役后，蒋介石预感到徐蚌大战迫在眉睫。因此，他匆忙布置华中、徐州地区的防御：以华中白崇禧部两个兵团、4个“绥靖”区共23万人，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调华中所属第12兵团加入徐州方面作战，以增加徐州地区防御力量；以徐州刘峙集团4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的部队置于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采取所谓“攻势防御”，确保该段交通，以拱卫南京、上海。情况不利时则放弃徐州，依托淮河组织防御。据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1月4日到徐州，调整徐州方面的具体部署：第16兵团由商邱移至蒙城地区；第2兵团在颍山、永城地区集结；第4“绥区”由商邱移驻临淮关，第13兵团由碾庄圩、炮车向灵璧、泗县转移；第7兵团由新安镇移至运河以西，控制窑湾至滩上段运河；海州第9“绥区”撤销，所属1个军改归第7兵团指挥，第3“绥区”由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段运河；第1“绥区”防守淮阴、扬州线各要点；徐州“剿总”直辖之4个军分别防守徐州、睢宁、蚌埠、五河等地，由国防部直接指挥之第12兵团由确山、驻马店开阜阳、太和集结。

蒋介石仍感兵力不足，将从葫芦岛撤出之两个军海运浦口，11月中旬到蚌埠。连同战役中新增调和新组建的，参加徐蚌会战的国民党军部队，共34个军部82个师约80万人。为加强指挥，蒋介石又重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杜聿明以“赴刑场心情”到徐州就任。

济南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批准了华东野战军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并对所提战役计划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10月11日又发出《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歼灭位于新安镇地区的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第三阶段寻歼海州、连云港和淮阴、淮安地区之敌。在兵力使用上采取“攻济打援”的部署，即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援敌一部，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保证歼灭敌第7兵团。同时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郑州，尔后相机攻占开封、或不扫”开封，直出徐蚌线，以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据此，华东野战军主力攻克州、济宁间完成休整、准备后，于11月初进抵临沂、滕县一线，中原野战军以两个纵队在平汉路以西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以4个纵队东进，10月下旬攻占郑州，解放开封，11月初进抵睢县、拓城、亳县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原、华东两军联合作战的格局。此时，正值辽沈决战结束，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则有撤退征候。根据全国战局发展和华东战场敌我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扩大原定的战役规模，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计22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及中原、华东、华北地方部队共60万人，协力作战，求歼刘峙集团主力于徐川附近。为统筹一切，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为书记。同时责成华东、华北、中原三大区以全力支援淮海前线，保证作战物资的供给。

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中原我军确定如下具体部署：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6、第9、鲁中南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第2、第12纵队、特种兵纵队

主力，以及中原野战军第 11 纵队，担任围歼新集镇地区之敌第 7 兵团和割裂该兵团与第 13 兵团联系之任务；以第 4、第 8、第 11 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围歼邱县、官湖、炮车等地之敌第 13 兵团一部，控制运河以东阵地，阻击敌第 13 兵团东援，以第 7、第 10、第 13 纵队，由山东兵团首长指挥，争取敌第 3 “绥区” 部队起义，尔后进逼徐州，切断陇海铁路，占领有利阵地，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中原野战军以第 1、第 3、第 4、第 9 纵队并指挥华东野战军第 3、两广纵队，寻歼商邱、砀山地区的敌第 4 “绥区” 部队，尔后直出徐蚌线，攻占宿县，孤立徐州；以第 2、第 6 纵队阻击、迟滞敌第 12 兵团东进。

战役第一阶段：歼灭第 7 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11 月 6 日，我军在西起商丘、北自单县与邳县、东至阿湖、南由宿迁等地，向敌徐州刘峙集团展开全线攻击。担任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任务的山东兵团挥师南进。8 日，敌第 3 “绥区” 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淬、张克侠按我党部署，率所部 3 个半师 2.3 万人起义，使敌徐北大门洞开。山东兵团迅速通过该部防区，直插陇海路。蒋介石和刘峙以为我军的目的是夺取徐州，急忙改变原定部署，令其第 2、第 13、第 16、第 7 兵团等向徐州收缩。我军担任攻歼敌第 7 兵团的各纵队向新集镇地区疾进，当发现该敌正在收缩兵力向西撤退时，立即展开猛烈追击。华野第 9 纵队“潍县团” 追至宿迁西北 40 公里之堰头镇时，一条 10 米宽的沂河挡住了去路。当以两架梯子捆接在一起代桥时，因无桥桩而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时，2 连 1 排共产党员范学福号召大家：“没有桥桩，我们当桥桩。” 于是形成了一座用 10 名勇士的身体架起的桥，这就是有名的“十人桥”，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过。至 11 日，我阻击、追击部队除歼灭第 7 兵团 1 个军外，将其主力 4 个军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南北 3 公里、东西 6 公里的地区内。我军从 12 日开始展开围歼作战，由于追击间仓促转入攻坚，攻击两日，进展不大，乃于 15 日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稳扎稳打，逐点攻击，至 22 日黄昏，全歼敌第 7 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毙命。刘峙认为：“黄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

当敌第 7 兵团被我追击、包围后，蒋介石方意识到我军的攻击目标是第 7 兵团，乃令第 2、第 13 兵团由徐州向东增援。从 13 日起，该两兵团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沿陇海路及其两侧东援，我军以 3 个纵队在正面阻击，以 4 个纵队向徐州东南逼近，威胁东援之敌的侧翼。我阻援部队顽强抗敌，寸土不让，歼敌近万人，击毁坦克数十辆，至第 7 兵团被歼，援敌仍被阻止在距碾庄 20 余公里的大许家一线。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东进各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于覆灭，实有乖军人武德”。

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会同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于 11 月 7 日在张公店歼灭由商邱东撤的第 4 “绥区” 后尾 1 个师。旋即向徐蚌线出击，歼灭向徐州收缩的敌第 16 兵团后尾一部，15 日攻占战略枢纽宿县，歼敌 1 个师，切断了徐蚌联系。位平汉路以西的中原野战军第 2、第 6 纵队尾敌第 12 兵团东进，并从侧翼超越该敌，于 15 日在涡阳、蒙城地区阻敌前进。随后，中野又增加 1 个纵队至蒙城地区，沿涡河、淝河布防。至 22 日，我将敌第 12 兵团仍阻于浍河以南的赵集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围歼敌第 7 兵团的作战。

战役第二阶段：歼灭敌第 12 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 宿县是徐州之敌南退的陆上要道，蒋介石为重占宿县，恢复徐蚌交通，于 24 日召刘峙、杜聿明至南京开会，决定以徐州第 2、第 16 兵团向南，以第 4 “绥区” 改编的第 8 兵团及新组成的第 6 兵团(由蚌埠两个军和东北葫芦岛撤来的两个军组成)

由任桥、花庄集向北，第12兵团经南坪集向东北，三路对进，重占宿县。

我军在歼敌第7兵团、攻占宿县后，随着战局发展，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员经过反复多次电商，决心先歼远道新到、孤军冒进的敌第12兵团。总前委据此调整了部署：以中野7个纵队、华野两个纵队，围歼敌第12兵团于浍河南北地区；以华野8个纵队位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地区，阻击徐州之敌南援；以华野5个纵队南下固镇地区，阻击蚌埠之敌北进并求歼其一部。

我中原野战军原准备诱敌第12兵团于浍河北岸我袋形阵地内歼灭之，但该敌先头军于24日上午渡过浍河后，发觉处境不利，即缩回浍河南岸，我军乘机全线出击，至25日晨，将敌合围于以双堆集力中心的地区内。27日，敌开始突围。我军待其先头第110师师长、我党地下党员廖运用乘机率部起义后，即封闭了合围圈。敌突围未逞，遂改为固守待援。与此同时，敌由徐州、蚌埠出击兵团亦分别被阻。这样，蒋介石三路会师宿县的计划完全破产，乃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徐州3个兵团经永城南下涡阳、蒙城，会同第12兵团南撤，山刘峙率“剿总”机关于29日飞迁蚌埠，指挥第6、第8兵团向北策应。

对徐州之敌撤逃，毛泽东早有预料，总前委亦预有处置。当11月30日杜聿明率部撤出徐州后，我军即以11个纵队采取平行追击、迂回拦截和尾追的战法，于12月4日将逃敌约30万人全部包围于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并于6日歼灭其突围的第16兵团。

这时，我中野、华野分别合围敌第12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虽给敌以严重杀伤，但一时难以全歼。而蚌埠北援之敌正逐步向双堆集接近，蒋介石又从武汉增调的两个军已到浦口。总前委研究了战场形势后，决定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吃掉敌第12兵团，同时挟住杜集团，看住蚌埠之敌。鉴于敌第12兵团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其中第18军是“五大主力”之一，力尽快歼灭该敌，总前委决定再抽调华野两个纵队参加围歼第12兵团的作战。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拒绝放下武器，并施放毒气，进行顽抗。13日，我军发起总攻，至15日全歼该敌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16日，由蚌埠北援之敌星夜撤至淮河以南。

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以邓小平政委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的决战决胜精神，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关键性胜利。

战役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 敌第12兵团被歼后，杜聿明集团已成瓮中之鳖。蒋介石虽感到“杜部待授，我责未尽”。但已力不从心。为了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拟将平津部队调往江南。毛泽东认为，淮海战役全胜已成定局，若蒋介石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势必影响我东北、华北两军正在进行的平津战役；且考虑淮海前线我军已连续作战40昼夜，亦需休整。因此指示总前委，对杜集团暂缓攻击，全军进行战场休整，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攻击准备。从12月16日起，华东野战军边围困敌人边休整，中原野战军位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为战役总预备队。

休整期间，各部恢复和整顿了战斗组织，将大批新兵和俘虏补充到连队，使华野总兵力由战役发起时的42万人增加到46万人；并开展敌前练兵，实施大量的土工作业；采取多种形式，造成声势巨大的政治攻势。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杜聿明等拒降，但他手下官兵却纷纷来降，20天中竟多达1.4万多人。前线我军在飞雪覆盖的战壕

里迎来了 1949 年元旦。

1949 年初，在平津战役已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以 10 个纵队组成 3 个突击集团，于 1 月 6 日 16 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仅经两小时战斗，即歼敌第 13 兵团万余人，攻占敌村落据点 13 处。7 日，敌第 13 兵团撤至敌第 2 兵团防区。我军乘势连续攻击，又攻占敌村落据点 23 处。9 日，在粉碎敌在飞机和施放毒气的掩护下突围后，继续分割歼敌，至 10 日 16 时全歼被围之敌，生俘杜聿明，击毙敌第 2 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河以南之敌纷纷南撤，我军乘胜追击，至 25 日，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等 14 城及江淮间广大地区，进抵长江北岸，为尔后渡江作战造成了有利形势。

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歼敌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5 个兵团部、1 个“绥区”司令部、22 个军部、56 个师，共 55.5 万人。我军伤亡 13.4 万人。至此，南线敌军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的预见。

为配合淮海战役，西北野战军于 11 月 15 日至 28 日发起冬季攻势，歼胡宗南所部 1 个军 2.5 万人，拖住了胡部主力，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中原战场。

五、平津战役

依据中央军委第三年军事计划和指示，华北我军于1948年秋发起太原、察绥战役，不但有力配合了辽沈战役，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华北战局，为平津决战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在华北丧师失地，危机日益加重。为了“从危机中找转机”，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和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企图通过偷袭石家庄和捣毁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来振作其士气。当他们的这一计划刚刚开始实施，就为我地下党所侦知。毛泽东、周恩来立即予以揭露，并做了周密部署：除令华北部队节节阻击进犯之敌外，又令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向关内进军，以配合华北部队行动。傅作义惧于被歼，迅速撤退了偷袭的部队。这样，傅作义集团更加陷入被动和不利态势。

在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随时可以入关作战。但蒋介石、傅作义既怕我东北野战军入关，直下平津，又以为东北野战军经过50多天的辽沈大战，非经三、五个月的休整补充不能入关作战；华北解放军兵力尚未集中，且力量有限。因此，最后决定在华北地区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

据此方针，傅作义在积极争取美援，扩充兵力的同时，进行部署调整。从11月中旬开始，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除归绥配置1个军3个师(旅)、大同1个师外，将主力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万人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具体部署是：以5个军共16个师防守天津及廊坊、塘沽、唐山、滦县一线；以6个军共18个师防守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琢县地区，以：个军共8个师(旅)防守张家口及柴沟堡、宣化、怀来一线，在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是颇费心机的，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17个师(旅)摆在北平以西，把蒋系部队25个师摆在北平以东，以便在形势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各奔东西。

在辽沈战役临近结束前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原计划以华北部队首先夺取太原、归绥、保定，准备战场，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现地休整1个月左右，然后入关，会同华北部队于1949年上半年歼灭傅作义集团主力，解放平津等地。但是，在我军发起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为屏障京畿门户，加强长江防线，有撤退华北傅作义集团至江南的可能。中央军委即指出：从战略利益来说，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来歼灭，对我有利。因此，毅然改变原定计划，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并采取如下具体措施和部署：令华北部队缓攻太原，停攻保定，撤围归绥，以免攻克上述诸城后，使傅作义警觉而提早从平津南撤，或分别向南向西撤退；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夜行晓宿，隐蔽入关，首先隔断平津、津塘、塘店间的联系，切断敌从海上南撤的通道；以华北第2、第3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向平张线发起攻击，切断傅作义部西逃退路，以引敌向西，为东北我军主力入关争取时间；同时通过多种渠道与傅作义保持接触，将其稳住。

我军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两个兵团部、13个纵队、1个特种兵司令部、55个师80余万人，华北军区两个兵团及军区部队共7个纵队、21个旅约13万人，总兵力达100万人。为统一战场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东北、华北部队统归东北野战军(公开称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指挥，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

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管理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

战役第一阶段：对傅作义集团“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告别了白山黑水，分3路向平洋唐塘地区挺进。29日，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地区守军发起攻击，平张线作战开始。该兵团先后攻占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张线是傅系军队通向大后方绥远的生命线，张家口是战略要冲，傅作义唯恐有失，急令其王牌部队第35军主力和另1个师星夜驰援张家口。同时，又将涿县的1个军调至南口、昌平间，以确保平张联系。

此时，我华北第2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经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间疾进，东北先遣兵团由蓟县向南口、怀来间挺进，12月5日于行进中攻克密云。傅作义误认为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有会同华北解放军夺取北平之势，遂令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同时调蒋系部队3个军由津塘地区开往北平加强防御。

6日，敌第35军由张家口东返。7日，我第3兵团再次切断张家口、宣化间联系，并追歼宣化逃敌1个师，随即包围了张家口；9日，第2兵团将东逃之敌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10日、11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康庄、怀来地区，歼灭向西策应敌第35军的第16、第104军主力。至此，我军全部达成对平张线之敌的分割包围。

此时，傅作义深恐平津间交通被切断，乃急忙收缩兵力，实行北平、津塘分区防守：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集中兵力守北平，放弃唐山、芦台、汉沽，并将第62军主力从丰台调回天津，以加强津塘防御，并确保塘沽海口。而蒋介石为要救出杜聿明集团，正在上海集中数十艘船只，随时准备北上接其平津塘诸部南下。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大部刚到达遵化、玉田、蓟县等地区集结，距平津塘尚有数天行程，敌从海上逃跑的通道尚未切断。所以，毛泽东于12月11日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即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平、津、通县之敌，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敌。同时，致电华东野战军暂停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的攻击，以免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

根据上述指示，我华北第2、第3兵团为防止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突因，构筑了多道阻击阵地，并做好攻击准备。为加强西线兵力，17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抽调第4纵队开赴张家口，归华北第3兵团指挥。从12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6个纵队和河北军区1个纵队向平津塘急进，至17日，先后占领南口、沙河、海淀、石景山、丰台、南苑机场、通州、廊坊等地，切断了平津联系，包围了北平；20日，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分别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村、杨柳青等地，割断了津塘间联系，包围了天津；另3个纵队正向津塘地区赶进。至此，我已顺利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任务。

战役第二阶段：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解放塘沽 12月22日夜，华北第2兵团向新保安之敌发起总攻，经10小时激战，全歼敌第35军两个师1.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自杀。

在第35军被歼后，敌张家口守军于23日拂晓仓皇向北突围。我华北第

3 兵团与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等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战至 24 日 16 时，全歼逃敌 5.4 万余人于张家口以北地区，收复了张家口。

塘沽地形于我不利，且打塘沽时平津之敌有可能趁机突围。因此，毛泽东采纳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不打塘沽，改打天津。并令华北第 2、第 3 兵团东进，协同东北野战军严密包围北平。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当时人口 200 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形特点是：市区狭长，地势低洼，海河自西北流贯东南，市区四周有护城河环绕，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设防，工事坚固。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共 10 个师，连同地方部队约 13 万人防守。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 纵队和第 12 纵队第 34 师、第 6 纵队第 17 师，约 34 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 538 门，坦克 30 辆，装甲车 16 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夺取天津，1949 年 1 月 14 日 10 时，在天津守军拒绝放下武器、和平解决的情况下，我军发起总攻，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 29 小时激战，解放天津，全歼守敌，生俘陈长捷。

天津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参战兵种最多的一次战役，积累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

1 月 17 日，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 5 万余人乘军舰逃走，我军追歼其后尾一部，解放塘沽。

战役第三阶段：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和他的北平守军 25 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我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已做好一切攻城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的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谈不成便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据此，我党通过北平地下党采取多种形式，直接做傅作义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敦促傅作义认清形势下决心，坚定地走和平谈判道路。同时，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从 1948 年 12 月中旬起，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了 3 次正式谈判，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供其选择。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一切国民党地方集团，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在我军一举攻克天津后，傅作义将军感于形势和我党政策，以及北平各界人民群众的和平压力，乃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 日，同我军正式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22 日起，国民党北平守军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31 日 12 时 30 分，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10 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北平城头上飘起人民解放军军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决定，第 4 纵队党委曾专门就进城后的政策纪律作出决议，全军开展了为期 1 周的政策纪律教育。第 12 师创造了“评入城资格”的办法，就是订出条件，从师首长到战士，一个一个地评，不够条件者不得入城执行任务。由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纪律教育，严格执行城市政策，第 4 纵队在警备北平过程中，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盛誉。

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部及 1 个警备司令部、3 个兵团部、13 个军部、50 个整师共 52 万余人。我军伤亡 3.9 万人。基本解放了华北地区，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

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在北平和平协议公布的当天，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向傅作义表示，愿意追随他走和平道路。2月2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董其武，指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所谓绥远方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愿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功，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样，在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对于尔后迅速解放全中国，及早结束战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六、加强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保证决战胜利

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后勤工作的宝贵经验，在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集中的体现，并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从而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以鼓舞斗志。首先，是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各部队广泛宣传全国的胜利形势，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论述，使广大指战员牢固树立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克服在少数人身上滋长起来的享乐观念、乡土观念和革命到顶的观念，提出“愿微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和“为新中国而战”等响亮口号，其次，进行作战方针的宣传教育，讲清每个战役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上级的战略战役意图变成部队的自觉行动。为此，战役前各野战军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或高干会议，反复领会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研究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方案和部署，并使全军指战员明确自己的作战任务；第三，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把毛泽东提出的“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深入贯彻到全军每一个指战员的心中。各级党委或前委分别召开会议，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作出专门决议，从而大大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对保证决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第四，进行全局观念教育，强调大兵团、多兵种作成必须统一指挥，统一号令，加强团结，主动支援，反对任何形式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淮海、平津战役均是两大野战军统一于一个战场作战，除在组织上成立党的总前委以统一战场指挥外，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加强协同作战和团结友军的教育，充分发挥了整体作战的威力。

思想工作不仅在战前，而且贯穿于战役全过程，各级政治机关和广大政工干部，精干，灵活，节奏快，效率高，深入到第一线，及时了解并帮助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形式多样的战场政治工作，如评功奖模、火线入党、战地诉苦等，加强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为了保证不间断的指挥和补充兵员，特别注重搞好火线整编工作，大胆提拔使用干部，大量补充俘虏兵，即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始终保持战斗组织的齐装满员。此外，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积极改善战场生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高昂的士气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从而成为夺取决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政治工作三原则之一的瓦解敌军工作，在三大战役中得到了更为成功的运用，取得了重大成效。从火线劝降到“北平方式”，从争取零散国民党官兵投诚，到争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成建制地改编国民党军部队，创造了许多丰富的对敌进行政治争取的经验。除在战场上实行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并举外，党中央、中央军委还特别注重抓隐蔽战线的斗争。一是安排隐藏在敌人内部多年的中共秘密党员组织举行战场起义，以加速敌军的混乱和动摇，促进战役的胜利发展；二是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政治争取和策反工作。

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做好部队的物资保障。三大战役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物资消耗巨大，能否保障前线的物资需要，直接关系到决战的胜负。因此，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后勤保障工作，创造

了以落后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支援大兵团决战的范例。

三大战役的后勤保障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军队的后勤部门。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了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统筹全军的后勤工作，各大军区和野战军也成立了统一的后勤机构；各级后勤部门积极筹措和储备作战物资，并组织有限的现代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等向前线输送；在已解放地区特别是城市做好军事设施和军事物资的接管工作，及时组织城市的人力、物力和运输力支援前线；实行就地取给，加强缴获物资的收集与分配。二是组织人民群众支前。所在战区的人民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下，不惜倾家荡产，全力支前。三大战役中，共动员支前民工 886 万人，出动担架 36 万余副，大小车 100 余万辆，牲畜 200 余万头，共运送粮食 8.5 亿斤。在千里运输线上，奔流着一支亘古罕见的支前大军，他们用肩挑、背扛、车推、船载，毛驴驮，担架抬，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翻山越岭，破冰渡河，谱写着一曲曲人民战争的动人凯歌。至今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还陈列着特等支前功臣唐和恩支前用的一根竹杆，他从胶东出发，每到一地，就在竹杆上刻下地名，最后，这根竹杆上留下了他经过的山东、江苏、安徽 3 省 88 个主要城镇的地名，它是数百万支前民工随军转战的生动记录。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月，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这期间，我军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战略决战。经过三大战役，连同济南等战役的胜利，我军共歼敌 175 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

第十三章 实施战略追击，解放全国大陆

一、战略决战后的形势和我军的任务

经过战略决战，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已濒临绝境，中国人民加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1946年6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共损失495万人，其精锐师团已丧失殆尽，残存的正规军虽仍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人，加上其他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除华中、西安两集团的少数部队尚未受到严重打击外，其余多是新组建或重建的，战斗力极弱，有的已成乌合之众。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358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88个师(旅)共218万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1.7，我军在数量上已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全军士气高昂，装备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在战略态势上，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防线已经崩溃，其残存的200万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战线上，在战略上已无法组成有效的防御。而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解放区总面积已达26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两亿，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在南方各省，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已发展到5万多人，除早就活动在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外，又新组成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滇黔边、闽浙赣边等游击纵队，成为一支配合我军主力作战的重要力量。

在军事崩溃的同时，蒋介石的一切“经济改革”都已宣告失败，市场一片混乱，物价狂涨，整个经济陷于崩溃之中。在政治上更是四分五裂。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被迫“引退”，但李宗仁代总统仍受制于蒋，孙科则自行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已众叛亲离。而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城市的解放，更增加了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我党领导的民主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前来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整个形势的特点是，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了。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争取喘息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而再次提出“和平谈判”。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中，公然提出要保存其宪法、法统和军队，也就是丝毫不能变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秩序。并且继续进行战争部署：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计划把国民党军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成立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控制长江防线并确保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安全；蒋介石还任命他的亲信重点控制西南、华南和台湾，以图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待机卷土重来。

为避免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出现“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中国共产党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即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时表示愿意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八项条件”。中共中央还

在 1949 年 1 月上旬和 3 月上旬分别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必须灵活运用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在进军过程中，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必须加强我军的工作队作用，除作战外，还应担负经营和建设新区的任务。同时，还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以整编后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举行渡江战役，占领宁沪杭等地。尔后，以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解放并经营川、黔、康、滇 4 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 5 省，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 5 省；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 6 省。

为适应形势需要，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平津战役之后进行了休整和整编。根据中央军委 1948 年 11 月 1 日和 1949 年 1 月 15 日商次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训令，我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 1 兵团(辖第 1、第 2、第 7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 2 兵团(辖第 3、第 4、第 6 军)，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该野战军共 15.5 万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 3 兵团(辖第 10、第 11、第 12 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 4 兵团(辖第 13、第 14、第 15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 5 兵团(辖第 16、第 17、第 18 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该野战军共 28 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下辖第 7 兵团(辖第 21、第 22、第 23、第 35 军)，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 8 兵团(辖第 24、第 25、第 26、第 34 军)，司令员陈士集，政治委员袁仲贤；第 9 兵团(辖第 20、第 27、第 30、第 33 军)，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 10 兵团(辖第 28、第 29、第 31 军)，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该野战军共 58.1 万余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一参谋长肖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第 12 兵团(辖第 40、第 45、第 46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第 13 兵团(辖第 38、第 47、第 49 军)，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肖华，第 14 兵团(辖第 39、第 41、第 42 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晔；第 15 兵团(辖第 43、第 44、第 48 军)，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该野战军共 90 万人。华北军区原辖之第 1、第 2、第 3 兵团依次改称，第 18 兵团(辖第 60、第 61、第 62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5 月改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 19 兵团(辖第 63、第 64、第 65 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5 月改由李志民任政治委员)，第 20 兵团(辖第 66、第 67、第 68 军)，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3 个兵团共 23.8 万余人，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建立了特种兵司令部，统一领导所辖的炮兵、工兵和装甲部队。华东军区还成立了华东海军，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 月，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归中央军委铁道部直接领导，由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司令员。

通过这次整编，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统一了

全军编制，充实了各级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连同各军区部队和南方各游击部队，全军总兵力已达 400 万人。

休整期间，各野战军结合整编、整训，认真学习“新年献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开展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教育。此外，还进行了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和协同作战的教育。团以上党委还进一步开展了整顿纪律和反对无组织、无政府等不良倾向的斗争，为向全国进军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二、横渡长江，解放京、沪、杭

敌江防部署与我军渡江作战纲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和实行所谓“京沪决战”，加紧组织长江防线。其部署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 24 个军共 75 个师约 4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间 800 公里地段上，其中以 18 个军担任一线守备，以 6 个军位浙赣路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华中“剿总”白崇禧所部 15 个军 40 个师约 25 万人，布防于宜昌至湖口间 1000 公里地段上。此外海军第 2 舰队和江防舰队共 130 余艘舰艇游戈于长江中下游，飞机 300 架位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支援其陆军作战，企图依托长江天险，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阻上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达 2 至 10 余公里。为保证渡江作战的胜利，我军作了充分的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 7 个兵团 24 个军约 100 万人，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继续担任统一指挥，实施渡江战役，求歼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另以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约 12 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南下武汉以北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渡江作战。

根据军委赋予的任务，总前委于 1949 年 3 月 31 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心组成东、中、西 3 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首先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尔后迅速割裂合围并各个歼灭京沪杭地区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 8、第 10 兵团 8 个军 35 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尔后迅速向宁沪铁路和宁杭公路挺进，坚决阻击南京、镇江敌人东逃或上海敌人西援，尔后会同中突击集团歼灭芜湖、南京、镇江地区之敌；以第三野战军第 7、第 9 兵团 7 个军 30 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机阳镇至裕溪口段渡江，尔后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合围歼灭南京、镇江地区之敌，并夺取杭州；以第二野战军第 3、第 4、第 5 兵团 9 个军及地方部队共 35 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枫阳镇至望江段渡江，尔后以一部东进准备参加攻取南京，主力迅速向浙赣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纲要》强调指出：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根据上述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 3 月初至 4 月初先后抵达长江北岸，进行渡江作战的直接准备：开展以强渡江河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搜集船只，训练水手，侦察敌情，搜集情报等等。为使战役旗开得胜，各部都非常重视对当面敌情的详细侦察。第三野战军第 27 军某部侦察班长齐进虎，奉命带领 4 名侦察员到芜湖、荻港间江中心的黑沙洲侦察敌情，上岸后他们分成两路，结果一路被敌人发觉，两名侦察员被迫划着小船撤离。齐进虎带着另两名侦察员潜入洲心，一面躲避敌军的严密搜查，一面详细侦察敌情和地形。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船只，无法将侦察到的情报送回部队。一天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木盆，就乘深夜到河湾中练习划盆，几经苦练，掌握了划盆要领，他们终于划着木盆闯过了波涛汹涌的长江，胜利回到了部队。部队首长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准确地摧毁了敌军的全部火力点，为该部顺利渡江扫清了障碍。为此，齐进虎被授予“侦察英雄”

称号。

突破江防，解放南京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和争取和平渡江，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作出了若干让步后，4月15日双方代表团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午时签字。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公然拒绝签字。于是，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20时，中突击集团奉命首先渡江。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也发起渡江作战。这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长江地段，展开空前的渡江壮举。我军虽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但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以陆、海、空军联合组成的长江防线，广大指战员奋勇争先，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工兵英雄邢全礼是某部操舟机驾驶员，20日晚他奉命把一个营指挥所和一个突击连送过长江，他巧妙操作，躲过了敌军密集炮火的射击，但由于船行甚速，操舟机的排档插销被震断。因无备用零件，船抛锚江中，情况十分危急。邢全礼急中生智，连忙用自己掏烟管用的铁丝代用，为防止再次被震掉，他一只手操机，一只手使劲顶住象烙铁般烫手的铁丝，硬是咬紧牙关把突击部队送上南岸。随后，他又忍痛坚持了两天两夜，把一批又一批部队送过长江，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22日，中集团攻占铜陵、南陵等地，东集团主力进抵百丈镇、南闸、香山一线，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西集团占领彭泽、东流等地，一部进入安庆。我军已完全突破敌长江防线。

当日下午，沿江守敌向沪、杭及浙赣线溃退，我军迅速突破和展开。至23日，西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中集团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向东疾进，东集团占领常州、无锡，切断了宁沪铁路，一部兵力解放镇江、南京。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我党的争取下，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向我投降。南京的解放，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毛泽东赋诗予以讴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围歼逃敌，前出浙赣线 为粉碎国民党在沪、杭地区组织新防御的企图，我东、中集团按计划迅速东西对进，于27日在吴兴会师，完成了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之敌5个军的合围，经两天战斗，全歼该敌于郎溪、广德地区。5月3日，中集团一部解放杭州。与此同时，西集团除以一个军担任安庆、芜湖警备外，主力迅速前出浙赣线，至5月6日，控制了浙赣线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公里，完全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攻占上海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以25个师20余万人猬集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继续抵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撤退，同时准备大肆破坏，以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为粉碎敌之阴谋，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位浙赣路休整，作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以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尽可能完整

地接管上海，以利解放后之和平建设，中央军委要求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再发起上海战役。

根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华东局决定抽调 5000 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并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领导护厂、护校，与敌之破坏进行斗争。第三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 9、第 10 兵团共 8 个军及特纵炮兵部队攻取上海，首先从两翼迂回钳击上海对外交通咽喉吴淞口和高桥，切断守敌退路：尔后待华东局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后，再总攻市区。并规定，为减少破坏，在市区作战尽量不使用重武器。同时指示各攻城部队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制定入城守则。

5 月 12 日，我军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迅即占领松江、南汇、川沙、太仓、嘉定、南翔等地。将敌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时，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我攻城部队在得到两个军的兵力和特纵全部火炮的加强后，于 23 日，向市区发起总攻。至 26 日，第 9 兵团攻占上海市区，第 10 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我争取下，率残部投诚。27 日，上海战役结束，除汤恩伯率 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 15.3 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 1370 门，坦克、装甲车 119 辆，汽车 1161 辆，舰艇 11 艘及大批军需物资。上海战役期间，我军模范执行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交口称赞。6 月 2 日，我军一部解放崇明岛。

在此期间，第 7 兵团主力先后解放浙东、浙南广大地区，第 8 兵团主力清剿苏浙皖边境溃散逃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 5 月 22 日解放南昌，另一部解放闽北广大地区。

解放武汉 为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奉命钳制白崇禧集团，连克黄梅、浠水、汉川、孝感、黄陂等地，直逼武汉。白崇禧惧于被歼，于 5 月初收缩武汉外围防务，准备向湘鄂赣边和湘鄂西地区撤退。先遣兵团奉命于 5 月 14 日在团风至武穴段横渡长江。15 日，争取敌第 19 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部两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 日，解放武汉三镇。至 22 日，先后攻占咸宁、通山、鄂城、大冶、阳新等地。

渡江战役历时 42 天，计歼敌 11 个军部。46 个师共 43 万余人，我军伤亡 6 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部分地区，为尔后向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攻克太原，和平解放绥远

攻克太原 在南线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北线我军对太原发起总攻。太原是山西省会，是阎锡山集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它依山傍水，地形复杂，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守敌有6个军共17个师(总队)，连同非正规军约10万人，各类火炮近600门。

早在1948年秋晋中战役之后，我华北第1兵团、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17个旅10万人，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即遵照军委关于夺取太原的指示，准备于10月中旬发起太原战役。阎锡山以攻为守，于10月2日出动7个师的兵力，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南犯，企图确保其城南机场并破坏我之战役准备。我第1兵团首长抓住敌处于运动中的有利时机，于10月5日提前发起太原战役，至16日，共歼出犯之敌1.2万人。随即，我各纵队分别向太原外围东山及城东牛驼寨、小窰头、淖马、山头4个要点发起攻击，经反复争夺，至11月12日，攻占了东山主峰罕山及上述4个要点，歼敌2.2万余人，控制了城东有利阵地，造成了攻城的有利态势。

当时，为配合即将开始的平津战役，稳住傅作义集团不使其逃跑，我第1兵团等部遵照中央军委缓攻太原的指示，从12月初开始，转入围城整训，对太原守敌采取围困、瓦解、逐步削弱的方针。至1949年3月底，共争取守军1.2万人投降。

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战场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太原守敌已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那位预备了毒药和棺材、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即借口商讨“和谈”大事，带着20多箱金条，以及医生、厨子、理发匠和洋狗，于2月中旬逃到南京去了。为扫除华北敌人最后一个老巢，中央军委决定，以华北第19、第20兵团(原第2、第3兵团)附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会同第18兵团(原第1兵团)总攻太原。3月底，该两兵团等部到达太原前线。这样，我军在太原前线的总兵力达32万余人，各种火炮增加到1100余门。为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3月17日决定，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的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和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太原前线司令部。

3月31日，太原前线司令部确定了先打外围，后取城垣的方针，并作了部署：以第20兵团附第7军(原西北7纵)一部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以第19兵团附晋中军区部队歼灭汾河西岸之敌，尔后由大南门攻城；以第18兵团附第7军主力歼灭东郊之敌，尔后由大东门攻城。4月20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我军分10路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22日，全部肃清城外之敌12个师，直逼太原城下。当日，我太原前线司令部向守敌发出劝降通牒，但遭拒绝。24日拂晓，我军向城垣发起总攻，经4小时战斗，全歼守敌，活捉敌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王靖国和日本顾问今村、岩田等，击毙敌特务头子梁化之。

太原战役历时半年，全歼敌太原“绥署”及1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兵团部、6个军部、20个师，共13.5万人。我军伤亡1.5万人。

孤守大同的国民党军1万余人，在我军的争取下，于4月29日接受和平改编。

和平解放绥远 太原、大同解放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用绥远方式解决

绥远问题的指示，经过华北人民政府与傅作义将军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双方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守、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人员等项内容的《绥远和平协议》草案。6月8日，双方签字生效。8月末，傅作义受我党中央委托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9月19日在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后，董其武率所部6.5万余人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随后，起义部队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另1个骑兵师)，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攻克太原战役的胜利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为我军转兵迅速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条件。

四、进军西北，解放陕、甘、宁、青、新诸省

太原战役后，中央军委于1949年4月25日决定，第18、第19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这时，西北敌军尚有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13个军约17万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等部8个军14万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整编师约7万人，以及榆林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1个军约1万人，共计约40万人。

解放西安，击退胡、马联合反扑 南京、太原解放后，胡宗南部慑于被歼，开始从铜川、蒲城、耀县地区向汉中实施战略退却。我第一野战军乘机于5月16日发起陕中战役，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地，20日解放西安，至5月底，解放了艘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胡宗南部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接着，我第一野战军于6月10日至16日击退了胡宗南集团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联合向西安的反扑。两次作战，共歼敌4万余人。

与此同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22军军部及所属1个师共4000余人，经过与我党有长期联系的邓宝珊将军的积极工作，该军于6月1日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起义部队不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师。

扶眉战役 6月下旬至7月初，第18、第19兵团先后由晋入陕，使第一野战军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西北我军总兵力增加到41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上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状况，为解放大西北增加了有利条件。

胡、马联合反扑被我粉碎后，胡宗南集团退守扶风、眉县、武功和西安以南至宝鸡一线秦岭北麓地区；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分别退守常宁、邠县、长武、永寿、崔木一线，企图联合抗击我军的进攻，阻止我军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各自后撤，保存实力。

针对上述敌情和我军仅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即以第19兵团进至礼泉、乾县，钳制“二马”，保障主力右翼安全，以第18兵团之第61军警备西安，并以一部向子午镇方向挺进，保障主力左翼安全，集中第1、第2兵团和第18兵团主力歼位于扶风、眉县地区之胡宗南部第18兵团等部。7月10日，我军开始行动，11日夜，将敌4个军合围于扶风、眉县、武功地区，12日下午粉碎了敌突围企图后，向敌展开全线猛攻，至20时，全歼该敌。随后，我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等地。青(海)、宁(夏)“二马”在我第19兵团的监视下未敢救援。此役，我军共歼敌4万余人。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集团退集凤县、佛坪、东江口及陇南地区，防我南取汉中。青、宁“二马”后撤平凉地区。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青、宁“二马”和“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的指示，采取钳胡打马方针，以第18兵团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第1、第2、第19兵团于7月21日至24日，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一线出动，求歼位于平凉地区之青、宁“二马”主力。守敌不战而逃，我军乘势向陇东发起追击，至8月11日，相继进至静宁、通渭、甘谷一线，直逼兰州。青、宁“二马”分别退守兰州、宁夏。

兰州战役 兰州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三面

环山，北临黄河，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当局为确保青海、宁夏、甘肃，并钳制我第一野战军主力不能经秦岭南下四川，制订了“兰州决战计划”，以马步芳主力扼守兰州，吸引我军主力，以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徽县、成县地区的胡宗南部4个军分别拊我侧背，企图三路夹击，挫败我军于兰州城下。

我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钳胡打马，先青马后宁马的方针，以第18兵团主力及第7军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以第19兵团之第64军钳制马鸿逵部，以第1兵团主力附第62军西进攻取西宁，集中第2、第19兵团攻取兰州。8月21日，我军发起攻击，歼敌一部。25日，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向兰州发起总攻，守敌依托坚固城防和有利地形拼死顽抗，战况空前激烈，阵地多次得而复失。攻击沈家岭敌阵地的第4军第31团，在团长王学礼的带领下，勇猛冲杀，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战。第4连19岁的司号员孙明忠，在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的情况下，指挥连队仅剩的10余人，打退了放军的多次反击，守住了攻克的阵地。该团经13小时激战，团长牺牲，全团仅剩100余人，最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攻下了沈家岭。第19兵团也攻占了马家山、古城岭等要点，激战至26日，攻克了西北重镇兰州，歼敌2.7万余人。

解放宁夏 兰州解放后，第1、第2、第19兵团主力分别向西宁、河西走廊和宁夏挺进，追歼残敌。9月5日，第1兵团进驻西宁；9月23日，第19兵团进驻银川，宁夏全部解放，马鸿逵部除1个军起义外，其余3万余人全部被歼。9月底，第2兵团和第1兵团一部解放河西走廊，进至酒泉、玉门等地，争取起义、投诚和歼灭敌军共4万余人。

新疆和平解放 在我军的争取和伟大胜利的影响下，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3个整编师7万余人和省政府人员，于9月25、26日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2月下旬，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长期战斗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地区的由我党领导的新疆民族军改为人民解放军第5军。

为接管新疆，巩固国防，我军第1兵团部率第2军、第6军(欠第18师)于10月中旬开始进驻新疆，指战员们战胜戈壁沙漠气候严寒、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经过长途艰苦跋涉，至1950年3月，完成了进驻新疆的光荣任务。

第一野战军经10个月的行军作战，解放了西北5省，歼灭和改编敌军30余万人。

五、进军中南，解放鄂、湘、赣、粤、桂等省

盘踞中南地区之敌，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署”（8月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集团共40万人。其中白崇禧集团21个军共52个师近30万人位于湘、鄂、赣、桂等省，余汉谋集团7个军共21个师约11万人位于广东和海南岛地区。

为了更好地完成解放中南各省的任务，1949年4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主力70万人自平、津地区南下，5月6日解放新乡、安阳，歼灭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守军共3万余人。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成立华中局，以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2月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任野战军和军区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任野战军和军区政治部主任。

和平解放长沙 6月上旬，第四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7月上旬，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至7月底，解放宜昌、沙市、慈利、桃源、常德和湘赣边广大地区，逼近长沙，歼敌近2万人。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我党的争取下，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10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辖第52、第53军。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集团退守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与川湘鄂边绥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第四野战军主力转入休整，一部进行了赣西南战役，解放了江西全省。

在休整期间，中央军委根据白崇禧的作战特点和部署，及时指示第四野战军：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对其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并具体指出：应以第13兵团2个军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沿湘桂边直下柳州，切断白崇禧部西退滇、黔的道路，以第4、第15兵团共5个军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歼灭余汉谋集团，占领广州。尔后第4兵团由广州西进桂南，切断白崇禧集团退往海南岛和逃往国外的通路，和第13兵团形成对白崇禧部的大钳形包围；以第12兵团3个军组成中路军，经湘潭、湘乡首先攻击宝庆地区之敌，尔后尾白崇禧部进入广西，会同第13、第4兵团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第四野战军前委根据上述指示，具体确定了三路大军的作战计划，另以1个军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大庸以南地区，监视宋希濂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翼侧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入川前的集结。

衡宝战役 9月13日，西路军第13兵团由常德、桃源南下，至10月5日，到达芷江、黔阳、会同一线，切断了白崇禧部西逃贵州的道路；

10月2日，中路军向衡阳地区之敌发起攻击；东路军也进至粤北地区。白崇禧发觉我全线展开攻击后，于10月6日下令全线后撤。我军发起追击，先期楔入敌人纵深的第45军第135师击退了优势敌军的多次进攻，扭住了敌

人，保证了第12兵团主力于9日将敌精锐主力4个师合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接着，我军向敌发起总攻，敌人猛烈反扑，我军英勇奋战，第135师第405团1营2连被敌分割在18处，连排干部相继牺牲或负伤，12名班长仅剩1人，仍继续顽强战斗，2排战士杨贵峰主动代理排长，带领战士连续夺占7个阵地，俘敌5名军官，20名士兵。第404团1连经反复冲杀，白刃格斗，攻占了2公里长的7个山头。激战至11日，我军歼敌2万余人。战后，第405团2连记大功一次。

广东战役 与此同时，东路军两个兵团于10月1日发起广东战役，守敌不战而逃，我军勇猛追击，13日国民党政府飞逃重庆，14日我军解放广州市。接着，第4兵团继续追歼逃敌，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高速前进，沿途被追上的敌军纷纷投降；23日，我第15军第43师第127团3营副营长刘子林，率2名干部和12名战士，在台山县那扶镇附近追上敌保安第4师后，巧妙地摸进敌师长的住房，没费一枪一弹，迫使他命令全师2700余人投诚。24日，我军将敌4个军共4万余人包围于阳江、阳春之间地区，各部队奋勇作战，至26日，全歼被围之敌。

广西战役 衡主战役后，敌白崇禧集团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退入广西，连同逃往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作最后挣扎。并准备在必要时由海上逃跑或由陆上逃往国外。

第四野战军为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于11月6日发起广西战役。西路第13兵团由洞口、武冈向百色方向挺进，断敌西逃云南道路；南路第4兵团由阳江地区向博白、玉林前进，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中路第12兵团则待上述两路断敌退路后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部于广西境内。白崇禧为保持逃往海南岛的通路，于24日以两个兵团在余汉谋部的配合下，向进至信宜、茂名一线我南路第4兵团发动“南线攻势”，遭我顽强阻击。27日我军发起反击，至12月1日，将白崇禧部两个兵团围歼于博白地区，余汉谋残部亦大部就歼。敌“南线攻势”失败后，即全线向钦州、防城方向逃窜，我军奋起直追。7日，在钦州、小董圩地区歼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及两个兵团残部共5万余人，俘中将级军官20名，缴获李宗仁、白崇禧的座车及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佩带的宝剑等大批军用物资。接着，我军继续猛追，至12月14日，敌除两万个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就歼。此役共歼敌17.3万人。至此，除敌白崇禧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主力已全部被歼，中南大陆基本解放。

海南岛战役 广东解放后，退守海南岛的10万敌人在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下，企图凭险固守，把海南岛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为歼灭该敌，解放海南岛，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5兵团首长指挥第40、第43军，在岛上的琼崖纵队配合下，发起海南岛战役。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召开了讨论渡海作战方案的会议。随后渡海部队加紧进行准备，收集船只，进行渡海作战训练。1950年2月，第128师382团4连1排副排长鲁湘云带领7名战士乘木帆船在海上练兵时，突然与1艘国民党军舰相遇，鲁湘云组织战士巧妙地与敌舰周旋，当与敌舰相距五六十米，进入敌舰炮射击死角时，他大喊一声“打”，刹那间，战士们手中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和掷弹筒一齐猛烈开火，并快速驶近敌舰，当距三四十米时，他们又甩出了一排排手榴弹，打得军舰甲板上冒起了浓烟，吓得敌舰仓皇逃走，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先例，渡海兵团授予该船为“英雄船”，授予鲁湘云为“木船打军舰战斗英

雄”的称号。

根据渡海作战的特点，第 15 兵团按照“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方针，于 3 月组织了两批 4 次共约 1 个师的兵力偷渡海南岛成功，增强了岛上我军的力量。4 月 16 日 19 时主力实施强渡。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和军舰的拦击，有的船舷被打穿，战士们毫无惧色，有的堵漏，有的用机枪、步枪扫射敌机，护航的火力船队则发挥近战威力与敌舰拼斗。第 40 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因发动机故障掉队成了孤船，与国民党海军第 3 舰队旗舰“太康”号相遇，他们巧妙地将船伪装成运输船，沉着地向敌舰驶去，当该船行至敌舰右侧，进入其主炮射击死角时，战士们掀开篷布开炮齐射，30 多发炮弹飞向敌舰，打得敌舰拖着黑烟狼狈逃窜，敌第 3 舰队司令王恩华负重伤后身亡。我军经彻夜强渡，在岛上部队的接应下，胜利登岛，并迅速向纵深发展。22 日敌军全线南撤，我军发起追击，至 5 月 1 日解放全岛，守敌大部乘舰逃往台湾，我军共歼敌 3.3 万人。

第四野战军自 1949 年 6 月进军中南，经 11 个月的作战，解放了湘、鄂、赣、粤、桂 5 省，歼敌 43 万余人。

六、进军福建，解放东南大陆及沿海大部岛屿

在渡江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青岛国民党军于1949年6月2日撤退。华东地区之敌在北面仅剩长山列岛少数敌人盘踞，其余18万人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指挥下，退守福建和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重新组织防御，企图控制上述地区，屏障台湾，待机反攻。为迅速消灭残敌，解放福建和沿海岛屿，并建立攻取台湾的前进基地，中央军委命令第10兵团进军福建，命令第7兵团攻取舟山群岛。

退守福建地区之敌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的10个军共27个师约12万人。其中第6兵团5个军6万人防守福州地区，第8兵团2个军3万人防守漳州地区，第22兵团3个军3万人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

福州战役 1949年7月下旬，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3个军到达福建的南平、古田地区，决心首先歼灭福州地区之敌，然后再歼漳州、厦门地区之敌。同时根据福州地区之敌随时可能南逃的情况，决定采取钳形攻击战法，首先由两翼插至敌侧后，封锁闽江口，切断福厦公路，断敌海陆退路，然后聚歼敌人。8月6日，我军分三路向福州开进，11日发起战斗，至16日，相继攻占马尾、长乐、福清。福州守敌分路向厦门、平潭逃窜。17日，我军解放福州，接着分路追歼逃敌，至23日，敌除一部逃跑外，其余均被歼灭于福清、永泰以北、马龙江以内地区。此役共歼敌4万人。

漳厦战役 福州战役后，第10兵团主力进行休整，一部在闽中游击队配合下，于8月底至9月中旬，解放了平潭岛、南日岛及循州岛等沿海岛屿，歼敌9000余人。9月19日，第10兵团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相继攻占了同安、长泰、南靖、漳州及马巷、澳头、集美等厦门外围阵地，歼敌1.2万人。10月15日，我军发起厦门战斗，登陆后，遭敌顽强反扑。我军奋勇作战，第31军第274团8连8班长崔金安在排长负伤后挺身而出，指挥全排仅存的12名战士，首先攻下1个地堡后，又在4小时内打退了敌1个营的5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又夺占了山头，战后该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称号。至16日中午，我军控制了岛的北半部，守敌向东南海岸撤退，我乘胜猛追，17日厦门全岛解放，共歼敌2.7万余人。

10月24日，我军又发起金门战斗，先头3个团登陆。但因轻敌和组织指挥失误，后续部队又无船可渡，致使我登陆部队与敌苦战3昼夜，终因兵力不足，大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我第7兵团于8月至11月攻占了舟山群岛30余个岛屿，歼敌近万人。后因敌兵力增加，我军继续进行攻岛准备。1950年5月我军解放海南岛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确保台湾，乃于13日将舟山守军秘密撤往台湾。19日，我军解放舟山群岛。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我第三野战军在进军东南过程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岛屿。

七、进军西南，解放川、滇、黔、康、藏诸省

1949年9月，盘踞在西南地区之敌，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共37个军约45万人，加上海空军、联勤总部及游杂部队共约90万人。蒋介石企图依靠这些残余力量，确保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并准备在迫不得已时，部队逃往国外。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最大可能是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遂决定以四川为防御重点，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其部署是：以胡宗南部第5、第18兵团8个军沿秦岭主脉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一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以第7兵团等部6个军沿白龙江、米仓山组成第二道防线；以张群集团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14、第20兵团6个军位于鄂西建始、恩施地区，与位于巫山、万县地区的第16兵团3个军相配合，扼守川东门户；以第15兵团3个军位于南充、大竹、达县地区机动；以第19兵团分散配置在贵州境内的湘黔公路两侧，阻我由湘西入黔；另以云南“绥靖”公署卢汉部4个军、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1个军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4个军分别防守昆明、雅安、宜宾、重庆、成都等地。

这时，我军已解放了青岛、上海和福建等地，第三野战军已可全力担负东南沿海的防务，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中央军委即令第二野战军主力按原定计划，执行向西南进军的任务。同时，根据西南敌军的情况，指示第二野战军应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并具体指出：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鄂西，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川境之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位于宝鸡地区之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首先钳制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路切断后，迅速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为了迅速解放和接管西南各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滇、黔、川、康及面藏。

9月初，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由上饶、芜湖地区西进。为迷惑敌人，保证我军大迂回大包围行动的突然性，第3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由芜湖、南京乘车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司令员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佯示向西进军，制造我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尔后，第二野战军领率机关和第3兵团即秘密转车南下，经武汉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第四野战军进行的广东、衡宝战役，也掩护了第二野战军向湘西的集结，造成了敌人的错觉。10月中旬，我第3、第5兵团先后进至常德、邵阳地区集结。

占领贵州、重庆 10月底，第四野战军首长为保障本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的侧后安全，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决定以位于湘鄂西地区的第42、第47和第50军及湖北军区部队西进，求歼宋希濂集团。根据这一情况，第二野战军决定以第5兵团附第10军按原部署直出贵州；以第3兵团主力会同第四野战军部队在湘鄂川边地区围歼宋希濂集团，尔后西出江滩与第5兵团协同作战。

11月11日，我军发起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5兵团等部由湘西直出贵州，守军纷纷西撤，第5兵团奋起直追。12日，第16军前卫

团在湘黔、黔桂公路会合点甘粑哨截获敌 100 余辆汽车，俘敌 1000 余。随后该团先头部队即化装成国民党军，乘车疾进，于 15 日袭占贵阳。21 日，我第 10 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接着，我第 5 兵团主力分两路北上，至 12 月初，前出至川南的纳溪、合江、自贡等地。与此同时，第 3 兵团和第四野战军部队由鄂西和湘西多路向来希濂部发起攻击，很快突破了敌川鄂边防线，占领秀山、西阳、彭水，将敌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第 15 兵团大部歼灭于咸丰、南川地区，并乘胜解放重庆外围之綦江、涪陵、江津等地。29 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逃往成都。30 日，我军解放重庆。至此，我军切断了川敌向黔滇的主要退路，歼敌 6 万余人。

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我军发起川黔作战后，蒋介石于 11 月下旬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向四川撤退。12 月上旬，胡宗南集团和川境其他之敌纷纷猬集成都地区。12 月 9 日至 11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第 19 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第 22 兵团司令官郭汝瑰等，在我政治争取下，分别在昆明、雅安、彭县、普安和宜宾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成都战役 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威逼下，蒋介石眼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计划已经失败，于 12 月 10 日，率其“国民政府”飞逃台湾。我第二野战军各部乘胜向川西急进，至 20 日前出至乐山、眉山、简阳、邛崃、大邑等地，歼宋希濂残部，生俘宋希濂；在进攻大邑县城时，第 12 军第 106 团先头连指导员王银虎带领 10 名战士直冲守军团部，生俘 1 个团 1000 余人。与此同时，位于秦岭地区之我第 18 兵团，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任务后，乘胡部南撤时，分路实施猛追，迅速前出至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这样数十万国民党军被紧紧包围在成都附近地区。在此情况下，经我军的耐心争取，敌第 15、第 16、第 20、第 7、第 18 兵团分别在罗广文、董宋珩、曾苏元、陈克非、裴昌会、李振等将军率领下举行起义，仅其第 5 兵团继续顽抗而被迅速歼灭。30 日，我军进驻成都。

滇南、西昌战役 云南和平解放后，驻守该省的敌第 8、第 26 军继续负隅顽抗。第二野战军第 4 兵团并指挥第四野战军第 38 军的两个师，在桂滇黔边游击纵队的配合下，于 1950 年 1 月由广西入滇作战。至 2 月中旬，先后在滇南蒙自、个旧、元江、南峤(今勐海)等地将敌第 8、第 26 军 2.7 万余人歼灭，生俘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 8 兵团司令官汤尧。3 月 12 日，第二野战军一部向盘踞西康省西昌地区的敌残部发起攻击，至 4 月 7 日，全歼敌 1 万余人。至此，我军进军西南作战基本结束，共歼敌 93 万余人。

昌都战役、和平解放西藏 川、滇、黔、康 4 省基本解放后，西藏当局顽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 10 项政策，竭力阻止我军进入西藏。西南军区在完成准备工作后，1950 年 10 月 6 日，以第 18 军在西北军区一部的配合下，开始进军西藏。12 日，进占宁静(今芒康)，争取了藏军第 9 代本起义，至 24 日解放昌都，共歼藏军主力 5700 余人，打开了进藏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爱国人士更加坚定，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 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我军根据协议规定，以第

18 军和西北军区骑兵部队于 8、9 月间分路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驻。指战员们攀登 10 余座雪山，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到一地，不住民房，不借用具，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至 11 月，先后到达噶大克、察隅、拉萨、日喀则等地，胜利完成了进驻西藏的任务。西藏和平解放。

八、剿匪反特，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 月 1 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民解放军作为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朱德总司令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命令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遵照这一命令，人民解放军一方面继续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另一方面为巩固解放战争成果，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新解放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反特斗争。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深感在大陆上已再无他的立身之地了。因此，他一面策划其“政府”和军队撤退台湾，一面有计划地留置一批反动武装和大批特务以及其党政军骨干，建立所谓“大陆游击根据地”，企图与我军作长期斗争，建立反革命基地，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

这些匪特潜往各地后，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放兵游勇，地痞流氓、惯匪惯盗，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形成一股股猖獗的反动势力，多则数千人，少则几十人，主要分布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各省的接合部、偏僻山区和沿海岛屿。1949 年下半年，部分地区已陆续开展了剿匪斗争，但到 1950 年初，全国仍有土匪武装 105 万余人，尤以中南、西南为甚，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使我在新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遇到严重困难。

对于剿匪的重要性和基本方针，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了多次指示。毛泽东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并规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先后抽调野战军 39 个军共 140 多个师约 150 余万人的兵力，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部队、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协助下，经过重点进剿、分区驻剿和肃清残匪等阶段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重点进剿阶段：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股匪密集、匪情严重、匪焰嚣张的地区，如川陕边、青宁新、云贵川康、粤桂边、广西、福建、湘西、湘赣边等的一些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手段，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精神上感到严重威胁与巨大压力。

进剿步骤是先内地，后边沿；先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地区，后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的山区，逐块逐片地进行，使大股土匪失去集中活动的的能力。

分区驻剿阶段：大股土匪被歼灭后，随即对中、小股土匪展开分兵进剿，以分片包干的方法，加强面的控制，使分散活动之匪无法集股再起；同时组织联防围剿，使小股土匪失去钻隙流窜之可能。此阶段，大力加强政治攻势，

剿匪部队与地方政府一起，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父劝子、子劝父、妻劝夫、弟劝兄、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的“七劝”活动，加速股匪的瓦解，使大批土匪自动投诚。

肃清残匪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剿匪作战，公开活动的土匪已为数不多，大多隐蔽起来。因此，此阶段以减租减息、生产救灾、土地改革、建立政权等工作为主，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搜剿散匪、潜匪，捕捉匪首。特别是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深入挖匪根的斗争，使农村大量反革命分子被镇压、被控制，从而铲除了匪特赖以存身的社会依靠，使其断绝物资和情报的来源，进一步孤立和暴露出来，以达到最后彻底肃清残匪的目的。

到1952年底，我军共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恢复工作与生产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1949年4月至1950年6月，我军共歼灭国民党3个军政长官公署、8个“绥靖”公署、2个警备总部、20个兵团部、98个军部、368个整师，连同地方武装共310余万人，其中争取起义和接受改编的为126万余人。解放了16个省，并争取了4个省和平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军进驻拉萨等地，从而使祖国领土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和南沙等少数岛屿外，均告解放。在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大规模作战至1950年6月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善于斗争的高超艺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经过4年英勇奋战，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其中生俘458万余人，毙伤171万余人，起义投诚和改编176万余人，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少数岛屿外的全部国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战争中我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共损失152万余人，其中阵亡26万余人，负伤和其他损失126万余人。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优秀儿女，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封建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从此结束，也标志着人民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开端。伟大的中华民族，犹如睡醒的亚洲巨人，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这一胜利也极大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剥削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给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用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自始至终指导着解放战争。首先，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善于掌握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科学地分析形势和预测发展趋势，制定出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方针，及时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例如：解放战争爆发前的

过渡阶段“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战略防御阶段实行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方针，战略进攻阶段的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战略决战阶段就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方针，以及战略追击阶段“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以“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人和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等等，都是这种战略指导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我军统帅部始终正确地驾驭着战争，从而仅经过第一年的作战，就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进而转入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4年即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次，制定了正确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我军20年来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指出了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打歼灭战，主要作战形式是打运动战，主要方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认真贯彻了这些原则，所进行的130多个战役中，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不同规模的歼灭战总计近100次。随着敌人有生力量的大量被歼，我军的兵力由劣势转为优势，迅速解放了祖国大陆，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我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英勇顽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方面。这种精神因素来源于崇高的政治觉悟，来源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战争中我军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诉阶级苦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包括对国民党起义投诚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和补入部队的俘虏进行教育。在他们懂得全国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后，均自觉地为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战斗。他们士气高昂，斗志旺盛，在革命队伍内部相互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气势汹汹的强敌面前威武不屈；在恶劣的环境里坚韧不拔；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勇于献身。不仅出现了王克勤、董存瑞、刘四虎、齐进虎、梁士英等一大批英雄人物，还涌现了临汾旅、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钢铁营等一大批英雄集体。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鼓舞我军胜利前进。

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同全国人民特别是老解放区人民大力支援分不开的。全国人民把解放战争看成是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战争，因此，他们大力支援和积极配合我军作战。解放区人民和我党我军休戚与共，鱼水相依，高度发扬了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仅工人、农民、学生志愿参军的人数就有200万之多。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积极参加修桥补路，筹集粮草，制作军鞋，看管俘虏，保卫后方，许多地区还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远征。著名的三大战役，支前的民工达到800多万，支前的粮食近10亿斤，做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打到哪里，支援到哪里，为保证我军作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援蒋内战的政策，开展了广泛的斗争，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直至最后被推翻，解放战争的史实又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非常珍惜和热爱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治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然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在中国和亚洲的失败，于 1950 年 6 月，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入侵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大陆的安全。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被迫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第十四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

一、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中共中央未雨绸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人民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但是，朝鲜立即陷入了以北纬 38° 线(下称“三八线”)为界的南北分裂对立状态。

1945 年 8 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妥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分别进入朝鲜接受日军投降，三八线以南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8 月，苏军解放朝鲜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9 月，美军占领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政治制度本来就不同的美、苏两国则日益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在朝鲜问题上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极大地膨胀起来，并握有原子弹，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当时帝国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在国际上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到处支持反动势力，镇压进步势力。美军占领朝鲜南部地区后，背离了同盟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有关“使朝鲜自由独立”的协议，立即利用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机构，进行新的殖民统治。美国不顾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不顾联合国许多会员国的强烈反对，于 1948 年 8 月，强行以“联合国”的名义，在南朝鲜组成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并积极为其组建军队，支持其以武力统一朝鲜。

苏联是当时和平民主势力的主要代表，奉行和平民主政策。支持进步势力。苏军帮助朝鲜北部人民获得解放以后，立即宣布朝鲜成为自由的国家，支持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1946 年 7 月同新民党合并，建立朝鲜劳动党)联合一切反日民主力量建立朝鲜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支持朝鲜人民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朝鲜人民针对美国强行组成南朝鲜李承晚反动傀儡政府的情况，于 1948 年 9 月，经过选举，在北方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该政府一成立，即为和平统一朝鲜作了不懈的努力。

苏军和美军于 1948 年底和 1949 年 6 月先后撤出朝鲜后，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磨刀霍霍，叫嚷以战争手段结束南北的分裂状态，并不断在三八线地区进行军事挑衅。鉴于此，朝鲜北方人民也作了必要的准备。朝鲜南北两个政权、两种制度在朝鲜统一问题上的斗争，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了。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国当局即从其帝国主义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进行了武装干涉。6 月 26 日，美国即派出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作战，7 月上旬，又派出其地面部队侵入朝鲜。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 6 月 27 日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已命令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 7 舰队入侵我国台湾岛和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积极活动，为其武装侵略朝鲜寻求“合法”外衣，于 7 月 7 日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朝鲜战争期间，先后共有 16 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军队参加“联合国军”)。7 月 8 日，美国任命其驻远东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7 月中旬，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将南朝鲜军交“联合国军”司令部

指挥。(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在讲到“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总体行动时,将其统称为敌军或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战争爆发后,英雄的朝鲜人民不畏强暴,没有被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在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军节节获胜,于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上旬将美军和南朝鲜军逐至北纬37°线(下称“三七线”)以南地区。

美国侵略朝鲜与台湾,是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严重挑战,严重地破坏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抗议。我国政府于6月28日即表明了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举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抗议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对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表示“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并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此时,中国人民正在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治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有计划地展开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然而,美国侵略朝鲜与台湾,制造亚洲的紧张局势,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发展,美军和南朝鲜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形势,认为美国侵略朝鲜已使朝鲜战争趋于复杂化,朝鲜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朝鲜战局的发展,一种可能是速决,即朝鲜人民迅速将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另一种可能是持久,即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扩大战争,甚至直接威胁中国大陆。而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和外交上孤立的政策,因此对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后一种局面,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防备。

作为未雨绸缪之计,保卫我国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并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已作为国防机动部队的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当时,第38、第39两军主力在河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该两军的各一个师分别在湘西桃源地区和广西宜山地区进行剿匪作战,第40军完成解放海南岛作战任务后,在广东休整,正准备北上河南从事农业生产)和在齐齐哈尔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及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共计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上旬,边防军全部到达我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集中,并开始突击整训。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采纳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决定抽调在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分别集结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备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

组成东北边防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

在军事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英明预见，为保卫我国的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争取了主动，为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二、美国将战火烧到我国门口，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在抗议和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同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对此不予理睬，继续增兵朝鲜扩大侵略。至8月中旬，美国侵朝的地面部队已达4个师和1个旅，共7万余人，由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但是，美国在战场上仍连遭失败。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于7月20日攻占大田，并生俘美第24师师长，至8月中旬，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地区，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仅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

美国为了挽回在朝鲜的败局，又抽调两个师组成第10军，加上南朝鲜一些部队共7万余人，在260余艘军舰和500架飞机支援下，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的登陆进攻，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在洛东江正面战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于9月16日上发起了反攻。致使前线的人民军部队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9月28日，美第10军攻占汉城，29日，美第8集团军进抵三八线，这时，美国当局已经作出决定，即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吞并整个朝鲜，并进而威胁中国大陆。此外，自8月27日起，美国即以其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地区的城镇乡村，残害我国人民，破坏我国财产。

鉴于此种形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讲话中，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时，再次指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政治上经济上困难很多，军队装备落后，无力也不敢同美国军队作战，因此把中国人民的严辞警告看作是“虚张声势”，是“恫吓”。于是，一意孤行，在命令南朝鲜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北进后，10月7日，美军也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

在此形势危急的时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我国发出了请求。10月1日，即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当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人民给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越过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与此同时，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的人民，纷纷要求志愿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要不要出兵参战，敢不敢与装备最现代化的美国军队直接较量，中共中央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

这时，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队装备均无法同美国相比。我国战争创伤刚刚进行治理，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1950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钢产量为60.6万吨，而同时期美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亿美元，相当于我国的5倍以上(按美元与人民

币 1 : 2 的比值计算), 钢产量为 8772 万吨, 是我国的 144 倍。在军队装备上, 美军是世界上第一流水准的, 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 其一个步兵师即装备有坦克 140 余辆、70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 330 余门, 火力、机动力均强, 并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 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军空军和海军均组建不久, 短时间内不可能参战, 根本谈不上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军的地面部队只有少量机动火炮, 坦克部队也刚刚组建, 每个步兵军只有 70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 190 余门, 还没有美军一个师装备得多, 并且多是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旧装备, 火力和机动力均很弱。我国出兵参战困难很多。但是, 朝鲜是我国的友好邻邦, 我们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 唇亡则齿寒, 户破则堂危, 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侵占了, 中国大陆就直接面临着美国侵略的威胁; 美军越过三八线, 已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门口, 并且早在 6 月即已将侵略魔爪伸到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民族从来就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更不容许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起而抵抗。同时, 我军参战也有取胜的一定条件, 这就是: 我们所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有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军队数量占优势; 军队战斗意志顽强; 人民军队特有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的保证; 正确的战争指导; 加之逐步改善武器装备条件等。

中共中央为了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保卫我国的安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于 1950 年 10 月上旬, 经过慎重研究后, 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为骨干组成志愿军入朝作战。10 月 8 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 指出: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 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又以第 13 兵团部为基础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 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 解方为参谋长, 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并组成以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的中共志愿军委员会。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的体现, 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伟大革命胆略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根据美军当时尚在三八线附近的战场形势和我军装备极为落后的情况, 为志愿军确定了行动方针, 即: 在志愿军入朝后, 先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 德川至宁远沿线以南地区构筑二至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 歼灭小股敌军。如敌来攻, 则在阵地前将其分割歼灭之; 在 6 个月之内如敌军固守平壤、元山不出, 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待我军从苏联订购的装备到达, 并装备训练完毕, 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即在 6 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10 月 19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中国人民的重托, 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开赴朝鲜战场, 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简称“抗美援朝战争”。

第十五章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

志愿军决定采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1950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越过三八线以后，分三路向平壤、元山一线进攻。东路为南朝鲜第1军团指挥南朝鲜第3师和首都师，中路为南朝鲜第2军团指挥南朝鲜第6、第7、第8师，西路为美第1军指挥美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1师。另美第9军指挥美第2、第25师随美第1军之后跟进。三路均归美第8集团军指挥。为配合美第8集团军的正面进攻，麦克阿瑟海运美第10军开往元山海域，准备再次实施登陆作战，同第8集团军在平壤、元山一线会合。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尚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地区。

在此种形势下，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借一批高级军政官员，专程从华盛顿飞赴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讨论朝鲜战争所谓“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以及中国和苏联出兵参战的可能性问题。讨论中，他们依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充其量只是有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认为苏联在冬季到来以前，也没有可能调出大量地面部队，即使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也“不足为患”。他们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之前结束”，断言美国的侵朝战争“是赢定了”，能够在圣诞节前将美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

基于这种估计，在10月15日以后，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大大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攻的速度。10月17日，麦克阿瑟改变了原定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在平壤、元山一线会合的计划，命令各部，分路继续北进，并将东线南朝鲜第1军团改归美第10军指挥。至志愿军开始入朝的10月19日，东线，南朝鲜第1军团已占领元山、咸兴；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已占领阳德、成川，美第1军已占领平壤。东西两线仍继续无所顾忌地以师、团或营为单位，分路向北冒进。美第10军指挥的陆战第1师（也是美军中战斗力比较强的所谓“王牌”部队之一）和步兵第7师也已船运至元山海域，准备登陆（10月26日和29日分别在无山和利原登陆）。此时，“联合国军”第一线进攻的总兵力共为13万余人，整个进攻布势被朝鲜的狼林山脉自然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东西两线之间相距约80公里。

朝鲜战场形势的这种急速变化，已不允许我志愿军按原定计划，先在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地区组织一个时期的防御作战了。而这时，无论是华盛顿的美国军政当局，或是在日本的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部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部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情况，均毫无察觉。美国战略上判断的错误和分兵冒进的战场态势，为志愿军从运动中予以突然打击，将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毛泽东主

美国骑兵第1师是保留骑兵师番号的机械化师，是美军战斗力较强的“王牌”部队之一。

美国的一个节日。1941年规定为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1950年的感恩节是11月23日。

圣诞节为12月25日。

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放弃了原定志愿军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的设想，确定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进攻之敌的方针。10月21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志愿军：现在是歼灭南朝鲜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同时指出：在战役部署上，以一部兵力置于长津地区，阻击东线敌军的进攻，而集中主力于西线，歼灭南朝鲜军突出冒进的几个师，以阻止敌军进攻，稳定朝鲜战局，使我军站稳脚跟。

彭德怀司令员据此进行了战役部署，并随着敌军进攻情况的变化，两次进行了调整。10月24日，敌军已经越过清川江，南朝鲜第1师进至清川江以北的宁边地区，南朝鲜第6师已进至熙川以西及温井地区，南朝鲜第8师已进至德川和宁远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彭德怀司令员确定：西线，以第40军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域，待机歼灭南朝鲜第6师于温井西北地区；第39军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域，准备在第40军围歼南朝鲜第6师时调动南朝鲜第1师东援，将其歼灭于云山附近地区；第38军并指挥第42军之第125师，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地域，准备歼灭南朝鲜第8师于熙川及以北地区。东线，以第42军第124、第126两个师于长津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东线敌军北进，牵制东线之敌，配合西线作战。与此同时，命令第50军和第66军入朝，加强西线作战力量。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志愿军于10月22日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志愿军全体官兵精神抖擞，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为了达成战略、战役的突然性，志愿军还在开进中采取了一系列隐蔽行动的措施，致使敌军一直未发觉志愿军入朝而放胆冒进。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进中同冒进的敌军遭遇，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

第一次战役 10月25日10时许，南朝鲜第6师第2团光头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方向推进。当其全部进至两水洞、丰下洞地区时，同奉命以预期遭遇姿态已占领该区阵地的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相遇，第118师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股南朝鲜军火炮未及开架、弹药未及开箱即全数被歼。随其行动的一名美军顾问，也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同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在云山以北，予向北进攻的南朝鲜第1师先头第15团以迎头痛击。当夜，第40军该两师又乘胜攻占温井。26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志愿军首长，祝贺志愿军在上述地区取得初战胜利。

接着，志愿军针对敌军以团或营为单位到处乱窜的情况，分头以军或师为单位边作战，边展开。28日晚至29日晨，第40军在温井以东地区，经过激战歼灭南朝鲜第6、第8两师各两个营大部；29日晚，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将从鸭绿江边楚山镇回窜的南朝鲜第6师第7团（该团于10月26日窜至鸭绿江边）大部歼灭于古场洞和柳良洞地区。第40军连获胜利，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嘉奖。第38军由于对敌情不够了解，未能及时对熙川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失去了攻歼该敌的良机。第39军29日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云山南朝鲜第1师构成了包围。至此，志愿军在同敌军交战中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战役展开，可以集中10至12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作战。

这时，美军仍不相信中国人已经参战，因而继续向北推进。10月31日，

美第1军指挥之美第24师进至泰川、龟城，并继续向朔州推进；英第27旅进至定州、宣川，并继续向新义州推进；美骑兵第1师从平壤前调云山地区，增援南朝鲜第1师。整个西线敌军仍处于分散状态，便于志愿军各个击破。于是，志愿军采取了正面突击和向敌后实施迂回的战法，对清川江以北之敌展开了攻击。

11月1日黄昏，第39军对云山之敌发起了攻击。该军第116师由西北方向攻击前进，直取云山；第117师由东北方向向云山以东进攻，配合第116师作战；第115师在云山西南堵击可能逃跑之敌，并阻击敌军从南面增援。这时，云山之敌，正由美骑兵第1师第8团接防。第39军发起攻击后，发现打的是美军，顿时部队战斗情绪倍增。美骑1师第8团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拼力突围，骑1师第5团前来增援，遭我歼灭一部。战至3日晚，云山战斗结束，志愿军歼灭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第5团一部和南朝鲜第1师第12团一部，共毙伤俘敌军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云山战斗，首开志愿军同美军作战并歼灭美军1个团大部的纪录，沉重地打击了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1师的进攻气焰，大增了志愿军的战斗士气。在这次战斗中，第116师第347团第2连战士张生，在敌军机枪火力挡住我军冲击道路时，只身绕到敌军机枪阵地后面，将敌军机枪射手连同机枪一起推下悬崖，打开了冲击道路；第5连副指导员顾仁柏，在连队其他干部都负伤的情况下，及时整顿队伍，带头冲锋，连续攻占几个山头，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张生、顾仁柏荣立一等功，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在第39军云山战斗痛歼美骑兵第1师第8团的同时，其他各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第38军沿清川江左岸前进，迂回敌后，于2日占领院里，对西线清川江以北敌军侧后构成威胁；第40军歼灭南朝鲜第8师和美骑兵第1师各一部，于2日逼近宁边；第66军于1日已进至龟城近郊，阻击与牵制了美第24师；第50军第150师进至新义州以南，准备阻击已窜至南市洞的英第27旅。“联合国军”西线进攻部队在接连遭到打击，并深恐被切断后路的情况下，遂于11月3日全线向南收缩，至11月5日，除少数兵力扼守清川江以北滩头阵地阻击志愿军进攻外，主力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组成防御。志愿军遂结束了西线作战。

在志愿军西线部队作战歼敌的同时，志愿军第42军之第124、第126两师会同朝鲜人民军一部，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和美陆战第1师的进攻，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苦战13昼夜，共毙伤俘敌27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线的作战。在阻击过程中，第124师第370团第4连守备黄草岭东南796.5高地。该连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召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会议，号召党团员在战斗中发挥模范作用。在党、团员的带动下，该连英勇作战，誓与阵地共存亡，两天之内打退敌军1个连至2个营兵力20次进攻，以50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军250余人，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黄草岭守备英雄连”称号。第124师第371团第4连，守备烟台峰阵地，11月2日和第6连一起反复冲击，击退敌军1个营至1个团兵力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烟台峰守备英雄连”称号。11月7日，第42军奉命撤出东线阻击战。

至此，志愿军首次战役告捷，东西两线共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其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

川江以南。我军初步站稳了脚跟，稳定了朝鲜战局，并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这大大出乎美国军政当局的意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打乱了美国的侵略步骤，也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惴惴不安和各种猜测。美国军政当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企图不外有三种可能：一是只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以保护边防安全和鸭绿江沿岸电力设备；二是同美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消耗美国军事力量；三是把美军全部赶出朝鲜半岛。同时认为，这三种可能又以第一种可能为最大。在美国看来，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同美国大举较量，并且从军事上看，中国出兵的有利时机应是在“联合国军”退守洛东江以东釜山滩头阵地的8月下旬，那时中国未出兵，而迟至美军迫近中朝边境时才出兵，也表明中国无意同美军进行较量。加之，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未举行大规模追击，这更加深了美国的错误判断。某于这种判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1月9日决定：在没有判明中国出兵的真正意图之前，在军事上，麦克阿瑟继续执行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据此，麦克阿瑟拟制了进攻计划，决定首先发动空中战役，轰炸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部队继续进入朝鲜；随后发动地面总攻势，东线美第10军经长津湖西进，西线美第8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东西两线部队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围歼在朝鲜北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尔后再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鸭绿江封冻前抢占全朝鲜，圣诞节（12月25日）前结束朝鲜战争。为实现这一计划，麦克阿瑟调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第25师和新到朝鲜的土耳其旅、英第29旅加强西线进攻力量，以从美国本土调来的美第3师加强东线进攻力量。这时，“联合国军”地面部队第一线总兵力达13个师又3个旅和1个团共22万余人，并拥有坦克1000余辆、各种炮1万余门，空军和海军飞机1200架。与此同时，美国在外交上积极活动，并试探谋求在鸭绿江西岸各10英里的地带，建立一个缓冲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朝鲜。

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针对美国军政当局再一次的判断错误，决心利用美国军队恃强骄傲的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方针，将其诱至志愿军第一次战役作战熟悉的地区，尔后突然发起反击，歼灭敌军，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以利于长期作战；如果敌军不进，志愿军则打出去。为达此目的，调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9兵团及所属第20、第26、第27军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转变东线战局；以先期入朝的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担任西线作战任务，并且主力向后转移，以逸待劳，以第38、第39、第40、第42军各一个师，同敌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并示弱以骄纵敌军，诱敌深入。另经与朝鲜人民军协商，以志愿军第42军2个营和朝鲜人民军1个联队，组成游击支队，渗透到敌后孟山、阳德、成川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正面各军的战役行动，并联络仍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部队。

根据这些方针和部署，11月7日，志愿军东线部队放弃黄草岭地区，9日，志愿军西线部队放弃了清川江一线地区，开始诱敌深入。11月中旬，游击支队开始向敌后渗透。西线敌军由于有了前次分兵冒进遭受打击的教训，此次进攻则比较谨慎缓慢，至11月15日，才前进9至15公里，距我志愿军

预定战场较远。为了造成敌军更大的错觉，诱使其更加放胆前进，志愿军第一线部队于11月16日，停止了向进攻之敌的反击，继续向北后撤，以示“败走”。同时，利用在战场上释放一些俘虏的机会，向他们散布：志愿军粮弹困难，要退回国内去。

“联合国军”果然为志愿军的后撤行为所迷惑，判断志愿军是“怯战败走”，并断定志愿军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更加坚定了向北冒进的决心，并加快了进攻速度。11月21日，“联合国军”已进至博川、球场、德川、宁远一线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其布势：西线，美第8集团军指挥8个师又3个旅和1个团共13万余人，其中以美第1军指挥美第24师、南朝鲜第1师、英第27旅向新义州、朔州方向进攻，美骑兵第1师位于顺川地区机动；以美第9军指挥美第25师、美第2师向朔州、碧潼、楚山方向进攻，土耳其旅位于军隅里地区机动；以南朝鲜第2军团指挥其第7、第8师向熙川、江界方向进攻，第6师位于北仓里、假仓里地区机动；英第29旅和美空降第187团位于平壤、沙里院地区为集团军预备队。东线美第10军指挥5个师共9万余人，其中以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第3师向武坪里、江界方向进攻(美第7师第17团已于11月21日进至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并向中国境内开枪射击)；南朝鲜第1军团指挥其首都师、第3师向图们江边推进。11月24日，发起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此时，我志愿军西线6个军23万多人、东线3个军15万余人，也全部在预定作战地区完成了战役准备。在“联合国军”到达志愿军预定战场后，志愿军西线部队于11月25日黄昏突然发起反击，东线部队于11月27日黄昏突然发起反击。

在西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首先以第38军、第42军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直接指挥，从“联合国军”西线进攻部署最薄弱的右翼德川、宁远地区打出去，并以第40军在清川江以东牵制当面美第2师。经一昼夜战斗，一举打开了战役缺口，第38军歼灭进至德川地区的南朝鲜第7师大部，毙伤俘其5000余人，并生俘7名美军顾问；第42军歼灭了进至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8师大部；第40军也歼敌一部。为了迅速发展胜利，彭德怀司令员于26日下午命令位于清川江以西之各军迅即包围歼灭敌军一部，抓住当面之敌，不使其逃脱。同时，命令第38军以主力迅速向敌侧后军隅里、三所里(位于价川与顺川之间)，第42军向顺川、肃川迂回前进，截断西线敌军的退路，并阻击平壤地区之敌军向北增援。26日晚，西线各军全面展开作战。其中第39军在云山东南柴山洞喊话，争取到美第25师1个建制工兵连115人全部投降。担任迂回任务的第38军之第113师昼夜兼程，巧妙避开敌军拦阻，以14小时行进70公里的速度，于11月28日8时赶到三所里，并主动抢占另一要点龙源里，切断了“联合国军”西线部队向顺川方向南撤的退路。至此，志愿军对美第9军形成了三面包围，震撼了“联合国军”的整个战役布势。

在这种形势下，麦克阿瑟从乐观的顶点坠入了沮丧的深渊，一面惊恐地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一面将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和美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紧急召到东京商讨对策，决定立即将部队撤至朝鲜半岛蜂腰部之元山、阳德、成川、顺川、肃川一线组织防御。29日，“联合国军”西线部队全线退却，并急调顺川美骑兵第1师和平壤英第29旅各一部猛攻三所里地区，向北增援接应。志愿军

则在价川、军隅里地区展开了围歼美第9军的作战。第39、第40军向南渡过清川江，协同第38军予被围之美第25师、美第2师以重大杀伤后，由价川地区西向安州攻击；第66、第50军也歼敌一部。第38军主力积极向第113师靠拢，第42军向敌后迂回受阻于新仓里地区。被围的美第9军部队包括美第2师、第25师和土耳其旅全部，以及美骑兵第1师和南朝鲜第1师各一部。美第9军集中其坦克和大炮的优势火力，在空军支援下，拼力突围，企图从三所里、龙源里退向顺川。然而志愿军第113师死死卡住了美第9军的退路，并数次击退了美骑兵第1师和英第29旅的向北增援接应，使得南北敌军相距仅1公里，可望而不可及。守卫在龙源里南侧阵地的志愿军第113师第337团第3连，控制美军向南逃跑的一道关口。该连击退敌军1个连至1个营多次冲击，阵地上被炸得弹坑累累，全连只剩50多人，但仍死死卡住关口，使得美军无法从此处逃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记集体二等功，授予二级英雄连称号。配合该连作战的第1连第3排，在排长郭忠田指挥下，守卫龙源里东南侧高地，以灵活的战术、勇猛的动作，创造了歼敌200余人，缴获火炮6门、汽车58辆，而本排无一伤亡的成绩。郭忠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美第9军见到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乃丢弃所有重装备，向西绕道安州，经肃川退向平壤。“联合国军”西线其他部队也已退向平壤地区。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第335团第3连在龙源里以北松骨峰截击美第2师一部。敌军在数十架飞机、数十门火炮和十余辆坦克支援下，连续向我3连阵地发动5次集团冲击，均被击退。第3连弹药用尽，遂同敌军展开肉搏，许多战士与敌同归于尽，战斗场面非常壮烈。最后，该连只剩下副指导员和6名伤员，仍顽强坚守阵地，直至主力部队将被截住的敌军全歼，美军留下数百具尸体。随军采访的著名作家魏巍以该次战斗的事迹为主，写成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刊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从此，中国人民即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最可爱的人”。通讯记载的松骨峰战斗的13名烈士中，有商名并没有牺牲，当时负重伤后，被辗转送回祖国，同部队失去了联系，至今仍健在，并隐功埋名40年默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奉献，被称为“活烈士”，他们是李王安和井玉琢。

军隅里地区围歼战，志愿军第38、第40、第39军及其他各军计毙伤俘美第2师7000余人、美第25师5500余人、土耳其旅2200余人；美第2师因被歼过半，失去了战斗力。在此次围歼战中，第38军完成任务突出，特别是第113师对围歼美第9军部队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该军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通令嘉奖。嘉奖令中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

在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之第20、第27军，于11月27日黄昏发起反击，当夜即在长津湖地区分割包围了美陆战第1师大部和美步兵第7师一部，同其展开了激战。此时，东线战场正下着大雪，气候寒冷，气温下降至零下20—30℃。第9兵团长期在中国华东地区作战，缺乏足够的防寒准备，加之运输补给困难，因此，部队因冻饿减员较大，战斗力的发挥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顽强作战精神，痛歼美国侵略军。28日，仅在下碣隅里、新兴里外围地区即歼敌1100余人。在新兴里战斗中，第27军第80师炮兵团班长孔庆三，奉命带领炮兵班摧毁敌军一个火力点，由于地形限制，只能将92步兵炮推上距离射击目标只有20米的山岗上，因地面冰冻无法架设驻锄，他毅然用自己的肩膀顶住驻锄，命令开炮射击，摧毁了敌军火力点，消灭敌军30余名，为步兵打开了前进通路，自

已被进回的弹片击中壮烈牺牲，被追记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该军第79师第235团第1营机枪连排长陈忠贤在攻击柳潭里的战斗中，因机枪的冷却水冻结不能射击，便带领战士参加步兵冲击，当其双手被冻坏，手指屈伸困难时，就用牙咬开手榴弹盖，用舌头舔出拉弦同敌军作战，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29日，被围在下碣隅里之敌向东南突围，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反复争夺1071.1高地东南之小高岭。守卫在该小高岭的志愿军第20军第172团第3连连长杨根恩带领的一个排数次将敌击迟。杨根恩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带领战士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等同敌军拼杀，最后全排仅剩2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在敌军发起第9次攻击时，有40多个敌人爬到山顶，已负伤的杨根恩便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毅然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被迫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其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恩连”。29日，第20军第60师将由古土里地区向北增援的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共1000余人大部歼灭。该师第179团经喊话和同敌军谈判，迫使被围在富盛里以北公路上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240人投降，其中美军中校1人，少校2人。

第9兵团经两天作战，基本查明了被围的敌军番号和兵力后，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新兴里地区之敌，尔后转移兵力攻歼柳潭里和下碣隅里地区之敌。11月30日，第9兵团集中第27军两个师，对被围在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团及第32团1个营和1个炮兵营发起攻击，激战至12月1日，将其大部歼灭。在新兴里美军被歼后，被围在柳潭里、下碣隅里的美陆战第1师师部率其2个团又2个营及1个炮兵营拼死夺路南逃。志愿军第9兵团便在北起死鹰岭，南至上通里、下通里长约70公里的路段上步步紧追，层层阻击。第26军于12月6日也加入追击战斗。从12月1日至12月12日，志愿军第9兵团予美陆战第1师以重大杀伤，其中，12月8日，第20军第58师2个连截歼美军800余人；9日，第20军第89师又先后在上通里、下通里以北地区截歼美军600余人。美陆战第1师伤亡过半，溃不成军。遗弃重装备，在美第3师和大量飞机的支援接应下，突出包围。美第10军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全部向南撤退。至此，志愿军扭转了东线战局。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并告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等，指出第9兵团“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在志愿军突然猛烈的打击下，麦克阿瑟的总攻势迅即崩溃。12月3日，“联合国军”即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撤退。志愿军西线部队于12月6日收复平壤，12日向三八线攻击前进，23日逼近三八线，进至涟川、华川一线地区集结，朝鲜人民军一部收复了三八线以南之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在东线，朝鲜人民军一部于12月9日收复元山，志愿军第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一部追歼逃敌。17日占领咸兴，24日收复兴南地区及沿海港口。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东西两线全部从陆路和海路撤到三八线及以南地区组织防御，志愿军胜利结束第二次战役。

在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并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斗争之后，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于11月28日出席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案。伍修权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及侵略朝鲜的罪行，代表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伸张了正义，造成了良好的巨大的国际影响，取得了中国人民外交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同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一样，对于制止美

国扩大侵略战争，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役，也是整个战争中对美军扫击最严重的一次战役。

这次战役，志愿军在作战指导上利用了敌军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恃强骄做的心理，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大胆地实施迂回包围。

从而取得了大大超过原来预想的重大胜利，共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4 万余人)，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土地，粉碎了美国迅速占领全朝鲜的企图，迫使美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极大地坚定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

二、粉碎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中朝人民军队越过三八线作战

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两次战役的突然打击后，由轻视中国军队转而变成畏惧中国军队，在其内部笼罩着严重的失败情绪，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中，在惶恐地撤至三八线及以南地区后，立即利用三八线既设阵地部署防御。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在撤退途中身亡。12月26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在三八线250公里的正面上和向南60公里的纵深内设置两道基本防线，还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三七线地区另设三道机动防线。在两道基本防线上，共部署13个师另3个旅约20万人，第一线为南朝鲜军8个师和土耳其旅；第二线为美军4个师、英军2个旅和南朝鲜军1个师，并大部集结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地区交通要道上，整个部署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向南撤退的态势。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和在华盛顿的美国当局，也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大规模地出现在朝鲜战场，并且大大出乎其意料他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感到极大不安。他们认为，这已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为了摆脱战场上的危机，寻求挽回败局的出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频繁召开会议，分析朝鲜的形势和研讨对策，然而迟迟找不到良策。英国、法国等，从各自国家的利益考虑，主张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美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则继续坚持侵朝政策，杜鲁门公开声明：尽管“可能要节节败退”，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美国政府不同意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但为了使“联合国军”得到喘息的机会，以便伺机卷土重来，试图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政治宣传，玩弄“停火”把戏。12月14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火小组”的决议，打出了“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以诱使我志愿军停在三八线以北。16日，杜鲁门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侵朝战争不惜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宣布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要将美国军队由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和4倍以上。

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先停火、后谈判”的真实意图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同时，毛泽东主席决定，志愿军必须乘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再消灭敌军几个师，以创造政治上、军事上更有利的条件，消除人们对于三八线的旧印象，加重帝国主义的悲观失败情绪。

据此，彭德怀司令员于12月22日确定：集中志愿军西线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突破“联合国军”三八线既设阵地，歼灭其在临津江东岸迄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的南朝鲜军第1、第6、第2师及第5师一部，如发展顺利，则相机占领汉城、洪川、江陵一线，尔后进行休整。具体部署是：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38、第39、第40、第50军为右纵队，由高浪浦里至永平里地段实施多路突破，并从两翼向敌后迂回，断敌退路，首先歼灭南朝鲜第6师，继则歼灭南朝鲜第1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由第42军首长指挥第42军和第66军为左纵队，主力由水平里至北汉江地段突破，歼灭南朝鲜第2师1至2个团，然后向加平、清平川方向发展，

1个师由华川南渡北汉江向春川佯攻，牵制南朝鲜第5师。另人民军以第2、第5军团由杨口、麟蹄间发起攻击，尔后向洪川方向进攻；第1军团在西线由开城向汶山地区行宽大正面佯攻，以牵制敌军，配合其他各部作战。

为了协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指挥，经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协商，解决了中朝两军统一作战指挥问题。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便在统一协调指挥下进行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连打两仗、来得休整补充情况下，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按计划于1950年12月31日黄昏发起了第三次战役。敌军对志愿军几乎是闻风丧胆，对中朝人民军队的攻势稍作抵挡就撤退逃跑，并且丢盔卸甲，显得非常狼狈。对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作了具体描述：“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南朝鲜人对“联合国军”的败退情景，也作了类似的描写。志愿军发起攻击后，迅速突破了敌军阵地，并向敌军纵深发展，至1951年1月1日，最远已突入敌军纵深15公里。右纵队担任迂回任务的第39军第117师，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截歼向南撤退的南朝鲜第6师600余人；第38军第114师由于走错路，未能按时与第39军之第117师对敌构成合围，当其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南朝鲜第6师1000余人正在南逃，便立即阻击，歼其400余人。左纵队突破后，至1951年1月2日，第66军和第42军在加平东北的济宁里、上南淙、下南淙地区歼灭南朝鲜第2师两个团及第5师1个团大部，共毙伤俘敌军3200余人，缴获各种炮60余门、各种枪1500余支(挺)，胜利完成了预定任务。

1月3日，志愿军和人民军乘胜展开追击，扩张战果。志愿军第50军在高阳以南佛弥地地区截断英第29旅的退路，经一夜激战，全歼其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坦克团一个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31辆。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爆破筒和手榴弹同英军的重型坦克展开了搏斗。其中第149师第446团第5连副排长李光禄，只身冲入敌军坦克群，以爆破筒连续炸毁敌军坦克3辆；第446团第4连战士顾洪臣用爆破筒炸毁敌军坦克2辆后，爆破筒用完，他又高举手榴弹爬上第3辆坦克，掀开炮塔仓盖，迫使敌人投降。李光禄、顾洪臣均荣立特等功。追击中，第39军失头部队同美第24师1个团遭遇，歼其一部，并截歼英第29旅两个连，其他各军和人民军各军团也各截歼敌军一部。1月4日，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解放汉城。1月5日，志愿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地区南渡汉江继续追击，志愿军右纵队和人民军另两个军团也继续追击，各歼敌军一部。至1月8日，“联合国军”已全部撤至三七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涉一线。志愿军和人民军鉴于追击战果不大，并为防止敌军在我侧后实施登陆、对我进行两面夹击，遂停止了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此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毙伤俘敌军1.9万余人，将战线从三八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地区，向南推进80—110公里，粉碎了美国玩弄“停火”、以便整军再战的阴谋，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影响。

三、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志愿军加强出国作战的纪律教育

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同时，全国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早在 1950 年 6 月，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后，全国人民就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向中朝边境，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各族人民更加义愤填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投书报刊，坚决要求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特别是同朝鲜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还筹集了大量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准备随时前往朝鲜担任战场勤务工作。

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更加有组织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 年 10 月 26 日，组成了以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后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此后，全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根据中央指示，具体组织领导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随着志愿军入朝参战，在全国首先展开了以仇视、鄙视、蔑视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为中心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抗美援朝运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洗刷了崇美、恐美、媚美的心理，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

在此教育基础上，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官兵，纷纷递交决心书、清战书，坚决要求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毗邻朝鲜的我国东北地区人民，率先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仅几天，安阳市(今丹东市)和双城县就各有 500 余名青年报名参军，锦州市在十几天内有 1000 余名青年志愿报名参军。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带头将自己的爱子毛岸英送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江苏省奉贤县(现属上海市)范爱乡蔡老妈妈，亲自将 4 个儿子和 1 个女婿送到县城参军；贵州一位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只有 5 天，就牵着马送丈夫到区里参军；内蒙古扎费特旗的一个行政村，有 60 多位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1951 年，全国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两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学生共达 58 万余人。这些，为志愿军的前方作战，准备和输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与此同时，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工作，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服务。全国铁路系统 80% 的员工报名志愿赴朝，仅北京市和上海铁路局的铁路员工赴朝服务的即达 2500 余人。据东北地区各省市 1951 年 6 月的统计，有 5571 名汽车司机赴朝服务，占当时东北地区汽车司机总数的 51.6%。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东北地区即有 5% 的青壮年农民(主要是民兵)随同入朝，其中参加担架队的即有 15 万余人。在上海军医大学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带领下，该校志愿手术队于 1950 年 11 月中旬最先前往朝鲜。

随后，北京、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地的医务工作者，也先后组成医疗队、手术队、防疫队等开赴朝鲜前线。

在抗美援朝总会的组织领导下，全国人民还积极为志愿军捐款、捐物，寄送慰问金、慰问品、慰问信，将志愿军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

1951年3月底，派出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又先后派出了以刘景范和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并于2、3月间，邀请由柴川若等10人组成的志愿军代表团归国，汇报前线志愿军将士抗击美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这些，极大地鼓舞了前线作战的志愿军广大官兵，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

继续加强军事准备 为了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国内继续加强了军事准备。

第一，突击组建或扩建特种兵部队。

空军：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由原来的1个混成旅共4个团，突击扩建和新组建为17个航空兵师共34个团。其中第4师之第10、第12两团，于1950年12月下旬和1951年2月初先后进驻安东机场，进行实战练习，第10团第28大队大队长李汉，于1951年1月21日和29日两次空战中，击落美F-84飞机1架，击伤2架。首开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的记录，荣立一等功，获二级489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9月至12月，空军还在我国东北地区完成了修补31个机场的任务。这些，为后来的志愿军空军大规模参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装甲兵：从苏联购买10个团的坦克，1950年11月先后运到我国，我军共装备3个师（6个团）和3个独立团，经过突击训练，于1951年3月底开始入朝，准备作战炮兵：从1951年初起，突击扩建4个高射炮师，新建两个火箭炮师、两个防坦克炮兵师、数十个高射炮独立营，并改装3个榴弹炮师和两个加农炮团。这些部队从1951年初起陆续赴朝参战。

第二，召开后勤工作会议，重点研究解决运输问题。

为使后勤工作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改善志愿军的供应状况，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会并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的后勤工作推上了新的阶段，“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已过去了，要求后勤工作必须以新的姿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会议重点研究了运输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决定建立几条兵站运输线，改变运输工作的被动局面。为此，从1951年2月开始，陆续增调铁道兵和工兵部队入朝，抢修铁路、赶筑公路，并组织运输团、运输营，赶制马车、手推车等入朝运输。为了解决前线部队的吃饭问题，从1950年11月起，国内赶制了大量炒面。

第三，抽调部队组成第二、第三番作战兵团。

为坚持长期作战，1951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在朝鲜实施轮番作战的方针，除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外，以正在准备入朝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和第3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等作为第二番作战兵团，准备4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一线作战。同时确定第47军和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等作为第三番作战兵团，视情况准备6月份接替第一线作战。并改装了

这些部队的轻武器。与此同时，在东北军区还为第一线部队整训 4 万名老兵和 8 万名新兵，准备补充。

所有这些军事准备，对坚持长期作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志愿军加强出国作战的政治、军事纪律教育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前后，同全国人民一样深入进行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心理，坚定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增强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自觉性。同时，针对出国到朝鲜作战的情况，又特别加强了出国作战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教育。

1950 年 10 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毛泽东主席就在签署的命令中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10 月 16 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讲话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要切实尊重他们。”“这次出国作战，纪律问题更为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与拥护。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志愿军参战以后，1951 年 1 月 25 日，彭德怀司令员在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这一问题，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作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遵循毛泽东主席和志愿军首长的指示，志愿军各部队不断进行教育，并始终把团结朝鲜人民做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利用作战的间隙积极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春种秋收、修渠治水等生产活动以及防疫救灾活动，真正把朝鲜人民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涌现出许多为保护朝鲜人民利益而英勇献身、被中朝两国人民广为赞颂的国际主义战士。第 47 军第 141 师文书罗盛教，在 1952 年 1 月 2 日晨进行投弹训练时，发现朝鲜少年崔莹在河上滑冰不慎掉在冰窟里，他听到呼救声，毫不犹豫立即跳进冰窟，三次潜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将崔莹托上冰面，崔莹得救，他自己却光荣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志愿军铁道军管总局安州分局警卫连战士史元厚，于 1953 年 12 月 1 日，在安州火车站附近为抢救掉进冰窟里的朝鲜儿童赵无弘而光荣牺牲，立一等功，获二级模范称号。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兄弟般的团结，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坚强的政治基础。

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歼敌7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从清川江打回到三八线，又从三八线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取得了战争的重大胜利，并积累了同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部队士气非常高涨。但是，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急需补充休整，并且随着战线南移，后勤运输线延长，加之有美军飞机疯狂轰炸封锁，运输更加困难。于是，志愿军和人民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水原、横城、襄阳一线担任警戒外，主力于1月8日开始，集结于汉城、横城一线以北地区转入休整。

这时，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分析朝鲜战争的前途，认为：

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因为美国要维护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并且自恃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因此，我们必须再进行几次激烈的大规模作战，才能达到解决朝鲜问题的目的。据此，志愿军计划以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3月中旬以前完成春季攻势的各种准备。

第四次战役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经过志愿军和人民军连续三次战役的打击后，失败情绪加剧。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美国同英国、法国之间，关于朝鲜战争政策问题，意见更加分歧。英法等国担心美国在朝鲜陷得太深而削弱对欧洲的力量投入，因而主张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解决朝鲜问题。麦克阿瑟则积极主张要么继续增加力量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美国当局虽曾不得不考虑被迫自朝鲜撤退的问题，但是，并不甘心在战场上的军事失败，更不甘心由此而在政治上失掉面子。为了协调内部矛盾，决定既不扩大战争，也不自动退出朝鲜，要求“联合国军”“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如果一旦被撤出朝鲜，在政治上、军事上也“不承认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并通过联合国施展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为此，1月13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继续玩弄“停火”把戏。当中国政府揭露其阴谋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

与此同时，为了贯彻美国的既定方针，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在战场上也积极进行活动。早在1950年12月底，他刚到任时就曾表示，一旦集结好部队，恢复实力，便发动攻势。在他艰难地稳住了“联合国军”的失败情绪后，1951年1月15日，便开始发动试探进攻，以探明汉江以南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兵力部署。

李奇微还乘飞机亲自到中朝军队阵地上空进行了侦察。经过试探与侦察，李奇微发现中朝军队补给运输很困难，并且第一线兵力不足，认为中朝军队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效地进行作战。于是，“联合国军”从1月25日开始，集中其16个师3个旅和1个团(其中两个师为预备队)共23万亲人的地面部队，统归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指挥，在其空军支援下，采取“磁性战术”，由西而东在全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将志愿军和人民军压回到三八线以北。其部署特点是：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攻，并加大了兵力密度和加强了纵深配备，美军主要兵力在西线，南朝鲜军主要兵力在东线，互相靠拢，齐头并进。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判明“联合国军”企图后，于1月27日立即停止了休整，准备作战。此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兵员尚未得到补充，运输补给的困难尚未得到改善。志愿军第9兵团由于第二次战役时冻饿和作战减员较大，仍在仲整，尚不能立即投入作战，只有第26军可作为预备队使用。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总兵力同敌军相比仅略占优势。根据这种情况，彭德怀司令员经同金日成首相协商，确定了“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并据此确定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部署了第四次战役。即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牵制敌军主攻集团；在东线则让敌军深入，尔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敌一两个师，进而向敌军纵深发展突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军主攻集团，动摇其进攻部署，制止其进攻。具体部署是：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志愿军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称“韩集团”)，展开于西线汉江南岸和仁川、永登浦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军向汉城方向进攻，吸引牵制敌军，掩护东线我军向指定地区开进集结；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称“邓集团”)为主攻集团，迅速向横城及其以西地区集结，寻机歼敌；由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指挥其第2、第3、第5军团(称“金集团”)，向横城以东及以南迂回，断敌迟路，配合邓集团作战；以志愿军第9兵团第26军为预备队。为保证侧后安全，对东西海岸防御也作了部署。

在西线汉江以南地区进攻之“联合国军”，共有6个师又3个旅，即美第3、第24、第25师和骑兵第1师，南朝鲜第1、第6师，英第27、第29旅和土耳其旅，在飞机、坦克和炮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的攻击。我“韩集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托野战工事顽强抗击。特别是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在第38军主力和人民军第1军团尚未到达汉江南岸之前，即已顽强坚守作战10天，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战斗中涌现了许多英雄集体和英雄个人，受到志愿军首长的通令表扬。第38军主力到达汉江南岸后，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该军第114师第342团第2营，坚守京安里以北350.3高地，战斗7昼夜，营长曹玉海、教导员方新，哪里情况紧急就出现在哪里，先后英勇牺牲，分别被追记特等功、一等功和追授一级、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在他俩模范行动的鼓励下，全营打得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坚守作战任务。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敌军在1月25日至2月7日的14天进攻中，付出重大伤亡，只前进18公里。我韩集团在汉江南岸的坚守防御作战，保持了基本阵地，有力地掩护了东线主攻集团的开进、集结。

在东线进攻之“联合国军”共8个师和1个团，即美第2、第7师和空降第187团，南朝鲜第3、第5、第7、第8、第9师和首都师。志愿军以第42军和第66军第198师，人民军以第2、第5军团进行了顽强阻击。第66军第198师在五音山与敌军浴血奋战5昼夜，击退南朝鲜第8师多次进攻，歼其1500余人。该师坚守五音山阵地，被称颂为“英雄的阵地钢铁的山”。

2月9日，美第2师一部和法国营被阻止于砥平里地区，南朝鲜第8、第5师进至横城以北地区。该两部敌军在整个战线上令员批准，邓集团按计划以第40、第42军和第66军主力及第39军之第117师，从北、西、西南方向向横城以北之敌发起迅猛攻击。第42军及第39军之第117师由西向东攻击，截断了南朝鲜第8师向南的退路，第40军和第66军主力从北向南攻击，一夜之间即将南朝鲜第8师战斗队形全部打乱，将该师3个团及美第2师一

部包围在横城以北地区。12日，经过激战，志愿军将被围的南朝鲜第8师所属3个团和美第2师1个营全部歼灭。在战斗中，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表现突出。该团于11日夜沿小路、踏积雪，翻越700米的高山，冲破敌军4次阻击，行程30公里，按时到达穿插位置，截断了敌军南逃退路，仅俘敌即达1100余人，内美军300人，缴获汽车140辆、各种炮24门，击毁坦克4辆，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的表扬。该团第2、第3营分别荣立集体二等功。人民军金集团配合邓集团同时发起攻击，在横城东南地区歼灭南朝鲜第3、第5师各一部，至13日晨。横城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1.2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横城作战的打击下，横城以东之南朝鲜军向南撤至原州、平昌、旌善一线地区，而横城西南砥平里之美第2师部队未动。为扩张战果，13日晚，志愿军按计划以邓集团6个团围歼砥平里之敌，并以两个军兵力前出原州以北及西南地区，阻击东面南朝鲜军西援；人民军全集团向平昌、旌善扩张战果。此时，砥平里计有美第2师第23团和法国营全部，1个炮兵营及1个坦克连，共6000余人，并已构筑了较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志愿军判断砥平里敌军兵力仅为4个营，并对预有坚固设防之敌采取了野战进攻的战法，仓促投入战斗，加之攻击部队建制多、协同动作差、攻击火力弱，致使当夜未能解决战斗。14日晚，调整部署继续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并将美第23团团团长击成重伤，将敌军压缩到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因火炮太少，弹药不足，仍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师第5团20余辆坦克突破志愿军阻击，与砥平里被围之美第23团等部会合，更增加了志愿军攻击的困难。这时，“联合国军”在整个战线上已做好了纵深部署。这样，志愿军即便攻克砥平里，也难以停止其整个进攻。为了争取主动，志愿军于16日拂晓前，撤出砥平里战斗向北转移。随后，前出的两个军和人民军金集团也向北转移。西线韩集团在圆满地完成了阻击牵制敌军、掩护东线邓集团反击的任务后，于2月16日至18日，也全部撤至汉江北岸。

这时，中央军委已确定志愿军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令以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于2月15日开始入朝，并决定以陈康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成第3兵团领导机构，辖第12、第15、第60军，于3月中旬入朝(陈质未到职，由王近山副司令员率部入朝)。以该两兵团和在朝鲜休整的第9兵团作为第二番作战部队，于4月中旬以后接替第一线作战。第50军和第66军于第二番部队到达前线后，回国担任防务。

志愿军和人民军向北转移后，“联合国军”于2月19日开始反扑。在进攻中，3月28日，美军在战场上首次以直升机1架，载步兵30余人，在志愿军旺方山前沿阵地实施机降作战。

为迟滞“联合国军”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开进集结，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作战。从汉江北岸至三八线附近，共设置三道防线，要求每道防线抗击20天至30天时间。在运动防御过程中，志愿军和人民军采取了纵深梯次配备、节节抗击的方式和“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配备前重后轻”的部署原则，在粮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依靠一般野战工事，逐山逐水地节节抗击，迫使敌军只能昼攻夜缩，缓缓前进。志愿军大量杀伤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作战中，1951年3月底4月初，第40军在春川以南、金化以北地区抗击敌军3个师又1个旅(其中2个美军

师、1个英军旅)的进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90余次,歼敌5000余人,该军许多官兵表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其中第360团第卫连副班长曹庆功,在阵地上只剩他一人并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又击退敌军1个排的3次冲击,最后与敌同归于尽;第358团第3连班长王学凤,在子弹打光、身负重伤后,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军,自己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副班长刘维汉拉燃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冲向进攻的敌群。他们均被迫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第26军扼守七峰山、海龙山阵地的部队,在3月28日的战斗中,同敌军反复争夺11次,杀伤敌军1000余人,并创造了1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军坦克9辆的范例。

4月15日,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第3、第9、第19兵团已先后开到前线完成了集结。“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第二番兵团集结后,除在局部地区仍进攻外,其余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至4月2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完成了迟滞敌军进攻、掩护后续部队开进集结的任务,将“联合国军”阻止于三八线南北地区,第四次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是在连续进行三次战役之后,未得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诸多困难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役,但全体官兵发扬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坚守防御和战役反击相结合,阵地防御和运动防御相结合的战法,灵活地抗击敌军的猛烈进攻,顽强奋战87天,歼敌7.8万余人,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赢得了时间,为实施下一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来,美国在侵朝战争中连遭失败,加之麦克阿瑟同美国政府之间在侵朝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不经美国总统批准便擅自发表政策性声明,于是,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任命李奇微接替,同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接替李奇微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这时,美国的方针是,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据有利地位后,即“以实力政策为基础”,或与中朝方面举行外交谈判,或继续以军事行动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美国军方认为,在朝鲜北部对军事上有利的地区是其蜂腰部的平壤、元山一线,因而计划“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线(即平壤、元山一线)及以北地区,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这时,美国正在加速整训在日本的3个南朝鲜师,扩建南朝鲜釜山、金浦等空军基地,并将美国国内的国民警卫第40、第45师调往日本,准备用于朝鲜战场。

此时,中共中央已为志愿军确定了“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夺回主动权,志愿军部署了第五次战役。决定集中11个军,采取战役分割同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同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西线的位山至春川间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南朝鲜第1、第6师,美第3师、英第29旅和土耳其旅,共3个师又2个旅,尔后会歼美第24、第25师。具体部署是:以第40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联合国军”东西割裂,并以第39军牵制华川和春川间之美军,不使其西援;与此同时,以第3兵团实施中央突击,以第9、第19兵团分由东西两翼实施突击,并进行战役迂回。另外,志愿军炮兵有500余门火炮参加作战。为防止“联合国军”在侧后登陆和空降,以志愿军第42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第38军位于肃川地区,

第 47 军(4 月 11 日入朝)位于平壤地区，以人民军两个军团位于淮阳、华川地区和沙里院、载宁地区，待敌军登陆和空降后将其歼灭之。志愿军首长特别指出：“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我军夺取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延长的关键。”并特别强调了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这次战役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到达前线后，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为：志愿军 11 个军 58 万人，人民军 4 个军团约 10 万人。“联合国军”方面地面部队共 16 个师 3 个旅和 1 个团 34 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为 2.02 :1，中朝军队方面占优势。但敌军在装备上仍占有很大的优势，并有空军的支援。经过必要的准备后，4 月 22 日黄昏，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担任左翼突击任务的第 9 兵团突破敌防御后，进展顺利，于 23 日夜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其第 20、第 26、第 27 军前出 15 至 20 公里，歼敌军一部。归该兵团指挥、担负战役割裂任务的第 40 军，动作勇猛迅速，按计划打开了战役缺口，直插敌军纵深，圆满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在穿插作战中，该军第 118 师第 354 团第 3 营，在团参谋长刘玉珠带领下，沿途打破敌军 5 次拦阻，以每小时 8 公里的速度急进，提前插到指定位置，并迅速展开，阻止了数倍于己之敌西援，予敌以重大杀伤，该营第 7、第 8 连荣立集体一等功。至 25 日，该军共歼敌 2000 余人，缴获汽车 230 余辆，火炮 60 余门。归第 9 兵团指挥的第 39 军也按时前出到指定地区。

将美陆战第 1 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使其不得西援。与此同时，担任正面突击的第 3 兵团和担任右翼突击的第 19 兵团及人民军部队，也按计划发起攻击。其中第 3 兵团和第 19 兵团之第 64 军突破后，攻击受阻，一度发展不很顺利。战至 4 月 26 日，中朝军队歼南朝鲜第 1 师、第 6 师、美第 3 师、第 24 师和英第 29 旅各一部。其中在右翼发起进攻的第 63 军，突破后，迅速占领英第 29 旅第一线阵地，第 188 师在新占阵地上同敌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该师第 564 团第 7 连战士陈三，在两个班据守的阵地上打得只剩他一人时，孤胆作战，轮番使用轻机枪、冲锋枪等 5 件武器，连续打退敌军 200 余人的 3 次反扑，毙伤敌军 80 余人，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第 187 师第 561 团，以无坚不摧的精神，神速勇猛地直插英第 29 旅纵深第一个制高点绀岳山，分割了该旅同其右翼美第 3 师的联系，截断了其南逃退路，与正面攻击的第 560 团相配合，全歼英第 29 旅皇家格劳斯特郡团第 1 营及配属的炮兵、坦克各 1 个连。该团第 2 连战士刘光子，在截歼逃敌时，发现一个山沟里挤了许多敌军，便只身迂回到敌后，突然用冲锋枪扫射，又投出手雷，趁烟雾冲入敌群，俘虏 63 名英军士兵，荣立一等功，获二级孤胆英雄称号。第 64 军第 190 师侦察支队同第 569 团第 3 营组成先遣支队，在 20 小时内，打破敌军 7 次拦阻，俘敌 100 余人，突入敌军纵深 25 公里，胜利前出到议政府西南之道峰山，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军心脏，并忍受饥饿和疲劳，坚守道峰山战斗 3 天 4 夜，分获“道峰山支队”和“道峰山营”光荣称号，第 569 团第 3 营并荣立集体二等功。

至 26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连续作战 5 天，予“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但“联合国军”在部署上齐头紧靠，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中朝军队插入其纵深必须经过艰苦作战方能打开缺口，致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迂回目的，歼敌有限。战至 28 日，“联合国军”主力撤至

汉城、汉江及昭阳江一线组织防御，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城以北地区歼敌机会已失，遂于4月29日停止了进攻，而以小部逼近汉城近郊、汉江和春川东西地区，同敌军保持接触，掩护主力转入整补。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平均向南推进48公里，共歼敌2.3万余人。

此时，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而东北的斜线态势，而东线从自隐里至东海岸一线之敌全系南朝鲜军，共6个师，并且态势突出。我军7个师和英军2个旅、土耳其旅均在西线，这有利于志愿军和人民军集中兵力在东线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鉴于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结束第一阶段作战时，即决定下一步作战，以第3、第9两个兵团隐蔽东移，求得在东线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将敌军牵制在正面战线，使其无力抽兵在我侧后进行登陆。为达此目的，令第39军进至洪川、春川间掩护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令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东西地区作渡江南进姿态，实施佯动，以迷惑和牵制西线美军。同时，将第40军从第一线调往沙里院地区，配合在肃川、平壤地区的第38、第47军和位于西海岸的人民军部队，随时准备歼灭在西海岸登陆之敌；将第26军从第一线调至平康地区，配合在元山、阳德地区的第42军，随时准备歼灭在东海岸登陆之敌。

5月上旬，志愿军和人民军下达了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志愿军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和第12军)和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首先歼灭县里地区的南朝鲜第3、第5、第7、第9师，尔后视情况继歼南朝鲜首都师和第11师；以志愿军第3兵团(指挥第15、第60、第39军)割裂美军同南朝鲜军的联系，阻击美军东援，其第39军完成掩护第3、第9兵团东移任务、待战役告一段落后，撤至成川地区整补备战；以第19兵团(指挥所属第63、第64、第65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积极行动，选择2—3个敌军营级单位防守的目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配合东线作战。同时指出了实现战役企图的关键，一是第19兵团的积极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二是第3、第9兵团开进要组织得好，切实隐蔽，不让敌军发觉我大军东移；三是东线几把合围的钳子按时到达合钳位置，迅速达成两翼迂回，多路切断，层层包围；四是各部及时报告敌情和自己的位置，掌握战机，积极歼敌。

第19兵团在西线的佯动，迷惑了敌军；第3、第9兵团也秘密完成了东移，致使李奇微一直以为志愿军和人民军会以战线中西部地区为主要攻击方向。这样，5月16日，志愿军和人民军便按预定计划出敌预料地在东线发起了主要攻击。第9兵团和人民军部队突破南朝鲜军防御后，至17日中午，志愿军第20军和人民军第5军团对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构成了合围，截断了其退路，尔后该两支部队对被围之南朝鲜军展开了攻歼战。18日晨，被围的南朝鲜第3、第9师动摇溃乱，开始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我第20军山西向东，人民军第5军团由东向西，夹击该敌，战至19日，将南朝鲜第3、第9两师大部歼灭，缴获其全部重装备。与此同时，第27军第81师和第20军第60师，在县里以南上南里地区歼南朝鲜军第5、第7师共5个营3000余人，南朝鲜第5、第7师土崩瓦解；第12军歼美第2师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20日，第27军和第12军各1个团，人民军第5军团一部，已前出到束沙里和下珍富里地区。由于南朝鲜军遭到严重打击，其第3军团被撤销了建制，该军团所属第3、第7师分别被编入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战斗中，志愿军第27军第81师师长孙端夫率该师第242团第2营、第20军第187团第

5连连长毛张苗率领该连分别执行穿插任务，沿途各经10余次大小战斗，打破敌军多次阻拦，及时抢占了合围要点，切断敌军退路，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孙端夫立二等功，毛张苗立一等功并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第81师第242团第2营获“穿插模范营”称号。

第3兵团和第19兵团也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其中第15军第44师歼美第2师第38团大部。该军第130团第9连排长崔建国，带领全排担任突击任务，连续爆破4个地堡，攻占了3个山头，直捣美第38团后方，并与撤退美军展开肉搏战，崔建国一人刺死6个美国兵，又用缴获的武器毙敌20余人，俘敌8人，荣立一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20日，美军主力已从西线逐次东移，其第3师进至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堵塞了战役缺口，志愿军和人民军遂于21日胜利结束了第二阶段作战。这一阶段又毙伤俘敌2.3万余人。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一个月內已连打两仗，甚为疲劳，并且粮弹将尽，运输补给困难，又值雨季将至，背靠江湖沼泽，一旦山洪爆发，交通中断，补给更加困难，于是，中朝军队首长决定，主力向北转移，撤至三八线以北之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之线地区集结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同时令各兵团留1个军或1个师，于现位置展开，实施机动防御，节节抗击，争取时间掩护主力转移。

5月22日，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开始向北转移。此时，“联合国军”利用中朝军队补给困难的弱点，集中第一线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为先导，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多路反扑。

中朝军队主力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然而，由于对“联合国军”有计划地迅速实施大规模反扑，缺乏足够的估计，以致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掩护主力转移的部队，有的尚需2至3天时间的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虽进入了防御地区，但未能很好控制要点和公路，以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放军“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一度造成了转移中的被动局面。至5月26日，志愿军有的部队被隔断。第60军第180师几乎完全处于被敌包围的态势；第12军第91团被远隔在敌后。为稳定局势，27日，中朝军队决定志愿军第64、第63、第15、第26、第20军和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停止休整，主力迅速展开于三八线南北的临律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转入防御，阻击敌军进攻。同时组织接应被隔在敌后的部队。彼隔在敌后的第12军第91团绕道转移，安全脱离险境。第60军第180师部队顽强作战、奋力突围，但该师首长临机处置失当，致遭受严重损失。

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阻击的部队，在减员较大，未得补充，粮弹补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顽强作战，大量杀伤消耗敌军有生力量，迟滞敌军进攻。28日至30日，第65军对进至涟川的美第1军部队，第20军对进占华川地区的美第9军部队，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击，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川。在阻击作战中，志愿军部队涌现了许多英勇事迹。第63军第563团第8连，在连长郭恩志带领下，坚守涟川东北255.1高地，抗击美骑兵第1师两个营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被敌军包围后，搜集起全连仅有的13发子弹突出重围。该连坚守4昼夜，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伤敌军800余人，荣获“特功第八连”称号，郭恩志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该团第1连第2排坚守在两面临敌、两面是悬崖的法化洞北山阵地上，抗击美军1个营的进

攻，毙伤敌 100 余人，最后全排剩下副排长李秉群和战士何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孟彦秋、瞿过灵、侯天佑、罗俊成等 8 个人，子弹打光，被敌包围，他们宁死不屈，壮烈地跳下悬崖，被称颂为“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第 15 军第 45 师第 134 团，在金化地区坚守作战 7 昼夜，毙伤敌 1400 余人。该团第 7 连 19 岁的苗族新战士刘兴文用一箱手榴弹与机枪手共同坚守阵地 10 小时，击退敌人 11 次冲击，毙伤敌 100 余人，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该团第 8 连班长柴云振，带领 4 名战士，插入敌后，连夺 3 个山头，毙敌 200 余人，自己无一伤亡，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在战后隐功 30 余年，默默为人民做奉献。第 15 军坚守铁原、金化地区作战 10 昼夜，共毙伤敌军 5700 余人。第 20 军第 58 师，在华川以北地区坚守作战 13 昼夜，毙伤敌军 7400 余人。其他各军和人民军各军团也予敌以重大杀伤，有力地迟滞了敌军进攻。6 月 1 日，志愿军以第 47、第 42、第 20、第 27 军在新幕、伊川、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至 6 月 10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 3.6 万余人，将“联合国军”阻止于三八线南北地区的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连续奋战 50 天，共歼敌 8.2 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在第四次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使新参战兵团得到了锻炼。经过这次战役的打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一步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力量的强大，从而不得不放弃其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并接受停战谈判。

第十六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战略转变

一、中共中央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

朝鲜战争进行到 1951 年 5、6 月间，敌我双方经过反复较量，力量对比趋于均势，基本上形成了相持局面。

这时，同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相比，双方的军事力量都有很大的变化。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总兵力由 42 万人增加到 69 万人，其地面部队计有美军 7 个师 1 个团，南朝鲜军 10 个师及其他国家军队 4 个旅等；飞机由 1100 架增加到 1700 架；坦克由 880 辆增加到 1130 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由 2820 余门增加到 3560 余门；军舰 270 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方面，总兵力由 41 万余人增加到 112 万余人（其中志愿军由 30 万人增加到 77 万余人），计有志愿军 14 个军、人民军 7 个军团及一些特种兵部队；飞机 200 架（人民军），坦克 210 辆，轻迫击炮以上各种火炮由 1500 门增加到 2080 门（志愿军）；没有海军参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在兵力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方面以 1.6 : 1 占优势，但在装备上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不仅飞机、坦克、火炮的数量少于美军，而且坦克和火炮在质量上也不如美军，美军方面仍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

战争实践表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虽然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军队装备具有绝对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已将其陆军作战部队的 1/3，空军的 1/5 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了朝鲜战争，但仍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美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地区后，不但再也无力打到鸭绿江边，而且从三八线以南将战线每向北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美国依靠战场上的现有兵力已不可能达到其侵占全朝鲜的目标了。而美国军队总数有限，除去进行侵朝战争和派驻世界各军事基地的部队外，美国国内的陆军作战部队只有 6 个多师了，已没有机动部队可再调往朝鲜，其海军和空军也无力再往朝鲜增调部队。联合国成员中的其他参战国，多是象征性地派出部队，此时更不愿再往朝鲜增兵，并且有的国家还宣称，将其已派到朝鲜的部队召回一部分以加强本国防务。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早就主张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以减少其在朝鲜的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同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美国侵朝以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陷在朝鲜而不是部署在欧洲，这与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的矛盾。美国总统杜鲁门谈到这时的情况说：“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美国当局已经看到“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战争的。”加之，美国在侵朝战争一年中已付出了伤亡 10 万余人，消耗军费 100 多亿美元的重大代价，非但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更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加深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美国在朝鲜已经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了。这些，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侵朝战争的政策。经过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辩论争吵，5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沿三八线一带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被迫放弃其侵占全朝鲜的军事目标，准备同中朝军队方面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据此，美国一方面指示其侵朝军队在战场上转入战略防御，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另一方面，在外交上积极活动，急切谋求和谈。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美国在朝鲜谋求和谈的愿望。6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沿三八线地带谋求停火。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完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依靠劣势装备，经过连续8个月的作战，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共毙伤俘敌军23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8个月的作战解决了我军能不能打的问题。实践表明，我志愿军虽然没有海军、空军的支援配合，装备落后，但是仍然可以同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进行战场较量，并且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由于敌我装备优劣悬殊和朝鲜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我军在作战中也有许多困难，这主要是：第一，难以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在作战中，一次战役可以包围敌军一个或几个整师，但成建制地歼灭其一个师、甚至一个整团都比较困难。第二，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困难。现代条件下作战，物资消耗量大，并且我军物资补给难以取之于敌，也不能就地补给，几乎全靠从国内运输。由于运输工具质量落后、数量又少，加以美军飞机的轰炸封锁，运输效率很低，在前三次战役期间，粮食运输只能保证需要量的25%，在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也只能保证需要量的50%，弹药只能重点保证。这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甚至限制了战役的规模和持续作战的时间。第三，白天没有行动自由。我军没有制空权，对空作战火器也很有限，入朝初期只有1个高射炮兵团36门高炮，后来虽然陆续有些高射炮部队入朝，总计高射炮也仅约有800门。这样，我军几乎一切作战和运输活动均在夜间进行。第四，朝鲜幅员狭小、三面环海、南北狭长的地理特点，限制了我军优势兵力的充分发挥。我军不便于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实施大规模的广泛机动作战，也不能另辟战场，而这种地理特点有利于敌军依靠其海空军的优势在我军侧后实施登陆进攻，等等。这样，我军难以在短时间内歼灭或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战争若长期打下去，国内的经济建设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将由于支援战争而受到影响，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能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都是有利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在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击美国的侵略，恢复朝鲜的和平。在此之前，只是由于美国执意坚持继续侵略，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不可能。而这时，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已暂时放弃了其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并已做出了愿意沿三八线一带谈判停火的表示。这样，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和可能性已经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商讨了战争的方针问题，确定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保证谈判顺利进行，并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为此，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在作战上“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毛泽东主席和中

中央军委当时在作战指导上作了如下一些具体规定：(一)关于作战地区。在敌军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和三八点五度线。这一地区对我军集中和机动兵力作战，对减轻供应负担和防止敌军登陆进攻均有利。作战前伸的最远目标，打到三八线为止(当时战线，临津江以东在三八线以北)。这不但于我军供应有利，而且政治上也有利。(二)关于兵力的安排使用。根据朝鲜地理特点和作战需要及补充能力，除特种兵继续在朝作战外，以 18 个军分为两批轮番作战，正面第一线部署 9 个军，第二线和东西海岸部署 9 个军担负海岸防御和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另以 2 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为总预备队。视情况，还可采取轮番与换班相结合的方式，以坚持长期作战。

(三)关于作战方式。一般不实行大踏步进退和死守一地的方式，而采取“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也即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四)关于歼敌的指导原则。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和我军历次作战的经验，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针，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即每个战役我军每 1 个军以歼灭美、英军 1 个营或南朝鲜军 1 个团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从此，我军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开始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二、我军持久作战的各种准备以及停战谈判开始

为贯彻中共中央“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我军进行了各种准备。

第一，在部队中广泛进行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1951年6月下旬，志愿军专门召开党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方针。此后，志愿军政治部又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地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等，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经过教育，全军普遍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并更加坚定了必胜信心。

第二，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志愿军初入朝时，基本上是第13兵团的部队。随着第9、第19、第3等兵团陆续入朝参战，为统一和协调各兵团的作战指挥，于1951年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陈赓、宋时轮分别任志愿军第二、第三副司令员，仍兼第3、第9兵团司令员。8月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参加谈判代表团）。

第三，加强后勤建设。1951年5月3日，志愿军党委专门作出了加强后勤工作的决定，5月19日，中央军委又专门作出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6月份组成了以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军、师、团各级也分别以一个副职加强本级后勤领导工作。从此，在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领导下，全面加强了志愿军的后勤建设。另外，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定，战时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以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运输补给，并组成了由贺晋年为司令员，张明远（东北局秘书长）为政治委员的铁道运输司令部。

第四，修建朝鲜境内的飞机场，准备空军入朝作战。为使空军能尽快参战，并能尽快以朝鲜境内的机场为基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早在1950年12月下旬，志愿军即派出1个歼击机航空兵大队，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实战练习。1951年3月，又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与此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朝鲜平壤以北地区开始修复飞机场。9月初，又专门调以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的第23兵团（率2个军共4个师）入朝修建3个新的飞机场。

第五，调新的作战力量入朝。根据战场需要，6月初调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治委员的第20兵团率第67、第68军入朝。7月上旬又调第50军第二次入朝。另调4个坦克团和经过改装的4个炮兵团入朝。

第六，组建游击支队，准备深入敌后作战。为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打击敌人，在战略和战役上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从各部队中抽调侦察骨干共2000余人，组成了游击支队，于7月中旬集中完毕。（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故游击支队未深入敌后，1952年8月撤销。其中志愿军的4个中队，改编为志愿军司令部直属独立团。）

此外，在国内继续进行文前工作，并进行了停战谈判的宣传教育。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善志愿军的装备而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全国人民响应号召，至1952年5月31日止，共捐款5.56亿元人民币，当时，可供购买3700余架作战飞机。7月3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宣传指示，对为什么赞成停战，为什么提出在三八线停战，谈判能否成功等

问题作了说明，并指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抗美援朝的各项工作都照旧进行，不得有丝毫的松懈。

在为坚持长期作战进行准备的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也做好了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的准备。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根据朝鲜战争中敌对双方的意向，建议“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据此，并根据美方要求谈判的愿望，我志愿军与人民军于7月初共同组成了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张平山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为代表的谈判代表团。为领导志愿军的谈判工作，中共中央专门组成了由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为委员的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在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领导下，整个朝中方面停战谈判的具体工作均由李克农主持。

6月30日，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建议双方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谈判会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与美方会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双方经联络协商，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出现了边打边谈、打谈交织进行的复杂局面。

第十七章 以打促谈，胜利停战

一、粉碎“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美国虽然被迫谋求和谈，但并不甘心在战争中的失败，也不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因此，谈判一开始，“联合国军”代表团(除一名南朝鲜军代表外，余均为美军代表。下文称“美方代表团”)就采取了拖延、讹诈政策。在1951年7月10日的第一次谈判会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简称“朝中代表团”)为了表明早日实现朝鲜和平的愿望，提出了三项建议：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十公里，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朝中代表团以这三项建议为基础，提出了谈判的五项议程方案。然而，美方代表团避而不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更不谈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却喋喋不休地声明，“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有许多内容与停战谈判无关的议程方案。在尔后的谈判中，美方代表团则以种种借口，蛮横拒绝讨论从朝鲜撤出军队问题；对于以三八线为界问题，也背离美国政府的有关声明，出尔反尔，拒绝将其列入谈判议程。此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并指令其首席代表特纳·乔埃，在谈判中，以“简短、生硬、有力的语言回答，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于是，美方代表团在谈判中表现出既蛮横，又无礼貌。

我朝中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坚持说理的态度，为了表示对谈判的诚意，以便早日达成关于议程的协议，在上述美方所提的两个问题上作了让步。即不再坚持将其列入议程，而留待具体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再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这一立场；关于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提议留待停战实现后，交由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召开高级会议来解决，并将这一提议作为谈判的一项议程。

这样，历经半个月的时间，关于谈判的议程问题方于7月26日以朝中代表团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达成协议，其内容包括：(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实现停火体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俘虏的安排；(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在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开始前，本来就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团，认为朝中方面的让步是软弱的表现，因此显得更加傲慢无礼，不但蛮横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且狂妄地炫耀其海空军“优势”。并无理要求这种“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得到“补偿”。美方首席代表乔埃说：地面部队的战线不能反映双方部队的实际力量，联合国军具有海空军的优势，一旦停战，联合国军将放弃这种优势，因此在选择非军事区时，联合国军方面必须“得到补偿”。为此，美方代表团标定了一份他们所要求的军事分界线的地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的地区。根据美方标定的这条军事分界线，我中朝军队将从双方实际接触线退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

对美方狂妄无理的要求，我朝中代表团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指出：你们陆上战线集中地反映了你们陆海空军的全部效能，正是因为你们依靠海空军优势进行毫无人道的狂轰滥炸，才勉强地、暂时地维持了你们地面部队

的现状。假使没有你们海空军优势的掩护和支持，你们的地面部队早就不知道撤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美方又非常可笑地提出，因为他们陆军弱，因此也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的要求。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中代表团的有力驳斥。

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照样没有得到，于是便诉诸武力，以飞机大炮相威胁，发动军事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夺取其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同时，还在开城连续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枪杀我方军事警察，轰炸开城我方代表团驻所，致使停战谈判无法进行。朝中方面遂于8月23日通知美方停开谈判会议，以待美方对其挑衅事件作出负责的处理。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转到了战场上飞机大炮的“辩论”。

8月18日开始，“联合国军”以美第2师、陆战第1师和南朝鲜第7、第5、第8、第11师及首都师共7个师发动了夏季攻势，其进攻的主要地区是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防守的北汉江至东海岸正面约80公里的地段。争夺最激烈的是1211高地至851高地地区。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可能在谈判中发动军事攻势，迫我订立“城下之盟”，早有预料，并作了必要的防备，构筑了防御工事。在“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后，朝鲜人民军依托野战工事，在因遭受特大洪水灾害而补给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顽强抗击，激战一个月，予敌军重大杀伤。至9月18日，除851高地至1211高地地区仍在激烈争夺外，敌之进攻被粉碎。朝鲜人民军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联合国军”突入朝方阵地2至8公里。851高地至1211高地地区，战至10月13日，美军因遭受重大损失，也被迫停止进攻。据南朝鲜国防部的材料称，仅进攻851高地地区的美第2师即伤亡4000余人。因此，美军称该地区为“伤心岭”。

志愿军为了配合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第一线各军遵照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的指示，于9月上旬积极进行了战术反击。这时，志愿军第一线共展开6个军，西起礼成江口、东到北汉江，依次为第65、第64、第47、第42、第26、第27军(第65军于8月底刚调到第一线担负保卫开城任务，未参加9月上旬的战术反击)。9月1日至3日，位于东线人民军右邻、北汉江以西地区的第27军，以3个步兵团在5个炮兵营支援下，向金城以南780.1高地、黑云吐岭、734高地一线美第7师防守的7个阵地攻击16次，连同打敌反扑，共毙伤俘敌1900余人。9月5日和6日，第64、第47、第42、第26军各以一部也分别向涟川以南德寺里、铁原西南338.1高地、铁原西北中马山、平康东南西方山和斗流峰等各由美军1至2个连防守的阵地实施反击，除中马山一处未成功外，其余均达到了预定歼敌目的，共毙伤敌2000余人，并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作战。

“联合国军”夏季攻势没有达到目的，并不甘心，经过准备后，于9月29日开始，集中兵力、火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又发动了秋季攻势。其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志愿军防守的高浪浦里至铁原地区和北汉江东西地区的阵地。这时，志愿军第67军已接替了第27军防务，第68军正准备接替北汉江左岸人民军第5军团的防务。“联合国军”以美第3师、骑兵第1师，泰国团和英联邦师(由英第28、第29旅和加拿大第25旅以及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参战国地面部队合编而成)，先在西线向我第 47 军和第 64 军防守的 40 公里的正面阵地发动猛烈进攻，紧接着 10 月 5 日开始，以美第 2、第 7、第 24 师和南朝鲜第 2、第 6、第 8 师在东线向志愿军第 68 军（正在接防）和第 67 军防守的北汉江东西约 40 公里地段发动猛烈进攻。“联合国军”在进攻中，实施所谓“坦克劈入战”，每次攻击，集中数十辆至二百余辆坦克，并有大量空军和炮兵火力支援。志愿军许多阵地被炸成焦土。

我志愿军各军遵照志愿军首长指示，依托野战工事，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实施了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在许多阵地上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反复争夺。我第 64 军防守的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其中防守 216.8 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掩蔽部在一天内击退英军 21 次冲击，毙伤其 700 余人，自身仅伤亡 26 人。第 47 军防守天德山及以西 418 高地营，在副团长狄进喜指挥下每天击退美军以两个团兵力实施的 10 余次冲击，激战 3 天，阵地变为焦土，人员大部伤亡，最后仅剩狄进喜和 10 余名伤员仍顽强作战，阵地屹立未动，后主动撤离。第 67 军和第 68 军均是入朝以来首次作战，而第 68 军是边接防边作战，一上阵地就接受了严峻的考验。该两军特别注意打敌坦克，设置了防坦克地域，组织了专门的反坦克分队。第 68 军第 612 团第 3 营机炮连战士胡连，潜伏在文登公路，用无坐力炮创造了一天击毁敌军坦克 4 辆的战绩，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第 610 团第 3 连排长牛瑞山，带领一个小组用埋设地雷的方法，先后炸毁敌军坦克 10 辆，荣立特等功；第 607 团第 2 营机枪连战士郑玉田，以高超的无坐力炮射击技术，用 14 发炮弹击毁敌军坦克 8 辆，荣立特等功。第 67、第 68 两军在北汉江东西地区的防御作战中，共击毁击伤敌军坦克 83 辆，其中第 68 军在文登里地区即击毁敌军坦克 28 辆、击伤 8 辆。在我志愿军的顽强抗击下，敌军付出了大量的伤亡，西线战至 10 月 18 日、东线战至 10 月 22 日，敌被迫停止了攻击，其秋季攻势被粉碎。我军共毙伤俘敌 7.9 万余人，局部地区阵地被敌军突入 6 至 9 公里。

“联合国军”两个多月的夏秋季攻势共付出 15.7 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已无力再继续发动攻势，而且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才在局部地区攻进几公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认为李奇微的作法“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美国国会也指责：李奇微发动这种攻势是“得不偿失”的。真是谈判桌上的舌战讨不到便宜，飞机大炮的“辩论”则损失更大。两个月飞机大炮“辩论”的结果，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经过双方协商后，谈判会场从开城迁到板门店。10 月 25 日，谈判会议在新会址板门店恢复。美国方面由于在战场上遭到失败，而再未敢提及其海空军优势要得到“补偿”的无理要求，并且其蛮横的态度也大有收敛。但是，在其新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中，仍企图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现有战线退出 1500 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撤出开城地区。

对此，朝中方面代表团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此同时，志愿军为了收复一些阵地和显示军事力量，打击“联合国军”的士气，增加对敌方的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乘“联合国军”疲劳之际，于 10 月 30 日起到 11 月底止，以第一线之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67（11 月 7 日由第 12 军接替）、第 68 军，分别在各自正面上选择敌军突出、暴露或薄弱的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实施了战术反击，共对 26 个阵地攻击 34 次。11

月4日,我第47军以11个步兵连在114门火炮和11辆坦克支援下,进攻美骑兵第1师3个连防守的正洞西山阵地,经3小时战斗,全歼守敌。次日,敌军以两个营兵力反扑,在遭到我军大量杀伤后,重新占领该阵地。是日晚,我军乘敌立足未稳,组织10个连的兵力在炮兵支援下再次反击,又全歼敌军1个营另1个连。我第47军在该阵地先后共歼敌2500余人,巩固了该阵地,创造了阵地进攻作战打小歼灭战的范例。与第47军攻击正洞西山的同时,11月4日,第64军以3个营的兵力在60门火炮支援下,出其不意地于白天向英第28旅1个营防守的马良山阵地发动攻击,经4小时激战,全歼守敌,5日至7日,又连续打敌反扑,共毙伤敌1740余人,巩固了这一阵地。此次反击作战,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攻克阵地21个,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9个。第65军于11月中旬开始,对开城以南地区进行两次扫荡作战,扩展土地280余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志愿军总部增调第63军加强了开城地区的防御。在正面备军举行战术反击的同时,为配合关于撤退岛屿部队问题的谈判,清除朝鲜西部沿海岛屿“联合国军”特务情报基地,志愿军和人民军驻西海岸部队,采取“由近而远,逐岛作战”的方针,于11月5日至30日,实施了攻岛作战。志愿军第50军在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间组织4次渡海作战,攻占10余个岛屿,共歼敌特武装570余人。在此期间,11月6日、29日和30日,志愿军空军轰炸机第8、第10师先后共出动杜-2飞机28架次轰炸大和岛,首次直接配合了地面部队作战。在11月30日的轰炸战斗中,担负空中掩护任务的志愿军空军第2师第4团副大队长王天保,驾驶拉-11活塞式飞机与美军F-86喷气式飞机展开激战,利用活塞式飞机转弯半径小的优势,同敌机周旋格斗,击落敌机1架、击伤3架,创造了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范例,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轰炸机编队遭到30余架美F-86飞机围攻,带队长机第8师第24团大队长高月明,坚定沉着,带领编队且战且进,对预定目标进行了轰炸,并指挥编队击落敌机3架、击伤5架,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人民军海防部队在大同江口和瓮津半岛附近也相继攻占了一些岛屿,歼敌特武装200余人。

在中朝军队的有力打击下,美方代表团不得不逐渐放弃其无理要求。朝中方面代表团为了实现早日停战的愿望,也作了让步,于11月初提出了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以此线为准备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的建议(实际上仍是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军事分界线)。美方再也无法耍赖,只好接受了这一方案,但又不愿以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最后军事分界线,而提出以30天限期,即若在30天期满后实现停战,届时则重新校正军事分界线。在朝中代表团的努力下,11月27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从6月中旬至11月底,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给了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并且取得了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作战的初步经验。中朝军队在这期间也付出9.1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二、粉碎美军“绞杀战”，建成钢铁运输线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在地面部队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以其空军对中朝军队后方发动了空中攻势。

对中朝军队后方的轰炸破坏，一直是美国侵朝战争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线稳定，美国侵朝空军当局认为，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已不能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于是，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指令，美国空军将其作战力量集中用于轰炸中朝军队的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系统，并选中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轰炸目标，计划以90天左右的时间，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使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以隔断中朝军队前方与后方的联系，“绞杀”中朝军队前线作战力量，迫使朝中代表团在谈判中接受其无理要求。为达此目的，美国侵朝空军和海军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执行这一轰炸任务。这时，美国侵朝的作战飞机计有第5航空队各型飞机约900架，其中F-84、F-80、F-51等型战斗轰炸机450架，B-26轻型轰炸机96架，F-86、F-80型战斗截击机160架，其他飞机200架，全部以南朝鲜为基地！远东轰炸机指挥部B-29型战略轰炸机和侦察机共115架，以日本本土和冲绳岛为基地；远东海军舰载航空兵各型飞机300架。此外，驻日本的第314空军师各型飞机175架，第315空运师各型飞机250架，其他勤务飞机80架。总计约1800架。美国侵朝空军当局对轰炸中朝军队运输系统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会使中朝军队实力大为削弱，以致于很容易被美军地面部队击溃，或被迫自动向北撤到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以解决补给问题，于是将这一轰炸计划称为“绞杀战”。

“绞杀战”自1951年8月18日开始。此时，正值朝鲜雨季，并且暴发了数十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主要江河上的铁路桥梁大部被冲坏，公路桥梁也被冲毁50%。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工兵部队、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部队，全部投入抗洪、抢修道路和运输工作。高射炮部队大部用于平壤以北地区掩护修建机场，空军尚未完成出动作战的准备。美国空军乘此时机，每日以数十架到上百架的大机群，对朝鲜北方尚存的铁路桥梁和铁路路基逐段地实行毁灭性的轰炸。洪水灾害和美国空军“绞杀战”给中朝军队的物资运输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尽管我后方部队采取了许多措施积极抢运，但仍无法保证前线的需要。8月底、9月初，前方部队发生粮荒，有的二线部队用野菜充饥。

9月至11月，美国空军对朝鲜北方铁路的轰炸逐月加剧。9月份出动飞机3027架次，破坏铁路线及车站648处次，破坏桥梁57座次；10月份出动飞机4128架次，破坏铁路1336处次，破坏桥梁53座次；11月份出动飞机8343架次，破坏铁路1937处次，破坏桥梁77座次。12月份的轰炸比11月略有减轻，出动飞机5786架次，破坏铁路1697处次，破坏桥梁101座次。这期间，美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是平壤以北的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铁路。这一地区是朝鲜北方铁路运输的咽喉，4个月中，共落炸弹63515枚，合31755吨，平均每公里线路落弹352枚，合170吨，致使80%的时间不能通车。1952年1至6月，美军又采取机动重点突击的方式，寻找我军高射炮火薄弱的铁路地区进行轰炸。

能不能解决运输问题，保证部队有饭吃，这是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在美军“绞杀战”开始后，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立即

采取了一些紧急抢修抢运措施。为粉碎美国空军“绞杀战”，解决运输问题，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作出重要决定：充实铁道抢修力量，为志愿军铁道兵团补充9000名新兵，并临时配属5个新兵团；抽调高射炮部队，加强铁路及江桥的防空力量，命令空军出动掩护铁路运输；从国内抽调一批桥梁材料北运入朝，以保证桥梁抢修等。为解决前方生活急需，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正待入朝的特种兵部队缓运入朝，并减少弹药和杂品的运输，而主要保证粮食、被服和汽油的运输。据此，志愿军后方部队全面展开了反“绞杀战”斗争。12月，根据反“绞杀战”斗争的需要，又组成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协调指挥铁路系统抢修、抢运和防空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为掩护平壤以北铁路运输、机场修建和取得战斗经验，在刘震司令员指挥下，以安东为基地，于9月中旬起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作战的方针出动作战。这不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上，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军首次大规模出动作战。首先出动的是第4师，尔后在反“绞杀战”斗争中陆续出动作战的有第3、第2、第14、第6、第15、第12、第17师、第18师。1953年初，第16师也开始轮战。每师辖2个团，装备飞机50架，除第2师有1个团装备拉-11活塞式飞机外，余均为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根据安东基地的容纳限度，同一时期作战的部队为2至3个师，每师作战2至3个月即行轮换。1951年底参战各师主要是在苏联防空空军（苏联防空空军也采取轮战方式，每次轮战的有2至3个师）带领下进行空战。1952年初起则以较有作战经验的第3、第4和第12师轮番带领新参战的师进行实战锻炼。

中国人民空军组建的历史很短，到志愿军空军参战时，飞行员一般只飞行几十小时，最多的才一百多小时，这同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经验的美军飞行员比较，相差甚远。但是，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大都有陆军的丰富战斗经验，有坚定的杀敌决心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因此，在同美国空军的作战中仍表现出身手不凡。

从1951年9月20日至10月19日，一个月内，志愿军空军第4师出动飞机508架次，同美国空军进行大小空战10余次，其中双方共200多架飞机的大空战7次，取得了击落敌机17架，击伤7架的战绩，自身损失14架。志愿军空军第3师自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86天中总出动2391架次，进行大小空战23次，取得击落敌机54架、击伤9架的显赫战果，自身战斗损失飞机16架、牺牲飞行员6名。大队长赵宝桐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战果最佳，荣立特等功两次，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此外，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飞行员范万章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他们都创造了突出的成绩，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一级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在1952年2月10日的空战中，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2团第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率6架米格-15飞机，于清川江以北泰川郡纳清亭附近上空，同美国“王牌驾驶员”、“空中英雄”乔治·戴维斯少校所率8架F-86飞机展开激战，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其中张积慧击落戴维斯，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志愿军空军在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的整个反了“绞杀战”斗争中，共击落击伤敌机144架，曾将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活动范围从鸭绿江边驱逐至

清川江以南空域，并迫使其 B-29 型战略轰炸机全部转为夜间活动，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空军的猖狂气焰，使其对清川江至鸭绿江间上空的“米格走廊”心生畏惧。同时，志愿军空军自身也得到了空战锻炼。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英雄集体和英雄人物。其中第 3 师第 9 团第 1 大队击落敌机 21 架、击伤 8 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除前述空军英雄人物外，还有第 3 师大队长孙生禄，击落敌机 6 架、击伤 1 架，自己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第 12 师技术检查主任鲁珉，在 1952 年 12 月连续击落美 F-86 飞机 5 架，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称为“打 F—86 能手”；第 15 师飞行员韩德彩击落敌机 5 架，其中包括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第 15 师飞行员蒋道平击落敌机 5 架、击伤 2 架，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等。

在志愿军空军投入作战的同时，志愿军司令部将在朝鲜的高射炮兵主要力量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当时，志愿军在朝鲜的高射炮兵计有第 61、第 62、第 63、第 64 师 4 个野战师，4 至 5 个城防团和 50 余个独立营。其中 3 个野战师、所有的城防团和 10 余个独立营被抽调掩护铁路运输。为集中统一指挥，专门组成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野战高炮师辖 3 个小团，师共装备 85 毫米口径中高炮和 37 毫米口径小高炮 48 门，12.7 毫米口径高射机枪 36 挺；城防高炮团装备中小高炮共 36 门，高射机枪 3 挺；独立高炮营装备小高炮和高射机枪各 12 门(挺)，志愿军总计有中小高炮 800 余门，还不足美军侵朝飞机数目的一半。

针对美国空军集中轰炸平壤以北三角铁路的特点，志愿军高射炮兵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重点保卫三角地区铁路，仅 1951 年 12 月，就在三角铁路地区击落敌机 38 架、击伤 68 架。1952 年上半年，针对美国空军实施机动重点突击的轰炸特点，志愿军高射炮兵又采取了“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方针，除一部兵力保卫桥梁、仓库区的重点目标外，其余部队则实施广泛机动作战，扩大掩护范围，减少铁路沿线对空作战火力的空白区。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高炮第 62 师第 605 团 5 次昼间游动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各 11 架，自身人员武器均无损伤，创造了昼间游动作战的范例。5 月 8 日，美国空军终日出动 485 架次飞机，轰炸志愿军设在楠亭里的仓库区。志愿军担任该区目标掩护任务的高射炮独立第 24 营，同敌机展开周旋，激战 13 小时，创造了一个营一日击落敌机 7 架、击伤 18 架的记录。6 月 10 日夜，高射炮第 62 师指挥的部队同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首次协同作战，一举将前来郭山上空轰炸铁路桥梁的美军 4 架 B—29 型战略轰炸机击落 3 架。

志愿军高射炮兵的作战，给美军飞机造成巨大威胁，美国舰载航空兵因惧怕新成川至高原段铁路沿线志愿军高射炮火的袭击，而拒绝前往轰炸，并称这一地区为“死亡之谷”。在整个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共击落敌机 260 余架、击伤 1070 余架，对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担负朝鲜北方铁路抢修任务的部队，主要是李寿轩为副司令员、崔田民为副政治委员的志愿军铁道兵团，辖第 1、第 2、第 3、第 4 师共 4 个师和 1 个独立团，还有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此外，朝鲜有一个铁道工程旅。在反“绞杀战”斗争开始以后，志愿军铁道兵团的力量得到加强。为重点保证

平壤以北三角铁路的抢修，铁道兵团把一半的兵力投入这一地区，最多时，平均每公里集中 190—240 余人抢修。为减少桥梁被炸，铁道兵桥梁部队采取了许多迷惑敌机的办法，如架设活动桥，拂晓前拆除几孔，黄昏后再架好，使敌机认为已遭破坏，不必轰炸。抢修部队还采取了以枕木排架法代替大坑填土等技术措施，提高了抢修速度。铁道兵抢修不但任务很重，困难很大，而且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除防敌机空袭外，还要排除敌机投下但未爆炸的炸弹，其中大量的是定时炸弹。这些炸弹浸入地下几米深，方向不定，并且随时都可能爆炸。仅 1951 年 10 月在三角铁路地区就排除定时炸弹 108 枚。铁道兵战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以勇敢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排除定时炸弹，涌现出了许多功臣和英雄。其中铁道兵第 4 师司令部见习参谋钟英，3 天中连续排除定时炸弹 16 枚；第 4 师第 4 团副班长田清洲，在 3 个月的时间内拆卸定时炸弹 18 枚；第 4 师第 4 团战士吴青山，在几天内排除定时炸弹 22 枚。他们均荣立一等功。第 1 师第 3 团战士李云龙从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3 月拆卸定时炸弹 34 枚，并教会 13 名同志拆卸定时炸弹 47 枚，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全国著名的登高英雄、铁道兵第 1 师第 1 团第 1 连副连长杨连第，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地完成抢修任务，并创造了“钢轨架浮桥”的办法，在抢修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 年 5 月 15 日，他正在指挥抢修清川江大桥时，被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爆炸时的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杨连第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志愿军总部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连第连”。

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掩护下，铁道兵奋力抢修，从 1951 年 12 月初开始，三角地区铁路连续通车，既保证了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又保证了朝鲜的民用运输。连美国空军对志愿军抢修铁路的能力也无可奈何地表示叹服，美国空军战史中称：“共军修路部队填补弹坑的速度可以和……F-80 飞行员轰炸的速度匹敌。共军从我‘绞杀战’一开始就能迅速地修复被炸断的铁路。”

“共军的修路人员和修桥人员，已经粉碎了我们对平壤铁路线的封锁……并赢得了使用所有铁路主要干线的权力。”

为了改善公路运输状况，志愿军司令部抽调了在朝鲜的几乎所有的工兵团，同时从在后方休整的各步兵军抽调大批力量，全面加宽加同了公路，并新修公路近 300 公里，在公路沿线构筑了大量汽车掩蔽部；以 1 个步兵师和 1 个公安师等部队在公路沿线设置 1300 多组防空哨，为行驶的汽车防空报警，并指挥交通。汽车司机在运输途中也注意隐蔽，月夜行车时尽可能少开灯，以免暴露目标。由于采取这些措施，汽车损失大大减少，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 50% 减少到 1952 年第一季度的 2.3%，运输能力大大提高。据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统计，1951 年 9—12 月份比 4—8 月份提高 95.6%；1952 年 1—4 月份，比 1951 年 9—12 月份提高 19.8%。毛泽东主席 1953 年 9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上讲话时，赞扬了志愿军的这些群众性创造，指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经过我志愿军空军、高射

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方勤务部队的密切协同、奋力作战和保障，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虽然大大超过原来预计的 90 天时间，曾给中朝军队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没有阻止住我中朝军队的物资运输，更没有能迫使朝中代表团在谈判中接受美方的无理要求。致使美国侵朝空军当局到 1952 年春即已非常忌讳使用“绞杀战”这个字眼了，并且遗憾地感到没能早一点从有关文件中将这一字眼删掉。1952 年 6 月，美国空军“绞杀战”被迫以失败而告终止。志愿军的运输线则形成了由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相结合，从后方物资基地到第一线各军的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即“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在反“绞杀战”斗争中，我志愿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据不完全统计，高射炮兵和铁路抢修、抢运部队即伤亡 2300 余人，损失高炮 30 门，被炸坏火车机车 502 台、车箱 4550 节，志愿军空军损失飞机 80 架。

三、粉碎美军的细菌战

从 1952 年初起，美国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又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在中朝军队后方普遍造成疫区，瘫痪整个后方，窒息前方作战力量，以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配合停战谈判，同时试验其细菌武器在朝鲜各种气候及地形条件下的性能。

经检验查明，美国实施细菌战所使用的病菌病毒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 10 余种。这些病菌病毒经过特殊培植后，附在昆虫及其他杂物上，制成细菌弹，由飞机投掷布撒。美国侵朝空军所有作战联队都执行过布撒细菌的任务。为保守秘密，布撒细菌一般都在夜间进行，或夹杂在其他轰炸任务中同时进行。其布撒的范围包括整个朝鲜北方，主要是朝鲜西北部平壤以北几条铁路干线的沿线地区及重要城镇。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投撒了细菌。

1952 年 1 月 28 日，我志愿军在铁原西北之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地区首次发现了美国飞机投撒的大量带菌昆虫。1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在朝鲜北方 70 个郡市陆续发现敌军投撒带菌昆虫、杂物等 804 次。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军飞机 68 批 448 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宾、安东、宽甸、临江等地布撒大量带菌昆虫。

在朝鲜，已多年没有鼠疫流行。1947 年以来，朝鲜北方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然而，在美国投撒带菌昆虫后，这些烈性传染病在朝鲜北方重又发生。2 月 20 日至 3 月 9 日，在朝鲜北方的居民中，有 13 人患霍乱，其中 9 人死亡。2 月 25 日至 3 月 11 日，朝鲜安州郡一个 600 人的村庄，就有 50 人患鼠疫，其中 36 人死亡，在志愿军中也有人患急性病症等。

据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美国是在实施细菌战，遂在政治外交战线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

2 月 24 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 2 月 22 日发表的抗议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声明，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此后，我国各地掀起了抗议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活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了美国细菌战的罪行，许多国家的人民和国际性的民主组织也纷纷举行集会或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细菌战的暴行。

对此，美国始则沉默，继则于 3 月 4 日由其国务卿文奇逊发表声明进行抵赖。为了揭露美国细菌战的事实真相，3 月中旬，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起，由各人民团体代表和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进行现地调查。在 3 月上旬至 8 月上旬期间，中朝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这 3 个调查团先后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法抵赖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

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1952年5月上旬至1953年11月下旬，我国又陆续公布了美国亲自执行过细菌战任务的25名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他们都供述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的保密规定，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飞行员，由于职务较高，有的还在美国空军部或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过职，供述了情节大致相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

这些事实，有力地戳穿了美国的抵赖。事实胜于雄辩，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其细菌战真相的被揭露“无疑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效果。”

在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在战场上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

志愿军于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以国内派来的40余名有关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会同志愿军卫生部防疫人员，组成防疫检验队，派往前线各兵团和留置志愿军卫生部，各军、师也先后成立了中小型防疫队，担负防疫和细菌检验工作；志愿军卫生部专门准备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各级也指定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国细菌战传染的疫病患者；全军普遍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A、B及破伤风混合疫苗），按部队驻区和作战区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组织对细菌媒介物的扑灭和对沾染区消毒，还开展了驻区卫生运动，等等。这期间，我国政府组织力量赶制了大批防疫疫苗及其他药品，保证了前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国内也展开了大规模的防疫爱国卫生运动（一直延续至今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从这开始的）。

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至1952年底，大规模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我军同美国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共384人，其中治愈258人。美国实施细菌战不但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且在军事上也未达到预期目的。

四、构筑坚固的“地下长城”，我军越战越主动

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特别是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开始以后，我军逐渐确定了坚守防御的思想。1951年夏秋季的防御作战，就是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场形势和国内财政经济困难的状况，为志愿军确定了行动方针，指示志愿军“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志愿军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于1951年底至1952年初进行了精简整编，压缩了机关，充实了连队，精简20万人回国，节约了人力，节约了开支，为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与此同时，以大力进行了巩固阵地的斗争。

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 根据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经验，我军实行坚守防御，仅仅依靠野战工事难以达到目的。美军集中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和坦克火力，往往对我军一个阵地倾泻数万发炮弹、炸弹，造成我军人亡地失。而这期间，我军阵地上由士兵群众创造的坑道工事，却对抗击敌军进攻，保存自己有生力量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志愿军领导机关推广，从1951年底起，便在全线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的活动。

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并且缺乏作业器材。各部队充分发动群众，想办法克服困难，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组织技术力量拆卸敌军投射但未爆炸的炸弹、炮弹，以解决炸药不足问题；自办铁匠炉，打制铁锤、钢钎、铁锹、铁镐等作业工具。据统计，仅第15军1个师至1952年7月底即拆卸炮弹、炸弹共295枚，解决炸药2900余公斤，第67军的1个师即成立了68个铁匠炉，100个木工组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工事构筑的顺利进行。

志愿军司令部不断提出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整个工事构筑基本上做到了每个阵地均有坑道，并把坑道工事同野战工事结合起来。一般每条坑道长十余米至数十米，有两个以上出入口。坑道顶部距地表面厚度为10—30米。坑道内部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使阵地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至1952年5月底，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的整个正面防线上，志愿军共挖掘坑道7789条，长198.7公里，构筑掩体75万个，露天及掩蔽式堑壕3420余公里；人民军挖掘坑道1730条，长88.3公里，完成各种掩体3万余个，堑壕260余公里。整个正面战线，在10公里的纵深范围内，构成了坚固的地下长城，基本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同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此后至8月份，全军基本上完成了第二道防御阵地工事。这样，我军实行防御作战，就有了比较坚固的阵地依托。正如毛泽东主席1952年8月所说的，能不能守的问题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以各种作战活动积极打击敌军 为巩固阵地，坚守战线，并使作战的规模同国内的经济力量相适应，志愿军在1952年未举行战役攻势。但在战术上采取了积极活动的方针，以各种作战活动积极打击敌军，杀伤、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以改变战场态势和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斗争。

开展小部队战斗活动。这一活动主要是在1951年底至1952年春进行的。

使用连以下的分队，采取侦察与反侦察、伏击与反伏击、偷袭、强袭等手段，袭扰打击敌军，掩护主力部队构筑工事。第 39 军担负临津江两岸的防务，在 1951 年 12 月一个月中，即主动袭击敌军 31 次，并粉碎敌军 1 个排至 1 个加强营的进攻 15 次，共毙伤敌 1244 名，自身伤亡仅相当于敌军的 1/4。第 12 军担负金城东西地区的防务，在 1951 年 11 月上旬至 1952 年 1 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即组织小部队活动 805 次，平均每晚出动 12 个班组，共毙伤俘敌 525 名，自身伤亡 114 名，敌我伤亡对比为 3.7 : 1，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表扬。第 63 军于 1951 年 12 月 28 日至 1952 年 1 月 8 日，拔除了高浪浦里以西智陵洞北山南朝鲜军 1 个连防守的据点，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了这一阵地。第一线其他各军也积极进行了活动。有力地掩护了工事构筑的进行。

开展狙击活动(冷枪冷炮活动)。由于战线稳定，敌我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双方最近距离约 100 米，最远距离也只有几千米，这便于我军开展射击活动。同时，敌军依赖其优势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用火药经常袭击我军一线阵地，迫使我军白天多隐蔽在工事内。而放军则在其一线阵地甚至在我军阵地前沿肆意活动，如跳舞、唱歌、摔跤、爬树、以广播机作宣传等，活动十分猖狂。为打击第一线敌军的气焰，各部队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在构筑坑道工事和进行其他作战活动的同时，从 1952 年 1 月起展开了狙击歼敌活动。以特等射手组成狙击组，或以游动火炮和坦克采取隐蔽的方式，经常变换射击阵地，对敌军阵地前暴露的目标进行射击，还有的以设置假坦克、假炮阵地和给稻草人着上军服等诱惑敌人出动，借以射击敌人。第 65 军第 585 团第 2 营在 1952 年 1 月至 2 月间，消耗子弹 750 发，毙伤俘敌 83 人。第 15 军开展了冷枪冷炮杀敌立功运动，涌现出许多优秀射手：副班长罗怀孝一个月歼敌 51 名，新战士张佩龙一个月歼敌 36 名，机枪班长袁柳根一个月歼敌 117 名，重机枪射手袁振江一个月歼敌 221 名，60 炮手王文黄一个月歼敌 78 名，82 炮手新战士孔良龙在 1500 米距离内一打即中，3 天歼敌 21 名。第 15 军从 6 月下旬至 7 月底，狙击歼敌共 3541 名，占该军这期间歼敌总数的 42%，狙击手伤亡仅 14 名。第 12 军从 7 月下旬至 10 月底狙击歼敌 2506 名，消耗步枪子弹 5843 发，狙击手伤亡仅 11 名。仅 5 月至 8 月，我志愿军和人民军狙击歼敌即达 13600 余名。

(1953 年春夏，部队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第 24 军第 214 团第 8 连战士张桃芳刻苦钻研射击技术，用 436 发子弹，毙伤敌 214 名，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另 1 月至 8 月游动火炮射击歼敌 8900 余名。狙击活动有效地打击和杀伤了敌军，限制了敌军在基本阵地的昼间活动，迫使其不得不龟缩到工事内。此外，从 4 月 30 日至 8 月 10 日，志愿军炮兵还有计划地对敌军阵地组织 7 次射击，参战火炮 166 门，共摧毁敌军炮兵阵地 12 处。

开展挤占阵地活动。1952 年 3 月，我军的坑道工事已初具规模。同时，美国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仍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以进行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司令部于 3 月 19 日指示各军：在 3 月底 4 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歼敌人的小战斗，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3 月 26 日，彭德怀司令员又明确指示：“我们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成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根据这些指示，从 4 月初起，我军即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军突出的个别的连、排支撑点的作战活动。到 5 月份，随着我军第一线阵地的日益巩固，这种作战活动在全线普遍展开。比较突出的有：

第 63 军挤占 10 处；第 40 军挤占 4 处；第 39 军挤占 3 处。在 8 月 6 日的战斗中，第 12 军第 104 团副排长杨春增，为巩固已占领的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阵地，率一个班连续击退敌军 14 次反扑，大量杀伤了敌人，在敌军再次拥上阵地的危急时刻，他举起一枚反坦克手雷扑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5 月至 8 月份，第一线各军共挤占阵地 23 处，扩展阵地面积 30 余平方公里。将斗争的焦点准向了敌军阵地前沿。

粉碎“联合国军”的“回击行动”。由于我朝中方面代表团的努力，至 1952 年 5 月初，停战谈判除关于战俘问题外，其余议程均已达成协议。而关于战俘问题，美国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战争结束后全部遣返战俘的规定，始则无理提出“一对一”的交换原则，继则又提出并顽固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方面部分被俘人员，致使停战谈判处于僵持状态。5 月中旬，美国以马克·克拉克上将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5 月下旬又以威廉·哈里逊接替特纳·乔埃为首席谈判代表。克拉克接任以来，采取许多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对我朝中方面施加压力。1952 年 6 月，“联合国军”惧怕中朝军队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发动攻势作战，于是为了破坏我军可能的进攻准备，并对我军 5 月间挤占阵地活动进行报复，和配合谈判对我方施加压力，遂于 6 月 12 日开始，以美第 45 师和南朝鲜第 6 师为主，前线其他各师配合，向我军前沿阵地发动了名为“回击行动”的进攻。其重点攻击目标是我第 39 军 5 月份挤占的 190.8 高地和第 12 军 5 月份挤占的官岱里西山。我军该两阵地均由一个连防守。6 月 12 日晨，放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向我军该两阵地发动进攻，我防守分队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顽强抗击。经过激战，两阵地均有一部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我防守分队遂转入坑道坚守。我军经过充分准备以后，于 15 日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反击。第 39 军组织 8 个步兵连在 112 门各种火炮(包括坦克)支援下，反击 190.8 高地，毙伤敌 1000 余人，夺回大部表面阵地。该阵地原退守坑道分队坚守坑道作战 5 昼夜。第 12 军先后各以两个步兵排分别在 36 门和 44 门火炮支援下，反击官岱里西山阵地，全部夺回表面阵地。该阵地原退守坑道分队坚守坑道作战 10 昼夜。志愿军坚守该两阵地的坑道作战，使坑道工事经受了考验，并积累了坚守坑道作战的重要经验。除该两阵地作战外，我军还击退“联合国军”以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对其他阵地的 7 次进攻。敌之“回击行动”被粉碎。整个 6 月份。我军共毙伤俘敌 2 万余人。

开展剿匪肃特活动。1952 年以来，敌军武装特务和土匪在我军后方活动猖狂，破坏我军交通和海防工事，刺探我军指挥机关和物资仓库位置，以信号指示其飞机轰炸。为确保后方安全，志愿军司令部指示二线部队和后方机关，先后对驻区附近之匪特进行了清剿，至 9 月中旬共捕获匪特 340 余人。10 月间，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又组织未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前后方部队，在朝鲜各当地政府协助下，统一对各自驻区及附近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剿活动，又歼匪特 272 名，有效地打击了敌特活动气焰。我军后方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粉碎敌军可能的局部进攻计划和锻炼部队，取得经验，我军在已有 5 至 8 月间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以将于 10 月底换防的第 12、第 39、第 68 三个军为

主，从9月18日开始，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此时，志愿军的领导人员已进行了调整，彭德怀司令员4月间回国治病，后被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赓副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治委员也奉调回国。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得志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与邓华共同主持志愿军工作。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就是在邓华、杨得志的组织指挥下进行的。此次作战，历时共44天，至10月31日结束，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采取“攻克固守，打敌反扑”、“拉锯式的反复争夺”、“速打速走抓一把”三种方式，先后对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攻击77次（其中人民军对3个阵地攻击3次），共毙伤俘敌2.7万余人。在这次反击作战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其中第12军第100团第2连班长伍先华，在9月30日反击官岱里西山的战斗中，当主攻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制在半山腰，前去爆破的两名战士又相继倒下时，他抱起10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跳进敌军坑道内，和4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保证了此次反击战斗的胜利；第15军第87团战士邱少云，在10月12日反击391高地之前，随部队担负潜伏任务，不幸被敌军打来的燃烧弹引起的烈火烧身，为了保证潜伏的成功和战斗的胜利，他忍受了烈火灼烧的巨大痛苦，严守潜伏纪律，一动未动，直至壮烈牺牲。伍先华、邱少云均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在这次反击作战中，我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攻击敌军一个连防守的阵地，平均集中8至10个炮兵连30至40门火炮，有力地支援了步兵的作战。我军攻击敌军60个阵地，除7处未得手和1处敌守军撤退外，余均攻克阵地，全歼守敌。诚如毛泽东主席在1952年12月签署的一个文件中所指出的：“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经过反复争夺，我军共巩固占领17个阵地。其中重点作战的第39军对10个阵地攻击10次，全部攻克，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5个阵地，第12军对13个阵地攻击18次，攻克17次，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1个阵地；第68军对10个阵地攻击13次，全部攻克，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3个阵地。毛泽东主席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继续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上甘岭坚守防御作战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1952年春季以来积极作战的打击下，特别是在9月18日开始的全线战术反击作战的打击下，“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为了对中朝军队发动的战术反击实施报复，摆脱其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并谋求在谈判中的主动地位，以及配合美国的总统大选活动和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召开，“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发动了代号为“摊牌作战”的“金化攻势”。在此之前，10月8日，美方代表团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断谈判会议。

“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的主要目标，是志愿军防守的金化以北、上甘岭以南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该两阵地是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的两个前沿支撑点，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由第15军第45师第

135 团两个连分别防守，直接威胁着敌军的金化防线。“联合国军”发动进攻后，我志愿军同其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即上甘岭坚守防御作战）。整个作战分三个阶段。

10 月 14 日至 20 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敌军进攻相当猛烈，特别是发起进攻的第一天，即 10 月 14 日，便集中美第 7 师和南朝鲜第 2 师共 7 个营的兵力，在 300 余门大口径火炮、30 余辆坦克和 40 余架次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的两个高地实施猛攻，共发射炮弹 30 余万发，投炸弹 500 余枚，企图一举夺取志愿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两个高地。当时，志愿军第 15 军第 45 师参加全线战术反击作战，正准备攻歼位于上甘岭东北地区的注字洞南山之敌，师主要炮兵已进入作战地区，来不及转移火力支援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作战。因此，我两高地守军主要依靠步枪、机枪、手榴弹等步兵武器，依托坑道和残存的野战工事实施顽强抗击。表面阵地曾一度被敌军占领，入夜后又被我军反击夺回。终日毙伤敌军 2000 余人。“联合国军”不甘心第一天的攻击受挫，为达到预期目的，继续增加兵力攻击我军两个阵地。我志愿军第 15 军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放弃了反击注字洞南山的计划，而集中力量粉碎敌军对上甘岭的进攻。激战至 20 日，我军两高地的表面阵地全部被毁，几经易手后被敌军占领，我守军转入坑道继续进行坚守作战。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第 15 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第 45 师第 135 团第 7 连排长孙占元，在 10 月 14 日的战斗中，双腿被敌炮弹炸断，仍来回爬行指挥作战，并用机枪打退敌军数次冲击，毙伤敌军 80 余人，敌军拥上阵地后，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第 45 师第 135 团第 2 营通信员黄继光，在 10 月 19 日的战斗中，为开辟冲击道路，主动申请担任爆破任务，在爆破组其他两名战友相继倒下和爆破器材用尽的情况下，毅然以自己已负重伤的身躯勇敢地堵住敌军机枪射口，掩护了分队的冲击，立特等功，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黄继光、孙占元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0 月 21 日至 29 日为第二阶段。敌军占领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后，以各种毒辣残酷的手段对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进行围攻：封锁、摧毁和堵塞坑道口，向坑道内投掷汽油弹、毒气弹、硫磺弹，以及使用火焰喷射器，并用炸药连续爆破坑道等等。造成坑道内部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恶浊，氧气不足，处境极端困难。我志愿军坚守部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作用，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坑道内建制较乱，党员、干部则挺身而出，组成临时党支部和临时统一作战指挥机构，形成有力的战斗集体，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困难，坚持战斗。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个馒头，有时甚至只能以尿止渴，但是部队始终顽强不屈，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亲密团结，顽强奋战。这次作战中发生的连长、战士、伤员之间相互转让一个苹果的故事，被传为历史佳话。在克服各种困难的同时，坚守坑道的部队还组织冷枪冷炮狙击和小部队出击活动，积极主动地打击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为纵深部队准备实施决定性的反击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5 日为第三阶段。志愿军经过部署和准备，以第 15 军第 29 师和第 12 军第 31 师同坚守坑道部队内外配合，在炮兵火力的有力支援下发起反击，相继将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两山头的表面阵地全部夺回，并击退敌军多次以营团规模兵力的反扑。第 12 军第 34 师第 106 团于

11月18日，也投入巩固537.7高地北山阵地战斗。至11月25日最后粉碎了敌军的“金化攻势”。在11月5日的战斗中，第12军第91团第5连新战士胡修道，在全班战友都伤亡的情况下，独自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英勇机智地击退敌军多次冲击，歼敌280余人，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在这次战役中，朝鲜人民的好儿子朴在根，在运送志愿军伤员途中，遇敌机袭击，毅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伤员的安全，自己则中弹牺牲，被称为朝鲜人民的“罗盛教”，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上甘岭作战，双方激烈争夺历时共43天，由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在仅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敌军先后共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300余门大炮、170余辆坦克和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阵地土石被炸松2米。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先后共投入4万余人的兵力，140余门火炮，发射炮弹40余万发。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敌我双方使用兵力如此之多，作战时间如此之长，火力如此密集、猛烈，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志愿军贯彻坚守防御的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顽强抗击敌军进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创造了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本来是企图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然而，经过此次失败，非但未能夺回主动权，反而更加被动。南朝鲜官方战史中曾就此写道：“在整个冬季，无论防御或进攻，主动权均被以优势兵力为后盾的敌人所夺去。”

1952年，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方针，并使作战的规模和国内的经济力量相适应，虽未进行大的攻势作战，但以多种形式和多种手段的小规模作战，依然大量杀伤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至11月底，共歼敌22万余人，并完全掌握了正面战线作战的主动权。特别是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形成后，我军有了坚固的阵地依托，加之炮兵力量有了加强，因此，攻防自如，全部作战几乎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守则必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对我军感到无可奈何。

五、粉碎美国的军事冒险企图，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

到 1952 年冬，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然而战争不仅未达到他们预想的结局，相反，其正面战线上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企图以正面战线的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无理要求，已完全失去作用。自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来，美国在战争中消耗和伤亡不断增加。对这种战争，美国人民早已厌烦，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要求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英、法等国则早已想从战争中脱身。

此时，停战谈判因美国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而处于停顿状态，尚无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复会。随着 1952 年 11 月文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 34 届总统，在美国统治集团中，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以最后结束这场战争的声浪愈未愈高，艾森豪威尔还亲自到朝鲜进行活动，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着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自 1952 年 10 月以来，克拉克在频繁组织登陆作战演习，并专门制定了军事进攻计划，其基本内容是“分三个阶段向平壤至元山一线发起攻击，每一阶段大约持续 20 天左右，包括地面部队包围共军，发动一次较大的两栖进攻，一俟时机适宜，空军加入这场行动，从空中和海上向中国境内的目标进攻。”为此，克拉克计划了所需兵力，并派遣特务到中朝军队后方和东西海岸刺探情报，搜集地理、水文资料。克拉克和美国在远东的陆、海、空军司令官们，都赞同这种行动路线，并且希望美国政府批准这项计划。

防止敌军在我侧后登陆进攻，一直是我军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 1950 年底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就开始有所部署；停战谈判开始以后，1951 年 9 月，中朝军队经过协商，成立了东海岸和西海岸两个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以统一指挥担负海岸防御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经过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特别是经过 1952 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坚守防御作战，表明我军正面防线坚固，不易被敌军突破。但这时，侧后的东西海岸尚未建成坚固的防线。我军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于是，中共中央根据敌军的登陆叫嚣和我军情况，于 1952 年 12 月 20 日给志愿军党委下达了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并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根据这一指示，我志愿军在深入思想政治动员的基础上，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第一，增调部队入朝，并全面调整战场部署。为增强我军反登陆作战力量，1953 年 1 月至 3 月，先后从国内调第 1、第 16、第 21、第 54 军入朝，另有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共 7 个团另 5 个营、坦克 3 个团入朝，空军 14 个师，海军 1 个鱼雷快艇大队和 2 个海岸炮连，也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以 1952 年 9 月、10 月间轮换第 20、第 42、第 27 军入朝的第 23、第 46、第 24 军，

分别接替正面第 38、第 40、第 15 军防务，而将第 38、第 40、第 15 军和刚从上甘岭阵地撤下来进行休整的第 12 军调到东西海岸，加强海岸防御力量。经过调整部署后，志愿军担任西海岸防御的部队有 6 个军、地面炮兵 14 个团和 9 个营、高射炮兵 2 个团和 13 个营、坦克 6 个团；担任东海岸防御的部队有 2 个军 1 个师、地面炮兵 2 个团和 3 个营、高射炮兵 5 个营、坦克 1 个团，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共 11 个军、地面炮兵 14 个团和 28 个营、高射炮兵 24 个营、坦克 4 个团；预备队有 1 个军和地面炮兵 4 个团又 2 个营。另人民军共有 6 个军团和 5 个旅、2 个坦克团分别部署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担任防御。为了加强反登陆作战的统一指挥和领导，调整和充实了东西海岸指挥机构，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并抽调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部分人员及原西海岸指挥所组成西海岸指挥部，以第 3 兵团指挥机构兼任东海岸指挥部。整个部署调整于 3 月底完成。

第二，全面构筑防御工事，完成整个防御体系。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为构筑防御工事筹集了大量的器材和物资。仅志愿军构筑工事消耗的材料，计水泥 2.8 万吨、钢筋 4200 余吨、木料 33 万余立方米、炸药 360 万公斤等。全军官兵艰苦作业，至 1953 年 4 月底，共挖掘坑道 8090 多条，总长 720 余公里，挖堑壕、交通壕 3100 多公里，还构筑 600 余个永备工事及大量火器掩体，连同在此前后构筑的工事，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构筑坑道工事总长约为 1250 公里，堑壕、交通壕总长为 6240 公里，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共绵亘 1130 余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三，进一步改造和完善了朝鲜北方的交通运输网络，并大量储备了作战物资。1953 年 1 月，我先后从国内抽调了铁道工程部队 6 个师及 5000 名铁路员工入朝，会同朝鲜铁道兵 1 个旅，修建从龟城至德川间的横向铁路和价川至殷山间的纵向满浦线辅助铁路，至 4 月 10 日，提前完成第一期工程，并正式通车，使朝鲜北部京义（汉城至新义州）、满浦（满浦至西浦）、平元（平壤至元山）三大铁路干线在我纵深地区联为一体，既减轻了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铁路运输的压力，又可在邻近西海岸的京义线一旦被敌军切断时，我军仍能保证运输。与此同时，还抽调一个步兵师和工兵部队，新建纵横各 4 条公路。上述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交通运输状况，并于 1953 年 2 月底即超额完成了物资囤运任务。弹药总囤积量达 12.3 万余吨。粮食总囤积量达 24.8 万余吨，可供全军食用 8 个多月。

第四，正面第一线部队积极进行作战活动。1953 年 1 月至 4 月底，正面部队以进攻手段歼灭敌人 1 个排至 1 个连的战斗达 47 次，仅 3 月和 4 月即歼敌 3 万人，有力地配合了侧后东西海岸的战备工作。

此外，志愿军补充 9 万名新兵，第一线部队基本上达到齐装满员。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还利用构筑工事的间隙，根据预定作战方案进行了战前训练和实兵演习。

至 1953 年 4 月底，我军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志愿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抗美援朝战争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必然结果，是抗美援朝战争指导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不仅仅是我军一次直接的战役准备，而且是我军战略上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抗美援朝战争战略指导的英明一招，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美国鉴于我军作了充分准备，不得不放弃其

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企图，转而同我恢复了停战谈判。

六、胜利实现停战

美国以大规模军事进攻结束朝鲜战争的企图破灭后，不得不再次谋求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3年2月22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根据美国政府的旨意致函我方，提议在停战实现之前，先行交换伤病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已被美方单方面中断4个多月的停战谈判。3月28日，我方答复表示同意这一建议，并提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随后中朝两国政府又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英法等国的赞同。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同意以我方建议为基础恢复战俘问题的谈判。4月20日，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4月26日，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然而，美国一面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一面积极扩编南朝鲜军队，继续进行军事准备。同时，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好战分子，仍然公开反对妥协，极力鼓吹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李承晚集团则更是极力反对停战。这些情况表明，虽然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战争停下来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大，但战争拖延下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我军以有力的作战进行配合，以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主席为志愿军确定的方针是：“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这时，我军方面，兵力强大，作战物资充足，阵地更为巩固，装备虽仍处于劣势，但炮兵火力有了显著的增强。鉴于1952年秋季以来新入朝的6个军和1个师，多数尚未在实战中直接取得经验，志愿军党委决定，采取“稳扎狠打”，积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举行类似1952年秋季那样的反击作战，以配合停战谈判。1953年4月20日下达了预先号令，5月5日又下达了补充指示，规定以美军为这次作战的重点打击目标，要求各部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周密的侦察部署，在战术上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有利则守，不利则给以一定杀伤之后放弃，保持主动。”志愿军首长为第一线部队加强了9个步兵师、地面炮兵5个团另8个营、高射炮兵1个师另2个团和6个工兵营。志愿军正面第一线共部署7个军，从西而东依次为第65、第46、第1、第23、第24、第67、第60军。第65军因地形不利，并且靠近板门店谈判会址，而不参加反击作战，其余6个军根据志愿军的指示，共选择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56个，作为歼击目标。为确保作战胜利，许多参战部队在选定的歼击目标正面200米附近秘密挖掘了屯兵洞和选择了潜伏区。

从5月13日起，我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的第60、第67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对选定的敌军连排阵地发起了攻击。随后，第9兵团指挥的第23、第24军也发起了攻击。至5月26日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结束，共对敌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20个阵地攻击29次，歼敌4100余人。其中第60军对7个阵地攻击14次，第67军对4个阵地攻击6次，两军均攻克阵地，并各巩固占领1个阵地。

在我军作战的有力打击和我方谈判代表团的努力下，美方于5月下旬基本上接受了朝中方面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立场，谈判不日将可达成全部协议。然而，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

言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会议。

根据这种形势，为了进一步促进停战谈判，使我军反击作战打得更策略些，同时使我新入朝的其他各军迅速开赴第一线得到作战锻炼，志愿军首长于6月1日决定，将原定的以打美军为重点改为以打南朝鲜军为重点，同时，以第54军和第16军加入第一线作战。第54军归第20兵团指挥，准备接替第67军防务；第16军归第9兵团指挥，接替第23、第24军两军平康接合部各1个师的防务。

为了在全军普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志愿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了轮换：以李达接替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以许世友、黄永胜、杨勇分别接替王近山(副司令员)、韩先楚、郑维山(代司令员)任第3、第19、第20兵团司令员，以王平接替张南生任第20兵团政治委员。此时，备前来轮换的指挥员已到达前线，开始接替作战指挥。在此前王建安已接替宋时轮任第9兵团司令员，聂凤智接替刘震(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后为司令员)，特种兵的指挥员也进行了轮换。

根据志愿军首长6月1日的指示，各兵团对反击作战计划作了适当的调整，担负重点作战的第20兵团经过部署和准备，于6月10日至15日上午，以第60军及归该军指挥的第33师和第68军1个团攻占了北汉江以东南朝鲜第5师两个团防守的西起加罗峙、东到广石洞段全部阵地，特别是在进攻883.7高地的战斗中，在进攻发起前，于9日晚预先将6个连另2个排兵力秘密潜伏在敌军阵前和翼侧，10日晚，在259门火炮支援下，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从北、东两个方向突然发起冲击，经50分钟战斗，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我军一次攻占敌军1个团阵地的范例。在我第60军作战的同时，我第67军于6月12日夜至14日，攻占了北汉江以西座首洞以南南朝鲜军第8师第21团的全部阵地。在该两军作战的前后，第9兵团指挥的第23、第24军，第19兵团指挥的第46军，人民军第3、第7军团，也对选定的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进行了攻击。

自5月27日至6月15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对敌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阵地攻击65次，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歼敌4.1万余人。中朝军队的作战，促进了停战谈判的进展。6月8日，谈判双方首席代表正式签订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至6月15日，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基本完成，停战协定签字的各种准备基本就绪。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促进停战实现，中朝军队遂于6月16日结束了第二阶段反击作战。

正当朝鲜停战谈判已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订停战协定之际，李承晚集团公然破坏谈判双方刚刚达成的遣返战俘的协议，以“就地释放”为名下令强迫扣留朝中方面被俘人员，从6月17日深夜至6月19日，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并且声言“不能接受如同对韩国宣告死刑的停战协定”，继续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

李承晚这一公然破坏停战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各国舆论纷纷予以谴责。在“联合国军”营垒内部也谴责李承晚这一“背叛行为”，并抗议他“侵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限”。

鉴于这种形势，毛泽东主席于6月19日及时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的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同

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正指出，“联合国军”方面“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必须负责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必须就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以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

为对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表示抗议，并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以更大的压力，6月20日，我方代表团宣布停战谈判体会，直至美方作出保证。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决定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再给李承晚集团以严厉打击。志愿军首长立即部署了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金城战役)，以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保证停战实现后的有利形势。

这时，南朝鲜军北汉江两侧的防御体系经中朝军队第一、第二两阶段的反击作战，已遭严重破坏，其位于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4个师的防御阵地更加突出，造成了我军攻占该地区的有利态势。同时，我第20兵团在金城地域已集中有4个军和近400门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并查明了当面敌军纵深工事情况，掌握了南朝鲜军防御特点，取得了对其营、团坚固阵地进攻的经验。这些，为我军举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于是，第20兵团首长决定以现有之第67、第68、第60、第54军及志愿军加强的第21军共5个军组成三个作战集团，给金城以南地区南朝鲜军更大的打击，具体部署是：以第67军、第54军之第135师、第68军之第202师(欠第605团)组成中集团；以第68军(欠第202师)、第54军之第130师组成西集团；第60军、第21军(欠1个师)并指挥第33师、第68军之第605团组成东集团。三个作战集团展开于东起北汉江，西至牙沈里的22公里的正面上，实施并肩突破，第一步以拉平金城南战线为目的，第二步视情况，继续向南作有限度的发展。

为了保证金城战役的胜利，志愿军首长决定，在第20兵团发起攻击的同时，其右翼第9兵团之第24军由阳地至杏亭3公里的地段上实施攻击，攻歼注字洞南山及杏亭西山之敌，阻击金化之敌东援，确保第20兵团右翼之安全，尔后视情况向南发展。志愿军首长还为第20兵团加强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共3个团另1个营和3个连、工兵4个营，使金城正面我军共有各种炮(含高射炮和2个连的坦克)1483门，敌我兵力对比为1:3，火炮对比为1:1.7，我军均占优势。

我军经过准备，于7月13日晚按计划开始了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一齐向南朝鲜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经7—28分钟炮火准备，共发射1900吨炮弹，破坏敌军地面工事30%以上，在开辟通路地段破坏敌军障碍80—90%。在炮火准备之后，我军各作战集团，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坚固设防阵地，至14日黄昏，即全部达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拉平了金城以南战线，向南最远推进9.5公里。在7月13日夜我军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后，第68军第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带领侦察班化装成南朝鲜军，向敌军纵深侦察，巧妙地通过几道岗卡，直插二青洞，捣毁了南朝鲜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团部，缴获了李承晚亲自授予该团的“白虎团”“优胜”虎头旗。14日上午，第67军第595团第1连战士李家发，在攻击轿岩山战斗中，主动请战，担负爆破任务，负伤后，拖着受伤的双腿，连续炸掉3个地堡，在部队冲击受阻时，他从昏迷中惊醒，挺起已负重伤的身躯扑向敌人的机枪，堵住了枪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杨育才、李家发均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

14日17时，志愿军首长鉴于战役第一步发展顺利，乃令第20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物资弹药，推进炮兵阵地，准备粉碎敌军反扑，而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军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据此，进攻部队又将阵地向南作了推进，推进纵深约8公里，至16日，全部达成了进攻作战任务。

金城以南我军反击作战，极大地震动了敌军。7月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于1953年2月间接替范佛里特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马克斯韦尔·泰勒赶到前线，亲自部署反击，先后集中南朝鲜第5、第7、第9、第11师和美第3师共5个师和南朝鲜第3、第6、第8师残部，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全力反扑。我军对此已有了准备，组织了有力的防御作战，并主动收缩了阵地，主要固守第一步作战攻占的阵地。从18日至27日，击退敌军1个连至2个团兵力的大小反扑1000余次，予敌军重大杀伤。整个金城以南地区我军作战共歼敌5.3万余人。

在金城战役准备和实施期间，正面第一线其他各军和人民军也主动选择目标进行了攻击，有力地保障和配合了金城以南地区的作战。其中第1军从6月25日至7月3日攻歼198.6高地和笛音里西山之敌，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5000余人，巩固占领了笛音里西山阵地；第23军于7月6日至11日攻歼了石岘洞北山之敌，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3500余人，在这次作战中，该军第200团战士许家朋，在双腿负伤和炸药失效的情况下，为打开冲击道路，毅然扑向敌军地堡射孔，以自己的壮烈行为掩护部队冲击，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总计这一阶段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予李承晚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在我方政治上强烈抗议和谴责及军事上的严厉打击下，美方不得不向我方作出保证。早在我军金城战役发起前，6月25日，美国即派其助理国务卿前往南朝鲜对李承晚进行劝说活动。6月29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复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信中作出保证说：“联合国军与利害相关的各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取得大韩民国政府的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卫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月10日，经我方同意，恢复停战谈判以后，从7月11日至16日，美方代表又在谈判桌上向我方代表团作出了9项保证，其中包括：保证南朝鲜政府“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南朝鲜军破坏停战协定、采取侵略行动，遭到中朝方面必要抵抗时，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并不给予南朝鲜包括装备和供应上以任何支持等。为使世界人民得以共见这些保证，7月19日，朝中代表团将其公诸于世。

尽管美方对部分问题的保证尚不能令朝中方面满意，但鉴于美方已作出了这些保证，朝中方面仍然愿意尽快讨论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后，双方最后一次校订了军事分界线，同1951年11月27日的军事分界线相比，朝中方面共向南推进332.6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战争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是夜22时，即双方签字后12小时，双方同时停火，朝鲜停战实现。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在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共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 71 万余人，其中美军 29 万余人、英法等其他“联合国军” 2 万余人、南朝鲜军 39 万余人，共击毁和缴获敌军坦克 1492 辆、飞机 4268 架。连同朝鲜人民军单独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共毙伤俘敌军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 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有效地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志愿军共伤亡 36 万余人，其中有 11 万余人牺牲（包括第 39 军副军长、1930 年参加革命的吴国璋，第 50 军副军长、1929 年参加革命的蔡正国，第 23 军参谋长、1930 年参加革命的饶惠潭，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等）。损失飞机 231 架，消耗作战物资 560 余万吨；战费开支 62.5 亿元人民币。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不但朝鲜人民军同志愿军密切协同，并肩作战，而且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也给了志愿军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全力以赴的支援。据统计，朝鲜人民仅为志愿军运送伤员、物资和担负其他战勤的人数即达 30 万人次以上，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它充分显示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同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忱和民族自尊心，推动了我国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和军事学术水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体现现代化作战特点较突出的一场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同我军历史上的其他战争相比，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诸如敌我装备优劣的程度更加悬殊、在别国领土上作战、我军也首次出现相当规模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尽管是比较初级的）等。适应这些新情况、新特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在战争指导中也有许多新创造、新发展，积累了许多新经验，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诸如：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针，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逐渐向打大歼灭战过渡；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解决作战和休整、补充的矛盾，并广泛锻炼部队；创造了坚守防御作战的新经验，特别是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和一套比较完整的坑道战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适应我军特点的后勤保障体系；积累了组织全面对空防御斗争的经验；积累了以军事斗争紧密配合政治斗争，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战争指导经验；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和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提高作战能力，并初步积累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经验；充分运用和发展了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经验，等等。这些，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进行了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并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至 1958 年 10 月，圆满地完成了中国人民赋予的伟大的光荣历史使命，全部撤离朝鲜，凯旋回国。

1958 年 2 月 27 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签署《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行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业绩作了高度评价。其中指出：

“在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部队派遣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结下的传统友谊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好团结的新榜样。

“他们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同全体朝鲜人民和她英雄的人民军队一起，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扬了无比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不仅打败了入侵的敌人，捍卫了我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也作出了光辉的贡献。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巩固朝鲜停战成果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积极帮助了朝鲜人民战后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斗争。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

“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地友好团结将永世长存。”

结束语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长达 23 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紧紧依靠人民并同人民一道，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实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外来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邻邦朝鲜、入侵我国领土台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以一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与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经过近三年浴血奋战，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英雄凯歌。通过历次革命战争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达 1/4 世纪的革命战争中，何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强大敌人而取得伟大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由于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在获取各次革命战争胜利的诸种因素中，最根本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这里仅就其基本方面加以概括和总结。

一、建设一支强大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人民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武装斗争道路。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的重要性，于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认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固然重要，但是解决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则尤为重要。对于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在我军建军之初，经历了一段摸索过程。1927年，在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并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同时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及至到达井冈山之后，又规定红军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进而在部队中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部队受旧式军队影响较重，存在两种不同的建军思想。直至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两年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写出了《古田会议决议》，从而形成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完整的建军原则。决议规定我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从而，明确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划清了我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本质界限。决议还特别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肃清红军中存在的一切旧式军队影响，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以及绝对平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对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古田会议决议》逐步推广到各地红军。成为指导全军建设的准则。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我军建军宗旨概括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军的三大任务也由建军初期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发展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这样，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在解决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问题之后，还必须解决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我军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建设新型的强大的人民军队，首要的是确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决定因素和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脱离或削弱党的领导，军队就必然变质和遭受挫折，甚至有被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敌对势力所篡夺，成为他们反革命的武器的危险。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同党争兵权的历史教训时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在全国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来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我军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则坚持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而保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人民军队的本色。党的领导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在政治上，要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在思想上，要不断加强对广大指战员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主观。自 1929 年古田会议后，我军更加重视部队思想教育，并以此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我军历史上空前普遍和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思想和理论水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组织上，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建立、健全党委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加强政治机关。自 1927 年南昌起义，特别是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开始，我军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委和政治委员制度，成为我军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屡克强敌而不溃散的决定因素。抗日战争时期虽因客观形势变化，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建立各级军政委员会，领导部队各项工作，但党的领导的实质没有变。虽然一度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取消了政治委员，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但不久就得到纠正，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我军分布于敌后战场等新情况，中央军委先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建立了分会，从而加强了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1942 年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发挥党政军民总体力量，战胜严重的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中进一步健全了党委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项根本制度，对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实践证明，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战胜敌人和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军的历史还证明，建设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建立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和战斗力的保障，这是已披历次革命战争所证实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政治思想工作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和形成，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和发展，及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具有鲜明的党性、深刻的理论性和颇富实践性的一门科学。这是我军区别于其他类型军队的重要标志。经验证明，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必须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的贯彻实施作为根本任务，把部队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我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实现土地革命目标而战。特别是在长征中鼓舞士气，使部队保持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等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开始，政治工作又保证了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顺利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并坚持了敌后艰苦抗战，直至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工作又保证部队为打倒蒋介石，解放个中国而英勇奋战。正是强有力的、不间断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我军始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和捍卫者。其次，政治思想工作要把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即大力加强部队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增强了胜利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着重加强部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民族责任感，使部队同仇敌忾，舍生忘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在

解放战争中，则大力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部队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英勇杀敌，涌现出许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献身的英雄人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思想工作则加强部队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蔑视、鄙视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使部队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勇敢杀敌，浴血奋战，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一切现代战争手段的美国侵略军，出现了众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基础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从而保障了部队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历史一再证明，适应斗争形势，不断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是保持部队的旺盛士气和顽强斗志的根本措施。第三，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贯彻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以及监督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尊干爱兵”活动，保证军民、军政、官兵和上下级之间的良好关系。第四，政治思想工作，不仅要保证部队有高度自觉的纪律性，而且要大力贯彻和保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战术水平的目的。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建设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还必须努力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政治建军固然重要，然而军事素质差的军队依然不能生存、发展和战胜敌人。我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强敌“围剿”的频繁战斗之中。尽管如此，毛泽东和当时红军的一些其他领导人，仍然创造一切条件来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毛泽东提出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一重要指导思想，并在井冈山创办了红4军第一个教导队。以后，随着战争和红军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以及各种专业教导队和培训班，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则将红大改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10余所抗大分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训出20多万干部。1939年至1940年，还在八路军中先后进行了四期整军，不仅整编了100多个团，巩固了大发展的成果；而且加强了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1944年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大练兵运动，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举行全面反攻准备了条件。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各大战略区根据中央军委要求，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并开办各种军事院校培训了大批干部，保证大规模作战和部队发展的需要。

建立和建设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我军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经历了漫长的创建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经验。这些经验已经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对我军现在以至今后的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战争，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我军所进行的历次革命战争，都是人民战争。毛泽东依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先后提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构成了我军实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

实行人民战争，首要的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和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都是把宣传、组织、动员和武装群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成为我军三大任务之一。动员群众，除了揭露敌人，宣传我军所进行的战争的政治目的及其革命性与正义性以外，还必须把革命战争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人民支援和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红军都把推翻当地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解决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同宣传动员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的积极性，保证红军的给养和兵源。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范畴更加扩大，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赞成团结抗战的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指引下，我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并在各根据地内协助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和加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抗敌积极性，对我军月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协助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大力进行土地改革，唤起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和支前，为保家保田而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宣传动员群众，把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联系起来，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热忱，积极参军、参战、支前和捐献，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历次革命战争经验证明：进行人民战争还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或巩固的战略后方，以为战略基地。没有这样的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革命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军队也难于生存和发展。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是敌人的统治重心，加之敌我强弱悬殊，中国革命不能首先夺取城市，后取乡村，必须走相反的路，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集聚和发展力量，以乡村包围城市 and 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最早认识这一特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我党我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此之后，党领导其他各地起义武装，也先后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创建了诸如湘鄂西、鄂豫皖等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把土地革命推向高潮。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毛泽东关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思想指引下，不仅在山区，而且在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地区，先后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从而为进行解放战争和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直至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才宣布以农村为重点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时期。如果没有广大而巩固的农村

革命根据地作依托，没有根据地(解放区)广大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援战争，那么，红军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八路军、新四军打破日、伪、顽军的夹击，人民解放军消灭 800 多万的蒋介石军队，那都将是是不可能的。

各次革命战争历史还证明：实行人民战争必须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我军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屡克强敌，赢得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初步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工农暴动队而没有主力红军，就难以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只有主力红军而没有地方武装，则主力红军就成了“独臂将军”。至抗日战争时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各大抗日根据地除主力军外，一些军区有独立旅、军分区有独立团、县有大队、区有中队等地方武装，以及广大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到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并说：我军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战争实践证明，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主力军犹如“种子”，每到一地即协助当地党政机关建立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经过以老带新的培养和作战锻炼，提高了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尔后或将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军，或以其部分补充主力军，再以民兵、自卫军补充地方武装，这样逐步升级，既保证主力军有大量合格的预备兵源，不致因大量补入新兵而使战斗力下降；又不致削弱地方武装。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还有利于相互配合作战。主力军担负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地方武装担负保卫地方的作战任务，民兵自卫队担负保卫家乡和生产的任务，三者相互配合。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还有利于根据地和后方的稳定。正常情况下，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担负保卫地方任务，一旦斗争环境恶化，则以主力军一部“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或执行更为分散的武装工作队的任务，深入敌占区，开展军、政攻势，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之进攻，以保卫根据地。

实践还证明：实行人民战争，还必须采取多种斗争形式，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公开的军事斗争外，还在敌占城镇和敌军中开展隐蔽斗争，从事侦察敌情和秘密购运医药和电讯器材等军需物资，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及至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又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全面的对敌斗争，挫败了敌人的“总力战”；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使许多伪军投诚、反正，大大削弱了敌军力量。在解放战争过渡阶段，我军又将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同政治上谈判斗争紧密配合，结果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打击，在政治上争取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在战争后期，则以强大的军事压力结合政治争取，创造出“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使大批放军或接受和平改编，或起义，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也是把军事斗争与停战谈判结合起来，谈谈打打，最后迫使美帝国主义者签订停战协定。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在人民战争中采取多种斗争形式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历史经验证明，实行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指导路线。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条件，造成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核心部分，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三、采取适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因此，它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必须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军所实行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适应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放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产生了；随着红军壮大和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的形势，“诱敌深入”和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方针、原则提出来了，并应用于战争中，取得多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抗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等战略战术原则，保证了抗战的胜利。及至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针对当时战争形势，总结我军历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我军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法宝。

历史经验一再证实：确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必须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综观我军作战历史，凡是能根据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来确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就胜利，就发展；凡是违背这一原则，脱离客观实际，主观片面地确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我国国土辽阔，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余地等特点，决定我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而在战役战斗上则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以及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而粉碎了强敌多次大规模“围剿”，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获得大发展。而各次“左”倾机会主义、特别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上述特点，或采取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占中心城市，或采取军事保守主义，以堡垒对堡垒，与敌展开阵地战，拚消耗，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和苏区遭受空前的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的非正义性，我之战争的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特点，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根据我军独具的特点，决定我军到敌后抗战，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军在敌后获得大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解放战争初期，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我军仍然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导原则，从而使我军迅速粉碎敌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在军事技术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在战争前期采取运动战作战形式，抓住敌之弱点，适时举行反攻，把敌人赶到三八线，尔后转入阵地坚守防御作战。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根据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确定战略战术原则是何等重要！

各次革命战争历史还告诉我们：必须根据战争对象和战争的发展进程，适时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战争发展阶段，应采取

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各地红军刚刚建立，力量弱小，因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红军数量有所扩大，军政素质有所提高，并逐步形成游击兵团，于是就由游击战争向中国型的正规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如果不实行这种转变，就会犯军事保守主义错误，丧失发展的有利时机。当土地革命战争结束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对象变了。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如果不实行这种转变，就会犯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以我军几万人数量与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打正规战，就会使我军吃大亏和消耗殆尽，这正是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希望的。到了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我军已成为百万大军，敌人已走向崩溃，因而我军开始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至解放战争初期完成了这一转变。解放战争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虽然敌我力量对比我仍居劣势，但我军在素质上有显著提高，装备上有很大改善，加以其他条件，因此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及至解放战争中后期除以大规模运动战为主，开始对敌坚固设防的城市展开攻坚战和对敌之增援的重兵集团展开阵地防御战，以保障我军在主要方向的行动。这对战争前期的运动战来说，也是一个变化和发展。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后，即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适时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对于适应敌我双方情况的发展变化，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和加速胜利的到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次革命战争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就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转变敌我的优劣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以及国际援助等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只说明胜负的可能性。能否取胜，还要看主观指导正确与否。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变化，而在历次革命战争初期都处于劣势的我军，则尤赖于主观指导的正确。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转变敌我的优劣形势，变被动力主动？根据我军历次战争实践，首要的是争取战场、战役战斗以至战争的主动权。主动权表现为军队的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则是军队的命脉。毛泽东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所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无不是从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无不贯彻积极、主动、灵活这一根本思想。诸如：在战略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中，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坚持歼灭战，反对击溃战；实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等等作战指导原则，都是为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我军正是坚决执行了上述作战指导原则，才得以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历次革命战争的实践还证明：要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实行战略反攻、进攻和战略决战。战略反攻一般是在敌之进攻已成“强弩之末”，战争或战场形势已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时进行。然而，我军在各时期的反攻都具有不同特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大苏区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多是先行退却，在退却中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如：进攻之敌疲惫沮丧，地形和人民条件有利于我，发现敌之

弱点以及我军兵力集中等等),尔后转入反攻。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局部反攻,是在日军集中主力打通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线时,利用敌军后方兵力薄弱之机发起的,而全面反攻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夜、日本帝国主义面临全面崩溃时发起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反攻,则是在敌集中兵力对我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而在其他战场取守势时,我晋察冀、晋冀鲁豫和东北野战军对各该地区之敌发起反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及时抓住敌以为中国不会出兵而分兵冒进时发起反攻。我军的战略进攻是发生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敌人的战略进攻尚未完全被打退,我军总兵力尚未超过敌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便果断地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进行防御作战,而以一部兵力转入战略进攻,并抓住敌军南线主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翼,其战线中央兵力薄弱的时机,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千里跃进,直插敌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其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因而一举成功,扭转了战争形势。战略决战,通常是战争一方已处绝对优势时,寻求对方决战,以夺取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在进行战略决战开始时,兵力数量上并未超过敌方,但在战略上已掌握主动权,特别是东北我军已具备就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能力;而敌军统帅部矛盾重重,进退失措,其政治经济已深深陷入危机之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决定进行战略决战,并首先由对我有利的东北战场开始,通过三大战略性进攻战役,赢得了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我军过去的战争岁月里发挥了无穷的威力,保证了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时代在前进,战争在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然而,其基本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全党全军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战争制胜的理论武器。过去我军靠它,无往而不胜;今后我军仍将靠它,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它,使之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这将是我军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